

徐一天
陈庆拥 主编

中国近代海军爱国将领传

唐宏
王红
编著
刘晓滨



中国近代海军爱国将领传

主 编 徐一天 陈庆拥
编 著 唐 宏 王 红
刘晓滨 袁华智
张晓辉

海 潮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近代海军爱国将领传/唐宏等编著. —北京: 海潮出版社, 1998. 10

ISBN 7-80151-055-0

I. 中… II. 唐… III. 海军—军事人物—生平事迹—中国 IV. K8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27244 号

中国近代海军爱国将领传

☆

海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三环中路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41)

烟台市牟平区第四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25 字数: 210 千字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ISBN 7-80151-055-0/K·3

定价: 19.80 元



邓世昌



林永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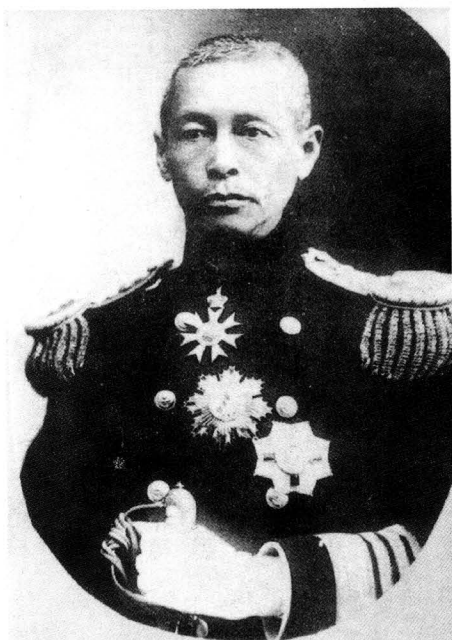
丁汝昌



刘步蟾



叶祖珪



萨镇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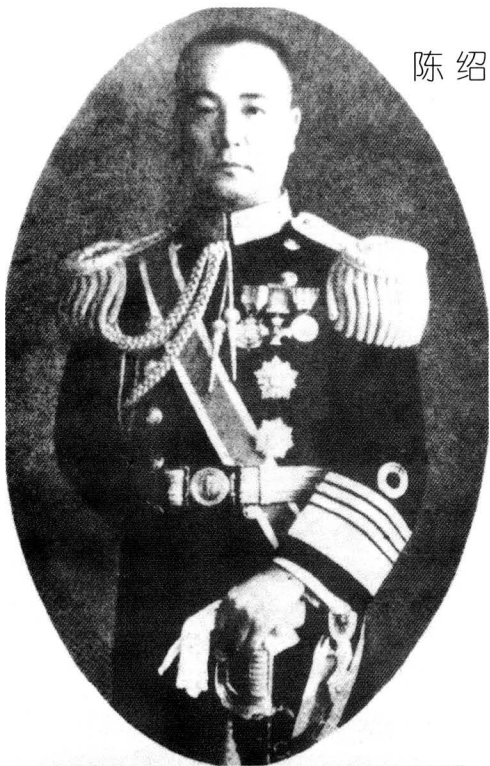


程璧光



黄钟瑛

陈绍宽



林遵



曾以鼎



邓兆祥



前言

在近百年的中国近代海军发展史上,既有屡战屡败的屈辱印记,更有可歌可泣的悲壮篇章。中国近代海军的爱国官兵们,在列强环伺、民族危难的险恶形势下,为建设强大海军,巩固万里海防,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为抗击外敌侵略,维护民族尊严,进行了英勇的斗争。由于政府腐败无能,国家积贫积弱,他们壮志难酬,抱恨终天。但是,他们舍生取义、为国捐躯的无畏精神和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悲怆呐喊,惊天地,泣鬼神,将永远激励和强烈震撼一代又一代爱国志士。在我们努力建设现代化人民海军的今天,尤其不能忘却那些为实现建设强大海军梦想而英勇献身的先驱者们。正是基于这样一个想法,我们编写了这本《中国近代海军爱国将领传》,旨在纪念海军英烈,弘扬爱国精神。

本书是第一部系统研究和专门记述中国近代海军爱国将领的著作,书中详细介绍了许寿山、陈英、吕翰、黄建勋、林履中、邓世昌、林永升、林泰曾、刘步蟾、丁汝昌、杨用霖、叶祖珪、萨镇冰、黄钟瑛、程璧光、陈绍宽、陈季良、萨师俊、曾以鼎、林遵、邓兆祥等 21 位海军著名爱国将领的生平事迹。

海军航空工程学院政治部主任徐一天、副主任陈庆拥领导了本书的编写工作,唐宏、王红、刘晓滨承担了本书编写的具体组织工作。本书撰稿人为唐宏、王红、刘晓滨、袁华智、张晓辉。其中,“许寿山”、“陈英”、“吕翰”、“邓世昌”、“林永升”、“林泰曾”、“刘步蟾”、“丁汝昌”、“叶祖珪”、“陈绍宽”10 传由唐宏撰写,“杨用霖”、“萨镇冰”、“黄钟瑛”、“程璧光”、“萨师俊”、“陈季良”、“曾以鼎”7 传由王红撰写,“黄建勋”、“林履中”2 传由刘晓滨撰写,“林遵”、“邓兆祥”2 传分别由张晓辉、袁华智撰写。最后,全书由唐宏、王红

统改定稿,徐一天、陈庆拥审定。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海潮出版社图书编辑室副主任、本书责任编辑崔树森同志以及海军航空工程学院洪庆根、徐珂文、陈澄乐、蔡磊等同志的热心帮助和大力支持,在此致以诚挚的谢意!

由于水平有限,时间仓促,书中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 著 者
一九九八年九月

目 录

捐躯马江的伟男子	
——记许寿山	(1)
男儿食禄 宜以死报	
——记陈英	(8)
见危授命 绝不苟免	
——记吕翰	(15)
为国尽节 不负所志	
——记黄建勋	(22)
临大节而不可夺	
——记林履中	(31)
有公足壮海军威	
——记邓世昌	(40)
争先猛进 奋不顾身	
——记林永升	(56)
舰存与存 舰亡与亡	
——记林泰曾	(65)
无愧舍生取义	
——记刘步蟾	(81)
决不弃报国大义	
——记丁汝昌	(98)

吾将以死报国	
——记杨用霖·····	(115)
不避危难 鞠躬尽瘁	
——记叶祖珪·····	(122)
从役何须问苦甘	
——记萨镇冰·····	(137)
尽力民国最多	
——记黄钟瑛·····	(156)
护法救亡 功在天下	
——记程璧光·····	(166)
清廉刚正 矢志报国	
——记陈绍宽·····	(183)
舰长必与舰共存亡	
——记萨师俊·····	(199)
要有鱼腹葬身的壮志	
——记陈季良·····	(207)
长江抗敌建功	
——记曾以鼎·····	(220)
坦骨东海 死得其所	
——记林遵·····	(231)
七十二载海军情	
——记邓兆祥·····	(245)

捐躯马江的伟男子

——记许寿山

1884年8月，中法两国海军在福州马尾江面爆发了著名的马江之战，拉开了中法战争的帷幕。马江之战是中国近代海军组建十年来的首战，在这次战役中，中国福建海军的“振威”舰管带许寿山壮烈殉国。许寿山是近代中国的第一批海军学生，也是最早为抗击外敌入侵而英勇牺牲的舰长之一。

（一）

许寿山，字玉珊，1853年出生于福建闽县（今福州）。许寿山的少年时代，正是中国海防危机不断加深的时期，也是中国近代海军蹒跚起步的时期。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清廷意识到中国海防的薄弱，所以在此后的十余年间，开始着手整顿旧有的水师。1856年爆发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再次使清廷尝到了有海无防的苦果，痛感海防危机。与此同时，清廷在同西方列强联合镇压国内太平天国起义的作战中，也对西方的坚船利炮有了更加直接、清晰的了解。于是，以朝中恭亲王奕訢、大学士文祥和在前线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为主的开明官僚，发起了一个向西方学习的洋务运动。创办军工企业，生产近代化的“坚船利炮”和枪枝弹药是洋务运动初期的主要内容。

1866年，闽浙总督左宗棠在福建马尾创办了近代第一个专门从事轮船制造的军工企业——福州船政局，负责生产近代化的舰船。在设厂造船的同时，左宗棠还在船政局内开办了福州船政学

堂。他认为,创办船政局不仅仅是为了生产几艘近代化的舰船,更重要的是让中国人学会生产和驾驶近代化舰船的知识和技术。所以,船政的根本在于学堂,在于培养掌握造船和驾驶技术的专门人才。

船政学堂最初称为“求是堂艺局”,按制造和驾驶两专业分为两个学堂。制造学堂专门培养船舶工程技术人才,驾驶学堂专门培养海军指挥人才。福州船政学堂是中国第一所近代海军学校,它的创建为中国近代海军的诞生和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因而被称为“中国海军萌芽之始”。

福州船政学堂招收 13—15 岁的少年入校学习,身体和文化条件都十分严格。1866 年,14 岁的许寿山报考了福州船政学堂,入学考试的题目是“大孝终身慕父母”。由于许寿山自幼喜爱读书,聪颖过人,所以顺利通过了考试,被船政学堂录取。

1867 年 1 月 6 日,福州船政学堂在总理船政大臣沈葆楨的支持下,正式开学。校舍先借用福州城南定光寺(白塔寺)空房和仙塔街亚伯尔顺洋房,不久后迁至马尾新校舍。

根据与船政局所处的位置,制造学堂又称前学堂,驾驶学堂又称后学堂。因为当时法国精于制造,前学堂多聘法国人为教习,学生上课用法语,所以,前学堂也称法国课堂;因为当时英国长于驾驶,后学堂多聘英国人为教习,学生上课用英语,所以,后学堂也称英国学堂。许寿山进入船政学堂后,被分在后学堂驾驶班,为该班第一期学生。

船政学堂的学习分为堂课学习和练船实习两个阶段。学生堂课学习结束后,还要被派上练习舰实习至少 2 年,期满合格后才算正式毕业。许寿山经过 4 年的堂课学习后,于 1871 年 6 月通过了堂课结业大考,一个月后开始上舰实习。在英国实习教师的指导下,许寿山和同学们乘“建威”号练习舰出海训练,练习驾驶与演炮。

“建威”舰原是普鲁士的一艘夹板船，名为“马得罗”，1870年底停靠马尾时，由船政局买下，按军舰式样改造后成为船政学堂的练习舰。该舰长 125 英尺，宽 27 英尺，排水量 475 吨，可容纳学生 30 余人、水手 100 余人。舰上配备后膛炮 1 门，前膛炮 4 门。

船政学堂的学生出海训练在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件新鲜事，因此引起特别的关注和重视。“建威”舰第一次出海航行，先后到达了牛庄、天津、大连湾、烟台、威海等北洋港口。第二年，“建威”舰二度出海仍是乘风北上，历浙江、上海、烟台、天津至牛庄而折回。

1873 年 3 月，许寿山和同学们乘“建威”舰进行了远航训练，南下经厦门、香港至新加坡、槟榔屿，7 月返回，历时 4 个月。在实习中，许寿山勤学苦练，“涉练风涛、沙线，考究航道，均有心得”，收获非常大。船政大臣沈葆楨对许寿山的表现和能力十分满意，认为他是一位可造之才。

(二)

毕业后，许寿山先在陆军中担任过一段时间的教习，不久调到“扬武”号练习舰上任大副，授千总。

1874 年，日本制造借口，出兵台湾。清廷因担心海军力量不敌日本，被迫与日本讲和，以赔款和默认日本占有琉球换得日本撤出台湾。这一事件再次刺痛了清廷，使其深感加快海军建设的重要。1875 年 5 月，清廷命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负责北洋海防建设，命沈葆楨为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负责南洋海防建设。从此，中国进入大规模发展海军的时期。

1877 年 9 月中旬，许寿山被任命为福建海军“艺新”号炮舰的管带。“艺新”舰是福州船政局 1876 年生产的一艘新舰，是由船政学堂毕业学生自己设计制造的第一艘军舰。这艘炮舰只有 254 吨，200 匹马力。由于舰小，遇有风浪时颠簸得非常厉害，所以，它不能做远洋航行，专门用于风后在沿岸巡逻救生，援救那些遇险的船只

和船民。

许寿山对这项工作十分认真，尽心尽职。他不辞劳苦，不避危险，经常在风急浪高的恶劣天气里，指挥“艺新”舰出海，沿岸梭巡，多次发现险情，并及时救助遇险的船只和人员。由于工作出色，许寿山不久即因功升任守备。

1880年4月，李鸿章将沈葆楨生前委托他从英国购买的4艘浅水炮舰“龙骧”、“虎威”、“飞霆”、“策电”移交给南洋海军。许寿山被调任“虎威”舰管带，驾舰前往南洋江宁（今南京），听候南洋大臣调遣。此后的几年里，许寿山便留在南洋海军中。

许寿山任舰长多年，具有丰富的海上经验，是一位出色的海军军官。不仅如此，他还擅长书法，工于诗文，时人称赞他有儒将之风。许寿山常常以文会友，相互切磋。每次得到朋友的诗文佳作或书画精品，他都爱如珍宝，精心收藏。每到酒后微醉，皓月当空，或是春风拂面，鸟语花香，许寿山便会乘兴取出，或琅琅诵读，或细细品评，情溢言表。许寿山为人清正，深得朋友尊敬，也深得属下的拥戴和上司的信任。

许寿山生性豁达，喜欢游历名山大川，寄情于山水之间。他倾慕并喜欢结交侠肝义胆的豪杰，自己也常以豪杰自许，希望能为国尽忠效力，不负平生之志。

许寿山在南洋海军任职数年后回到福建。不久，因中法关系恶化，法军舰队入侵，爆发了马江之战。

1883年底，中法关系因法国出兵北越而变得越来越紧张，最后导致双方军队在越南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法国想变越南为它的殖民地，而中国是越南的宗主国，双方互不相让，战争的阴云骤起。法国要求中国从北越撤军，并赔偿法军与清军冲突所造成的损失。为迫使中国同意法国的无理条件，法国海军的一支分舰队在海军中将孤拔指挥下，驶来中国沿海，扬言要夺取中国沿海口岸作为抵押。

1884年7月，法国舰队以“游历”为名驶入马江，停泊在福建海军的基地马尾港，与福建海军对峙。当时，清廷不愿冒与法国爆发全面战争的风险，希望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两国争端。所以，对法国舰队闯入马江不敢采取对抗的措施，担心激化矛盾，引发战争。福建地方当局囿于清廷“不可衅自我开”的指令，加之对海军作战缺乏了解，所以没有进行有效的战争准备。

中国海军经过10年发展，已初步形成北洋、南洋、福建、广东4支舰队，其中以南北洋海军为最强。福建当局和清廷深知福建海军实力远不敌法国舰队，所以多次要求南北洋和广东海军派舰支援。但南北洋均以种种借口拒绝，只有广东海军派舰来援。但由于广东海军实力最弱，它的来援无法改变敌强我弱的形势。

福建海军孤军抗敌，形势显得十分严峻。正在福建的许寿山毅然接受福建海军的征召，出任福建海军“振威”号炮舰管带。“振威”舰是福州船政局1873年制造的一艘木质军舰，只有572吨，350匹马力，时速不足9海里，舰上只装备有5门炮，其中后膛炮4门，前膛炮1门，攻击力和防护力都很弱。尽管“振威”舰早已陈旧落后，但受命于危难的许寿山还是积极地作好战斗准备，使军舰处于最佳状态，随时可以参加战斗。后来的事实也说明，“振威”舰是福建海军中准备最为充分的一艘军舰。

（三）

许寿山担任“振威”舰管带还不到一个月，马江之战就爆发了。此时，福建海军在马尾港驻泊有11艘军舰，其中包括广东海军来援的2艘军舰。福建海军的8艘军舰停泊在罗星塔的上游，负责守卫船厂；许寿山指挥的“振威”舰和广东来援的两艘炮舰“济安”号、“飞云”号，停泊在罗星塔下游海关附近，与法国的3艘巡洋舰和4艘炮艇对峙。

1884年8月23日上午10时，一切准备就绪的法国舰队将开

战通知送交闽浙总督何璟，声明 4 个小时后，也就是下午 2 时，正式开战。在此前 2 个小时，各国驻福州领事及停泊在马江上的英国和美国军舰都已接到了同样内容的通知。

何璟接到开战通知，惊得目瞪口呆，不知所措。迟至 12 时，他才将开战通知转达给马尾前线的会办大臣张佩纶和船政大臣何如璋。此时，福建海军一直恪守“静以待之”的训令，缺乏准备。张佩纶、何如璋担心军心瓦解，不敢把开战通知告知各舰，决定派船厂工程长魏瀚前往法舰谈判，请求法军推迟到明日开战，理由是中国方面没有作好准备。

当魏瀚乘坐的小船驶向法国舰队的旗舰时，正在舰上观察福建海军动静的舰队司令孤拔中将误以为是福建海军要抢先发起攻击，急忙发出了战斗信号。马江之战提前 15 分钟打响了。当时，法国军舰处于福建海军南北夹击之中。所以，法军的进攻是从罗星塔上游和下游两个方向同时展开的。

许寿山指挥“振威”舰一直密切注意法国军舰的动向，保持高度的戒备。所以，当法国军舰首先攻击福建海军的旗舰“扬武”号时，“振威”舰最快作出反应，猛烈的炮火立刻射向停泊在它附近的法国巡洋舰“德斯丹”号。与“振威”舰同泊的广东海军的 2 艘炮舰“济安”和“飞云”，由于毫无防范，还没有来得及启锚，就被倾泄而来的炮弹击中，燃起熊熊大火，很快就沉没了。这样，在罗星塔下游方向，只剩下“振威”一舰与敌舰相抗。

开战后，“振威”舰首先遭到从闽江口疾驶而来的法国巡洋舰“凯旋”号的袭击。许寿山一面传令砍碇应战，一面冒着炮火登上望台指挥。法军见“振威”舰反应迅速，料想必是劲敌，担心它一旦行动起来，就难以控制。于是，集中 3 艘军舰的火力，围攻“振威”舰。

在敌舰密集炮火的攻击下，许寿山毫无惧色，指挥若定，频频发炮还击。但“振威”舰很快多处中弹，引起大火和爆炸。许寿山一面传令开炮还击，一面指挥“振威”舰开足马力，向附近的法国巡洋

舰“德斯丹”号冲击，要与敌舰同归于尽。法军的另一艘巡洋舰见势不妙，急忙以舷炮拦击。“振威”舰锅炉被击中，轮叶也被击毁，江水涌入舱中，舰体开始缓缓下沉。

这时，许寿山仍指挥全舰官兵继续奋力还击。当时，一位西方人目睹了“振威”舰官兵的英勇顽强和许寿山战斗到最后一刻的动人场景。他带着钦佩的口吻描述说：“这位管驾具有独特的英雄气概，其高贵的抗战自在人的意料中；他留着一尊实弹的炮等待最后的一着。当他被打得百孔千疮的船身最后倾斜下沉时，他乃拉开引绳，从不幸的振威发出嘶嘶而鸣、仇深如海的炮弹……”

“振威”舰发出的这最后一发炮弹，准确地击中了敌舰，敌舰长和 2 名士兵被炸成重伤。那位西方目击者对此惊叹不已，对“振威”舰的英勇抵抗给予高度评价，称“这一事件，在世界最古老的海军记录上均无先例。”

在激战中，许寿山与大副梁祖勋被敌舰射来的机关炮炮弹击中，壮烈牺牲。许寿山时年仅 31 岁。

许寿山为国捐躯后，人们都对他的英勇精神赞佩不已，称赞他是一位伟男子。许寿山为官廉洁，从不苟取，好接济他人危困，所以死后家无积蓄，十分清贫。许寿山牺牲后，尸体也随滔滔马江而去，未能寻到。

清廷得知许寿山为国尽忠的消息，传旨按照游击例从优赐恤，入祀战后兴建的昭忠祠，予荫一子云骑尉。许寿山无子，以弟弟之子庆霖为嗣，承袭世职。

男儿食禄 宜以死报

——记陈英

陈英是福建海军一位年轻的舰长，在 1884 年 8 月的马江之战中，他率舰抗敌，表现英勇，最后壮烈牺牲。《清史稿》在评价马江之战时，称赞陈英“战最烈”。

（一）

陈英，字贻惠，福州人。史书上称他为世家读书子弟，可见他是出生于书香门第。陈英少年时聪慧好学，考入福州船政学堂，为后学堂驾驶班第三期学生。

船政学堂的招生时间和人数都不固定，第一期驾驶班学生为 33 人，第二期则减少至 13 人，陈英这期学生只有 8 人，第四期学生又增加到 26 人。第三期学生虽然人数最少，但后来出了不少知名人物。除陈英外，还有后来在马江之战中阵亡的福建海军“建胜”舰管带林森林、在黄海海战中殉国的北洋海军“扬威”舰管带林履中及在民国时曾任海军总司令的蓝建枢等。

经过几年的刻苦努力，陈英结束了堂课阶段的学习，转上练习舰实习。船政学堂原有的“建威”号练习舰，使用数年后已损坏不堪。1875 年 1 月，法国人日意格建议将船政局制造的“扬武”舰改作练习舰。“扬武”舰是福州船政局生产的第 7 号军舰，于 1872 年建成下水，为中国近代海军的第一艘轻型巡洋舰。“扬武”舰为木壳暗轮，排水量 1560 吨，马力 1130 匹，航速 12 节，装备有 13 门炮，可配兵员 250 余人，是福建海军最大的一艘战舰。

1875年5月,经朝廷批准,船政学堂接收了“扬武”舰,并将其改造为练习舰,由记名提督蔡国祥暂任督练,聘请英国人德勒塞担任总教习。9月30日,改造完毕的“扬武”舰首次出海试航,10月3日顺利返回。

随后,学堂将“建威”舰上原有的实习学生移入“扬武”舰,又将第二期学生萨镇冰、叶琛等和第三期学生陈英、林履中等8人派上“扬武”舰,一同实习。陈英等随“扬武”舰航行外海,先后到过新加坡、小吕宋、槟榔屿各埠,最后到日本而返。通过实习,陈英等增长了见识,各项技术也日趋成熟。在1876年进行的福建海军各舰操演中,“扬武”舰枪炮射击成绩最好,中靶最多。而实习学生们的成绩则要优于舰上水手的成绩。这次操演是对陈英等实习效果的最好检验,说明他们已逐渐成为合格的海军军官。

陈英毕业后,留在福建海军任职。自1874年发生日本侵台事件后,清廷痛定思痛,开始大规模建设海军。按照最初的规划,打算在10年内建成北洋、南洋、粤洋3支海军舰队,史称“三洋海军”。北洋包括奉天、直隶、山东沿海,由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负责;南洋包括江苏、浙江沿海,由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沈葆楨负责;粤洋包括福建、广东沿海。拟议中的粤洋海军并没有专人负责,福建和广东两省凭借各自的优势,独立发展起自己的海军舰队。于是,拟议中的“三洋海军”在实际发展过程中变成了“四洋海军”,即北洋海军、南洋海军、福建海军和广东海军。

清廷开始筹建海军时,各省的实力以福建最强,拥有海军学校、造船厂和马尾海军基地。所以,福建海军是四洋海军中最早粗具规模的一支。陈英进入福建海军时,正是它大力发展的时期。但到了80年代,由于种种原因,福建海军的实力相对下降。当时,最强的是南洋海军,其次是北洋海军,最弱的是广东海军。福建海军落在了第三位,实力仅比广东海军略强一些。

由于各地发展海军的需要,船政学堂有不少毕业生或调往南

洋,或调往北洋,离开了福建海军。陈英进入福建海军后,服役多年,一直没有离开。到1884年中法战争以前,他以五品军功担任福建海军“福星”号炮舰的管带官。

(二)

1884年7月14日,法国舰队闯入马江,福建形势骤然紧张起来。由于清廷采取妥协政策,南北洋海军又拒绝派舰南下来援助福建,势单力薄的福建海军面临严峻的考验。

会办福建海防事务大臣张佩纶、福州将军穆图善和船政大臣何如璋等前线大吏见形势危急,屡次请求清廷准许封锁闽江口,采用突然袭击的办法,先行攻击法国舰队,以先发制人的攻势来弥补福建水陆防卫力量的不足。但是,清廷仍寄希望于同法国和平谈判解决两国争端,不同意张佩纶等人的建议,要求驻福建的部队“静以待之”,“不可衅自我开”。这样就彻底束缚了前线官兵的手脚,听任法国舰队加强在马尾的力量,从容作好了战争准备,使福建海军处于更加明显的劣势。

到开战前,陆续驶入马江的法军舰艇已有10艘之多,其中巡洋舰5艘,炮舰3艘,此外还有2艘鱼雷艇。

在马尾停泊的中国军舰有11艘,其中福建海军的轻巡洋舰1艘、炮舰4艘、浅水炮舰2艘、运输舰2艘,另外有广东海军来援的炮舰2艘。法国军舰无论在吨位、马力、舰炮火力和装甲防护方面都超过了福建海军。福建海军的11艘军舰中有9艘是福州船政局70年代初的产品,早已陈旧过时,许多舰船的轮机还在水线以上,很容易遭到破坏;而且,这9艘军舰都是木制的,未装铁甲,虽然外表美观,但质地脆弱。福建海军各舰的火炮多是前膛炮,也没有防护铁板,不仅火力小,射速慢,而且也很容易被击毁。法国舰队装备的都是后膛炮,并有重甲防护。此外,法国舰队还装备了当时先进的鱼雷装置和机关炮。而福建海军没有机关炮也没有机关枪,更没

有先进的鱼雷装置。

法国舰队占有的绝对优势，使福建海军的各位舰长深感忧虑。陈英在福建海军任职多年，对福建海军的弱点更是了如指掌，深知一旦法军开战，后果将不堪设想。但是，敌强我弱的态势并非完全无法弥补，如果布置得当，先发制敌，局面有扭转的可能。陈英尽管只是一个五品军功，但他“位卑不敢忘忧国”，毅然上书前线最高指挥官、会办福建海防大臣张佩纶，剖陈利害并献破敌之策。陈英在分析了中法双方力量对比后，请张佩纶当机立断，先敌发起进攻，争取主动。他建议集中各舰火力，首先攻击法国舰队司令孤拔中校的旗舰“窝士达”号巡洋舰，以迅速坚决的打击重创该舰，使整个法国舰队因失去指挥而陷入混乱。然后，福建海军各舰与陆上炮台相配合，对抗法军各舰。

当时，法国舰队配备有两艘 32 吨重的鱼雷艇，对福建海军构成很大威胁。陈英建议组织旧水师艇船用火攻牵制下游的敌舰，然后派小商船水勇和捍雷船阻截法国鱼雷艇，使其无法发挥作用。

张佩纶是清廷一位积极的主战者，但他不谙军务，对近代海军作战更是一窍不通，只是纸上谈兵。在强敌压境的情况下，他早已惊惶失措，只知株守清廷“不可衅自我开”的命令，不敢临机决断。他收到陈英的上书，觉得有些道理，并将这一上书的内容转达给其他舰长。但仅此而已，再也没有下文了。实际上，张佩纶并没有对陈英的建议给予应有的重视，当然也就谈不上认真组织实施了。

1884 年 8 月 15 日，法国舰队的 4 艘军舰在舰队副司令利士比少将的指挥下突然袭击了台湾基隆，企图一举将其占领。由于中国守军的顽强抵抗，法军进攻失利。法军的 3 艘军舰返回马尾港，会合其他军舰，准备袭击福建海军，并破坏马尾港和福州船厂。

法军进攻基隆，战争意图已暴露无疑。但清廷仍在幻想和谈，迟迟不下令对法国宣战。在福州的大吏们也囿于朝廷成命，不敢临机处置，先发制敌。这就注定了福建海军的可悲命运。

(三)

1884年8月23日下午1时45分,与福建海军“和平共处”四十多天的法国舰队,发动了突然而猛烈的进攻。

法舰的进攻是在罗星塔上游和下游两个方向同时展开的。上游方向的法国军舰,在旗舰“窝士达”号的指挥下,首先集中火力轰击福建海军的旗舰“扬武”号巡洋舰。当时,法国军舰同中国军舰首尾相衔而泊,法舰利用退潮转移船身之机发起进攻。这时法舰正好是以舰首火力攻击中国军舰的舰尾。舰尾是军舰最薄弱的部位,极易遭到破坏;而且,中国军舰要作整个半圆形的回转才能攻击敌舰。法舰选择这一时机进攻是极为有利的,所以一开战法舰就掌握了主动。

“扬武”舰在遭到法舰的进攻后,立即发尾炮还击,第一炮就打中了“窝士达”号,当场击毙5人。这时,法国海军中尉道詹斯指挥46号鱼雷艇,迅速冲近“扬武”舰,发起鱼雷攻击。随着一声巨响,“扬武”舰右舷被鱼雷击中重伤。

法国军舰在向“扬武”舰发起进攻的同时,也向其附近的“福星”、“建胜”、“福胜”等舰猛烈射击。

当时,停泊在罗星塔附近江面的还有英国军舰“警戒”号、“冠军”号、“蓝宝石”号和美国军舰“企业”号及各国商船。战前,法国舰队预先告知了他们开战的消息。所以,战斗打响前,英、美军舰和各国商船纷纷启锚驶离战区。在“福星”舰上观察敌情的陈英,见形势异常,判断敌舰有可能发动进攻。于是,他命令“福星”舰作好战斗准备。但是,由于法军提前发动进攻,“福星”舰来不及更充分地准备就投入了战斗。

战斗打响后,法国海军中尉莱佩里指挥的45号鱼雷艇,企图偷袭“福星”舰。陈英对法军鱼雷艇格外提防,早有准备。当45号艇接近“福星”舰时,立即遭到猛烈的阻击。由于45号艇快速冲来,

双方距离太近，“福星”舰上的官兵只得用步枪甚至手枪、手榴弹攻击敌人。45号艇遭到突如其来的打击，损失严重，伤亡多人，艇长莱佩里的眼睛也被打伤。于是，45号艇急忙掉转船头，逃向美国军舰“企业”号的附近，求得庇护。

陈英指挥“福星”舰击退法军45号艇后，急令砍断锚链，调转船头，救援“扬武”舰。但“扬武”舰已受重伤，燃起大火，勉强撤出战斗，在近岸搁浅，管带张成等弃舰跳水逃生。不久，这艘1500吨重的巡洋舰便带着浓烟烈火沉入马江。

这时，与“福星”舰同泊的“艺新”、“伏波”两舰也中炮受伤，驶向上游福州方向避战。“福星”舰的周围只剩下“福胜”、“建胜”2舰。陈英身边一个姓程的仆人见形势危急，劝他将“福星”舰也驶向上游躲避。陈英闻言勃然大怒说：“你想让我当逃兵吗？”说罢连声将其斥退，继续指挥战斗。

“福星”号炮舰是福州船政局1870年生产的一艘木质军舰，只有515吨，80匹马力，装备有5门过时的前膛炮，火力很弱，对远处的敌舰构不成大的威胁。陈英对舰上官兵说：“今天是我们报效国家的时刻了。我们的军舰和火炮都小，不深入敌阵，接近敌舰，不足以攻击敌人。如果我们率先冲向敌舰，其他各舰定会跟进。这样，我们或许还有获胜的可能。”舰上官兵深为陈英的勇敢精神打动，“喑声雷动”。于是陈英下令开足马力，冲向敌舰。陈英不顾弹如雨集，血肉风飞，屹立在望台之上，指挥“福星”舰集中火力猛攻孤拔旗舰。

孤拔见“福星”舰怒驶而来，急忙指挥3艘军舰拦击。陈英高喊：“男儿食禄，宜以死报，今日之事，有进无退！”激励舰上官兵。“福星”舰力敌数舰，毫不退缩。但终因炮火太弱，未能重创敌舰。

激战中，一发炮弹击中陈英，他那瘦弱的身体立即扑倒在望台上。这位英勇的舰长就这样壮烈殉国了。

陈英牺牲后，三副王涟接替他指挥开炮，不久也中弹牺牲。“福

星”舰“死伤枕籍，仍力战不退”。

敌舰施放鱼雷，击中“福星”舰的暗轮。接着，舰上火药舱又中弹起火，引起阵阵剧烈的爆炸。法舰将“福星”舰包围，并派兵冲上舰来，升起法国国旗，企图俘获该舰。但完全失去战斗力的“福星”舰最终缓缓沉入江中。“福星”舰上的 95 名官兵，阵亡 70 余人。“福星”舰作战之英勇，不仅使法舰丧胆，连在一旁观战的英美各舰也为之惊叹不已。

陈英阵亡时为五品军功，因为他在战斗中表现英勇，清廷追授他都司衔，并按照都司阵亡例，从优议恤。马江之战后，为表彰和纪念阵亡将士，清廷在马限山下修建了一座昭忠祠，陈英等 700 余名官兵入祠。他们的英勇事迹至今仍受到人们的缅怀。

见危授命 绝不苟免

——记吕翰

吕翰是中国近代海军初创时期的一位优秀军官，也是最早担任舰长的船政学生之一。在 1884 年的马江之战中，吕翰表现英勇，为国尽忠，时年仅 31 岁。

（一）

吕翰，字赓堂，1853 年出生于广东鹤山。吕翰的父祖都是读书人，由于家庭的教育和熏陶，他自幼就聪明好学。广东是中西文化交汇较早的地区，人们的思想也比较开放。当时，大多数的父母都希望儿子一心只读圣贤书，将来通过科举谋取一官半职。而吕翰的家人却让他自幼就去接受西方近代化教育，把他送进上海英国教会开办的英华书院学习。14 岁时，吕翰从这所学校毕业。通过几年的学习，他了解了不少近代科技知识，并打下了很好的英语基础。

1867 年福州船政学堂初创时，由于在福建招生太少，船政大臣沈葆楨决定再从广东、香港一带招考一批具有一定文化基础、英语水平较高的学生进船政学堂学习。最后，吕翰、邓世昌等 10 人被录取，与先行录取的刘步蟾、林泰曾、许寿山等福建学生，同为船政后学堂第一期驾驶班的学生。

1871 年 6 月，吕翰以优异的成绩结束了堂课学习，转上“建威”号练习舰实习。

吕翰先后随舰游历了南北洋各口和新加坡、小吕宋、槟榔屿等地，开阔了眼界，增广了见识，所学的各项技艺也在实践中得到了

提高。在 1873 年 3 月“建威”舰进行的远航训练中，吕翰表现突出，成为实习学生中的佼佼者。这次实习从马尾出发南下，经厦门、香港至新加坡、槟榔屿，历时 4 个月，扣除在各码头停泊的时间，在海面上实际航行 75 天。去时由英国教习亲自指挥驾驶，学生们认真记录、练习。返回时，则由实习学生们自行轮班驾驶。遇到恶劣天气，海面上狂风大作，巨浪如山，军舰颠簸震撼。每当这时，教习都注意观察每位实习学生的表现，通过一举手一投足判断其技术是否精熟，神色是否镇定，以此来区分他们的优劣。然后作详细的记录，作为将来选用的参考。

船政大臣沈葆楨根据英国教习的实习记录，向朝廷报告了实习情况并提出使用意见。他在上奏中说：“其驾驶心细胆大者，则粤童张成、吕翰为之冠。”因此，“臣谨拔张成、吕翰管驾闽省原购之海东云、长胜两轮船，使独当一面，以观后效。”

“长胜”是 1865 年由左宗棠购买的一艘英国轮船，“海东云”是闽浙总督英桂 1869 年从外国商人手中购买的一艘轮船，2 船加以改造后，作为炮舰，担负沿海缉盗任务。吕翰与张成分别担任“长胜”、“海东云”舰的管带，使他们成为近代海军中最早担任舰长的海军学校毕业生。这是受过近代化正规教育的海军军官逐步取代行伍出身的旧水师军官的开始，也是中国海军走向近代化的一个标志。

船政大臣沈葆楨是著名民族英雄林则徐的女婿，他本人也是一个开明爱国的官员，为中国近代海军的创建殚精竭虑，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沈葆楨深知加强海防，发展海军的重要意义，因此急切盼望他主持的船政学堂能尽快培养出海军建设所需的人才。吕翰刚刚毕业，就被他委以管带的重任，足见他需才之心切。这一年，吕翰才 20 岁。

吕翰担任管带后，学识和才干进一步显露，深得沈葆楨的赏识和信任。不久，沈葆楨委派他担任船政局刚刚建成下水的“振威”号

炮舰管带。

(二)

1874年5月,日本借口上年琉球渔民在台湾避风被杀一事,悍然派兵侵入台湾。琉球是中国的属国,它的渔民被台湾高山族人劫杀,日本无权单方面处理,更无兴兵问罪之理。明治维新后,日本走上对外扩张的道路,积极向海外拓展其势力,台湾成为它的一个猎物。于是,它以琉球宗主国自居,抓住已经过去的事件大作文章,意在乘中国内乱未平,海防未固之机,吞并台湾。

清廷得知日本侵入台湾的消息,立即照会日本外务省,提出抗议,要求日本撤军,遭到拒绝。于是,清廷任命船政大臣沈葆楨为钦差大臣,率海陆军开赴台湾。当时,船政所辖的12艘军舰全部出动,第一次在抗击外敌的斗争中显示了中国年轻的近代化海军的实力。吕翰指挥的“振威”舰,奉命与“扬武”等5舰开赴澎湖,并在此常驻。

日本侵入台湾是一次冒险性很大的行动,日本政府内部也存在很大分歧,没有作好同中国进行全面战争的准备。当时,日本海军也刚刚组建,实力尚不及中国,中国派往台湾的陆军也占有很大的优势。所以,形势对中国是有利的。但清廷为日本的大胆进兵所震慑,对本国年轻的海军也缺乏信心,因此,倾向于同日本和平解决争端。由于清廷采取了妥协的方针,最后这一事件以中国赔偿日本50万两白银并承认日本实际控制琉球为代价,换取日本于是年11月撤出台湾。

台湾事件结束后,清廷决定加快海军发展的步伐,近代海军建设遂全面展开。当时,船政学堂的许多毕业生担任了舰长,为进一步提高他们的指挥能力和技术水平,适应福建海军建设的要求,船政局又从中选拔最为优秀的吕翰、张成等人,派往“扬武”练习舰,随同英国教习和其他实习学生一道,进行远航训练。吕翰等随舰游

历了南洋群岛和日本等地。是年，吕翰被授守备加游击衔，又以防护台湾有功，晋都司。

1876年，吕翰远航结束后，出任同年建成下水的“艺新”号炮舰管带。1877年5月，吕翰又被任命为“飞云”号炮舰的管带。一个月后，福州船政局制造的“威远”号炮舰建成下水。9月，吕翰以尽先都司出任该舰首任管带。

“威远”舰是福州船政局制造的第一艘铁肋军舰，并采用了英国先进的750匹马力康邦轮机，航速12节，排水量为1268吨。它的建成标志着船政局从建造木壳军舰，转为建造铁肋木壳军舰，造舰水平有了新的突破。9月14日，吕翰指挥着刚刚建成、尚未安装大炮的“威远”舰，进行了首次出海试航，驶往白犬洋面，次日安全返航。

“威远”舰建成后，用作练习舰。吕翰兼任教习，率实习学生前往南洋等处作远航训练。1878年，吕翰因参加台湾后山三次剿平加礼番社有功，被奖以游击升用。

1879年，日本出兵占琉球，海防形势再度紧张。当时，中国虽然拥有了一些近代化的军舰，但还没有正式组建海军舰队。清廷鉴于闽台沿海的重要和福建的优势，命福建水师提督彭楚汉总统福建各舰，先行组建一支舰队。在近代海军建设方面很有经验和权威的原福建巡抚丁日昌认为，近代化的军舰应由受过正规训练的船政学堂毕业生来指挥，彭楚汉等水师官员对海军事务不甚了了，无法担当指挥舰队的重任，而从船政学堂毕业的张成、吕翰、刘步蟾、林泰曾、蒋超英5人都是最优秀的人才，只是资历太浅。因此，丁日昌建议从5人中挑选一人暂行代理舰队统领，或担任副职。但是，这一建议最后未被采纳。

（三）

1881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向福建商借“威远”舰到

北洋驻防。吕翰奉命指挥军舰北上，途中不慎搁浅，于是年5月进入上海船厂修理。7月14日，吕翰率“威远”舰到达天津。

1882年6月，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率“威远”舰和刚从英国买回的轻巡洋舰“超勇”、“扬威”及南洋海军的“登瀛洲”舰，前往属国朝鲜，帮助订立朝德条约。吕翰指挥的“威远”舰为丁汝昌座舰。7月，朝鲜发生“壬午之变”，日本派兵干涉。丁汝昌再次乘“威远”舰前往朝鲜，平息事变。

当时，北洋海军刚刚组建，人才缺乏，特别是象吕翰这样有才华和经验的年轻军官更是凤毛麟角。作为海军中最优秀的青年舰长之一，吕翰在不断发展壮大的北洋海军中有着远大的前途。正当吕翰准备在北洋海军中一展才华的时候，家中传来父亲病故的消息。

按照当时的规定，官员在父母去世时一般要辞官守丧，所谓“忠孝不能两全”。1883年1月，吕翰离开北洋海军，返回广东故里，操办父亲丧事。他的“威远”舰管带职务由他在福州船政学堂的同期同学方伯谦接任。

吕翰为父守丧期满除服后，于1884年回福建海军报到。当时福建海军日渐衰落，没有几艘象样的军舰，无法为吕翰在舰上找到适当的职位。于是，先暂行派吕翰到后学堂担任教习。不久，因中法交恶，闽海形势紧张，吕翰被委派指挥“福胜”、“建胜”2艘炮舰。

久别战舰的吕翰重新回到舰上任职，心情格外激动。他登上军舰，高兴地用手抚摸着大炮，动情地对随从们说：“只有它才能酬我平生之志。”

吕翰平素喜好诗文和历史，待人友善，遇事机敏果敢，性情沉静刚毅。法国舰队闯入马江后，吕翰深知来者不善，将会有一场恶战发生，于是让妻子送老母回广东，以免牵挂，自己则做好了为国效命的准备。他在写给亲友的信中慨然表示说：我吕翰蒙受国恩，“见危授命，绝不苟免”。

法国军舰驶入马江后，强占有利位置，对福建海军构成严重威胁。福建海军停泊港内的 11 艘军舰，由“扬武”舰管带张成负责指挥。各舰与法舰首尾相衔而泊，而且排列密集，一旦敌舰发动突然袭击，福建海军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各舰管带请求与敌舰保持一定距离，分散布置，疏密相间，首尾数里，既可相互策应，又可免遭聚歼。吕翰与张成是同乡、同学和多年同事，关系比较密切，多次代表各管带向张成陈说利害。但是，这些很好的建议都没有被采纳。

8 月 23 日，法舰发动了突然袭击。在罗星塔上游方向，法舰的第一排猛烈炮火就击伤了“艺新”、“伏波”2 舰，迫使其驶离战场。接着，法军 46 号鱼雷艇又击伤旗舰“扬武”，使其很快丧失战斗力。福建各舰在岸防炮火的支援下顽强反击，法军旗舰和 2 艘鱼雷艇受伤。

激烈的战斗使浓烟和烈火弥漫了整个马江，在罗星塔上游的“建胜”号炮舰上，吕翰身着短衣，手提长剑，冒着密集的炮火，沉着地指挥“建胜”、“福胜”2 舰发炮还击。陈英指挥的“福星”号炮舰逼近敌舰，遭到猛烈的围攻。吕翰见“福星”舰情势危急，立即指挥“建胜”、“福胜”2 舰随后跟进，集中火力予以支援。

“建胜”和“福胜”2 舰是福建 1876 年从美国购买的两艘浅水炮舰，又称为“蚊子船”或“蚊船”。这种军舰船体较小，舰上装有巨炮，马力不大，速度很慢，显得非常笨重迟缓。它是专门为海口防御设计的，起浮动炮台的作用。“建胜”、“福胜”2 舰购置多年，已陈旧落后，舰上只装备有 1 门 16 吨重的阿姆斯特朗式前膛炮，而且不能转动，缺乏攻击能力，加之航速太慢，无法有效援救“福星”舰。最终，“福星”舰在敌舰的围攻下很快失去了战斗力。

接着，敌舰集中炮火转而攻击“建胜”、“福胜”2 舰。冲在前面的“建胜”舰开炮击中法军旗舰“窝士达”号，轻伤其舰首。敌舰以重炮还击，“建胜”多处中弹，船政学堂第三期驾驶班毕业的管带林森林阵亡。吕翰被飞起的弹片击中头部，血流满面。但他毫无惧色，

用布稍作包扎，又继续督战。

当“建胜”舰逼近敌舰时，被密集的炮火击沉，吕翰中炮牺牲。舰上 83 名官兵也同时遇难。不久，“福胜”舰也被击沉。

吕翰牺牲后，他的尸体随江水漂失，未能打捞到。清廷为表彰吕翰作战英勇，令照二品例从优议恤，入祀昭忠祠，给云骑尉世职，并规定袭次完时，给恩骑尉罔替。吕翰之子吕民袭职。清廷还命广东派员专程赙文赐祭，同时将吕翰的事迹交付史馆立传，使名垂史册，激励后人。

为国尽节 不负所志

——记黄建勋

1894年9月17日，北洋海军与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在大东沟海面爆发了一场大海战。这场中日海军间的主力决战，在历史上称作黄海海战或大东沟海战。海战中，北洋海军虽然击退了日本舰队，但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有5艘军舰沉没，4位舰长阵亡。“超勇”号轻巡洋舰是北洋海军此役战沉的第一艘军舰，指挥这艘军舰的管带黄建勋壮烈殉国，成为甲午海战中牺牲的第一位海军舰长。

（一）

黄建勋，字菊人，福建永福人，生于1852年。黄建勋家是永福的望族，家族中出了不少文人词客。而出身于这样一个书香门第的黄建勋却弃文从武，成为近代中国的第一代海军军官。

黄建勋的海军生涯始于福州船政学堂。1867年，15岁的黄建勋作为文童参加了福州船政学堂的首次入学考试，录取后被分在后学堂，学习驾驶专业。

1871年6月，黄建勋顺利通过了福州船政学堂的大考，结束了为期4年的堂课学习。接着，黄建勋和其他第一期驾驶班学生一道，被派上“建威”号练习舰，进行海上实习训练。这一年，黄建勋随“建威”舰先后到达了北洋的牛庄、天津、大连湾、烟台、威海等处。第二年，黄建勋又随“建威”舰到达香港、新加坡、槟榔屿等处及北洋各口。1873年，黄建勋随“建威”舰海上实习，再次前往香港、新加坡、槟榔屿各口。

1874年，黄建勋被任命为“扬武”号巡洋舰的正教习，这是他在海军中担任的第一个职务。不久，他被调到“福星”号炮舰上担任正教习。第二年，黄建勋又重新调回“扬武”舰。

这年秋天，黄建勋随已改为练习舰的“扬武”舰前往香港、新加坡、槟榔屿、马拉甲、小吕宋等处，冬天返回福建。1876年2月，黄建勋随“扬武”舰远航至日本的长崎、神户、横滨等港口。

1873年12月，船政大臣沈葆楨奏请选派船政学堂的优秀毕业生前往法国、英国留学，“深究其造船之方及其推陈出新之理”，“深究其驶船之方及其练兵制胜之理”。沈葆楨的意见得到恭亲王奕訢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等人的支持。但因次年5月发生日军侵台事件，此事被搁置。以后，派遣留学生一事一再延宕，直到1877年1月才确定下来。由李鸿章等入奏，并制定了留学章程。不久，得到了清廷批准。

第一届海军留学生共计30人，其中制造学生14名，制造艺徒4名，驾驶学生12名。制造学生和制造艺徒前往法国学习，驾驶学生则往英国学习。

黄建勋与刘步蟾、林泰曾、林永升、叶祖珪、萨镇冰、严宗光（复）、蒋超英、何心川、方伯谦、林启颖、江懋祉等12人入选为第一届驾驶专业留学生。1877年3月31日，他们与赴法学习制造的18名留学生一道，乘坐“济安”号轮船，由华监督李凤苞和洋监督日意格带队，从福州出发，驶往香港。与他们同行的，还有随员马建忠、文案陈季同、翻译罗丰禄3人。

4月4日，他们在香港换乘外国轮船西行。5月7日，轮船到达法国马赛。学习制造的留学生留在马赛，黄建勋等学习驾驶的学生乘火车北上，渡过英吉利海峡，于5月11日抵达英国。

黄建勋等到达英国后，因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10月1日开学，他们便前往南安普顿暂住，准备入学考试。7月，他们与英方联系，前往抱士穆德，先后参观了船厂、船坞、炮台、海港等设施，

以及练习舰上的教学情况。

12名留学生中，刘步蟾、林泰曾、蒋超英3人直接被派上军舰学习。黄建勋、林永升、叶祖珪、萨镇冰等9人前往报考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结果，林永升、叶祖珪、萨镇冰、严宗光(复)、方伯谦、叶心川6人考取，黄建勋、林启颖、江懋祉3人则未能考取。随后，黄建勋等3人被派上军舰学习。

10月，黄建勋被派到驻美国的英国“伯利洛芬”号铁甲舰上，该舰属英国西印度舰队。黄建勋在“伯利洛芬”号铁甲舰上任二副之职，随舰到过南北美及印度一带海口，研究海道沙线。

1879年11月，经过2年多的学习，黄建勋结束了海上实习生活。“伯利洛芬”号铁甲舰舰长阿武里向黄建勋颁发了“学行优美”证书。

黄建勋等人的舰上课程相继结束后，李凤苞又聘请英国海军炮队教官苏萃为他们讲授火炮、军火诸学，聘请美国水雷教官马格斐讲授水雷电气诸学。1880年3月，黄建勋等在英国参观考察了船厂、机器局、枪炮厂及水雷营、炮台等。一个月后，黄建勋结束了他在英国的学习回国。

(二)

黄建勋学成回国后，被分配到福州船政学堂，担任驾驶教习。1881年，黄建勋因教练学生有功，升补守备，加都司衔。是年5月，北洋大臣李鸿章将黄建勋调往北洋，派他管带水雷兵队。

黄建勋从船政学堂毕业后，大部分任职时间是在舰上和陆上担任教习，没有在舰上担任过指挥职务。而他的大部分同学则相继担任了舰长。直到1882年初，黄建勋才得到一个机会，从林泰曾手中接过“镇西”号炮舰的指挥权，出任该舰的代理舰长。

“镇西”号炮舰是李鸿章向英国订造的第三批炮舰中的一艘。1875年春，李鸿章向英国订造了4艘炮舰，其中320吨2艘，440

吨2艘。1876年6月24日,第一批2艘320吨炮舰由英国皇家海军舰长指挥,从英国出发,经过近5个月的航行,抵达中国,两舰被命名为“龙骧”、“虎威”。第二年春天,第二批2艘440吨炮舰也由英国舰长驾驶来华,被命名为“飞霆”、“策电”。接着,李鸿章又向英国订造了4艘440吨炮舰。1879年11月,第三批4艘炮舰建成来华,分别命名为“镇东”、“镇西”、“镇南”、“镇北”。不久,李鸿章第四次向英国订购440吨炮舰,共3艘,命名为“镇中”、“镇边”和“海镜清”。

后来,“镇中”、“镇边”、“镇东”、“镇西”、“镇南”、“镇北”6舰留在北洋,称为北洋“六镇”。“龙骧”、“虎威”、“飞霆”、“策电”4舰原在北洋,后划归南洋。“海镜清”则属广东海军。

李鸿章分4次向英国购买的11艘炮舰为浅水炮舰,因为舰体小而装有大口径前膛火炮,所以人们形象地把它们称为“蚊子船”或“蚊船”。这种炮舰速度较慢,时速为10海里,不适宜于海上作战,它是被设计用于港口防御的,作为浮动炮台与陆上炮台相配合,以击退来犯的敌方铁甲舰。

英国《泰晤士报》1879年8月载文评论中国购买的“镇西”等舰时说,这些军舰的出现使英国的海军界“为之惊愕”。称“中国人作此突然的冒险的一跳,已经跳到我们的前面去了。”文章认为,这些军舰上的前膛炮“力量和射程是远远地增加了,并在穿透力上比目前英国海军所拥有的最可怖的武器——无畏舰上的大炮,超过百分的五十”。可见,“镇西”等舰还是有一定威力的,所以在当时被称为“守口利器”。

1883年,黄建勋实授“镇西”舰管带。不久,朝鲜发生动乱,日本乘机派兵干涉。北洋海军奉命护送陆军东渡援朝,很快平息了事变。黄建勋率舰赴朝,因功保升都司,赏戴花翎。

1884年6月,李鸿章与张之洞等巡阅北洋水陆各军。黄建勋率“镇西”舰与“镇中”、“镇边”、“镇东”、“镇南”、“镇北”等舰一起,

在烟台海面操演，接受检阅。7月，因中法关系恶化，海防形势紧张。“镇西”舰同“镇中”、“镇东”、“镇北”舰奉调前往大沽口，与陆路炮台相依护，防守海口。

1886年6月，黄建勋率“镇西”舰与“镇北”舰一起前往朝鲜仁川港驻泊，接替在那里驻防的“威远”号炮舰。

1887年4月，黄建勋出任“超勇”号轻巡洋舰管带。“超勇”舰是李鸿章1879年向英国阿姆斯特朗厂订造的，一起订造的还有“扬威”号轻巡洋舰，2舰1881年10月建成来华。因为英方称这2艘巡洋舰速度快并在舰首水下装有撞角，可以追上并碰坏铁甲舰，所以，当时中国称这种舰为“快船”或“碰快船”。“超勇”舰长220英尺，宽31英尺9英寸，排水量1350吨，马力2400匹，航速15节。

“超勇”和“扬威”是北洋海军的第一代巡洋舰，首任管带是黄建勋的同学林泰曾和邓世昌。黄建勋是继林泰曾之后的第二任“超勇”舰舰长，以后他再也没有离开过这艘军舰。

1888年7月，因朝鲜发生仇教事件，各国派舰前往。北洋海军派黄建勋率“超勇”舰与“扬威”舰一起前往朝鲜仁川，事件平息后返回。

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根据《北洋海军章程》，北洋海军设提督1人统领全军，下面依次是总兵、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等官职。其中，总兵2人，副将5人，参将4人，游击9人。

《北洋海军章程》规定，“左翼右营参将一员，委带超勇快船。”1889年2月，黄建勋以花翎补用都司破格晋升为署理左翼右营参将，统带“超勇”舰。

1890年9月，黄建勋指挥“超勇”舰与“定远”、“济远”、“开济”、“寰泰”、“扬威”等舰一道，前往朝鲜巡弋，到达仁川、天冠山、釜山等地。

1891年5、6月间，李鸿章校阅北洋海军。黄建勋率“超勇”舰

参加了操演，因训练有功，加副将衔予二品封典。1892年4月，黄建勋参将署理期满3年，改为实授。

(三)

1894年2月，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6月3日，无力镇压起义的朝鲜当局，请求清廷派兵援助。清廷决定派兵入朝，帮助平息起义。6月6日，第一批援朝清军聂士成部900人，乘坐招商局的“圉南”号轮船赴朝，黄建勋率“超勇”舰负责护航。8日，聂士成部安全抵达朝鲜牙山。

就在“超勇”舰出发前往朝鲜的前一天，日本在参谋本部设立了大本营，制定了消灭北洋海军，夺取黄海制海权，最后与清军决战于直隶平原的计划。随后，日本派兵进入朝鲜。

由于形势危急，中国驻朝部队与国内电讯又中断数日，黄建勋奉命率“超勇”舰于6月16日从牙山返回威海，向清廷报告朝鲜的局势。

6月18日，李鸿章电告丁汝昌，日本在仁川的军舰已达7艘之多，而北洋海军仅有“操江”号炮舰在仁川，“济远”、“平远”、“扬威”3舰在牙山，应再派几艘军舰入朝，加强北洋海军的驻朝力量。丁汝昌遂命“镇远”号铁甲舰与“超勇”、“广丙”舰增援朝鲜。6月22日下午3时，“镇远”、“超勇”、“广丙”3舰抵达仁川港。

6月23日，日本枢密院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对中国发动战争。

几天后，北洋海军决定将在朝鲜的“镇远”等舰调回，以集中兵力与日军进行主力决战。7月1日，北洋海军的“康济”号炮舰带粮饷赴朝鲜，接济“超勇”、“扬威”、“平远”3舰。接着，“超勇”舰与“镇远”、“平远”、“济远”等舰启航，返回威海集中。

7月23日，日军攻占朝鲜王宫，劫持国王，组成以大院君为首的亲日傀儡政权。25日，朝鲜的亲日傀儡政权授权日军，驱逐驻扎

朝鲜的中国军队。

同日7时许，日军舰队在丰岛海面突袭中国的运兵船队，中日甲午战争爆发。8月1日，中国正式向日本宣战。

8月9日，丁汝昌率“定远”、“镇远”等10艘军舰前往大同江搜寻日军舰队。黄建勋奉命率“超勇”舰和3艘炮舰负责守卫威海。

与此同时，日本海军联合舰队也在寻找北洋海军进行决战。日军判断北洋海军主力仍在威海，便于8月7日出发，前来威海寻战。10日，日本舰队进攻威海，威海炮台予以还击，黄建勋指挥留守各舰严阵以待，紧守海口。日军探知北洋海军主力不在威海，返回隔音岛锚地。在外搜寻日本舰队的丁汝昌，则奉命率10艘战舰于13日赶回威海固防。

9月7日，守卫平壤的清军统帅叶志超请求派兵增援。李鸿章决定派刘盛休统领的铭军赴朝增援，由丁汝昌率北洋海军主力负责护送到大东沟登陆，然后从陆路开往平壤前线。

9月16日凌晨，丁汝昌率领包括“超勇”在内的18艘舰艇，护送分乘招商局5艘轮船的铭军10营共4000人，向中朝边界的大东沟进发。中午，部队到达大东沟。丁汝昌命“平远”等8艘舰艇护送陆军登陆，自率“定远”、“镇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济远”、“广甲”、“超勇”、“扬威”10舰在大东沟口外12海里处下锚，防止日本舰队袭击。

17日上午，陆军已全部登岸，北洋海军完成了护送任务，准备返航。

此时，日本海军联合舰队也在附近海域搜寻北洋海军。中午11时许，北洋海军发现了日本舰队，丁汝昌下令各舰准备战斗。

北洋海军的10艘军舰分成5小队，列阵迎敌。黄建勋指挥的“超勇”舰与“扬威”舰为第5小队，开战时，2舰位于北洋海军“人”字阵右翼阵脚。

日本舰队的12艘军舰列“一”字阵攻击北洋海军。战斗打响

后，日舰利用其速度快的优势，直扑北洋海军阵尾的“超勇”、“扬威”2舰，想集中炮火先击沉这两艘最弱的军舰。

“超勇”舰是一艘旧式巡洋舰，已有13年的舰龄，火力较弱，舰上没有鱼雷发射管，只装备有舰炮12门，其中10英寸阿姆斯特朗式主炮4门，4.5英寸副炮4门。“超勇”舰的装甲防护能力也较差，其船体为木质，外面包铁皮，厚仅有1公分左右，很容易被敌舰击坏。

由号称“帝国精锐”的“吉野”、“高千穗”、“秋津洲”、“浪速”4舰组成的日本舰队第一游击队，向“超勇”、“扬威”2舰发起了猛攻。2舰也奋勇抵抗，连连击中敌舰。“吉野”舰后甲板被击中，引起堆积在那里的弹药爆炸，日军浅尾重行少尉和1名水兵被炸死。“高千穗”舰也被击中数炮，右舷后部被炸开了3个大洞。“秋津洲”舰上的永田廉平大尉等5名官兵被炸死。“浪速”舰一号炮台下的水线部分也被击中，海水涌入。

海战是12时50分开始的，“超勇”与“扬威”2舰5分钟后即遭到“吉野”舰的炮击。经过激战，“超勇”舰多处中弹，舰上的机件被炸得粉碎，甲板上满是肢体残缺、血肉模糊的尸体。日舰一发炮弹击穿了“超勇”船舱，引起大火。黄建勋指挥舰上官兵一面救火，一面继续发炮射击。由于“超勇”舰内部隔舱均为木质，所以舱内着火，无法施救。“超勇”舰渐渐难以支持，军舰右舷倾斜，海水很快淹没了甲板，舰尾缓缓沉入水中，舰首笔直地向上立起。13时30分，全舰沉入海中。

“超勇”舰沉没后，黄建勋落入水中。这时，左一鱼雷艇赶来营救，抛长绳给黄建勋，救他上艇。黄建勋抱定与军舰共存亡的决心，拒绝营救，毅然沉入滚滚波涛，壮烈殉国，时年42岁。“超勇”舰上有舰员137人，此役阵亡15人，伤者则无法统计。

大东沟海战结束后，李鸿章上奏清廷，为黄建勋等阵亡将领请恤。清廷准将黄建勋照原官升衔从优议恤，追赠总兵衔，世袭云骑

尉，恩骑尉罔替。

黄建勋为人慷慨，崇尚侠义，性情沉静刚毅，言谈率直坦诚，不屑于世俗周旋之态。他治军精勤，表现出色，屡屡受到上司的嘉奖和赞许。黄建勋牺牲后，人们称赞他为国尽节，可谓不负所志。

临大节而不可夺

——记林履中

林履中是北洋海军“扬威”号轻巡洋舰管带。在黄海海战中，他指挥战舰与“超勇”舰并肩作战，奋勇抗击日本舰队精锐战舰的疯狂围攻，最后英勇捐躯。人们称赞他“见危授命，激烈效忠，其所谓临大节而不可夺者”。

（一）

林履中，字少谷，福建侯官（今福州）人，生于1852年。1871年，考入福州船政学堂，为后学堂驾驶班第三期学生。林履中在校学习非常刻苦，考试屡列优等。1875年，林履中结束了堂课学习，与同学陈英等一起被派上“扬武”号练习舰实习。同年，林履中等随舰实习到达新加坡、小吕宋、槟榔屿等港口。

1876年2月4日，林履中等又随“扬武”舰从烟台出发，练习海道。“扬武”舰航行至日本，先后抵达长崎、神户、横滨等港口。每次军舰进港，都会引来成千上万的围观者。当时，日本海军建设也刚刚起步，1500多吨的“扬武”号巡洋舰在日本人的眼中是一个庞然大物，他们对中国拥有这样的军舰感到非常羡慕和惊骇。

这一年的冬天，林履中结束了实习生活，被派上福建海军的“伏波”号炮舰担任大副。

“伏波”舰是福州船政局制造的第4号军舰，1870年12月22日建成下水。该舰为木质，长217尺8寸，宽35尺，马力150匹，排水量1258吨，航速10节，造价16100两白银。1874年日军侵略台

湾时，“伏波”舰曾随船政大臣沈葆楨赴台湾驻防。林履中到“伏波”舰任职后不久，福州船政学堂第一期毕业生林国祥担任了该舰管带。

1881年7月，“威远”号练习舰被李鸿章借调到北洋。林履中被任命为“威远”舰的教练大副。舰上的管带是林履中在福州船政学堂的校友、第一期驾驶班毕业生吕翰。

林履中到“威远”舰上任职不久，便在当年夏天被李鸿章派往德国，参加验收并协助管驾中国订造的第一艘大型铁甲舰“定远”号。

拥有铁甲舰一直是中国创建近代海军所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早在1875年，清廷委派沈葆楨、李鸿章总理南北洋海防时，就批准购买一至二艘铁甲舰。此后，沈葆楨、李鸿章等人便开始积极活动，从国外购买铁甲舰。

1877年，土耳其想把它在英国订造的2艘铁甲舰以每艘80万两白银的价格出售。这两艘铁甲舰一名“柏尔来”号、一名“奥利恩”号，排水量4830吨，马力3900匹，航速13节。

李鸿章等得知土耳其有意转卖铁甲舰的消息后，便派人与土耳其领事联系。

后来，因为考虑到土耳其的两艘铁甲舰式样较老，价格也不是很便宜，加上中国当时还没有停靠大型军舰的船坞，也没有能够指挥铁甲舰的人才，所以，购买铁甲舰的事迟迟没有定下来。最后，土耳其的2艘铁甲舰由英国买下。

当时英国买下土耳其的2艘铁甲舰是因为英俄关系紧张，英国怕俄国将2舰买走。到了1879年，形势有了变化，英国又打算卖掉从土耳其买下的2艘铁甲舰。

这年年底，俄国因伊犁问题，向中国调派舰队，海防形势又严峻起来。李鸿章得知英国要出售铁甲舰，急令驻德使臣李凤苞与英国海军部商洽购买，而此时，2舰原来每艘80万两的价格已涨到

每艘 200 万两。

1880 年 5 月,李凤苞向李鸿章报告说,英国以中俄关系紧张、英国需保持中立为由,拒绝将 2 艘铁甲舰卖给中国。李鸿章遂指示李凤苞在英国另订造 2 艘新的铁甲舰。

经过李凤苞和驻德使馆二等参赞徐建寅等人的仔细考察和反复研究,决定在德国订造铁甲舰。这个意见得到李鸿章的赞同。1880 年 12 月 2 日,李凤苞与德国伏尔铿厂签订了订造第一艘铁甲舰的合同。这艘军舰被命名为“定远”号。第二年 5 月,中国又与德国伏尔铿厂签订了订造第二艘铁甲舰“镇远”号的合同。合同规定,“定远”、“镇远”这两艘姊妹舰于 1884 年春夏间交货。为了保证建造质量,中国派首批留欧学习海军的船政学堂制造专业第一届毕业生魏瀚、陈兆翱、郑清濂带匠首 7 人,前往德国监造。

1882 年 6、7 月间,刘步蟾、林履中等 11 人奉派前往德国,验收“定远”舰并进行训练,林履中等负责验收装备“定远”舰的鱼雷、炮械。

“定远”舰是李凤苞、徐建寅参照英国最先进的铁甲舰“英弗来息白”号和德国最新式的铁甲舰“萨克森”号,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而设计的。徐建寅说:“现在中国拟造之船,议仿‘英弗来息白’及‘萨克森’之制,集两者之长,去两者之弊,……似可列于当今遍地球第一等之铁甲舰。”“定远”舰排水量为 7335 吨,马力 6000 匹,航速 14.5 节,舰长 298 英尺 5 英寸,最宽处 60 英尺 4 英寸,铁甲厚 14 英寸,炮台甲厚 12 英寸,指挥台甲厚 8 英寸,大炮、汽机、锅炉、弹药舱等均有铁甲堡保护。

“定远”舰上的武器装备也属世界先进水平,共装备有双联装 305 毫米口径巨炮 4 门,150 毫米炮 2 门,76 毫米炮 4 门,大小函炮 6 门,5 管机关炮 12 门,鱼雷发射管 3 具,附小鱼雷艇 2 只。验收这些先进的装备,对于年轻的中国海军军官和技术人员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尽管验收任务十分复杂、艰巨,困难重重,林履中

等还是凭着顽强的毅力,运用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尽心竭力地工作,以确保装备的质量。

(二)

林履中到德国后不久,又奉派前往英国留学,进入戈斯波特海军军官学校,“精究驾驶、枪炮、算学、电学”。经过两年的潜心学习,林履中于1885年夏结束了学业,由英国返回德国。一路上,林履中无心游玩,而是“沿途参考英、德海军各港口的风潮沙线”,检验和巩固所学的知识。

林履中返回德国后,立即投入到了“定远”舰回国的准备工作中。

“定远”舰1883年6月建成试航,因为中法关系恶化,德国海军部担心“定远”舰在来华途中被法国海军劫掠,拒绝由他们负责驾驶来华。当时,因无法悬挂中国的龙旗,经李凤苞与德国内政部协商,决定用伏尔铿船厂商旗送“定远”舰回国。李鸿章随即电令李凤苞,要“定远”舰速驶回国。但很快德国外交部又表示,因为“定远”舰属军事装备,一旦中法开战,法国即可扣留“定远”舰,德国不负责保护。这样,“定远”舰回国一事只得暂缓。不久,爆发了中法战争,“定远”舰在德国一等就是2年。

中法战争结束后,清廷于1885年6月11日命“定远”、“镇远”2舰和1883年在德国订购的“济远”舰一同回国。7月3日,“定远”、“镇远”、“济远”3舰由洋员驾驶,从德国启航。林履中随“定远”舰回国。11月17日,“定远”、“镇远”、“济远”3舰抵达大沽。李鸿章率丁汝昌等前往验收,认为“定远”等舰质量与合同要求相符,十分满意。

林履中回国后,出任“定远”舰大副,奏奖蓝翎千总。不久,他又升任“定远”舰副管驾。

1887年,林履中离开“定远”舰,升任“扬威”号轻巡洋舰的管

带官，荐保花翎守备。

“扬威”舰的首任管带是福州船政学堂第一期驾驶班毕业的邓世昌。1887年2月，邓世昌奉派前往英国接收订造的“致远”号巡洋舰，并任该舰管带，“扬威”舰管带一职交林履中接任。

“扬威”舰与“超勇”舰为同型舰，是北洋海军最早的2艘巡洋舰。2舰是1879年向英国阿姆斯特朗厂订购的，1881年10月建成来华。“扬威”舰长220英尺，宽31英尺9英寸，排水量1350吨，吃水16英尺，马力2400匹，航速15节。装备有舰炮12门，其中10英寸阿姆斯特朗式主炮4门，4.5英寸副炮4门。

1887年12月10日，“致远”、“靖远”、“经远”、“来远”4舰从欧洲万里远航驶抵厦门。丁汝昌率北洋“定远”等7舰和南洋的“南琛”舰到厦门迎候。林履中率“扬威”舰随同前往。

次年7月，因朝鲜发生仇教事件，各国均派舰前往。林履中奉命率“扬威”舰与“超勇”舰一道，前往朝鲜，驻泊仁川港。

1888年10月，《北洋海军章程》颁发，标志着北洋海军正式成军。《北洋海军章程》中规定，北洋海军设右翼右营参将1员，管带“扬威”舰。次年2月20日，李鸿章根据《章程》的规定，奏请朝廷任命了一批海军军官，包括副将5人，参将3人，游击7人，都司21人，守备46人，共计82人。其中，右翼右营参将由已是蓝翎补用都司的林履中升署，委带“扬威”舰。1892年4月，林履中等署理期满3年，李鸿章奏请朝廷改作实缺。林履中实授右翼右营参将，加副将衔。

林履中是个性格内向的人，为人谨慎持重，平时寡言少语，显得很深沉，于“稠人广众嘈杂喧哗之中，往往对之以静默。”但他并不孤僻，而是一个很随和，很好交往的人，总是给人一种和气可亲、诚恳可信的印象。林履中对上司尊重服从，对工作认真负责，和同事相处也非常融洽。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他没有沾染奢靡骄横之气，虽为一舰之长，仍保持过去俭朴的习惯，自律甚严，勤勉如旧，

与属下官兵同甘共苦，深得他们的爱戴和尊重。

(三)

1894年2月，朝鲜全罗道爆发了东学党起义。6月3日，朝鲜致文清廷，请求中国派兵入朝，帮助镇压起义。清廷同意了朝鲜的请求，决定立即派兵入朝。

4日，北洋海军首先派“济远”号巡洋舰和“扬威”舰赶赴朝鲜。林履中指挥“扬威”舰于次日下午与“济远”舰同抵朝鲜仁川港，和已在港内驻泊的“平远”号巡洋舰会合。8日，“超勇”舰护送陆军到达朝鲜牙山驻防。14日，林履中奉命率“扬威”舰进抵牙山，与先期到此的“平远”舰会合。16日，“济远”舰也驶来牙山集中。

当时，日本也乘东学党起义之机派兵入朝。它在仁川港集中了7艘军舰，而北洋海军只有一艘小炮舰“操江”号驻泊仁川，另有“扬威”等3舰驻泊牙山，实力明显弱于日本海军。于是，李鸿章6月18日电令丁汝昌，速增派军舰前往朝鲜。当日，“扬威”舰从牙山赶往仁川，加强力量。“平远”舰随后也赶到仁川。

6月22日，北洋海军左翼总兵林泰曾率“镇远”、“超勇”、“广丙”3舰到达仁川，北洋海军在朝鲜的兵力得到增强。

第二天，日本决定对中国发动战争，加快了战争准备，形势变得越来越危急。

6月26日，林泰曾电告李鸿章，认为仁川战守皆不宜，准备留一、二艘舰在仁川探信，其余驶往牙山备战。同时，请国内速派3艘鱼雷艇赴牙山。

李鸿章经征求丁汝昌的意见，决定将在朝鲜的“镇远”等舰调回，以集中兵力。7月1日，丁汝昌派“康济”号练习舰带粮饷赴仁川，接济“扬威”、“超勇”、“平远”3舰。

根据部署，“镇远”、“济远”、“广丙”、“康济”、“超勇”、“平远”6舰返回威海集中。林履中率“扬威”舰与“操江”舰继续在朝鲜留守。

7月23日，日军占领朝鲜王宫，劫持朝鲜国王，组织了亲日的傀儡政权，朝鲜形势异常紧张。

此前一天，丁汝昌准备率“定远”等11艘舰艇出巡。因威海防务空虚，电请李鸿章允许“扬威”舰速回，与“平远”等舰艇依辅炮台防守威海。24日，林履中奉命率“扬威”舰回国。

7月25日，日本舰队在丰岛海面袭击中国的运兵船队，挑起了中日战争。8月1日，中国正式对日宣战。

8月9日，林履中率“扬威”舰跟随大队出巡大同江，搜寻日本舰队。因日舰骚扰威海、旅顺，李鸿章命海军大队返回威海防守。8月14日后，“扬威”舰又随大队出巡渤海一带，继续搜寻日本舰队。

9月15日，林履中奉命率“扬威”舰参加护送援朝陆军前往大东沟登陆的行动。

次日，5艘运兵船在北洋海军18艘舰艇的护航下，安全抵达大东沟，开始运送陆军登陆。“扬威”舰与“定远”等共10艘军舰由丁汝昌指挥，在大东沟口外12海里处下锚，担任警戒，以防日本舰队袭击。

9月17日中午，当完成护航任务的北洋海军准备返航之际，发现了日本舰队。双方随即展开了一场海上大决战。

战斗打响后，“扬威”舰处于北洋海军“人”字阵右翼的最外侧，远离主力战舰，缺乏有效的保护。

日本舰队发现北洋海军的弱点在右翼，作“一”字阵从北洋海军阵前掠过，直扑右翼距离“定远”、“镇远”2艘铁甲舰最远的“超勇”舰和“扬威”舰。

12时55分，日军舰队第一游击队司令坪井航三少将发出了“适时开炮”的命令。“吉野”舰在距离“扬威”、“超勇”舰3000米时，率先开炮轰击2舰。接着，第一游击队的“高千穗”、“秋津洲”和“浪速”3舰也先后开炮。

“扬威”和“超勇”2舰面对号称“帝国精锐”的第一游击队“吉

野”等4舰的疯狂围攻，奋勇还击。

在“扬威”、“超勇”2舰的猛烈轰击下，日舰连连中炮。一颗炮弹击中了“吉野”舰的后甲板，引起堆积在那里的弹药连续发生爆炸，引起大火，海军少尉浅尾重行和一名水兵被击毙，另有9人受伤。“高千穗”舰多处中弹，右舷后部被炮弹炸裂，火药库附近的军官室也被击穿，8英寸厚的钢板被穿透三个大洞，床上器具被击得粉碎，弹丸四处飞扬。一名管理火药库通风的人员腹部被击中，肠子流了出来，倒在血泊中。破碎的木板、衣物都着起了火，威胁到火药库。“秋津洲”舰的五号炮座被击中，永田廉平大尉等5名官兵被击毙。“浪速”舰一号炮台下的水线部分被炮弹击穿，海水涌入舰中。

但“扬威”和“超勇”2舰毕竟是旧式巡洋舰，攻击能力和防护能力都较弱，敌不住“吉野”等4舰的围攻，多处中弹，舰上燃起了熊熊大火。13时30分，“超勇”舰首先沉没。“扬威”舰起火后，引燃木结构的内部隔舱，火势渐渐无法控制。

尽管形势十分危急，林履中仍沉着指挥，不断发炮还击。在敌舰的围攻下，“扬威”舰开始下沉，舱面进水，“首尾两炮交通已绝，而弹药供给又无途径，陷入进退维谷之境”。不久，“扬威”舰首尾大炮也都无法射击。林履中遂指挥军舰艰难地向浅水处撤退，迫使吃水较深的日舰无法接近，以便紧急抢修军舰，然后归队再战。“扬威”舰向北撤至大鹿岛附近时，不慎在近岸处搁浅。林履中见“扬威”舰已无法再战，拒绝了部下要他离舰撤退的请求，誓与战舰共存亡。当“扬威”舰渐渐下沉时，悲愤万分的林履中奋然投海自尽。林履中投海后，官兵们试图将他救起。但林履中拒绝援救，终于沉入滔滔黄海中。舰上100多名官兵大多牺牲，仅有不到半数获救。

“扬威”舰搁浅焚烧后，并没有立即沉没。第二天，日本舰队返航大同江口时，发现了搁浅将沉的“扬威”舰，遂命“千代田”舰用外装鱼雷轰击“扬威”舰。“扬威”舰被击坏舰底而沉没。

林履中奋战捐躯，时年 42 岁。清廷为表彰他的功勋，下令照总兵例议恤，并世袭骑都尉世职。

有公足壮海军威

——记邓世昌

在黄海海战中壮烈殉国的邓世昌，是中国一百年来最为著名的一位海军战将。他指挥战舰冲向敌舰的悲壮瞬间，已成为中华民族抗御外侮的永恒一幕。邓世昌作为中国海军的骄傲和一位不屈的民族英雄将永垂青史。

（一）

邓世昌，原名永昌，字正卿，从军以后改名世昌。1849年10月4日，邓世昌出生于广东番禺县（今广州市海珠区）。邓世昌的父亲邓焕芬，号秋浦，是番禺邓氏第二十三世祖。他和妻子生有6个儿子，邓世昌排行第四。

邓世昌少年时曾随外国人学习英语和数学知识，为他后来进入福州船政学堂接受正规的海军教育，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少年时的邓世昌显得比同龄的孩子要成熟许多，沉默寡言，若有所思，一付少年老成的样子。《清史稿》中称他“少有干略”，是个很有志向，很有抱负的少年。

邓世昌曾随父亲到过上海，亲眼看到过许多外国人的军舰和商船。西方的发达和海军的强盛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中国有海无防的现实也使他受到很大的刺激。他曾不无忧虑地说：“洋人与中国通商已久，中国沿海险要尽为洋人所知。洋人深谙海上作战，中国如不赶紧向西洋学习编练海军，将来一旦发生战事，如何能抵抗得了洋人的进攻呢？”此后，邓世昌更加留意学习近代

科学知识和其他“经世之学”。

1867年，邓世昌毅然放弃科举功名之路，报考福州船政学堂，学习海军。

最初，船政学堂只打算在福建招收学生。后因生源不足，又从香港和广东招收了吕翰、邓世昌等10人，为外学堂学生。从香港和广东招收的这批学生大都具有良好的英语、数学基础，但年龄偏大些。邓世昌入学时已18岁，而从福建招收的学生多在12—15岁之间。

邓世昌在校学习十分用功，各门课程屡列优等。1871年，邓世昌结束堂课学习，登上“建威”号练习舰开始海上实习，先后到过南北洋各口和香港、新加坡、槟榔屿等口岸。海上实习生活使邓世昌得到了更多的锻炼，逐步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海军军官。

邓世昌经过2年实习后毕业，被派管“建威”号练习舰。1874年，船政大臣沈葆楨派邓世昌担任“琛航”号运输舰大副，并奖以五品军功。

“琛航”舰是福州船政局制造的第14号军舰，1873年12月建成下水。该舰由法国人安乐陶监造，造价16400两白银，排水量1358吨，马力580匹，航速10节。该舰的管带是邓世昌的同学林国祥。

1874年5月，日本出兵进犯台湾。邓世昌随舰参加了中国近代海军组建以来的第一次反侵略作战行动。

日军侵台后，清廷一面通过外交途径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一面调派海陆军加强防卫。船政大臣沈葆楨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前往台湾。船政所辖12艘军舰全部出动，“扬武”等9艘军舰分驻澎湖、台北、厦门和福州等处。邓世昌所在的“琛航”舰与“永保”、“大雅”号运输舰一道，负责运送部队和军火。

日本侵台事件平息后，清廷痛感海防危机。1875年，清廷发布上谕，派沈葆楨和李鸿章总理南北洋海防，加紧发展海军力量。

这一年，邓世昌调任“海东云”号炮舰管带。他率舰巡缉福建沿海，以功补千总。不久，邓世昌转任“振威”号炮舰管带，负责缉捕海盗。后来，邓世昌又先后担任“扬武”号巡洋舰大副、代理管带等职，荐保守备，加都司衔。

1875年，李鸿章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督办北洋海防，创建北洋海军。当时，北洋只有几艘军舰，海军人才也极为匮乏。李鸿章一方面借调和购置军舰，一方面积极从福州船政学堂毕业生中物色一些优秀人才到北洋任职。他得知邓世昌精通管驾技术，是海军中不可多得的人才，便调他前来北洋。

1879年7月，邓世昌奉调来到天津，担任从英国购买的“飞霆”号炮舰的管带。

11月9日，李鸿章从英国订购的“镇南”、“镇北”、“镇东”、“镇西”4艘炮舰建成来华，邓世昌等奉命在天津接收并暂行兼管。30日，李鸿章奏请将先前从英国购买的“飞霆”、“策电”、“龙骧”、“虎威”4艘炮舰划归南洋，而将新购的“镇南”等4舰留归北洋。清廷批准了这一建议。邓世昌被李鸿章任命为“镇南”舰管带。

1880年5月12日，邓世昌率“镇南”舰与“镇北”、“镇东”、“镇西”和“操江”4舰，奉命执行任务。在由大连湾驶往海洋岛的途中，“镇南”舰不幸触礁。面对突如其来的险情，邓世昌临变不乱，沉着指挥，很快使军舰脱离了险境。

事后，“镇南”舰因触礁受损，被送到上海进坞修理。邓世昌等以“驾驶不慎”，遭撤革摘顶的处分。他的同学、“镇东”舰管带邱宝仁也因“救援不力”而被撤革摘顶。

这次触礁事件，是邓世昌海军生涯中的一个严重挫折，使他深感痛心和内疚。邓世昌被撤职后，英国教习章斯敦暂时代理指挥“镇南”舰。

(二)

邓世昌虽然因为“镇南”舰触礁而受到严厉处分,但在李鸿章的眼里,他仍然是最优秀的舰长之一。所以,李鸿章对邓世昌依然十分信任和器重,甚至流露出对他的格外偏爱。他在1881年1月4日写给督办船政黎兆棠的信中,品评船政学生时,对邓世昌颇为赞赏,称他为人忠厚朴实,只是带船运气不佳,相信只要多给他提供出洋历练的机会,他会很有前途。

正是因为对邓世昌的才干深信不疑,李鸿章才敢于在邓世昌被撤职后仅几个月,便挑选他去执行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随丁汝昌等前往英国接带“超勇”号和“扬威”号巡洋舰。

“超勇”和“扬威”是李鸿章为北洋订购的第一批巡洋舰,由英国的阿姆斯特朗厂承建。此前北洋向英国订购的炮舰,建成后都由英国人驾驶,悬挂英国旗来华。为了节约经费,更为锻炼中国的海军官兵,李鸿章决定由中国派员前往英国,驾驶“超勇”、“扬威”2舰来华。

李鸿章对此次接舰行动十分重视,选派得力人员执行这项任务,并做了周密安排。1880年底,李鸿章派丁汝昌和英人总教习葛雷森先期出国,照料造舰有关事项并在欧洲考察;派邓世昌和章斯敦等率领接舰官兵在吴淞操练。

1881年2月27日,邓世昌等264名接舰官兵乘坐轮船招商局的“海琛”号轮船从吴淞口出发,前往英国。4月24日,抵达英国纽卡斯尔。由于英方拖延了2舰的竣工时间,邓世昌等接舰官兵被安排在阿姆斯特朗厂对面的一个小岛上进行训练。

8月2日,邓世昌等中国官兵在纽卡斯尔港接收了“超勇”、“扬威”2舰。第二天,中国驻英使臣曾纪泽登上军舰,与舰上官兵一起举行了升旗仪式,并亲手将中国龙旗——带有飞龙戏珠图案的黄色三角旗——升上旗杆。

8月17日，“超勇”、“扬威”2舰在丁汝昌、林泰曾、邓世昌和英人葛雷森、章斯敦的率领下，启航回国。其中，“超勇”舰由林泰曾任管驾官，“扬威”舰由章斯敦任管驾官，邓世昌任副管驾。

一路上，“扬威”舰的航行很不顺利。8月31日，航行至地中海时，“扬威”舰与“超勇”舰失散，煤水告罄，被迫在亚历山大港外80海里洋面抛锚。已抵达塞得港的“超勇”舰，接到“扬威”舰的告急电报，立即赶往救援接济。9月9日，“扬威”、“超勇”2舰进入苏伊士运河。次日，“扬威”舰螺旋桨损坏，停在河中无法航行。11日，“扬威”舰被拖轮拉出运河，入坞修理，直到21日竣工。“扬威”舰行至珠江时，又不慎搁浅，不得不前往上海修理。章斯敦因指挥不当，受到多方指责。

11月17日，“扬威”、“超勇”2舰历经艰险，驶抵大沽口。22日，李鸿章亲赴大沽口验收。“超勇”、“扬威”2舰的万里远航，被称为“中国龙旗首次航行海外”，是中国海军历史上的一次壮举。2舰回国后，李鸿章奏请朝廷嘉奖接舰有功人员。邓世昌被赏戴花翎，以都司补用。邓世昌初以副管驾接替章斯敦管带“扬威”舰，不久后升任管带。

1882年5月，邓世昌率“扬威”舰与“超勇”、“镇海”舰一道，随丁汝昌前往朝鲜，帮助签订朝美条约。不久，朝鲜与美国签订了《朝美通商条约》。6月8日，“扬威”、“超勇”2舰随丁汝昌回国。

23日，应朝鲜国王请求，丁汝昌乘“威远”舰前往朝鲜，帮助朝鲜与德国谈判通商。两天后，邓世昌率“扬威”舰与“超勇”舰一起也奉命赶往朝鲜。6月30日，朝鲜与德国签订了《朝德通商条约》。邓世昌率舰于7月2日随丁汝昌等回国。

1882年7月，朝鲜发生内部争夺政权的“壬午之变”，大院君乘机掌握了政权。政变中，汉城哗变军人袭击了日本公使馆，杀死日本官员，日本公使花房义质逃往仁川。

“壬午之变”发生后，清廷担心日本趁机干涉朝鲜政局，急令北

洋派海陆军赶赴朝鲜，稳定那里的局势。

8月10日，丁汝昌率“扬威”、“超勇”、“威远”3舰抵达朝鲜仁川港。此时，日本海军的“金刚”号军舰已先期赶到。随后，日军又陆续派出7艘军舰和部分陆军，加强其在朝鲜的力量。

为迅速控制朝鲜局势，不使日本有机可乘，丁汝昌决定乘“威远”舰返回天津，报告朝鲜局势，并请朝廷速派援兵。邓世昌率“扬威”舰与“超勇”舰一起留在仁川坚守。18日，2舰又移驻南阳浦口。

20日，丁汝昌率舰护送淮军吴长庆部抵达朝鲜。清军迅速采取行动，扣留了大院君，将其解往天津，很快平息了朝鲜内乱。

“壬午之变”平息后，清廷下令奖励此次赴朝有功人员。邓世昌得免补都司，以游击尽先补用，并赏给劲勇巴图鲁勇号。

(三)

1883年，法国加紧了对越南的侵略。与越南有宗藩关系并在越南驻有军队的中国，同法国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5月，清廷命李鸿章前往广东督办越南事宜。26日，李鸿章电令“超勇”、“扬威”、“威远”3舰驶往上海，准备随他南下。28日，丁汝昌率3舰离开大沽，前往上海。几天后，清廷又密电李鸿章仍回北洋大臣任，“扬威”等3舰南下之事也作罢。

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中法关系不断恶化。1884年8月，法国舰队袭击了停泊在马尾港的福建海军舰只，挑起了中法战争。

法国舰队在马尾得手后，转而进犯台湾，企图占领台湾，迫使中国屈服。10月2日，法军攻占基隆。与此同时，法军从海上向淡水发动进攻，结果遭到中国守军的顽强抵抗，损失严重，不得不放弃攻占淡水的计划。随后，法国舰队封锁了台湾西海岸，以切断大陆对台湾的援助。

为了打破法军的封锁，清廷决定调集南北洋海军的精锐战舰前往台湾增援。在清廷的一再催令下，南洋答应派出5艘主力战

舰，其中包括它仅有的3艘巡洋舰“开济”号、“南琛”号、“南瑞”号和最大的2艘炮舰“澄庆”号、“驭远”号。北洋则派出最好的2艘军舰“扬威”号和“超勇”号参加援台行动。

11月20日，邓世昌率“扬威”舰与“超勇”舰一道，由李鸿章聘请的德国退役海军军官式百龄统带，抵达上海，与南洋海军5舰会齐。“扬威”、“超勇”2舰抵沪后，入坞进行检修。

正当“扬威”、“超勇”等舰准备南下援台之际，朝鲜国内再次发生政变。

12月4日，朝鲜开化党人金玉钧等，在日本驻朝公使的支持下，乘庆祝邮政局开局之机，刺杀了守旧派人物、禁卫大将闵泳翊，攻入王宫，控制了国王，组成了亲日的新政府。这次政变，史称“甲申之变”。

政变发生后，中国驻朝守军应闵妃和守旧派大臣的请求，开进王宫，将朝鲜国王迎至中国驻军营中保护起来。

12月10日，李鸿章电请朝廷放弃援台计划，将援台7舰调往朝鲜，平息政变。

次日，清廷命“扬威”、“超勇”2舰返回北洋，前往朝鲜；南洋5舰仍按原计划南下援台。

此时，日本已派兵700人乘“扶桑”、“比睿”2舰前往朝鲜增援，形势十分紧急。16日，邓世昌率“扬威”舰同“超勇”舰一起离开上海赶往旅顺。

12月20日，丁汝昌、式百龄率“扬威”、“超勇”、“威远”3舰和一个营的陆军，从旅顺出发，前往朝鲜增援。22日，援军抵达朝鲜马山浦。

中国方面行动迅速、果断，使日本无机可乘。日本政府深感其海军尚无法与中国海军相抗，目前无力对中国开战。所以，不得不不同中国协商解决朝鲜问题。“甲申之变”很快得以平息，朝鲜局势重新恢复稳定。

1885年4月，英国占领了朝鲜的巨文岛，朝鲜和中国都表示坚决反对。5月16日，邓世昌率“扬威”舰同“超勇”舰一起随丁汝昌前往巨文岛察看。

中法战争结束后，清廷及时总结战争中的经验教训。它在1885年6月21日发布的上谕中指出：“上年法人寻衅，迭次开仗，陆路各军屡获大胜，尚能张我军威；如果水师得力，互相支援，何至处处牵制？当事实之时，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

所以，中法战争后，鉴于海军力量薄弱，清廷国防建设转向“以大治水师为主”，加强了对海军的建设，重点是北洋海军的建设。

当年10月，清廷成立了“总理海军事务衙门”。这是第一个全国性的海军领导机关，清廷派醇亲王奕譞为总理海军大臣，所有沿海水师，悉归节制调遣。同时，派庆郡王奕劻和李鸿章任会办大臣，派正红旗汉军统领善庆、兵部右侍郎曾纪泽为帮办大臣。

1886年5月，奕譞和李鸿章、善庆前往大沽、烟台、威海、旅顺、大连湾等处视察海军，校阅南北洋海军。邓世昌率“扬威”舰参加了这次规模空前的海军大校阅，表演了列阵、射击等科目。

奕譞对北洋海军的建设非常满意，校阅结束后上奏清廷，要求进一步充实和加强北洋海军的实力，建议将中国在英国和德国订购的4艘巡洋舰拨给北洋海军，加快北洋海军的建设步伐，争取早日成军。这一建议最后得到了清廷的批准。

（四）

奕譞所说的4艘巡洋舰，是清廷为加强台湾、澎湖防务而向英、德两国订造的。1885年8月，清廷鉴于台湾、澎湖海防空虚，责成李鸿章仿照在德国订造的“济远”号巡洋舰的式样，再订购4艘，用于台、澎防务。李鸿章随即电令出使英、德两国大臣曾纪泽、许景澄分别在英国阿姆斯特朗厂和德国伏尔铿厂各订造2艘巡洋舰。

曾纪泽在英国阿姆斯特朗厂订造的是2艘穹甲巡洋舰，命名

为“致远”、“靖远”；许景澄在德国伏尔铿厂订造的是2艘装甲巡洋舰，命名为“经远”、“来远”。4舰仿“济远”而造，但克服了“济远”舰一些明显的弊病，所以当时人认为，4舰“均胜于济远，诚为巡海利器。”

4舰建成后，李鸿章选派海军官兵前往英、德两国接舰。“致远”舰管带由营务处副将衔参将邓世昌担任，“靖远”舰管带由都司叶祖珪担任，“经远”舰管带由都司林永升担任，“来远”舰管带由守备邱宝仁担任。叶祖珪、林永升、邱宝仁都是邓世昌在福州船政学堂学习时的同期同学，3人都在英国留学过。

1887年2月，邓世昌、叶祖珪、林永升、邱宝仁率领400余名官兵，从天津登上招商局的轮船，前往英、德两国接舰。途中，邓世昌兼管文报和经费。

接舰官兵抵达英国后，邓世昌与叶祖珪率部分官兵负责接收“致远”、“靖远”2舰，林永升、邱宝仁则率部分官兵赴德国接收“经远”、“来远”2舰，然后返回英国与邓世昌等会齐。

9月12日，“致远”等4舰和在英国订造的左队一号鱼雷艇一起，从英国朴茨茅斯港启航回国。

途中，邓世昌指挥舰上官兵勤加操练，“终日间变阵必数次”，“时或操火险，时或操水险，时或作备攻状，时或作攻敌计”。在邓世昌的指挥下，舰上官兵踊跃参加训练，紧张忙碌，士气高昂，毫无惊慌杂乱的迹象，一切都是那么井然有序。

军舰行至西班牙，邓世昌乘舢板登岸办事。返回时，海上突然刮起了大风，海浪翻卷咆哮，稍有不慎，舢板就有倾覆的危险。邓世昌临危不惧，亲自把舵，驾驶舢板破浪前进，最终顺利靠上了“致远”舰。邓世昌和随员们均安然无恙，只是全身都被海水湿透了。

9月17日，“致远”等5艘舰艇开始经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地中海。“致远”舰在地中海航行时，因烟囱里有火，添煤过多，着起了大火。邓世昌果断下令打开火门，堵塞灰洞，火势立即得到控制，很快

熄灭了。

10月14日，“致远”等舰艇驶入亚丁港。行至印度洋时，有一段航程海况十分复杂，海流交汇，潮头激撞，浪高有时达数十丈，航行非常危险。邓世昌当时正患病，为保证行船安全，他依然抱病坚守岗位，亲自指挥行船。在他的沉着指挥下，“致远”等舰艇顺利地驶过了危险海域。

10月27日，“致远”等舰抵达锡兰；11月28日，到达香港九龙；12月10日，“致远”等5艘舰艇驶抵厦门。丁汝昌率“定远”等舰在此迎候，并验收了各舰艇。

“致远”、“靖远”、“经远”、“来远”4舰是当时属世界先进水平的巡洋舰。其中，“致远”舰舰长250英尺，宽38英尺，舰首吃水14英尺，舰尾吃水16英尺，排水量2300吨，马力5500匹，时速18海里，各种火炮29门，鱼雷发射管4具。“致远”等4艘巡洋舰加入北洋海军，大大增强了它的实力。

1888年5月，李鸿章视察勘验了驶来天津大沽的“致远”等4艘新巡洋舰，深表满意。6月6日，李鸿章上奏朝廷，为接舰有功的邓世昌等人请奖。9日，清廷准其所请。邓世昌以副将补用，加总兵衔，管带“致远”舰。

8月2日，台湾吕家望番社围攻清军在卑南的大营，台湾巡抚刘铭传请求援助。李鸿章于11日电令丁汝昌派出速度较快的巡洋舰赶赴台湾，用于送信、探事。

由于连日大雨，电报线路中断，无法及时与正在旅大巡洋的各舰取得联系，使援救行动不得不推迟。26日，丁汝昌率“致远”、“靖远”2舰抵达基隆，随即转往卑南。

9月10日，邓世昌率“致远”舰随丁汝昌抵卑南，卸下2门舰炮上岸，协助清军攻剿。9月21日，清军攻破吕家望，“致远”舰从海上发动进攻，支援清军的进攻。台湾之乱平息后，邓世昌因率舰助战有功，擢升为总兵。

(五)

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根据清廷颁布的《北洋海军章程》规定，北洋海军设提督1人，总兵2人，副将5人，参将4人，游击9人，都司27人，守备60人。12月17日，清廷任命丁汝昌为提督，林泰曾、刘步蟾分别为左右翼总兵。次年2月，李鸿章将邓世昌为首的82位海军军官报请清廷任命。邓世昌以花翎提督衔记名总兵借补北洋海军的中军中营副将，仍管带“致远”舰。

6月，邓世昌率“致远”舰与“定远”等7舰赴朝鲜各海口和海参崴一带操巡，历时2个月回国。

1890年1月，邓世昌率舰与“靖远”舰赴台湾恒春，协助刘铭传“剿番”。2月以后，邓世昌又率舰随舰队南巡，先后到香港及南海各口，并访问了西贡、新加坡、小吕宋各口，于5月返回威海。

1891年4月，俄国皇太子来华游历，抵达香港。邓世昌奉命率“致远”舰与“靖远”舰一道，前往随护。5、6月间，李鸿章校阅北洋海军，邓世昌率舰参加。校阅结束后，他又率“致远”舰随舰队前往日本访问。这年10月，李鸿章奏请朝廷，表彰办理海军有功人员，邓世昌被赏换噶尔萨巴图鲁勇号，覃恩赏给三代一品封典。

“定远”、“镇远”、“致远”、“济远”、“靖远”、“经远”、“来远”、“平远”八舰，被称为北洋海军的“八大远”，它们与“超勇”、“扬威”2舰属北洋海军的主力战舰。在这10艘主力战舰的舰长中，只有邓世昌和“平远”舰管带李和没有出国留学过，其他8位舰长都是留英学生。邓世昌虽然因为较早担负管带重任，未能出国留学，但他经过不断学习和艰苦磨练，逐渐成为北洋海军最出色的舰长之一。当时的人称赞他“西学甚深”，精通舰船指挥，“使船如使马，鸣炮如鸣铙，无不洞合机宜”。

由于历史的原因，北洋海军的军官绝大多数是福建人。在10艘主力战舰的舰长中，除邓世昌、李和是广东人，其余8位都是福

建人。邓世昌性格坚毅，深沉持重，处事谨严，说话不多，也不热心于往来应酬。这使他在闽籍军官占多数的北洋海军中，愈发显得有些形单影只。

当时，北洋海军规定，除海军提督以外，总兵以下各级军官不许设衙，不建公馆，一律在舰上办公和居住。开始时，北洋海军的军官们还能比较严格地遵守这条纪律，但慢慢就放松了，以至“总兵以下多陆居，军士亦去船以嬉”。军官们纷纷移眷刘公岛，有的还建起了公馆。夜晚在岸上居住的官兵，往往一船有半。邓世昌自律甚严，始终恪守军规，“非时不登岸”。他的这种作法，引起许多闽籍军官的不满，有的人甚至非常嫉恨他。

邓世昌的主要精力用在了部队的管理和训练上，时人称他为人“英气勃发”，“治事精勤，若其素癖”，“衽席风涛，不避风险”。他善于带兵，精于训练。在他的出色管理下，“致远”舰成为北洋海军最有战斗力的战舰之一，多次圆满完成任务。

邓世昌闲暇之时，喜欢以读书、练字自娱。他最大的爱好是收藏和欣赏书画作品。邓世昌收藏有很多名人字画。其中，他最喜欢的是黄山谷的笔法和风格。

邓世昌是个很重感情的人，尽管他常常克制自己不外露。中法战争期间，邓世昌的祖父和父亲不幸相继去世。当时，邓世昌正率“扬威”舰执行任务，无法回乡奔丧。他深知忠孝不能两全的道理，对祖父和父亲的去世深感悲痛，对不能最后见亲人一面以尽孝道，“终身引为大戚”。

邓世昌对属下官兵既严格要求，也十分关心，与他们同甘共苦，深得他们的尊重和信任。邓世昌非常重视培养军人的爱国精神和忠烈气节。他常对人说：“人谁不死，但愿死得其所。”他常常在军中“激扬风义，甄拔士卒，遇忠烈事，极口表扬，慷慨使人零涕”。人们称赞邓世昌“有古烈士风”。

1894年5月，李鸿章第二次校阅海军。邓世昌率“致远”舰参

加了检阅。此时，朝鲜爆发了东学党起义，日本趁机蠢蠢欲动。校阅结束后仅一周，清廷便应朝鲜之邀，派海陆军赴朝，帮助镇压东学党起义。不久，日军也开进朝鲜，中日关系骤然紧张，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

7月25日，传来日本军舰在丰岛海面袭击了中国运兵船队的消息。“高升”号运兵轮船被击沉，船上官兵800余人遇难。北洋海军的“操江”号炮舰被俘，负责护航的“广乙”舰受伤后搁浅焚毁，只有“济远”舰带伤逃回。邓世昌闻讯，十分气愤，请求进兵，与日本舰队决战，以雪丰岛之耻。8月1日，清廷正式对日宣战。此后一个月里，邓世昌几次率舰随舰队出巡，搜索日本舰队。他对部下说：“如果遭遇不测，誓与日舰同沉。”表露了他准备与日舰决一死战的决心。

(六)

1894年9月16日，邓世昌率“致远”舰参加了护送陆军前往大东沟登陆的任务。次日，完成护航任务的北洋海军与前来搜索的日本舰队相遇，爆发了著名的大东沟海战。

海战打响后，处在北洋海军“人”字阵左翼中间位置的“致远”舰，与友舰密切配合，英勇抗击日舰的进攻，给日本舰队的“比睿”、“赤城”等舰以重创。最后，“比睿”、“赤城”2舰丧失了战斗力，狼狈逃离战场。

激战数小时后，日本舰队渐渐占据上风。北洋海军“超勇”舰沉没，“扬威”、“平远”、“广丙”3舰中弹起火，驶离战阵自救。北洋海军以8舰力敌日本舰队的9艘军舰。“致远”舰虽中弹累累，但在邓世昌的指挥下仍力战不退，于“阵云缭乱中，气象猛鸷，独冠全军”。

战至下午3时零4分，北洋海军的旗舰“定远”号铁甲舰被敌舰击中要害，舰上燃起熊熊大火，形势十分危急。邓世昌为保护旗舰，急令战舰冲至“定远”舰之前，迎击敌舰。“镇远”舰也驶至“定

远”之前掩护旗舰。

“致远”舰是北洋海军中航速最快的2艘军舰之一，敌舰见“致远”舰冲出战阵拦截，便集中火力进行围攻，“致远”舰处境十分险恶。这时，舰上的一些官兵开始有些慌乱。邓世昌站在指挥台上大声喝道：“我等从军卫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不过一死而已，不必惊慌纷乱。我等虽死，而因此扬我海军声威，这就是报国！”

在他的激励下，全舰官兵同仇敌忾，拼死反击敌舰的围攻。“致远”舰在“致远”和“镇远”2舰的掩护下，全力扑灭舰上的大火，重新投入了战斗。

激战中，“致远”舰受了重伤，水线以下被敌舰10英寸和13英寸炮弹击出几个大洞，海水涌入舰中。

由于水密门隔舱的橡皮年久破烂，无法防堵海水，海水很快涌入各舱中，使军舰随时有沉没的危险。

此时，日本舰队的“吉野”号巡洋舰从“致远”舰前掠过。邓世昌决心作最后一搏，用舰首撞角撞沉“吉野”舰。“吉野”舰是日本舰队第一游击队的旗舰，速度最快，高达22.5节，对北洋海军威胁最大。邓世昌对大副陈金揆说：“倭舰专恃吉野，苟沉是舰，则我军可以集事。”陈金揆深表赞同。于是，“致远”舰鼓足马力，一面不停地用抽水机排出舱中的海水，一面“鼓轮怒驶，且沿途鸣炮，不绝于耳”，奋勇冲向敌舰。“吉野”等敌舰见“致远”舰怒驶而来，慌忙逃避，并集中炮火拦截。顷刻间，如雨般的炮弹倾泻到“致远”舰上和它的四周。不久，“致远”舰即被密集的炮火击沉。随“镇远”舰参战的美国顾问马吉芬目睹了“致远”舰的沉没。他后来在回忆文章中描述当时的情景说：

不转瞬间，该舰即向一方倾斜。最以勇敢著称之邓舰长世昌，早经觉悟已迫于最期，能破敌一舰，斯可以洁此生，故毅然决然出于杀身成仁之举。第敌舰所发巨弹有如雨霰，加之自舰倾斜已甚，致功业成之际遽尔颠覆，舰首

先行下沉，推进器直现于空中，犹在旋转不已。惜哉，壮哉！

“致远”舰沉没后，邓世昌坠入海中。仆人刘忠抛救生圈给他，被他推到一边；左一鱼雷艇赶来援救，他也拒不上艇；邓世昌蓄养的爱犬名叫太阳犬，凫到他身边，衔住他的手臂不使他沉入水中，邓世昌挥斥其离开，太阳犬又咬住他的发辫，使他的头部露出水面。邓世昌抱定与战舰共存亡、以一死报国家的决心，毅然抱住爱犬，一起沉入滚滚波涛之中。

邓世昌生于道光二十九年八月十八日，死于光绪二十年八月十八日，按农历计算，邓世昌捐躯之日正是他 45 岁生日。

“致远”舰有 200 多名官兵，此役除 7 名水兵获救外，其余全部牺牲。

邓世昌是黄海海战中北洋海军阵亡将领中职务最高的一位，表现最为英勇，牺牲最为壮烈。海战结束后，李鸿章上奏朝廷为阵亡将士请恤，特别报告了邓世昌的英勇事迹并请朝廷对其予以特殊奖励。他在上奏中说：

邓世昌首先冲阵，攻毁敌船，被溺后遇救出水，自以阖船俱没，义不独生，仍复奋掷自沈。忠勇性成，一时称叹，殊功奇烈，尤与寻常死事不同，且官阶较大，可否特旨予谥，以示优异，而劝将来。

清廷批准李鸿章的奏请，下令将邓世昌按提督例从优议恤，追赠太子少保，赐祭葬，世袭骑都尉兼一云骑世袭。接着，清廷又赐予邓世昌“壮节”的谥号，入祀京师昭忠祠。

光绪皇帝对邓世昌壮烈殉国深为震悼和敬佩，亲自撰写了“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的挽联。并赐诗一首：“城上神威炮万斤，枉资剧寇挫我军。后来天道终许汝，致远深沉第一功。”光绪皇帝还赐给邓世昌的母亲一块鑲金大匾，上书“教子有方”。

邓世昌素以忠义自励，平时生活俭朴，为官清正廉洁。所以，牺

牲之后，家无余财。李鸿章对邓世昌的为人深感钦佩。他曾叹息说：“没想到世间竟会有邓世昌这样的人物，最终捐躯报国，真是一个言行一致的人。”

与此同时，李鸿章对邓世昌“业经救起而坚执船亡与亡之义，卒以身殉”，深感痛惜。大东沟海战结束后不到一个月，李鸿章便将丁汝昌所呈《海军惩劝章程》转奏朝廷。其中写道：

海军战备，首重选才。拔之千百人，养之数十年，然后得一将之用。兵船犹可骤添，将才殊难猝致。大东沟之战，“致远”管带邓世昌首先冲锋，攻毁敌船，旋因“致远”船沈同没，业经被人救起，自以船亡不能独存，不肯出水，仍复溺毙，闻者无不叹伤。该管带忠勇性成，死事固其本分；特恐诸将狃于闻见，但以轻生为烈，而不知徒死无益，非所以示常守之法，而全有用之才。应请明定章程，俾有遵奉。拟嗣后海军各船遇敌退缩即以军法从事；其有前敌冲锋尽力攻击者，或被敌轰沈，或机器损坏，或子弹罄尽，或伤焚太甚，无可挽救，虽军舰沈焚，而船中将士遇救得生，准免治罪，仍予论功。

很显然，李鸿章不希望再有像邓世昌这样的优秀将领引义轻生，他要为北洋海军尽可能多地保留有用之才。但李鸿章的想法并没有完全实现。以后，仍有不少优秀的海军将领继邓世昌之后，抱定与战舰共存亡的信念，自裁殉国。

邓世昌牺牲后，山东百姓仰慕英雄的忠烈节义，在成山之巅集资修建了邓公庙，塑像致祭，纪念英灵。

邓世昌的遗骸长存海底，后人在广州北郊沙河为他修建了衣冠冢，位于他母亲的墓下。

争先猛进 奋不顾身

——记林永升

在1894年9月的大东沟海战中，北洋海军奋勇抗击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先后有4位巡洋舰管带英勇捐躯。其中，“超勇”舰管带黄建勋、“扬威”舰管带林履中和“致远”舰管带邓世昌3人都是在军舰沉毁的情况下，抱定誓与战舰共存亡的决心，拒绝援救，引义自尽。而唯一的例外就是“经远”舰管带林永升。他是在率舰与日舰激战时，因中炮而壮烈牺牲。

在大东沟海战中，作战之英勇，牺牲之壮烈，首推邓世昌和林永升。后人评价说：“是役临阵之勇，奋不顾身，以公（指林永升）与邓壮节公为最。”战后，清廷以邓世昌、林永升“争先猛进，死事最烈”，除按提督例从优议恤外，还特追赠邓世昌、林永升二人太子少保，以示旌奖。

（一）

林永升，字钟卿，福建侯官（今福州）人，生于1853年。14岁时，考入福州船政学堂，为驾驶班第一期学生。

1871年，林永升结束堂课学习，派上“建威”号练习舰实习。几年里，他与同学一道，乘舰巡历了南北洋各口以及香港、新加坡、槟榔屿等口岸。1875年，林永升调往“扬武”号练习舰担任教习，奖补千总。此后，他随“扬武”舰先后到过日本的长崎、神户、横滨等港口和香港、新加坡、槟榔屿、马拉甲、小吕宋等处。

1877年3月，清廷向英国和法国派出第一批30名海军留学

生。林永升有幸入选,前往英国学习驾驶。和他一起学习驾驶的还有刘步蟾、林泰曾、黄建勋等 11 人。

林永升等留英学生是 3 月 31 日乘“济安”轮从福州马尾出发的。他们首先抵达香港,在这里换乘外国公司的轮船继续向西航行。5 月 7 日,林永升等到达了法国的马赛港。18 名学习制造的留学生留在了马赛,林永升等 12 名学习驾驶的留学生则乘火车北驶,然后渡过英吉利海峡。11 日,他们抵达英国首都伦敦。

林永升等抵达英国后,先被安排前往抱穆士德,参观那里的船厂、船坞、炮台、海港等设施,以及练习舰上教学情况。

8 月,刘步蟾、林泰曾、蒋超英 3 人被安排到英国地中海舰队的“马那杜”号、“孛来克柏林”号、“狄芬士”号铁甲舰上实习。林永升、黄建勋等 9 人则前往南安普敦,补习英语,准备考取最著名的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

10 月,林永升、严宗光(复)、萨镇冰等 6 人通过了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严格的考试,进入该院学习。黄建勋等 3 人未能考取,被派往舰队实习。

林永升在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学习了 8 个月,学业极为优秀,深得英人的好评。1878 年 6 月,林永升等 5 人结束了在皇家海军学院的学习,被派上军舰实习。严宗光则继续留在学院学习,准备回国后担任教习。

8 月,林永升被派往英国地中海舰队的“马那杜”号铁甲舰实习,随舰巡历了地中海各口。

1879 年秋,林永升等陆续结束了海上实习课程。留学生监督李凤苞又延请英国皇家海军炮队教官苏萃和美国海军水雷教官马格斐,分别为留学生们讲授了炮垒军火诸学和水雷电气诸学。

1880 年 5 月,林永升与方伯谦、叶祖珪、萨镇冰 3 人一起结束了留学生活,最后一批回国。官方对他们在英国的学习甚表满意,认为林永升等“均勤勉颖悟,历练甚精,堪充水师管驾之官。”

林永升回国后，升守备，加都司衔。此时，奉旨督办北洋海防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正积极网罗海军人才，充实他刚刚开始组建的北洋海军。从英国留学回国的林永升自然成为他的重要目标。1881年5月，李鸿章调林永升到北洋任职。7月，李鸿章从英国订购的“镇中”号和“镇边”号炮舰建成来华，林永升被任命为“镇中”舰管带。

“镇中”舰长125英尺，宽29英尺，吃水9英尺6英寸，排水量440吨，马力400匹，时速10海里，装备有11英寸口径35吨前膛炮1门，12磅后膛炮2门，格林炮2门。该舰是李鸿章从英国购买的第4批炮舰中的一艘，这些炮舰主要是用来配合炮台防守海口的。

1884年，法国加紧侵略越南并派出舰队前来中国沿海威胁骚扰，海防形势骤然紧张。北洋各口作为海防的重中之重，加强了战备。6月，李鸿章等前往旅顺、烟台、威海，巡阅北洋海防。北洋海军的“超勇”、“扬威”2巡洋舰和“威远”、“康济”2练习舰齐集大沽口外，林永升率“镇中”与“镇边”、“镇东”、“镇西”、“镇南”、“镇北”各舰齐集烟台，准备接受检阅。22日，林永升率“镇中”舰随舰队参加操演。李鸿章等观看了北洋各舰操演雁行、鱼贯各阵式和帆缆、灯旗各号令，及枪炮施放之法等，认为阵容整齐，变化灵活，对舰队表现较为满意。

7月，战争威胁越来越严重，清廷命李鸿章切实加强北洋海防，确保京津安全。李鸿章认为，北洋之天津至山海关一带，沿海地段绵长，港汊纷歧，不能处处设防，必须在敌舰有可能深入登岸的地方，扼要守险。直隶境内敌舰可以深入的地方以大沽口、北塘口最为重要。为此，除加强两口的炮台及陆路防守力量外，李鸿章又派炮舰前去帮助守口。林永升奉命率“镇中”舰与“镇东”、“镇西”、“镇北”舰前往大沽口镇守，与炮台相依护。另外2艘炮舰“镇南”、“镇边”被派往北塘口镇守。与此同时，丁汝昌率北洋海军的“超

勇”、“扬威”2巡洋舰和“威远”、“康济”2练习舰前往旅顺固防。

林永升率舰到防后，丁汝昌写信给他，通报舰队部署情况，并指示他将“镇中”等4舰现有弹药数量及尚需弹药数量了解清楚，详细报告。

由于中法战争一触即发，驻泊旅顺的北洋海军“超勇”、“扬威”、“威远”、“康济”4舰的外国雇员纷纷辞职离去，各舰急需管轮人才。丁汝昌致信林永升和“镇边”舰管带叶祖珪，请他们从“六镇”炮舰上挑选4名二管轮前往旅顺。

是年8月，中法战争爆发。为加强旅顺防务，林永升于9月奉命率“镇中”舰与“镇东”舰一道，离开大沽口，移驻旅顺。整个战争期间，战事主要集中在闽浙沿海和台湾一带。法国舰队虽屡次扬言要北上直隶，但始终未能付诸行动。北洋各口严阵以待，总算是有惊无险。

(二)

中法战争结束后，清廷汲取战争中的教训，决定加快海军建设的步伐。1885年10月，清廷成立了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统一全国的海军建设。

当时，中国拥有4支海军舰队，即北洋海军、南洋海军、福建海军和广东海军。福建海军曾最早具备规模，也有一定的实力。但中法战争中经马江之战几乎全军覆没，仅剩下小型炮舰、运输舰、通报舰共10艘。

南洋海军在中法战争中也受到严重损失，实力被削弱。广东海军一直相对比较薄弱，多数是小炮舰，很少有能用于海上作战的军舰。相比之下，北洋海军成为4支海军中实力最强的一个。鉴于北洋战略地位重要，海军发展基础较好，为了相对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清廷决定重点发展北洋海军，使其尽快成军，然后再次发展其他几支海军。

1886年5月，总理海军大臣奕谟等视察了北洋海防。随后奏请朝廷允准，把为加强台湾、澎湖防务而分别在英、德两国订造的4艘巡洋舰划归北洋海军，以期加快其发展。

1887年2月，清廷在英国和德国订造的4艘巡洋舰竣工，分别命名为“致远”、“靖远”、“经远”和“来远”。随后，李鸿章选派得力人员前往英、德两国接舰，林永升奉派管带“经远”舰回国。

林永升与邓世昌等接舰官兵400余人，乘招商局轮船前往英国。抵达英国后，林永升和邱宝仁又率部分官兵转往德国。8月11日，林永升、邱宝仁与中国驻德使臣许景澄一道，在德国士旦丁港接收德国伏尔铿厂制造的“经远”号和“来远”号巡洋舰，并举行了升旗仪式。

林永升管驾“经远”舰同“来远”舰一起返回英国，与接收“致远”号和“靖远”号巡洋舰的邓世昌等会合。9月12日，他们率舰从英国的朴次茅斯港出发回国，经大西洋、地中海、红海、印度洋、南洋，历时近3个月，于12月10日抵达厦门，圆满完成了接舰任务。

1888年6月，清廷对接舰有功人员分别给予奖励，林永升被赏给御勇巴图鲁勇号。

是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1889年2月，李鸿章奏请清廷委任北洋海军副将以下各将领。林永升以花翎补用游击升署北洋海军五副将之一的左翼左营副将，仍管带“经远”号巡洋舰。

“经远”舰与“来远”舰同为装甲巡洋舰，舰长82米，宽12米，吃水5米，排水量2900吨，马力5000匹，航速15.25节，火炮12门，其中210毫米炮2门，150毫米炮2门，40毫米快放炮1门，47毫米5管钢炮2门，37毫米5管钢炮5门，另有鱼雷发射管4具。“经远”和“来远”2舰是北洋海军最大的两艘巡洋舰，在北洋诸舰中，其吨位仅次于“定远”号和“镇远”号铁甲舰（排水量7335吨），航速仅次于“致远”号和“靖远”号巡洋舰（航速18节）。“经远”、“来远”2舰购舰费用总计为594万马克。其中，“经远”舰工价为300

万马克,于1887年1月20日前建成。“来远”舰工价为294万马克,于1887年4月前建成。

1889年6月,林永升率“经远”舰随丁汝昌前往朝鲜沿海各口巡弋,同行的还有北洋的“定远”、“致远”、“靖远”、“来远”4舰和南洋的“寰泰”、“镜清”、“开济”3舰。29日,“经远”等8舰抵达朝鲜仁川。7月17日,南北洋8舰由巨文岛开元山。接着,林永升率“经远”舰与“寰泰”舰前往图门江探测。8月,“经远”等8舰回国。

次年1月11日,林永升率舰随丁汝昌巡阅基隆、澎湖、平安后,抵达香港修理。2月,“经远”舰又与“致远”、“济远”、“来远”等舰随丁汝昌巡历南海各口,历时20余天。

1891年6月,林永升率“经远”舰与“定远”、“镇远”、“致远”、“靖远”、“来远”各舰随丁汝昌访问日本。这次访问是丁汝昌率北洋军舰第二次访日。第一次是在1886年8月,结果舰上水兵在长崎与日本军警发生了严重冲突,酿成流血事件,即“长崎事件”。丁汝昌第二次率舰访日,是应日本方面的邀请。

7月9日,日本天皇接见了丁汝昌及林永升等各舰管带。20日,北洋海军结束在日本的访问,返回威海。

是年10月,李鸿章奏请朝廷,奖励办理海军有功人员,林永升着赏换奇穆钦巴图鲁勇号。1892年4月,林永升副将署理期满3年,改为实缺。甲午战前,林永升为升用总兵、左翼左营副将。

1893年4月,朝鲜发生内乱,驻守朝鲜的袁世凯,电请李鸿章派2艘军舰赴朝,帮助恢复秩序。6日,李鸿章先派“靖远”、“来远”2舰赴朝。5月15日,又派“济远”、“经远”2舰赴朝。林永升率“经远”舰抵朝后,驻泊仁川港。

1894年2月,朝鲜发生东学党人起义,清廷应邀派海陆军前往朝鲜。一直企图侵略朝鲜和中国的日本,也趁机出兵朝鲜,最终导致双方兵戎相见,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

(三)

7月25日，日本舰队在丰岛海面袭击北洋海军派往朝鲜的运兵船队，挑起了战争。6天后，清廷正式对日宣战。

战前，北洋海军频繁调动军舰前往朝鲜，加强中国在朝鲜的军事力量，与日军抗衡。林永升率“经远”舰一直留在国内镇守，丰岛海战爆发后，始随舰队出巡，搜索日本舰队。

8月2日，林永升率“经远”舰与“定远”、“镇远”、“致远”、“靖远”、“来远”等舰一道，由丁汝昌率领，巡弋朝鲜大同江口一带。9日，丁汝昌再次率“定远”、“镇远”及“经远”等10艘军舰，赴大同江搜寻日舰。29日，林永升又率舰与各舰随丁汝昌前往海洋岛一带巡查。第二天，有消息说在旅顺以北发现2艘日舰。丁汝昌立即派林永升率舰与“致远”舰一起前往搜索。9月1日，“经远”、“致远”2舰在老铁山、长尖岛一带进行了仔细搜索，没有发现日舰的踪影。

林永升深知北洋海军与日本舰队必有一场生死之战。所以，他率领全舰官兵加紧战前准备，夜以继日地进行操练，使全舰官兵熟练掌握战术和技术要领，并明确每个人的职责。林永升非常注意用爱国精神和忠烈气节教育、勉励舰上官兵，晓之以大义，动之以真情，使全舰官兵无不为之感动。林永升性格和易，待人诚恳，平时与人交往，唯恐伤害别人的感情，总是小心谨慎，不使别人难堪。林永升对舰上官兵很有感情，非常关心爱护他们，从不当众训斥、辱骂属下，还反对在军中使用肉刑。他认为长官应当以身作则，循循善诱。这在当时长官动辄体罚打骂部属的北洋海军中是非常难得的。林永升也因而深得部属的爱戴，大家都感到他“待士卒有恩”，所以，“咸乐为之死”。

9月16日，林永升率“经远”舰参加了北洋海军的护航行动，护送陆军前往大东沟登陆。9月17日，完成护航任务的北洋海军与日本海军联合舰队相遇，爆发了大东沟海战。

战斗打响时，“经远”舰位于北洋海军“人”字阵右翼的中间位置，左前为“来远”、“镇远”2舰，右后为“超勇”、“扬威”2舰。日本舰队第一游击队的“吉野”等4舰，直扑北洋海军右翼阵脚的“超勇”、“扬威”2舰，日本舰队本队6舰则驶至北洋海军“人”字阵正前方进行攻击。林永升指挥“经远”舰与友舰密切配合，同日舰展开了激战。为表示与敌舰死战到底的决心，林永升在战斗开始前，下令撤去了船舱中的木梯，并命在桅顶升起龙旗，策励全舰将士。

北洋海军各舰虽然给日本舰队以重创，但由于在开战之初便失去了指挥，日本舰队利用其速度快的优势，很快将北洋海军的战阵冲散，予以分割包围。战至下午1时30分，北洋海军的“超勇”舰首先被日舰击沉，“扬威”舰受重伤退出战斗。3时20分，“致远”舰也英勇战沉。

林永升平素与邓世昌志趣相投，“夙与世昌等以忠义相激励”。他目睹“致远”舰被日舰击沉，悲愤填膺，发誓与日舰血战到底。他抱定必死的决心，毅然指挥战舰冲向日军“吉野”舰。此时，“经远”舰已多处受伤，舰上燃起大火，烈焰升腾，浓烟翻滚。林永升沉着指挥舰上官兵，一面发炮回击日舰的进攻，一面扑救舰上的大火。舰上官兵各司其职，坚守岗位，毫无慌乱，显得井井有条。

在林永升的指挥和激励下，“经远”舰全体将士，冒着敌舰密集的炮火，拚死抵抗，力战多时。正当激战之际，林永升突然被飞来的弹片击中头部，血流满面，倒在指挥台上，当场牺牲，时年41岁。

林永升牺牲后，“经远”舰大副陈策和二副陈京莹代替他指挥，继续战斗。不久，二人也壮烈殉国。

“致远”舰战沉后，北洋海军左翼阵脚的“济远”、“广甲”2巡洋舰，见形势危急，转舵西驶，脱离战场。“广甲”号巡洋舰逃至大连湾三山岛外，触礁搁浅，舰上官兵纵火焚船，然后登岸逃走。两天后，“广甲”舰被日舰发现并击毁。“济远”舰驶离战场后，提前回到旅顺。大东沟海战结束后，“济远”舰管带方伯谦被清廷以临阵退缩罪

斩首。

“广甲”、“济远”2舰脱离战场后，北洋海军的“平远”和“广丙”2舰负伤退出战场，在近岸抢修；“经远”、“来远”、“靖远”3舰也负弹累累，且战且退至大鹿岛附近浅水处抢修军舰。

日本舰队第一游击队的“吉野”、“高千穗”、“秋津洲”、“浪速”4舰追击“广甲”、“济远”2舰，由于距离太远，无法追上，遂转舵围攻“经远”舰。“经远”舰上的士兵在失去指挥的情况下，仍坚守岗位，继续战斗。“经远”舰以一抵四，毫不畏惧，拖住了号称“帝国精锐”的“吉野”等4舰，使“来远”、“靖远”得到喘息的时间，全力扑灭舰上大火，抢修军舰。

受伤的“经远”舰在日舰环攻之下，中弹无数，渐渐不支。日舰“高千穗”从3000米的距离上猛攻，“吉野”舰又以6英寸快炮从2300米的距离上夹击。“经远”舰抵抗力越来越弱，在海上绕行，躲避敌舰炮火。日舰在不到两千米的距离上向其连续发射排炮。至5时许，大火吞噬了“经远”舰，军舰开始下沉。

但舰上炮手仍坚持开炮，直到最后一刻。5时30分，“经远”舰向左舷倾倒，舰底缓缓露出水面，舵机失去作用。在日舰疯狂的弹雨下，“经远”舰尾沉入水中，舰身直立，舰首高昂。最后，随着一阵剧烈的爆炸声，“经远”舰沉入海中。

“经远”舰上有官兵200余人，最后获救者仅16人，其余均壮烈殉国。

大东沟海战结束后，清廷以林永升与邓世昌在海战中“争先猛进，死事最烈”，下令均照提督例从优议恤，追赠太子少保。林永升在军中素得人心，大家对他的牺牲无不深感痛惜。

舰存与存 舰亡与亡

——记林泰曾

1894年11月14日凌晨3时许，从旅顺匆匆返回的北洋海军各舰鱼贯而行，趁着茫茫夜色，缓缓驶入威海西口。此时，强劲的西北风掀起层层波涛，指示航向的浮漂，在风浪的猛烈拍击下发生偏移。紧随旗舰之后的“镇远”号铁甲舰循浮漂航行，不幸撞到了礁石上，致使军舰严重受损，海水汹涌而入。虽经舰上官兵奋力抢救，保住了军舰，但已无法出海作战。“镇远”舰管带林泰曾见战舰损毁，抱定“舰存与存，舰亡与亡”的信条，自杀殉国。

（一）

林泰曾，字凯仕，福建闽县（今福州）人，生于1851年。1867年，他考入福州船政学堂，为驾驶班第一期学生。

林泰曾聪颖好学，在学堂考试总是名列前茅，是船政学生中的佼佼者。

1871年6月，林泰曾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船政学堂的大考，结束了堂课学习，转上“建威”号练习舰实习。他随舰游历了南北洋各口及香港、新加坡、槟榔屿等口。实习中，林泰曾表现出众，深得英国教习的赞赏。船政大臣沈葆楨向朝廷报告学生远航实习的表现时评价说：“其驾驶心细胆大，则粤童张成、吕翰为之冠；其精于算法、量天尺之学者，则闽童刘步蟾、林泰曾、蒋超英为之冠。”在数十名实习学生中，林泰曾无疑是出类拔萃的。

结束海上实习生活后，林泰曾于1874年被派往台湾后山测量

海道,随后被任命为“安澜”号炮舰的枪械教习。“安澜”舰是福州船政局制造的第5号军舰,1871年6月建成下水,排水量为1258吨,马力580匹,航速10节,装备有5门大炮。林泰曾在这艘军舰上只工作了几个月,便在年底调往“建威”号练习舰担任大副。第二年,“安澜”舰不幸在台湾旗后遭风沉没。

1873年12月,沈葆楨等奏请朝廷选派船政学堂的优秀学生前往法国和英国留学,进一步深造。后因日本侵台事件发生,派遣海军留学生的事便搁置起来。

1875年春,沈葆楨派船政监督法国人日意格回国采购挖泥船、轮船铁肋和新式轮机,借此机会选派5名船政学堂毕业生随他前往法国和英国考察学习。这5名毕业生是前学堂学习制造的魏瀚、陈兆翱、陈季同和后学堂学习驾驶的林泰曾、刘步蟾。

林泰曾与刘步蟾随日意格出洋后,“阅览欧洲水师武备”,收获很大。这年年底,经日意格安排,林泰曾和刘步蟾进入英国戈斯波特海军军官学校学习。

1876年3月5日,已升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的沈葆楨致文总理衙门,称赞林泰曾和刘步蟾“英学颇精,于外国武备水师,俱经阅历”,都是可造之才,建议与英方联系,允许林泰曾、刘步蟾“于英国大战船续学驾驶,以期精益求精”。同一天,船政大臣丁日昌也致文总理衙门,请安排林泰曾和刘步蟾到英国军舰学习1至2年。结果,沈葆楨和丁日昌的努力均未获成功。4月23日,林泰曾、刘步蟾与陈季同随日意格离开欧洲回国。

林泰曾出洋学习时,沈葆楨保荐他守备加都司衔,不久又保以都司留闽补用。林泰曾回国后,被派往台湾,会办翻译事务。

1877年,清廷正式派遣第一批海军留学生共30人前往英法两国。林泰曾入选,赴英国学习驾驶。

林泰曾因已出洋学习过,所以经中国与英方商定,他到英国后,直接被派往英国舰队实习。与他一起直接上舰的还有刘步蟾和

蒋超英,其余9名学习驾驶的留学生则准备进入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学习。

林泰曾和其他留学生在抱士穆德学习考察了一段时间后,于是年9月前往英国地中海舰队报到,被派上“李来克柏林”号铁甲舰,赴地中海实习,学习驾驶、枪炮、阵法等知识。

第二年6月,林泰曾转上“潘尼洛布”号军舰实习。两个月后,他又先后到地中海舰队的“阿其力”号军舰和“威灵顿”号军舰实习。8月13日,中国驻英使臣郭嵩焘应邀随英国女王赴朴次茅斯检阅海军并参观船厂,林泰曾作为随员陪同。

1879年7月,林泰曾结束了在英国2年的学习,取道法国先期回国。与他一起回国的还有刘步蟾、何心川2人。

林泰曾和刘步蟾是留英学生中最优秀的两位,李鸿章等认为,他们知“水师兵船紧要关键”,不仅能熟练指挥大小军舰,更能测绘海图,防守港口,布置水雷,完全可以和西洋海军的舰长相比。

林泰曾等回国后,受到各方重视。李鸿章称赞林泰曾“沈毅朴诚”,才堪大用,将来可派他指挥大舰。李鸿章还奏请朝廷,着林泰曾以游击留闽尽先补用,并赏戴花翎。丁日昌也认为林泰曾等学生“才皆可用”,建议从中挑选最优秀的暂行代理海军统领。是时,李鸿章为南洋代购的“镇东”、“镇西”、“镇南”、“镇北”4艘炮舰即将来华,沈葆楨便奏请优先考虑由林泰曾和刘步蟾出任管带。

南洋海军订购的“四镇”炮舰11月到华,李鸿章将4舰留归北洋,而将北洋以前在英国订购的4艘炮舰划归南洋,这4艘炮舰是“龙骧”、“虎威”、“飞霆”、“策电”。李鸿章致函沈葆楨催促速派林泰曾和刘步蟾来北洋管带“四镇”,或派其中一人任“四镇”的管带,另一人接任“飞霆”管带,带舰南下。

12月7日,李鸿章致函沈葆楨,拟派林泰曾管带“飞霆”舰南下。18日,沈葆楨病逝。李鸿章又把林泰曾留在北洋,改任“镇西”号炮舰管带。而由许寿山等人管驾“飞霆”等4舰南下,归建南洋海

军。时刘步蟾任“镇北”舰管带，林泰曾与他一起将留学心得写成题为《西洋兵船炮台操法大略》的条陈，呈给李鸿章，提出加强海军建设的意见，认为“最上之策，非拥铁甲等船自成数军决胜海上，不足臻以战为守之妙”。

(二)

1881年2月，林泰曾奉派前往英国，接带在阿姆斯特朗厂订造的“超勇”号和“扬威”号巡洋舰。林泰曾负责管驾“超勇”舰回国。

4月22日，林泰曾与邓世昌等200多名接舰官兵抵达英国伦敦。24日，他们转往纽卡斯尔港，作接舰准备。由于英方推迟了交货时间，林泰曾等直到8月17日才率“超勇”、“扬威”2舰从英国启航回国。

8月31日，林泰曾率“超勇”舰抵达塞得港。第二天，当“超勇”舰准备通过苏伊士运河时，突然接到“扬威”舰的告急电报，报告他们煤水均已告罄，在亚历山大港外80海里的洋面上抛锚。林泰曾立即率舰前往救援接济，帮助“扬威”舰脱离了险境。

9月9日，“超勇”、“扬威”2舰进入苏伊士运河。次日，“超勇”舰先行驶出运河，林泰曾接到“扬威”舰发来的电报，得知其螺旋桨损坏，停在河中无法航行。林泰曾急率舰前往救援。第二天，“扬威”舰被拖轮拉出运河，入坞修理。

10月15日，“超勇”、“扬威”2舰抵达香港，途中2舰营救了一些遇险渔民。3天后，“超勇”、“扬威”2舰抵达广州外江口。11月17日，两舰到达大沽。

李鸿章率员验收了“超勇”、“扬威”2舰，随后，他奏请朝廷奖励圆满完成接舰任务的丁汝昌、林泰曾和邓世昌等人。林泰曾被赏果勇巴图鲁勇号，免补游击，以参将补用。

1882年5月，林泰曾率“超勇”舰与邓世昌所率的“扬威”舰一起，随丁汝昌等前往朝鲜，帮助朝鲜与美国订立了《朝美通商条

约》。6月，林泰曾再次率舰随丁汝昌等赴朝，帮助订立了《朝德通商条约》。

7月23日，朝鲜发生“壬午之变”，士兵和百姓焚毁了日本使馆，日本公使逃离仁川回国。接着，日本派出海陆军前往朝鲜干涉。清廷为了控制住朝鲜的局势，命丁汝昌率舰前往朝鲜。8月10日，林泰曾率舰随丁汝昌第三次前往朝鲜，驻泊仁川。一起赴朝的还有“扬威”、“威远”2舰。两天后，丁汝昌率“威远”舰回天津报告朝鲜局势。林泰曾与邓世昌率舰留守在朝鲜。13日，林泰曾和邓世昌分乘小轮前往南阳测量水道。不久，丁汝昌、吴长庆等率兵赴朝，很快平息了朝鲜的内乱，迫使日本不得不暂时放弃了对朝鲜的干涉。

林泰曾率舰回国后，因功受到了朝廷的嘉奖，着免补参将，以副将尽先补用。

1883年5月，因为法国侵略越南引起中国西南形势紧张，清廷派李鸿章前往广东，所有广东、广西、云南防军都由他节制。李鸿章电令丁汝昌率“超勇”、“扬威”和“威远”3舰赴上海待命，准备与他一同南下。不久，清廷又命李鸿章回北洋任上，“超勇”等3舰也随即返回北洋。

1884年，中法关系因越南战事而变得十分紧张，法国舰队也驶来中国沿海进行威胁。北洋各口加强了力量，以防法军的袭击。林泰曾率“超勇”舰与“扬威”、“威远”、“康济”等舰一起，驻守旅顺。

8月，法军袭击了马尾港内的福建海军，挑起了战争。随后，法军转而进攻台湾，企图通过控制台湾来迫使清廷就范，接受其苛刻的条件。法军的进攻遭到守军的顽强抵抗，于是，他们在加强岛上进攻的同时，封锁了台湾海域，打算切断大陆对台湾的援助。

为了援助驻台守军，清廷调集南北洋海军精锐，准备打破法军的海上封锁。11月，林泰曾奉命率“超勇”舰与邓世昌所率“扬威”舰前往上海，与南洋海军的5艘军舰会合，准备南下援台。李鸿章聘请德国海军退役军官式百龄，改名万里城，担任“超勇”、“扬威”2

舰的顾问。20日，式百龄统带“超勇”、“扬威”2舰抵达上海，随即入坞修理。

李鸿章认为，北洋2舰与南洋5舰远不是法国舰队的对手。所以，他对这次援台行动深感忧虑，总是担心“超勇”、“扬威”2舰有什么闪失。2舰抵达上海的第二天，李鸿章便打电报给林泰曾，要他负责协调北洋2舰与南洋5舰的行动，并一再叮嘱要注意保密，千万不可泄露风声，以免遭到法军的截击。

正当林泰曾等准备南下援台行动的时候，传来了朝鲜发生政变的消息。开化党人在日本的支持下，夺取了政权，组成了亲日的新内阁，史称“甲申之变”。政变发生后，袁世凯等应保守党的请求，率驻朝清军攻占王宫，救出朝鲜国王，在营中保护起来。日本也借机派出海陆军赴朝，支持开化党人。清廷担心日本乘机控制朝鲜，决定派兵入朝平息政变。李鸿章急调“超勇”、“扬威”2舰回北洋，准备赴朝。

12月22日，林泰曾率“超勇”舰随丁汝昌、式百龄抵达朝鲜马山浦，同行的有“扬威”、“威远”2舰和庆军1营。由于清军行动迅速，很快控制了局势，平息了政变，日本控制朝鲜的企图再一次受到严重挫折。

次年5月，因英国占据朝鲜巨文岛，引起交涉，林泰曾与邓世昌奉命率舰随丁汝昌前往巨文岛巡查，随后又前往长崎，会晤英国远东舰队司令，进行交涉。

(三)

中法战争结束后，中国在德国订造的2艘大型铁甲舰“定远”号和“镇远”号于1885年11月驶抵大沽。刘步蟾和林泰曾分别被任命为2舰的管带。

林泰曾管带的“镇远”舰与刘步蟾管带的“定远”舰是同型姊妹舰，排水量7335吨，航速14.5节，马力6000匹，吃水19.6英尺，

舰长 298.5 英尺,宽 60.4 英尺,铁甲舰厚 14 英寸,炮台甲厚 12 英寸,指挥台甲厚 8 英寸。舰上装备有双联装 305 毫米克虏伯巨炮 4 门,150 毫米克虏伯炮 2 门,76 毫米炮 4 门,大小函炮 6 门,5 管机关炮 12 门,鱼雷发射管 3 具,附小鱼雷艇 2 只,小轮船 1 只。“镇远”、“定远”这 2 艘巨型铁甲舰是远东当时最大也是最先进的军舰。

1886 年 5 月,总理海军大臣醇亲王奕譞和会办大臣李鸿章、帮办大臣善庆巡阅北洋海军。林泰曾率“镇远”舰与北洋其他各舰一道,表演了列阵和射击等科目。善庆还登上“镇远”舰,进行了视察。

7 月,为遏制俄国向朝鲜扩张其势力,清廷命丁汝昌率舰前往朝鲜、俄国巡历。林泰曾率舰与“定远”、“济远”、“威远”、“超勇”、“扬威”5 舰一起,随丁汝昌先后巡历了朝鲜釜山、元山和俄国海参崴。

8 月 7 日,丁汝昌率“定远”、“镇远”、“济远”、“威远”4 舰驶往日本长崎修理。舰上水兵放假上岸购物、游玩时,与长崎市民和警察发生了严重流血冲突,酿成了“长崎事件”。在这次事件中,北洋海军的水兵和日本警察及市民均伤亡数十人,其中“镇远”舰上伤亡 10 余人。事件发生后,清廷与日方进行了长时间的交涉,第二年 2 月始结案,双方彼此各给抚恤。其中,日方付给中方抚恤金 52500 元,中方付给日方抚恤金 15500 元。

中法战争结束后,清廷大力发展海军,特别加强了北洋海军的建设。经过几年的努力,北洋海军有了很大的发展。1888 年,清廷颁发《北洋海军章程》,标志着北洋海军已发展成军。林泰曾积极参与了《北洋海军章程》这份重要文件的制订工作。

林泰曾谨慎稳健,忠于职守,资深学优,精于驾驶,因而深得李鸿章的信任和赏识。李鸿章称赞他“心志坚定,器识深闳”,并常常委之以重任,令其独当一面。北洋成军时,确定编制,设提督 1 员,

总兵2员。12月17日，清廷发布上谕，任命丁汝昌为北洋海军提督，林泰曾为北洋海军左翼总兵，管带“镇远”舰，刘步蟾为北洋海军右翼总兵，管带“定远”舰。此时，林泰曾成为北洋海军中地位仅次于丁汝昌的重要将领。第二年，林泰曾又加提督衔。

1889年5月，吴安康率南洋海军“寰泰”、“镜清”、“开济”、“保民”、“南琛”、“南瑞”6舰来到威海，准备与北洋海军出海合操。6月，南北洋海军各舰驶往烟台添煤购物，然后分作两队出海操巡。

林泰曾率北洋海军的“镇远”、“济远”、“超勇”、“扬威”4舰和南洋海军的“南琛”、“南瑞”、“保民”3舰在北洋各口操巡；丁汝昌和吴安康则率北洋海军的“定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5舰和南洋海军的“寰泰”、“镜清”、“开济”3舰前往朝鲜各海口和海参崴一带操巡。

林泰曾率南北洋7舰在北洋各口操巡约一个月后，返回威海。丁汝昌、吴安康率南北洋8舰操巡结束后，南洋各舰返回。随后，丁汝昌率北洋海军的“定远”、“康济”、“威远”3舰前往旅顺，其余北洋各舰由林泰曾指挥，在威海照章操练。

12月，丁汝昌奉命率北洋各舰赴上海。29日，林泰曾指挥“镇远”、“靖远”、“来远”3舰转赴台湾基隆，准备绕往后山，协助台湾驻军“剿番”。由于海上连日刮起大风，林泰曾率3舰在基隆抛锚，未能绕往后山。不久，接丁汝昌电，林泰曾率舰至澎湖与其会合。然后，同“定远”、“经远”、“来远”3舰前往香港修理。

1890年2月，丁汝昌率“致远”、“济远”、“经远”、“来远”4舰前往南海一带操巡。其余在港各舰由总查英人琅威理和林泰曾、刘步蟾督率。3月，林泰曾率舰与“定远”、“济远”、“致远”、“来远”等舰随丁汝昌访问了西贡、新加坡、小吕宋。

1891年5、6月间，李鸿章在北洋大阅海军。林泰曾率舰参加了3年一次、规模盛大的海上阅兵活动。李鸿章对北洋舰队和各口防务深表满意，认为渤海门户已有深固不摇之势。

6月26日，林泰曾率“镇远”舰随丁汝昌第二次出访日本。同行的还有“定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5舰。7月20日，北洋6舰结束在日本的访问，返回威海。在日本期间，日本天皇接见了丁汝昌及林泰曾等各舰管带。

次年10月，丁汝昌乘“镇远”舰离开威海前往大连湾，与北洋其他各舰会齐，大操打靶。随后，林泰曾率“镇远”、“济远”、“威远”3舰南巡，先后到上海、福州、香港，历时2个月，于第二年的2月14日返回厦门过年。3月19日，林泰曾率3舰返回威海。

(四)

1893年是一个看似平静的年份，国内外形势都没有什么大的波澜。但是，平静的背后却隐藏着深刻的危机。日本在企图控制朝鲜的努力一再受挫后，深知必与中国有一战，因此全国上下大有卧薪尝胆之志，努力发展其海军力量，准备与中国决一雌雄。日本人把北洋海军的“定远”、“镇远”2舰看成是他们最大的敌人，连孩子们玩的游戏也是打沉“定远”、“镇远”的内容。经过几年努力，日本海军有了长足的发展。相比之下，北洋海军却止步不前。1888年成军后，除福州船政局制造的“平远”号装甲巡洋舰划归北洋外，北洋海军力量再没有大的增长。海军经费被用来修建颐和园等，北洋海军急需的武器装备却得不到补充和更新。

李鸿章对日本海军实力的迅猛增长深表忧虑，2年前他对北洋海防所抱有的百分之百的信心，已所剩无几。他认为日本以全国之力注于海军，至蕞尔小国也能岁增铁甲舰，而且战舰之精良处处胜我一筹，将来必是中国的大患。可惜的是，李鸿章虽然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来自各方的制约却使他无力改变现状。

这一年的4月，朝鲜东学党人进入汉城，要求国王驱逐日本人，致使朝鲜形势再度出现紧张。李鸿章立即派舰前往朝鲜，帮助朝鲜国王恢复秩序。他希望能象以往一样，尽快稳定朝鲜的局势，

以免日本借机生事。然而，李鸿章的想法只能是一厢情愿，此时的日本已今非昔比。它密切关注朝鲜国内事态的发展，准备在继“壬午之变”和“甲申之变”两次受挫后，第三次与中国在朝鲜展开较量。

在经历了短暂的平静之后，暴风雨终于来临。

1894年5月，朝鲜爆发了东学党起义。清廷应朝鲜国王请求，派海陆军赴朝帮助镇压起义。早已虎视眈眈的日本也趁机派兵入朝，并制定了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的作战计划。

5月17至27日，李鸿章在北洋第二次大阅海军，林泰曾率舰参加了检阅。李鸿章对北洋海军装备落后和日本海军日益强大感到忧心忡忡，没有战胜日本的信心。所以，他主张中日双方在镇压了东学党起义之后，共同从朝鲜撤军，以免引起冲突。

但日本已决心与中国一战，对中国的撤军建议置之不理，反而迅速向朝鲜增兵，并积极扶持朝鲜的亲日势力，控制朝鲜政权。

鉴于朝鲜形势日趋恶化，清廷只得采取措施加强驻朝清军的力量。6月18日，李鸿章电告丁汝昌，日本在仁川的军舰已增加到了7艘，北洋海军仅有1艘军舰在仁川，另有3艘在牙山。命他从林泰曾和刘步蟾中挑选一人，统率数艘军舰赴仁川，加强在那里的海军力量。最后，丁汝昌决定派林泰曾率舰前往仁川，指挥在朝鲜的北洋各舰。

6月22日下午3时许，林泰曾率“镇远”、“超勇”、“广丙”3舰抵达仁川。

两天后，林泰曾与中国驻仁川理事会见日本领事，与其交涉。此前一天，日本枢密院召开紧急会议，正式决定对中国发动战争。日本不断增兵朝鲜，控制了仁川至汉城的各处险要。

26日，林泰曾致电李鸿章，分析了朝鲜局势，认为仁川战守皆不宜，准备留下1至2舰在仁川探听消息，其余各舰前往牙山备战。同时，林泰曾请速派3艘鱼雷艇到牙山。

李鸿章接电后，征求丁汝昌的意见。丁汝昌此前曾电请李鸿章将“镇远”等舰调回威海，以集中兵力，但李鸿章认为这是向日本示弱，没有同意，仍令林泰曾镇守朝鲜。此次接电与丁汝昌议，丁汝昌仍力主将“镇远”等舰调回威海。李鸿章觉得丁汝昌的意见有道理，同意将“镇远”等舰从朝鲜调回。

7月1日，林泰曾率“镇远”、“济远”、“平远”、“超勇”4舰回国，于次日3时到威海。

7月25日，日本舰队袭击了北洋海军的运兵船队，挑起了中日甲午战争。战争爆发后，林泰曾主张采取主动，“举全队扼制仁川港”，与日本舰队“一决胜负于海上”。但是，他的这一正确意见未被采纳。

7月27日，林泰曾率舰随舰队出巡至汉江口外，搜寻日舰。8月1日，中国正式对日宣战。次日，林泰曾率舰随舰队巡弋朝鲜大同江口。9日，林泰曾第三次率舰随舰队出巡，赴大同江搜索日舰。第二天，因日舰骚扰威海，李鸿章急调出巡各舰返回威海。14日，北洋海军第四次出巡，林泰曾率舰随行，仍未发现日舰踪影。

由于北洋海军几次出巡都未能发现敌舰，朝廷十分恼怒，下令将丁汝昌革职，戴罪立功。林泰曾和刘步蟾也遭到朝中一些官员的严厉指责，有的甚至奏请朝廷将他们2人革职。由于李鸿章的保护，丁汝昌被朝廷暂免处分，以观后效；林泰曾、刘步蟾则未受到朝廷的批评。

（五）

9月16日，丁汝昌率北洋海军主力护送援朝陆军前往中朝边境的大东沟登陆。援军共10营4000人，分乘招商局“新裕”、“图南”、“镇东”、“利远”、“海定”5艘轮船，北洋海军则派出14艘军舰和4艘鱼雷艇负责护航。林泰曾率“镇远”舰参加了这次规模庞大的护航任务。

17日早晨,北洋海军完成了护航任务。上午9时,停泊在大东沟口外10海里担负警戒任务的“定远”、“镇远”等10舰,照例进行了1个小时的常操。10时,“镇远”舰上的了望哨首先发现在西南方海天之际有薄烟升起。不久,确认为日本舰队,随即发出了战斗警报。丁汝昌指挥北洋海军的10艘战舰,列阵迎敌。

战前,林泰曾下令除保留1艘6桨小艇外,舰上其他救生艇全部卸除,以表示“舰存与存,舰亡与亡”的决心。此外,舰上与战斗无关的索具、木器、玻璃等易燃、易碎物品也都除去,以避免战时引起燃烧和对人员造成伤害。一些紧要部位,也都用沙袋或煤袋保护了起来。舰上官兵士气十分高昂,作好了战斗准备,决心一雪北洋海军丰岛海战之耻。他们接到战斗命令,立刻行动起来。战斗警报声还没有停止,他们就已各就各位,作好了迎战准备。

中午12时50分,“定远”舰在距敌舰队5300米时首先开炮。10秒钟后,“镇远”舰在距敌舰队5200米时发出了第二炮。接着,北洋海军各舰一起向日舰开炮,日舰随后也发炮还击,大东沟海战爆发。

北洋海军成“人”字阵迎敌,以“定远”、“镇远”2舰居中,其余各舰向左右张两翼排开。“镇远”舰右后方依次是“来远”、“经远”、“超勇”、“扬威”4舰。战斗打响后,日本舰队第一游击队的4艘军舰从“定远”、“镇远”2舰之前掠过,直扑北洋海军右翼阵脚最弱的“超勇”、“扬威”2舰。几分钟后,日本舰队本队6舰在旗舰“松岛”号巡洋舰的率领下,随第一游击队之后,作“一”字阵驶至“定远”、“镇远”的正前方,双方随即展开了激烈的炮战。“镇远”和“定远”2舰的猛烈炮火击毁了“松岛”舰320毫米口径大炮的旋转装置,击伤2名炮手,水压管也遭破坏。日舰畏惧“定远”、“镇远”2舰的巨炮,纷纷躲避。

海战刚刚开始,旗舰“定远”号上的信号装置便遭到破坏,无法指挥。由于战前没有明确应由何人何舰来接替指挥,所以,北洋海

军在海战中处于群龙无首、各自为战的境地，很快就被日舰将队形冲散，分割包围。

经过数小时的激战，“超勇”、“致远”、“经远”3舰战沉；“广甲”舰率先逃跑，“济远”舰随后脱离战场，驶回旅顺；“扬威”、“平远”、“广丙”、“来远”、“靖远”5舰则因受伤撤至浅水处，一面抵抗，一面自救。日本舰队第一游击队的“吉野”等4舰也因追击北洋各舰而驶离原战场。最后，只剩下“镇远”和“定远”2舰与日本舰队本队5舰仍在原战场激战。

“镇远”舰在海战中一直与“定远”舰相互配合，并肩作战。战至3时零4分时，“定远”舰受重伤起火，形势危急。林泰曾毅然率“镇远”舰驶至“定远”舰前，迎击敌舰，掩护“定远”舰扑灭了大火，重新投入战斗。日方记载说，在海战中，“镇远与定远的配置及间隔，始终不变位置，用巧妙的航行和射击，时时掩护定远，奋勇当我诸舰，援助定远且战且进”。

激战中，“镇远”舰中炮无数，伤痕累累，多处燃起大火。但在林泰曾的指挥下，舰上官兵沉着应战，一面不断发炮回击敌舰，一面奋勇扑救舰上的大火，毫无畏惧之色，顽强顶住了日舰的疯狂进攻。日方记载说：“定远、镇远2舰顽强不屈，奋力与我抗争，一步亦不稍退”。“我本队舍其他各舰不顾，举全部五舰之力量合围两舰，在榴霰弹的倾注下，再三引起火灾。定远甲板部位起火，烈焰汹腾，几乎延烧全舰。镇远前甲板殆乎形成绝命大火，将领集合士兵救火，虽弹丸如雨，仍欣然从事，在九死一生中毅然将火扑灭，终于避免了一场危难。”

在“镇远”、“定远”2舰的英勇反击下，日舰也屡屡受创，伤亡惨重。战至3时30分，“镇远”舰大炮给日本舰队旗舰“松岛”号致命的一击。日本方面详细记载了“松岛”舰受重创时的情形：

此前，敌弹命中松岛舰虽多，却未使松岛舰受到使舰体震动的大打击。三时半，镇远舰三十厘米半口径大炮发

射的一颗炮弹，霹雳一声，命中松岛舰下甲板，击中第四号炮。松岛舰舰体倾斜，白烟腾起，四面暗淡，海浪涌起，疑鲸鲵也会惊而逃离。巨弹爆炸，又使火药爆炸，如百雷骤落，毒烟充满了整个军舰，伤亡八十名，分队长志摩大尉也因之死亡，将士们皆抽泣而不能自持。此时，松岛舰终于因火药爆炸而起火，黑烟冲天。兵士见此情形，猛然奋起，无论是负重伤的、负轻伤的，一起奔跑灭火，全舰颇为努力，但仍然没有把火扑灭。敌舰见此情形，乘机凶猛进逼，欲将松岛舰击沉。我军一面灭火，一面以生存者、军乐队等补充炮手，与敌军应战。但是，许多火炮已被击毁而不能发射。四时零七分，松岛舰以信号旗命令各舰独立运动，奋勇突击。

在“镇远”舰的重创之下，“松岛”舰完全丧失了战斗力，日本军心也为之动摇。4时10分，日舰纷纷撤出战斗，向东南方向退去。林泰曾指挥“镇远”舰与“定远”舰一起，奋勇追击。日舰无法摆脱，被迫回头应战。由于炮弹告罄，“镇远”、“定远”2舰未能扩大战果，再重创日舰。

5时许，北洋受伤各舰陆续修峻赶来会合。日舰见形势不妙，全力撤退。因日舰速度快，北洋各舰追赶不及，最后只得转舵返回旅顺。

(六)

海战结束后，清廷嘉奖作战有功将士，林泰曾赏换霍伽巴图鲁勇号。

“镇远”、“定远”等6舰战后在旅顺日夜抢修。由于形势紧张，“镇远”等舰未及修竣便于10月18日离开旅顺，前往威海备战。

24日，日军从辽东半岛登陆，入侵中国。丁汝昌奉命率“镇远”、“定远”等舰帮助防守旅顺。11月14日，丁汝昌率舰队返回威

海。凌晨3时许，各舰从西口鱼贯进港，“定远”舰在前，“镇远”舰紧随其后。由于连日西北风盛，加之“定远”舰先行分水力大，航标被推向东南。“镇远”舰依航标指示前进，不慎触上礁石，弹药舱、帆舱、煤舱、锅炉舱及水力机舱之下被撞裂8处，底舱进水。林泰曾立即采取紧急措施，组织全舰官兵奋力抢救军舰，终于使军舰脱险，驶至浅水处抛锚待修。

当时，日军大举入境，旅顺危在旦夕，北洋其他各口也朝不保夕，京津受到严重威胁。清廷和李鸿章都对北洋海军寄予厚望，把它视为京津的屏障。因为“定远”和“镇远”2艘大型铁甲舰是北洋海军的中坚，所以清廷和李鸿章一再叮咛设法保全巨舰，以震慑日军，使其有所顾忌。

林泰曾非常清楚朝廷对“镇远”、“定远”2舰是何等重视。所以，当他看到“镇远”舰已严重受损，无法出海作战，悲痛难抑，深感责任重大，认为自己有负于朝廷重托，贻误了军国大事，是犯下了不可宽恕的大罪。林泰曾是个性格十分内向的人，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他独自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无以排遣。16日晨，林泰曾抱定“舰存与存，舰亡与亡”的信念，在极度忧愤之中服毒自尽，时年43岁。

林泰曾平时沉默寡言，鲜有笑容，显得严肃凝重，给人的感觉似乎是难以接近。而实际上正相反，林泰曾是个非常温和宽厚的人，待人诚恳，十分友善。他总是尽量避免与上司和同事们发生争执和冲突，谦恭有礼，克己让人，“存心慈厚，能忍人之所不能忍”。林泰曾也因此给人留下一种过于小心谨慎的印象。

林泰曾对部下十分关心爱护，像是一位慈爱的兄长。他能够倾听并采纳部属的意见，而且用人不疑，对部下给予充分的信任。林泰曾深受舰上官兵的尊敬，“故临事恒得人之死力”。

林泰曾是北洋海军的优秀将领，他引义轻生，自裁殉国，对于危难中的北洋海军是个严重的损失，无异于雪上加霜。所以，林泰

曾殉国后，“知与不知，咸为扼腕”，深感痛惜。

李鸿章在给朝廷的上奏中，对林泰曾的一生给予了概括的评价：

林泰曾由闽厂学生出洋肄业，西学优长，曾经历任船政大臣沈葆楨等叠次保荐，回华后历充师船管驾。及北洋设立海军，简放左翼总兵，管带镇远铁舰。频年巡历重洋，驾驶操练均极勤奋。日前大东沟一役，苦战多时，坚忍不拔，方冀从此历练，可成海军将才。乃因所带铁舰被伤，引义轻生，知耻之勇，良可惋惜。

无愧舍生取义

——记刘步蟾

刘步蟾无疑是近代中国海军中最优秀的将领之一。作为船政学堂驾驶班学生中的佼佼者，他曾两度前往英国学习海军。回国后，又奉派前往德国，接收“定远”号铁甲舰，该舰后来成为北洋海军的旗舰。北洋海军成军后，刘步蟾出任北洋海军右翼总兵、“定远”舰管带。由于他具有丰富的近代海军专业知识，精通驾驶，长于治军，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对其颇为倚重。因此，刘步蟾很快成为北洋海军中的核心人物，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甲午海战中，刘步蟾率舰抗敌，英勇无畏，最后壮烈殉国。时人称赞他“志节凛然，无愧舍生取义”。

（一）

刘步蟾，字子香，福建侯官（今福州）人，生于1852年。他幼时丧父，由母亲抚养长大。刘步蟾自幼聪颖过人，1867年考入福州船政学堂，为驾驶班第一期学生。刘步蟾在校学习勤勉刻苦，进步很快，考试屡屡名列第一。1871年，刘步蟾以第一名的成绩通过了船政学堂的大考，结束了堂课学习，登练习舰实习。

刘步蟾随“建威”号练习舰先后巡历了南北洋各口以及香港、新加坡、槟榔屿等口岸。船政大臣沈葆楨评价学生实习的表现时认为，“精于算法、量天尺之学者，则闽童刘步蟾、林泰曾、蒋超英为之冠”。

1874年春，发生了日本侵略台湾事件，刘步蟾随军参加了援

台行动。事件平息后，他被任命为“建威”舰管带。

1875年春，福州船政局法国监督日意格赴欧洲采办机器设备。船政大臣沈葆楨乘此机会选派刘步蟾、林泰曾和3名制造专业的毕业生，跟随日意格前往英国和法国考察学习。

刘步蟾和林泰曾等抵欧后，考察了英法海军。是年年底，经日意格介绍，刘步蟾和林泰曾进入英国戈斯波特海军军官学校，学习枪炮、水雷知识，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海军留学生。他们在校学习了几个月后，于次年4月随日意格离开欧洲回国。刘步蟾回国后，奉派前往台湾巡防，因功升都司。

1877年3月，清廷正式派遣第一届海军留学生前往英国、法国，学习驾驶和制造技术。刘步蟾入选，再次前往英国学习。刘步蟾等12名学习驾驶的学生于5月从法国渡过英吉利海峡，来到英国，先集中在抱士穆德参观考察了几个月，然后一分为二，刘步蟾、林泰曾、蒋超英3人直接上舰学习，其他9人则准备进入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学习。9月，刘步蟾登上英国地中海舰队的旗舰“马那杜”号铁甲舰，赴地中海实习，担任该舰的见习大副。

1878年12月，刘步蟾因病不得不离开军舰，从塞浦路斯前往巴黎休养。第二年2月，刘步蟾病愈返回伦敦。一个月后，他又奉派上“拉里”号军舰，前往地中海实习。7月，他结束了在英国的留学生活，获得了英国海军部发给的优等文凭，与林泰曾、何心川2人一起，取道法国，先期回国。

北洋大臣李鸿章对刘步蟾非常赏识，他在给朝廷的上奏中，盛赞这位26岁的海军留学生“颖迈英俊”，视之为船政最优秀的学生之一。刘步蟾回国后，李鸿章立即将其调往北洋任职。12月，刘步蟾被任命为“镇北”号炮舰管带，委以游击留闽尽先补用，并赏戴花翎。

“镇北”舰是李鸿章1878年为南洋订购的4艘炮舰中的一艘，由英国阿姆斯特朗厂制造，1879年建成来华。同时建成来华的还

有“镇东”、“镇南”、“镇西”3舰。“镇北”舰长125英尺，宽29英尺，吃水9.6英尺，排水量440吨，马力350匹，时速10海里，装备有11英寸口径35吨前膛炮1门，12磅后膛炮2门，格林炮2门。“镇北”等4舰来华后，被李鸿章留在北洋，而将北洋原来的4艘旧炮舰划归南洋。

刘步蟾到北洋任职后，很快便与同学林泰曾一起，将留学心得归纳成题为《西洋兵船炮台操法大略》的条陈，呈送给李鸿章。他们在这份条陈中对中国海军建设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提出了“以战为守”的积极防御思想，并建议尽快购买铁甲舰装备海军，认为“最上之策，非拥铁甲等船自成数军决胜海上，不足臻以战为守之妙”。

李鸿章对他们的建议很感兴趣。日本侵台事件发生后，他受命筹办北洋海防，一直梦想购买铁甲舰来装备他致力建设的北洋海军，但迟迟未能如愿。

1879年底，中俄因伊犁问题，关系变得十分紧张。俄国派舰队驶来中国沿海进行威吓，战争阴云又起。于是，购买铁甲舰来装备海军，以提高海上作战能力便迫在眉睫。清廷对此高度重视，责成李鸿章妥速办理。

1880年3月，李鸿章得到消息说，英国打算将土耳其订造的2艘铁甲舰转售。他立即派人与英国方面联系，并奏请朝廷筹措经费，准备购买2舰。

在李鸿章的心目中，刘步蟾颇有胆识，是管驾铁甲舰最理想的人选。5月15日，清廷根据李鸿章的意见，命刘步蟾交卸“镇北”炮舰之任，前往福州船政局挑选轮机生徒舵水人等，赴英国学习训练，掌握铁甲舰操作和管理知识，准备接舰回国。

不久，英方提出，因为中俄关系紧张，英国当恪守中立，不便将土耳其订造的铁甲舰转售中国。李鸿章遂指示出使德国大臣李凤苞在英国订造2艘新的铁甲舰，并派刘步蟾率福州船政局的头目水手数十人，准备前往英国，协助驾驶铁甲舰回国。

但是,在英国订购铁甲舰的方案很快被否定了,刘步蟾的英国之行也作罢。不过,李鸿章订购铁甲舰的决心并没有动摇。不久,他又指示李凤苞和驻德二等参赞徐建寅在德国伏尔铿厂为北洋订购了2艘铁甲舰,就是后来的“定远”和“镇远”2舰。

刘步蟾一直在国内待命,准备前往德国接收铁甲舰。1881年8月,李鸿章为山东订购的2艘炮舰建成来华,取名为“镇中”号和“镇边”号。刘步蟾与营务处道员许铃身一起,在大沽验收2舰。2舰与“镇北”等舰技术参数相同,只是马力为400匹。“镇中”、“镇边”2舰管带分别由刘步蟾在船政和留英时的同学林永升、叶祖珪担任。

(二)

1882年3月,在德国订造的“定远”、“镇远”2舰即将完工。李鸿章通知李凤苞,准备派刘步蟾等11人前往德国,协助驾驶2舰回国,一个月内起程。第二天,李凤苞回电给李鸿章,称“定远”、“镇远”2舰有保险保固,再派员前来协驾,恐怕有损无益,而且在时间上也早了些。但李鸿章不这么认为,坚持立即派刘步蟾等人赴德。他让李凤苞转告德国方面,中国派员前来,只是随舰学习,以尽快掌握管理、指挥铁甲舰的技术,要求李凤苞立即就此事与德国方面联系。接着,李鸿章又通过伏尔铿厂在天津的人员与厂方联系,同意刘步蟾等人前往随舰观摩。是年7月,刘步蟾终于启程前往德国,验收“定远”舰。

1883年6月,“定远”舰竣工。这时,中法关系因越南问题恶化,法国派舰队来华威胁,海疆形势又告紧张。李鸿章要求“定远”舰尽快回国,加强虚弱的海防。他还特别叮嘱李凤苞,让刘步蟾随舰回国。李凤苞回电称,因中法交恶,法国有可能中途截夺“定远”舰,现在回国,难保安全,并请示是否命刘步蟾先行回国。李鸿章见“定远”舰无法回国,便命刘步蟾继续在国外学习,待“镇远”号铁甲

舰验收完毕以后,再与2舰一起回国。

1884年6月,“定远”、“镇远”2舰装备完毕,准备回国。但很快因中法战争爆发,李鸿章只得令2舰暂缓回国,在德国等候战事结束。

中法战争打了近一年,1885年4月双方议和。6月11日,清廷发布上谕,命“定远”、“镇远”2舰和在德国订购的“济远”号巡洋舰一起回国。7月3日,“定远”等3舰启程回国,分别由洋员伏司、密拉克、思诺尔管驾。刘步蟾等随舰回国,沿途照料。

11月17日,“定远”等3舰驶抵大沽。李鸿章与丁汝昌等前往验收,认为与合同相符,表示满意。几天后,李鸿章奏请朝廷奖励刘步蟾等接舰有功人员。刘步蟾回国后,出任“定远”舰管带,授参将。不久,升为副将。

中法战争结束后,清廷下决心大规模发展海军力量,特别是大力加强北洋海军建设。1885年10月,清廷设立了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统一管理全国海防事宜。

第二年5月,总理海军大臣醇亲王奕譞在李鸿章等人的陪同下,巡阅北洋海防,检阅了北洋海军和南洋海军部分舰只。奕譞高兴地观看了“定远”等舰为他表演的列阵、射击等科目,并乘坐“镇东”舰,登上“定远”舰视察。

是年7月,刘步蟾率舰与“镇远”等5舰一起,随丁汝昌赴朝鲜釜山、元山、永兴湾和俄国海参崴一带操巡。

8月7日,丁汝昌率“定远”、“镇远”、“济远”、“威远”4舰转赴日本长崎进行修理。13日,中国水兵上岸购物、游玩,因细故与日本警察发生冲突。结果,造成1名日警重伤,1名水兵轻伤。15日是个星期天,“定远”等舰官兵放假上岸。下午,刘步蟾还在岸上宴请了方伯谦、林履中、蓝建枢等人。晚8时许,中国水兵在广马场外租界及华侨住区附近,遭到日本警察和市民有预谋的袭击、围攻,双方发生了严重冲突。经过3个小时的混战,双方死伤共80人。中

国水兵伤亡人数大大多于日本，其中“定远”舰伤亡 20 余人。“长崎事件”发生后，清廷与日本进行了长时间交涉，直到次年 2 月始结案，双方互相赔偿了事。

1887 年 5 月，李鸿章乘坐“定远”舰视察北洋海防，并观看了刚从英国和德国买回的“致远”、“靖远”、“经远”、“来远”4 艘巡洋舰试航。6 月 9 日，清廷根据李鸿章的奏请，赏刘步蟾强勇巴图鲁勇号。

1888 年 10 月，清廷颁布了《北洋海军章程》。这个章程以英国皇家海军章程为蓝本，参考了德国海军章程的有关内容，并结合了中国的旧制。刘步蟾积极参与了章程的制定工作，他和林泰曾等人一同商讨，反复修改，数易其稿。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努力，最终完成了这项工作。《北洋海军章程》是近代中国第一个较为完备的海军章程，它的颁布标志着北洋海军正式成军。

《北洋海军章程》颁布后，李鸿章奉旨举荐北洋海军提督和左右二员总兵人选。他保举丁汝昌为北洋海军提督，林泰曾、刘步蟾分别为左翼和右翼总兵。李鸿章在上奏中说：“管带镇远铁甲舰记名总兵林泰曾，心志坚定，器识深闳；管带定远铁甲舰总兵銜水师补用副将刘步蟾，才识明远，饶有干略；该二员由学堂出身，久在西洋随队操习，委带战船巡海已阅七、八年，资劳甚深，林泰曾堪胜北洋海军左翼总兵之任，刘步蟾堪胜北洋海军右翼总兵之任。”海军衙门赞同李鸿章的意见，称海军大臣巡阅海防时，“亦亲见管驭有方，允称得力之员”，请朝廷批准对丁汝昌和林泰曾、刘步蟾 3 人的任命意见。12 月 17 日，清廷发布上谕，批准了李鸿章和海军衙门的奏请。刘步蟾遂出任北洋海军右翼总兵，仍管带“定远”舰，成为舰队中的第三号人物。

1889 年 5 月，吴安康率南洋海军的“寰泰”、“镜清”、“开济”、“保民”、“南琛”、“南瑞”6 舰来威海，准备与北洋海军出海合操。6 月，南北洋海军舰只分作两队，林泰曾率“镇远”等 7 舰，在北洋各

口操巡；丁汝昌和吴安康率“定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寰泰”、“镜清”、“开济”8舰前赴朝鲜各口和海参崴一带操巡。丁汝昌、吴安康所率8舰先后抵达仁川、巨文岛、元山、釜山、图门江、海参崴、穆湖崴等处操巡，约两个月后返回。南北洋海军合操结束，清廷传令予以嘉奖。

刘步蟾率舰随丁汝昌结束操巡后，驶往旅顺。旋转天津，与李鸿章、丁汝昌等讨论有关北洋海军建设事宜。

(三)

北洋海军结束与南洋海军联合北上操巡之后，进行了几个月的休整，然后又开始南下操巡。12月2日，丁汝昌率“定远”、“镇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6舰抵达上海。随后，各舰前往台湾、澎湖。次年1月初，“致远”、“靖远”2舰留台协助刘铭传在恒春“剿番”；“定远”、“镇远”、“经远”、“来远”4舰赴香港操练、修理。2月，丁汝昌率“致远”、“靖远”、“经远”、“来远”4舰前往南海一带操巡，留在香港的“定远”、“镇远”及“超勇”、“扬威”4舰由北洋海军总查琅威理和林泰曾、刘步蟾3人督率。由于丁汝昌不在军中，刘步蟾与琅威理就旗舰应挂提督旗还是总兵旗发生了争执，引发了著名的“升旗事件”。

琅威理是一位英国海军军官，早在1863年时就随同阿思本率领“中英舰队”来过中国。此后，他又于1877年和1879年两度护送李鸿章订购的炮舰来华，引起李鸿章的注意。当时，李鸿章亟需聘请精通海军的外员，帮助进行北洋海军的组建与训练。经各方推荐和李鸿章亲自考察，琅威理于1882年11月5日受聘为北洋海军副提督衔总查，负责全军的组织、教育及训练工作。中法战争时，琅威理为避嫌，辞职回国。战后，李鸿章决定再次聘用琅威理。当时，“超勇”舰管带林泰曾等北洋海军将领也请求重新聘请琅威理。1886年春，已升为英国海军上校舰长的琅威理再次应聘来华。由

于琅威理训练有方，在很短的时间里，北洋海军的管理状况和训练水平就有了很大的改观。清廷传令嘉奖，赏给他提督衔，并发给一枚二等宝星勋章。琅威理在北洋海军的地位也因之日益巩固，人们遂有“军中有两提督”的说法。

刘步蟾与琅威理在七十年代就已认识，琅威理来华任职，刘步蟾也曾极表欢迎。但琅威理来华后，渐渐与刘步蟾、林泰曾等军官发生了矛盾。刘步蟾等人对琅威理的严厉和傲慢，越来越难以容忍，对他以提督自居发号施令十分不满。“升旗事件”遂成为他们矛盾的爆发点。

3月6日，刘步蟾命令在旗舰“定远”上降下五色长方提督旗，改升总兵旗。理由是提督丁汝昌不在军中，应按海军章程规定，由总兵指挥全军。琅威理则认为，虽然丁汝昌不在军中，但自己也是提督，旗舰应继续悬挂提督旗，刘步蟾不向他请示便擅作主张，改挂总兵旗，是对他的一种蓄意侮辱，因而与刘步蟾发生了激烈争执。

双方各持已见，争执不下。琅威理便于当日致电李鸿章，请其裁断。李鸿章并没有直接给琅威理回电，而是在第二天覆电林泰曾说：“琅威理昨电请示应升何旗。章程内未载，似可酌制四色长方旗，与提督有别。”这份电报实际上是否定了琅威理的意见，而支持刘步蟾。李鸿章认为，琅威理的提督衔只是一种荣誉，他并没有指挥舰队的实际权力。而这与琅威理对自己职务的理解大相径庭。琅威理认为自己受到了欺骗和羞辱，最终愤而辞职。

1891年6月，应日本邀请，丁汝昌率北洋海军“定远”、“镇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6舰第二次访问日本。

刘步蟾对5年前发生的“长崎事件”记忆犹新，所以此次访日他格外小心，保持警惕。7月5日，丁汝昌率舰队从神户驶抵横滨。日本方面设宴邀请北洋海军军官们，十分隆重。丁汝昌为表示友好，率各舰管带前去赴宴。唯有刘步蟾拒绝前往，而派舰上总管轮

陈兆镛代表。事后，大家对他的作法感到不解，刘步蟾说：“日本人狡诈无信，胆大妄为。我很担心他们假借宴会之机，乘我不备，袭我战舰。所以，我要留在舰上以防不测。”听罢，大家都对他深表钦佩。

刘步蟾在日本期间，十分注意搜集有关日本海军的情况。通过了解分析，他深感日本海军的发展已赶上甚至在某些方面已大大超过了中国。中国海军战斗力已远不及日本，应该加快武器装备更新换代的步伐。

回国后，丁汝昌于7月30日致电李鸿章，转达了刘步蟾的意见，认为北洋海军添舰换炮刻不容缓。但是，此时朝廷已同意了户部的意见，两年内停止购买外洋船炮军火。

刘步蟾对北洋海军装备落后的情况十分焦虑，曾面见李鸿章，力陈日本对中国的威胁，建议海军每年都添置两艘像“定远”、“镇远”这样的战舰，以备不测。李鸿章说：“你的意见很好，我也有同感。可是朝廷不采纳我们的意见，我也无能为力，只好听之任之了。”刘步蟾闻言，十分激动地说：“中堂大人身居高位，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如果我们平时不做准备，一旦战争爆发，贻误国事，责任由谁来负？”在场的其他官员见刘步蟾公开顶撞李鸿章，都吃了一惊，一个个面面相觑，不敢作声，唯恐李鸿章雷霆大发会殃及自己。

刘步蟾深为北洋海军的现状担忧，慷慨激昂的情绪不由自主地流露了出来，根本没有考虑到是否会因此冒犯李鸿章。当时，他并没有感到气氛有什么不对，所以神情依旧，并无畏惧之色。

李鸿章被刘步蟾的爱国激情和他的勇敢直率所打动。不但没有因为他的不敬而动怒，反而对他更多了几分钦佩和赞赏。

虽然李鸿章越来越明显地感到了来自日本的威胁，对日本海军的长足发展深感不安，但由于各方掣肘，他加强北洋海军的努力收效甚微。1894年5月，李鸿章第二次大阅海军，也是他最后一次检阅他的北洋海军。经过10天的视察、检阅，李鸿章越发对中日海军的差距感到忧心忡忡。他在写给朝廷的巡阅海军情况报告中说：

西洋各国，以舟师纵横海上，船式日异月新。即日本蕞尔小邦，亦能节省经费，岁添巨舰。中国自（光绪）十四年（1888年）北洋海军开办以后，迄今未添一船，仅能就现有大小二十余艘勤加训练，窃虑后难为继。

李鸿章发出这番感慨仅两个月，日本就发动了对中国的战争。战争的结果表明，刘步蟾等人的担忧并不是多余的，清廷忽视海军发展所带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

（四）

丰岛海战后，“定远”舰作为北洋海军的旗舰，多次与各舰前往大同江等处巡弋，搜寻日本海军联合舰队的踪迹。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在护送陆军登陆朝鲜的同时，也伺机寻找北洋舰队，以求在一场海上决战中，将其一举消灭，为进攻中国本土扫清障碍。

1894年9月，双方终于在大东沟海面不期而遇，爆发了著名的黄海海战。

9月17日晨，由18艘舰艇组成的北洋海军护航舰队，完成了护送援朝陆军在大东沟登陆的任务。上午9时，停泊在大东沟口外12海里处担任警戒任务的“定远”、“镇远”等10艘军舰，开始进行1小时的常操训练。10时，“镇远”舰了望哨首先发现了西南方海天之际有轻烟升起。不久，确认为日本舰队。随即，北洋海军各舰都响起了战斗警报。刘步蟾、丁汝昌和总教习、德国人汉纳根登上舰桥，一面观察敌情，一面紧急商讨应敌对策。

日本舰队很快也发现了北洋海军，12艘战舰排成“一”字形的单纵阵，向北洋海军扑来。北洋海军10舰排列成“人”字阵，以7节的航速迎敌。12时50分，双方舰队相距5300米时，刘步蟾一声令下，“定远”舰上305毫米主炮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巨响，炮弹呼啸着飞向敌舰，在日舰“吉野”号左舷附近100米处爆炸，掀起高达数丈的水柱。“定远”舰发出的第一炮，拉开了大海战的帷幕。接着，双

方展开了激战。

“定远”舰主炮射击的巨大震动将舰桥震塌，在舰桥上的丁汝昌坠落到甲板上负伤。接着，“定远”舰上的信号装置也被日舰猛烈的炮火摧毁，舰队失去了指挥。

海战开始后，日本舰队第一游击队的“吉野”等4舰，从“定远”舰前方快速掠过，攻击位于北洋战阵右翼的“超勇”、“扬威”2舰。12时53分，“松岛”号旗舰率领的日本舰队本队6舰驶至“定远”舰前方，立即遭到“定远”、“镇远”等舰的猛烈轰击。“松岛”舰320毫米口径大炮的旋转装置被击毁，2名炮手受伤。1时零4分，“定远”舰发炮击毁了“松岛”舰第七号炮位，3名炮手受伤，1名信号兵毙命。

日本舰队本队6舰强行冲过北洋海军阵前时，日舰“比睿”因速度较慢，落在阵后。“比睿”舰见形势不妙，企图从“定远”舰和其左翼的“靖远”舰之间冲过去，取捷径与本队会合。但是，它立即遭到“定远”和“靖远”等舰的痛击。“定远”舰从“比睿”舰的右后方发动猛烈攻击，其中一颗305毫米炮弹击穿其侧舷，在后桅处爆炸，舰上的后甲板被彻底破坏，大军医三宅贞造、少军医村越千代吉、大主计石塚铸太等19人被击得粉碎而死，分队长高岛万太郎大尉等32人负伤。军舰后部舱面燃起大火，浓烟弥漫。“比睿”舰遭此致命一击，完全丧失了战斗力，被迫挂出“本舰火灾，退出战列”的信号，逃离战场。1时20分，“定远”舰舰尾150毫米克虏伯大炮击中日本舰队的“赤城”舰，2名炮手被炸死，正在查看海图的舰长坂元八郎太少佐被飞来的弹片击碎头部，当场毙命，鲜血和脑浆飞溅到海图台上，染红了罗盘针。在“定远”等舰的打击下，“赤城”舰接连中弹，死伤28人，舰上军官非死即伤，被迫退出战场。

“定远”舰与“镇远”舰配合，又重创日本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中将乘坐的“西京丸”舰。一颗305毫米炮弹，从“西京丸”舰的右舷穿过游艺室，在距机舱2尺的地方爆炸，将机舱炸毁。2时22

分，“定远”舰炮火再次击中“西京丸”舰，305毫米炮弹从军官室后面穿过，击毁了舵机使用的蒸汽罐，蒸汽舵轮机不能使用，只得用人力舵，勉强航行。“西京丸”舰无奈发出“我舰故障”的信号，撤出战斗。结果，又遭到从大东沟赶来参战的北洋海军“广丙”号巡洋舰和“福龙”号鱼雷艇的攻击，最后狼狈逃离战场。

“定远”舰作为北洋海军的旗舰，也是日舰攻击的重要目标，多次被敌舰炮火击中。3时零4分，一颗炮弹击穿了“定远”舰腹，火焰从炮弹炸开的洞口喷出，洞口像是一个喷火口，火势非常猛烈。由于军舰受伤严重，刘步蟾指挥舰上官兵全力扑救大火，“定远”舰的攻势顿时减弱。日舰见“定远”舰受了重伤，便集中火力猛攻，企图将其一举击沉。

正当“定远”舰万分危急之际，“致远”、“镇远”等舰毅然担负起掩护的责任，驶至“定远”舰前，迎击敌舰，吸引了敌方的火力。“定远”舰官兵乘机奋力扑灭了大火，保住了战舰，又重新投入战斗。

日本舰队的本队5舰围住“定远”和“镇远”2舰猛攻，想集中火力将2舰击沉。“定远”、“镇远”2舰凭借坚厚的装甲、猛烈的炮火和巧妙的航行，顶住了日舰的疯狂围攻，并不时给日舰以重创。

日本舰队本队的“松岛”、“严岛”、“桥立”3舰是专门为了对付“定远”、“镇远”2舰而设计制造的，每艘军舰上都配备有一门320毫米口径的巨炮，以对付“定远”、“镇远”2舰上的305毫米主炮。但是在海战中，“松岛”、“严岛”、“桥立”3舰，加上“千代田”、“扶桑”2舰，在“定远”、“镇远”2舰的顽强抵抗和英勇反击下，丝毫没有占到便宜。

“定远”舰虽然中弹累累，但仍力战不退。日方记载说，“定远”舰面对日本“配备大口径炮之最新式诸巡洋舰，毫不畏惧”，“陷于厄境，犹能与合围之敌舰抵抗，定远失火后，甲板上各处设施全部毁坏，但无一人畏战逃避”。战至5时40分，日本舰队见无法击沉“定远”、“镇远”2舰，北洋海军受伤各舰也陆续修竣赶来，加之天

色已晚，担心遭到北洋海军鱼雷艇的袭击，于是，率先退出战场，向南撤离。“定远”等舰追赶不及，转舵返回旅顺。

（五）

黄海海战后，刘步蟾因作战有功，被清廷嘉奖，以记名提督简放，并赏换格洪毅巴图鲁勇号。丁汝昌由于受伤严重，呈请李鸿章从林泰曾、刘步蟾中挑选一人暂代他的职务。李鸿章决定派刘步蟾临时接替丁汝昌指挥舰队。按照北洋海军中的排名，刘步蟾排在第三，而林泰曾排在第二。李鸿章之所以挑选刘步蟾来接替丁汝昌指挥舰队，不仅仅是看重他的学识和能力，更看重他敢作敢为的性格。

刘步蟾和林泰曾是船政学生中的佼佼者，在船政学堂学习和在英国留学期间，性格外向的刘步蟾比林泰曾更引人注目一些。但到北洋海军任职后，林泰曾的发展则要比刘步蟾更快一些。这一方面是因为林泰曾的机会好一些，参加了诸如前往西洋接舰，平定朝鲜政变等多项重要军事行动，并有出色的表现。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因为林泰曾为人沉稳谦逊，处事谨慎妥当，更能赢得上司的信任。

刘步蟾性情刚直，雄心勃勃，“豪爽有不可一世之慨”。他处事大胆果断，指挥才能出众，军中都称赞说：“刘船主有胆量，有能耐。”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斐利曼特也称赞他“涉猎西学，功深伏案”。《清史稿》中则认为，“华人明海战术，步蟾为最先”。李鸿章对刘步蟾的指挥才能并不怀疑，他认为在船政学生中刘步蟾“船学稍精”，比其他人更出色一些。但李鸿章认为他不足之处在于“气质稍浮”，不够稳重。刘步蟾经常就海军建设的一些敏感问题，直言不讳地发表不同意见，显得锋芒毕露，有时令李鸿章感到不快。所以，在刘步蟾和林泰曾的使用上，李鸿章更倾向于后者。

此后，刘步蟾的过人才能够不断得以展现，成为北洋海军中船政毕业生的领袖人物。丁汝昌对近代海军知识了解有限，军中的许多

工作都倚重刘步蟾。久之，刘步蟾已俨然是实际上的提督，成为军中的核心和灵魂。

黄海海战中，刘步蟾在丁汝昌受伤的情况下，督率战舰与敌舰激战 5 个小时，予敌以重创，为李鸿章争回了不少面子，李鸿章对刘步蟾更加信任。战后，大敌当前，形势险恶，更需要一位有胆略有魄力的将领来统军。所以，李鸿章选择刘步蟾来暂代丁汝昌的职务。

尽管刘步蟾代丁汝昌统军时间很短，但从中可以看出，他在军中的地位已得到李鸿章的肯定。

大东沟海战后，“定远”舰在旅顺修理了 2 个月。由于形势紧张，未及修竣便前往威海。

11 月 14 日，“镇远”舰不慎触礁损坏，林泰曾忧愤自杀；22 日，旅顺又告失守，北洋海军处境十分困难。不久，清廷下旨将丁汝昌交刑部治罪。12 月 21 日，清廷又命刘步蟾暂行署理海军提督。刘步蟾与各舰管带及威海守将等致电朝廷，恳请丁汝昌留任。由于后来威海战事紧迫，朝廷只好做出让步。

日军占领旅顺后，决定进攻威海，消灭北洋海军。丁汝昌与刘步蟾等将领及帮办北洋海军提督英国人马格禄共同商讨，制定了海军守卫威海的作战计划。他们认为，目前海军兵力太单，如果出海与敌力拼，不仅舰队会受损，威海也将不保；如果株守港内，一旦陆路防守有失，海军将束手待毙。因此，最稳妥的办法是介于两者之间，海军各舰与炮台相依辅，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如果日军只派少数军舰前来进犯，海军各舰可出海口迎击；如果日军舰队主力悉至，“则我军船艇均令起锚出港，分布东西两口，在炮台炮线水雷之界，与炮台合力抵御，相机雕剿，俾免敌船闯进口内”。

刘步蟾等制订的这个防守计划，是以陆路防御为基础的，即“全恃后路游击有兵，以防抄袭，方能巩固”。一旦陆路防守失败，两岸被日军占领，炮台为敌所用，海军将陷入绝境。刘步蟾等对此是

有思想准备的，他们表示，一旦出现最坏的情况，海军将士“惟有誓死拼战，船沉人尽而已”。

1895年1月，日本陆军兵分两路从荣成向威海发动进攻，海军联合舰队则从海上给予支援。

北洋海军一方面用炮火支援陆上守军，阻遏日军的陆路进攻；一面奋勇抗击日本联合舰队从海上的进攻。

经过连日激战，刘步蟾指挥“定远”舰与各舰一起给陆路进攻的日军以重创。日军步兵第十一旅团旅团长大寺安纯少将，在“定远”等舰猛烈的炮火下丧命，成为自开战以来第一个被击毙的日本将军。

日军从海上的进攻也屡屡受挫，多艘军舰受创。日本海军见正面进攻不能奏效，改派鱼雷艇潜入港内进行夜袭。

2月5日凌晨，日军派出10艘鱼雷艇进港偷袭，被北洋海军发现，双方展开激战。当时，“定远”舰停靠在刘公岛铁码头西侧，刘步蟾正与丁汝昌等在舰中议事。闻知敌舰入口，刘步蟾和丁汝昌立即登上甲板指挥反击。日军9号艇和10号艇向“定远”舰冲来，先后在200米和50米距离处向“定远”舰发射鱼雷。“定远”舰和附近北洋海军炮舰、鱼雷艇的猛烈炮火，击毁了日军9号鱼雷艇，艇上4人毙命，2人重伤，2人轻伤。

与此同时，“定远”舰被日军鱼雷击中舰底，海水立即涌入机舱，舰身渐渐开始倾斜。刘步蟾急令砍断锚链，驶至铁码头东侧刘公岛岸边沙滩搁浅，以充作水炮台之用。

“定远”舰中雷受伤后，刘步蟾十分悲愤。他对丁汝昌说：“定远舰损毁，是我的责任，作为管带有失职之罪，现在唯有自裁谢罪。”丁汝昌劝慰说：“定远舰受伤，责任不在你，完全是我的过错，切勿有轻生的念头。”

丁汝昌的劝慰并没有动摇刘步蟾以死殉国的决心，他早已立下了“苟舰亡，必与亡”的誓言。他曾慨然对同事们表示说：“我虽然

接受的是西式教育，但我恪守中国的传统礼教，不成功，则成仁。”

“定远”舰受伤后，丁汝昌移驻“镇远”舰指挥。天明后，日军从望远镜中看到北洋海军正用汽艇转移“定远”舰上的物品，证实“定远”舰已中雷受伤。于是，日军向刘公岛发动了猛烈攻击，但遭到北洋海军的顽强抵抗。6日凌晨，日军再次派出鱼雷艇队潜入港内进行夜袭，击沉了北洋海军的“来远”号巡洋舰、“威远”号练习舰和“宝筏”号通信舰。

接着，日军连续几天向刘公岛发动进攻。由于北洋海军伤亡严重，援兵又毫无希望，军心渐渐瓦解，部分官兵开始哗变。鱼雷艇队的部分官兵打算驾鱼雷艇逃跑，“定远”舰所配鱼雷艇的几个官兵也准备一起逃走。刘步蟾得知后，予以痛斥，但最终并未能阻止他们。几天后，北洋海军的13艘鱼雷艇和“飞霆”、“利顺”2艇突围逃跑。结果，遭到日本舰队的拦击和追堵，多数鱼雷艇被击沉或俘获，只有左一鱼雷艇得以侥幸逃生。

此时，孤立无援的北洋海军已无法抵抗日军的强大攻势。刘公岛陷入一片混乱和恐慌之中，一些高级军官和外国顾问们怂恿哗变官兵逼迫丁汝昌下令投降。

2月10日，刘步蟾见局势已无法挽回，在极度悲愤中服毒自尽，时年43岁。此前一天，刘步蟾下令将“定远”舰用炸药炸毁，以免战后被日军俘获。

刘步蟾殉国两天后，丁汝昌自杀，刘公岛遂告陷落，北洋海军全军覆没。17日，刘步蟾等人的灵柩由被解除武装的“康济”舰运往烟台。

李鸿章得知刘步蟾殉国的消息，深为惋惜。他想起刘步蟾当面对他争论的情景，更是感叹不已。当年刘步蟾的担忧，终于变成了残酷的现实。斯人已去，言犹在耳，怎能不使他感慨万千。

池仲祐在《海军实纪》中评价刘步蟾时说：“公自束发习海军，数十年祗席风涛，远涉重洋，不辞艰险，而胆识材干，亦屡经磨练而

长进。”称他“治军严肃，凛然不可犯。慷慨好义，有烈士风”。山东巡抚李秉衡在给朝廷的上奏中，称赞刘步蟾“船亡与亡，志节凛然，无愧舍生取义”。

刘步蟾殉国后，清廷下令将刘步蟾照提督阵亡例从优赐恤，世袭都骑尉加一等云骑尉。

决不弃报国大义

——记丁汝昌

曾是骑兵军官的丁汝昌，成为北洋海军的统领，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今天，都遭到一些人的讥讽和责难。但是，人们又不得不承认，在当时要找到一位比丁汝昌更合适的人的确是件非常困难的事。特定的历史环境造就了丁汝昌这样一位海军将领。尽管他的近代海军知识还很缺乏，但他毕竟是旧军队中最了解海军的将领，在受过专业教育和训练的年轻海军军官们成长起来以前，由他来执掌海军是很自然的事情。丁汝昌为北洋海军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应当给予充分肯定，不能仅仅以成败论英雄。何况，北洋海军的战败并不是哪一个人的过错。丁汝昌在最后关头选择与舰队共存亡，壮烈殉国，不愧为位令人敬佩的爱国将领。

（一）

丁汝昌，原名先达，字禹亭，号次章。1836年11月18日生于安徽庐江北江石嘴头村（今名丁家坎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里。由于家境贫寒，丁汝昌10岁时便外出帮工，后来又又到豆腐房去当学徒。丁汝昌在外做工，收入微薄，勉强够养活自己，没钱接济家人。咸丰初年，庐江一带旱情严重，丁汝昌的父母都饿病而死。

1853年（咸丰三年），太平军进军巢湖地区。次年1月，太平军攻克庐江城。17岁的丁汝昌投奔了太平军，在安徽桐城人程学启的部队中当兵，驻守安庆。1861年夏，湘军围攻安庆。隶属英王陈玉成的程学启，在安庆集贤关率部下300余人投降了湘军将领曾

国荃，丁汝昌也随之被编入湘军。湘军攻克安庆后，程学启被授参将，领开字营，丁汝昌为营中哨官，授千总。

1861年冬，李鸿章编练淮军，程学启部被拨归其指挥，丁汝昌因此改隶淮军。丁汝昌随军在上海作战，因作战骁勇，被淮军将领刘铭传看中，调他到自己的部队中。不久，丁汝昌升为营官，负责统领马队。

1864年，丁汝昌擢为副将，统领先锋马队3营，跟随刘铭传参加了镇压东西捻军的作战。1868年，丁汝昌授总兵，加提督衔，赐协勇巴图鲁勇号。

1874年，清廷裁军，刘铭传决定将丁汝昌所率马队3营裁撤。丁汝昌得知后，上书表示反对。不料，此举激怒了刘铭传，要杀死丁汝昌。丁汝昌闻讯，逃回巢县家中。

丁汝昌在家中闲居了几年后，于1877年秋到北京活动，想再谋新职。在京期间，他受到西太后的召见。不久，朝廷派他到甘肃任职。丁汝昌对这一任命不太满意，便到天津去找老上司、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求助。李鸿章对丁汝昌颇为赏识和信任，此时他正忙着筹建北洋海军，需要一位有作战经验的淮系将领来统军，丁汝昌不失为一个理想的人选。于是，他便把丁汝昌留在北洋做他的助手，参与北洋海军的创建工作。

1879年11月，李鸿章在英国订购的“镇东”、“镇西”、“镇南”、“镇北”4艘炮舰建成来华。29日，李鸿章正式奏请朝廷将丁汝昌留北洋海防差遣。

3天后，清廷同意了李鸿章的奏请。丁汝昌随即被任命为北洋水师炮船督操，正式开始了他的海军生涯。

1880年，李鸿章在英国阿姆斯特朗厂订造的“超勇”、“扬威”2艘巡洋舰即将告成，丁汝昌奉派率200余名海军官兵前往英国接舰。12月23日，丁汝昌与部分随员乘坐法国轮船，先行赴英验收军舰。

1881年8月3日，中英双方在纽卡斯尔港举行了军舰交接仪式，驻英使臣曾纪泽在礼炮声中为军舰升挂龙旗。丁汝昌率舰启航回国，被誉为“中国龙旗第一次航行海外”。

“超勇”、“扬威”2舰回国后，李鸿章于12月2日向朝廷报告了丁汝昌赴英接舰情况，并请任命丁汝昌统领北洋军舰。他在上奏中写道：

此次记名提督丁汝昌赴英带船升旗回华，欧洲诸国始知中国亦有水师，群起而尊敬之。迭据出使大臣曾纪泽、李凤苞函称，该提督在英随班谒见君主待以优礼，因与各部尚书、各国公使往复周旋，并游历英、法、德各营垒、厂、局，各提督、总管、监督等均殷勤接待，讨论军实，藉扩见闻。所带弁兵二百余人，驻英半年，训练约束，和辑商民，传播新闻纸，津津乐道，洵足尊国体而固邦交。该提督曾在长江水师管带炮船，嗣随刘铭传统带铭军，转战南北，功绩卓著，干局英伟，忠勇迈伦。自（光绪）五年十月臣奏派该员督操蚊船，与中西各员研究观摩，颇有心得；今又出洋多增历练，臣详与咨询于西国船炮制造运用之妙，体会更深。顷委以统领北洋水师重任，督同员弁，切实讲求操练，以期渐成劲旅，可收指臂之助。目今水师人才尤为难得，该提督久经大敌，远涉重洋，谋略机宜均臻妥洽。合无仰恳天恩，另单存记，破格擢用，遇有水师提督缺出，即予简放，以备折冲御侮之选。

12月4日，清廷以丁汝昌接舰有功，赏换西林巴图鲁勇号，并正一品封爵。

1882年7月，朝鲜发生政变，史称“壬午之变”。日本派兵干涉，企图借机控制朝鲜。丁汝昌奉命率“超勇”、“扬威”、“威远”3舰于8月10日抵达朝鲜仁川，进行震慑和探查。几天后，丁汝昌乘“威远”舰返回天津汇报朝鲜局势。接着，他与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

率军 2000 余人，分乘“威远”、“泰安”2 舰及招商局的“镇东”、“日新”、“拱北”等船赶赴朝鲜，于 8 月 20 日在仁川登陆。

当时，日军已派出 7 艘军舰和 1 营陆军到朝鲜，形势十分严峻。丁汝昌与吴长庆等迅速采取行动，于 26 日平息了政变。

平息“壬午之变”是北洋海军创建以来的第一次重大军事行动，也是近代以来中国海军首次大规模的海外行动。这次行动检验了北洋海军的实力，展示了北洋海军快速、机动的威力。同时，也为丁汝昌提供了一次绝好的机会，展示他的指挥才能和应变能力，从而赢得了朝廷的信任。9 月 7 日，丁汝昌率舰返回天津。14 日，清廷任命丁汝昌为直隶天津镇总兵，统领北洋海军；10 月 10 日，李鸿章又奏请朝廷，以丁汝昌平息朝鲜政变有功，赏穿黄马褂。平息“壬午之变”，牢固确立了丁汝昌在北洋海军中的地位。

（二）

经过近十年的努力，北洋海军到 1884 年已初具规模，拥有包括巡洋舰、炮舰在内的大小 20 多艘军舰。丁汝昌为北洋海军的创建，作出了重要贡献。

1884 年 8 月，中法战争爆发。北洋海军的“超勇”、“扬威”2 舰奉命南下，准备援助被法军围困的台湾。丁汝昌率炮舰镇守旅顺和大沽口。

12 月，日本政府乘中国忙于中法战争无暇他顾之机，策动朝鲜政变，攻占王宫，组建了亲日政权。1884 年是旧历甲申年，所以这次政变被称为“甲申政变”。

政变发生后，驻扎朝鲜的清军提督吴兆有和帮办袁世凯率军攻占王宫，将朝鲜国王救至清军营中保护起来。日本也迅速派出海陆军，准备与清军较量，朝鲜形势骤然紧张。

清廷决定派兵赴朝，平息政变。于是，命“超勇”、“扬威”2 舰返回北洋，随丁汝昌前往朝鲜增援。

12月20日夜，丁汝昌率“超勇”、“扬威”、“威远”3舰，载方正祥庆军1营，从旅顺出发前往朝鲜。22日，抵达朝鲜马山浦。

丁汝昌到达朝鲜后，立即前往汉城，会见了朝鲜国王和各国公使。日本方面虽然也增派了几艘军舰和2000陆军前往朝鲜，但见中国陆海军迅速赴朝，感到形势不利，不敢轻举妄动。最后，只得与清廷协商，和平解决朝鲜危机。

1885年5月，英国为扼制俄国，派舰队占领朝鲜巨文岛。丁汝昌又奉命率“超勇”、“扬威”2舰先后前往巨文岛和长崎，与英国方面交涉。

中法战争结束后，清廷下决心发展海军，设立了总理海军事务衙门，负责统一全国的海军建设，并决定先重点建设北洋海军。

1885年11月，在德国伏尔铿厂为北洋海军订造的“定远”、“镇远”、“济远”3舰建成本来华。丁汝昌陪同李鸿章前往大沽口验收。次年5月，丁汝昌陪同总理海军大臣醇亲王奕譞和李鸿章大阅海军。

1886年7月，因俄国窥伺朝鲜永兴湾，丁汝昌奉命率领“定远”、“镇远”、“济远”、“威远”、“超勇”、“扬威”6舰，前往朝鲜釜山、元山各口及永兴湾和俄国海参崴等处操巡。

8月7日，“超勇”、“扬威”2舰留在摩阔崴。丁汝昌自率“定远”、“镇远”、“济远”、“威远”4舰赴日本长崎修理。13日，舰上水兵登岸购物、游玩，因细故与日本警察发生了冲突，造成1名日本警察重伤，1名中国水手轻伤。

事件发生后，日本方面要求北洋海军不要再允许水兵请假登岸。为避免事态扩大，丁汝昌同意了日方的要求。第二天星期六，舰上水兵没有放假。

8月15日是星期天，舰上水兵纷纷要求请假上岸。丁汝昌担心水兵上岸再与日方发生冲突，坚持不允。

北洋海军总查琅威理则认为天气炎热，舰上官兵都很辛苦，应

该允许他们上岸放松一下，不要约束得太紧。

最后，丁汝昌同意了琅威理的意见，答应舰上官兵上岸的请求，但严格规定登岸水兵不准携带武器。

不料，当晚8时许，放假登岸的中国水兵在广马场外租界及华侨住区附近，遭到日本警察和市民有预谋的袭击，双方发生混战。结果，中国水兵伤亡50多人，酿成了著名的“长崎事件”。

事件发生后，军中群情激愤，琅威理主张立即向日本开战。丁汝昌十分冷静，反对动用武力，主张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这一事件，从而防止了两国武装冲突的发生。后经长时间的交涉，双方以互恤伤亡人员了结此案。

1887年12月，在德国伏尔铿厂订造的“致远”、“靖远”、“经远”、“来远”4艘巡洋舰建成来华，驶抵厦门。丁汝昌率北洋海军的“定远”、“镇远”、“济远”、“超勇”、“扬威”、“康济”、“威远”7舰和南洋海军的“南琛”舰前往厦门迎接。丁汝昌认真查验了4舰，并将情况报告李鸿章，对4舰质量给予了肯定。次年5月，丁汝昌率北洋7舰及“致远”等4舰驶抵天津大沽。

经过中法战后几年的建设，北洋海军实力已相当可观。到1888年，北洋海军已达到成军的规模，拥有大小舰船近40余艘，总排水量4万余吨，其中“定远”、“镇远”2艘铁甲舰是亚洲最大的军舰。此外，北洋海军还修建了规模宏大的旅顺、威海基地。

这年7月，丁汝昌与周馥、林泰曾、刘步蟾、罗丰禄等人一起拟定了《北洋海军章程》，经朝廷批准，很快颁布实行。此举成为北洋海军正式建军的一个重要标志。

《北洋海军章程》确定后，朝廷命李鸿章按照章程规定，上报北洋海军提督和总兵人选。12月17日，李鸿章向朝廷推荐丁汝昌出任北洋海军提督，林泰曾、刘步蟾分任左右翼总兵。他在上奏中说：“兹查北洋水师记名提督直隶天津镇总兵丁汝昌，久经大敌，谋勇兼优，自统带水师后，曾赴英、德各国及日本、朝鲜各洋面游历操

巡，讲求西法，深谙机要，实属资深劳多，堪胜北洋海军提督之任。”

当天，朝廷批准了李鸿章的奏报，任命丁汝昌为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成为中国近代海军第一位正式的舰队司令。

(三)

根据《北洋海军章程》的规定，南洋海军能出海作战的军舰每年春分以后，由海军衙门调往北洋合操，暂归北洋海军提督节制，秋分以后再返回南洋。

1889年5月，在中法战争中被革职的提督衔总兵吴安康率领南洋海军的“寰泰”、“镜清”、“开济”、“保民”、“南琛”、“南瑞”6舰抵达威海，准备与北洋海军出海合操。

6月，丁汝昌和吴安康率南北洋海军舰只前往烟台添煤购物。然后，兵分两路，丁汝昌、吴安康率“定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寰泰”、“镜清”、“开济”8舰前往朝鲜沿海各口和海参崴一带操巡；林泰曾率“镇远”、“济远”、“超勇”、“扬威”、“南琛”、“南瑞”、“保民”7舰在北洋各口操巡。

29日，丁汝昌率8舰抵达朝鲜仁川。几天后，丁汝昌前往汉城，朝鲜国王会见了。接着，丁汝昌又率舰前往巨文岛和元山。抵达元山后，丁汝昌派2舰前往图门江测操，2舰前往海参崴，2舰前往穆湖崴，留下2舰在元山操练。

7月21日，清廷传令嘉奖参加操巡的南北洋海军将士，并调阅了各舰航海日记和丁汝昌与朝鲜国王的会谈记录，对丁汝昌同朝鲜国王的会谈表示满意。

8月间，丁汝昌率舰回国。休整几个月后，又开始为舰队南下作准备。按计划，丁汝昌将在冬季率舰队前往越南和小吕宋一带洋面操巡。

12月2日，丁汝昌率“定远”、“镇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6舰从威海驶抵上海。几天后，“济远”、“超勇”、“扬

威”、“威远”4舰也随后到达上海。

丁汝昌在上海勘验了福州船政局制造的“龙威”舰。该舰是第一艘国产装甲巡洋舰，由中国工程技术人员自行设计制造，始建于1886年，1889年建成下水，舰长197英尺，宽40英尺，吃水深13英尺1英寸，排水量2100吨，马力2400匹，航速为14节。该舰经丁汝昌等勘验后，编入北洋海军，后改名为“平远”，成为北洋海军主力战舰“八大远”之一。

次年1月，“定远”、“镇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6舰先后驶抵台湾、澎湖海面。11月，丁汝昌率“定远”、“镇远”、“经远”、“来远”4舰前往香港修理，留“致远”、“靖远”2舰在台湾帮助台湾巡抚刘铭传“剿番”。

3月，丁汝昌率“致远”、“济远”、“经远”、“来远”4舰巡历了南海各口。返回香港后，他又于3月21日率“定远”、“镇远”、“济远”、“致远”、“来远”5舰访问了西贡、新加坡、小吕宋等口，4月29日返回香港。

5月30日，丁汝昌率舰队返回威海，结束了近半年之久的南下操巡。

1891年5、6月间，李鸿章大阅海军，丁汝昌率北洋海军接受检阅。李鸿章对北洋海军的表现十分满意，认为渤海门户已有深固不摇之势。据林乐知《各国新政治记》称，这一年，中国海军在世界的排名为第8位，而日本排在第16位。

6月26日，应日本邀请，丁汝昌率“定远”、“镇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6舰再访日本。7月9日，日本明治天皇接见了丁汝昌及各舰管带。16日，丁汝昌在“定远”舰上设宴款待日本国会议员。20日，丁汝昌率舰队返回威海。

次年6月，丁汝昌率舰队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访问了日本，并前往穆湖崴、海参崴及元山、釜山、仁川等处操巡。

创建近代海军在中国是一项前所未有的事情，不仅缺乏建军

经验,而且缺少海军人才,尤其是缺乏统驭全军的将才。当时,从船政学堂毕业的海军军官们虽然接受了比较系统的海军教育,但都比较年轻,既没有带兵经历,也没有实战经验,不具备统军的资历和声望。所以,李鸿章不得已派身为陆军将领的丁汝昌来统帅海军。丁汝昌到海军任职之时,已过不惑之年,李鸿章并不指望他也像船政毕业学生那样精通海军业务。他所看重的是丁汝昌的治军才能和实战经验,希望他能担负起统领全军的重任。丁汝昌在组织、协调方面的才能和经验以及他的谦逊勤敏,使他很快成为北洋海军中不可替代的人物。

丁汝昌深知,自己虽然努力去学习 and 了解近代海军知识,但所得仅是皮毛,与船政学堂的毕业学生、特别是留学归来的学生们相比,相去甚远。所以,在军中他能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充分信任和依靠他们,并不凭借身经百战的经历傲视这些年轻的军官们。丁汝昌为人十分随和,不拘形迹,视部下如家人,因而深得他们的尊重和信任。

丁汝昌还十分注意处理好与北洋海军所聘洋员的关系,及时化解他们与中国军官之间的矛盾,既充分尊重他们的意见,又不唯洋是从,较好地发挥了洋员们的作用。

丁汝昌喜好文墨,能很轻松地起草军中的各种文电,这在当时的武将中还是颇为少见的。他喜欢结交文士,对他们优礼有加。

丁汝昌统领下的北洋海军,尽管不可避免地受到王朝末期腐败习气的熏染和影响,但它仍然是一支颇有作战能力的近代化军事力量。西方人也认为,“中国海军同陆军相比是非常优越的”,“中国的海军在提督丁(汝昌)指挥之下,质料上远胜于陆军”。

(四)

1894年2月18日,丁汝昌赏加尚书衔。3月,他率北洋6舰前往新加坡、马六甲、槟榔屿等处访问,于4月底返回天津。5月,李

鸿章大阅海军。丁汝昌率北洋海军各舰与南洋海军的“南琛”、“南瑞”、“寰泰”、“镜清”、“保民”、“开济”6舰及广东海军的“广甲”、“广乙”、“广丙”3舰一道，接受了检阅。6月，朝鲜政府向中国求援，帮助它镇压东学党起义。丁汝昌奉命派“济远”、“扬威”2舰前往仁川、汉城护商。与此同时，清廷派出淮军1500人分乘招商局轮船前往朝鲜，驻守牙山。日本也乘朝鲜内乱之机派军前往朝鲜，准备向中国开战。

这期间，北洋海军先后奉命派出“镇远”等多艘军舰赴朝增援，由林泰曾负责统一指挥在朝各舰。由于战争已迫在眉睫，丁汝昌和林泰曾等都主张海军应集中兵力，准备与日本海军进行决战，反对将北洋海军的力量过分分散。在他们的一再要求下，李鸿章同意将在朝鲜的北洋各舰陆续调回。

7月25日，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在丰岛海面突然袭击了中国的运兵船队，奉命护航的“济远”舰负伤，死里逃生；“广乙”舰受伤搁浅，舰上官兵焚烧军舰，登岸逃生；运送军械和饷银的“操江”号炮舰被日军俘获；运送陆军的“高升”号轮船被日军击沉，船上800多名中国官兵殉难。

丰岛海战前，丁汝昌计划率海军大队护航。李鸿章认为形势还没有恶化到开战的地步，不必小题大作，他担心海军大队出动会激化与日本的矛盾，加速战争的爆发。所以，他只同意派少量军舰护航。结果导致北洋海军首战失利，造成严重损失。

丰岛海战后，丁汝昌先后4次率舰出海搜寻日本舰队，但未能发现日舰的踪影。日舰乘丁汝昌率大队出海之机，前来威海、旅顺一带海面骚扰，引起朝廷一片恐慌，命丁汝昌迅速回防，并不得再率舰队远离。

朝廷中一些激进的官员对北洋海军的表现十分不满，要求将丁汝昌撤职。光绪皇帝受此影响也有换将之意，命李鸿章参办。但李鸿章反对撤换丁汝昌，他认为，“海军全仿西法，事理精奥，决非

未学者所可胜任。且临敌易将，古人所忌。似宜随时训励，责令丁汝昌振刷精神，竭力防剿”。

但是，朝廷仍坚持要撤换丁汝昌。8月27日，朝廷降旨称：

现在倭船屡窥海口，海军防剿统将亟须得人，丁汝昌畏葸无能，巧滑避敌，难胜统带之任。严谕李鸿章于海军将领中，遴选可胜统带之员，于日内覆奏，不得再以临敌易将，接替无人等词，曲为回护，致误大局。

两天后，李鸿章上奏为海军和丁汝昌辩护，指出丁汝昌等海军将领曾多次请求添购新型军舰和炮械，但始终未能如愿。目前，北洋海军实力弱于日本海军，所以不得不采取守势。至于评论海军的功过，“应以各口能否防护，有无疏失为断，似不应以不量力而轻进，转相苛责”。李鸿章认为，丁汝昌“曾经大敌，迭著战功”，统领海军多年，熟悉情况，“目前海军将才，尚无出其右者”。最后，由于李鸿章的力保，丁汝昌得以继续留任。

9月15日上午，丁汝昌奉命率北洋海军主力抵达大连湾，准备护送援朝部队前往大东沟登陆。次日凌晨1时，丁汝昌率18艘舰艇组成的护航舰队向大东沟进发。1小时后，5艘运兵轮船载着4000名援朝官兵也从大连湾启航。

下午，运兵船队抵达大东沟。丁汝昌命“镇南”、“镇中”2炮舰和“福龙”、“左队一”、“右队二”、“右队三”4鱼雷艇护送运兵船入口，“平远”、“广丙”2巡洋舰在口外担任警戒。他自己率“定远”等10舰在口外12海里处下锚，以防日舰来袭。

17日晨，登陆任务完成，丁汝昌命5艘运兵轮船先行返回大连。9时，“定远”等10舰开始进行1个小时的常操训练。常操结束后，各舰开始准备午餐。

此时，日本海军联合舰队的12艘军舰正从海洋岛向东北方向航进，搜寻北洋海军。11时30分左右，日舰发现了北洋海军。而在此之前，北洋海军也发现了日本舰队，并发出了战斗警报。

丁汝昌与“定远”舰管带刘步蟾和北洋海军总教习、德国人汉纳根一道登上舰桥，一面观察敌情，一面商讨对策。随后，丁汝昌下令“定远”等10舰排成五叠小队，“定远”、“镇远”为第一小队，随后跟进的是“致远”和“靖远”、“来远”和“经远”、“济远”和“广甲”、“超勇”和“扬威”4个小队，各舰以5节的航速迎敌，不久提高到7节。因为日舰距离尚远，丁汝昌下令各舰官兵抓紧用午餐。

日本舰队发现北洋海军后，旗舰“松岛”号巡洋舰传令各舰列单纵阵迎战。第一游击队的“吉野”、“高千穗”、“秋津洲”、“浪速”4艘快速巡洋舰相衔而进，为全军先导，准备向北洋海军战阵作中心突破。本队的“松岛”、“千代田”、“岩岛”、“桥立”、“比睿”、“扶桑”6舰，亦成单纵阵紧随其后，舰队以10节航速向北洋舰队航进。随军督战的日本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乘坐的“西京丸”舰和另外一艘军舰“赤城”号，因航速慢、战斗力弱，被列入非战斗队列，置于战阵左侧。

丁汝昌见日舰成“一”字形纵阵扑来，下令各舰按预定方案，列双横阵迎敌。同时，要求各舰随旗舰运动，保持舰首对敌，每小队的2艘军舰要协同动作，互相援助。

变阵命令下达后，由于各舰航速没有保持好，形成了一个中间突出，两翼张得很开的松散队形，看上去好似一个“人”字。“定远”、“镇远”2舰居中，左翼为“靖远”、“致远”、“广甲”、“济远”4舰，右翼为“来远”、“经远”、“超勇”、“扬威”4舰。

日军发现北洋海军的弱点在其右翼，第一游击队便迅速驶过北洋海军“人”字阵正面，向最弱的“超勇”、“扬威”2舰扑去。

丁汝昌发现了日军的企图，在洋员泰莱的建议下，命令全队向右转4度，试图以主力舰对敌，扭转不利局面。但最后北洋海军变阵尚未结束，战斗便打响了。

12时50分，两军相距5300米时，“定远”舰打响了海战的第一炮。不料，305毫米主炮巨大的后座力，竟将舰桥震坍。正在舰桥

上的丁汝昌跌落到甲板上负伤，无法指挥作战。不久，“定远”舰上的信号装置也被敌舰炮火击毁，北洋海军失去了指挥。

丁汝昌受伤后，无法站立，属下想把他抬进舱中，他坚决拒绝。在稍事包扎后，丁汝昌不顾危险，坐在甲板上督战，鼓励舰上官兵奋勇杀敌，一直坚持到战斗结束。

经过5个小时的激战，北洋海军击退了日本舰队的进攻，予敌以重创。但北洋海军也遭受了严重损失，官兵伤亡800多人，“致远”、“经远”、“超勇”、“扬威”、“广甲”5舰沉毁，其他各主力战舰也不同程度受伤，从而丧失了与日本海军进一步争夺黄海制海权的能力。

实力上的差距是北洋海军在大东沟海战中失利的一个主要原因。北洋海军在军舰航速及炮火等方面均不及日本海军，在当时的条件下，军舰的炮火威力和航行速度是作战能力的核心内容。汉纳根战后评论说：“中国海军近八年中未曾添一新船，所有近来外洋新式船炮，一概乌有，而倭之船炮，皆系簇新，是以未能制胜。”

除此之外，阵形存在严重缺陷，作战中舰队失去指挥，各舰缺少配合，以及有的战舰临阵逃跑等，也都是造成北洋海军大东沟海战失利的重要原因。

（五）

大东沟海战后，清廷嘉奖作战有功人员，丁汝昌交部从优议叙。

由于丁汝昌受伤较重，头脚肿胀，眼不能睁，两耳流血水，不得不休息养伤。清廷根据李鸿章的推荐，命刘步蟾暂代提督之职。但因形势很快恶化，丁汝昌又不得不带伤复任，一面抓紧抢修战舰，一面积极布防，加强戒备。

11月，日军进攻旅顺，清廷命丁汝昌率北洋海军护送援军前往旅顺。丁汝昌和汉纳根认为，北洋海军中只剩下“定远”、“镇远”

2 舰能战，此次援旅，必遭日本舰队围攻，一旦“定”、“镇”不保，后果不堪设想。最后，李鸿章决定将援军用轮船自登州运往营口，再转赴旅顺。

11 月 16 日，日本舰队驶至威海口外，引诱北洋军舰出战，准备一举将其歼灭。丁汝昌严阵以待，坚守不出，日军无奈撤走。而在同一天，清廷却发布上谕，称丁汝昌统带海军不能得力，着革去尚书衔，摘去顶戴，仍令戴罪立功，以观后效。

23 日，旅顺终告失守。不久，清廷又根据山东巡抚李秉衡的奏请，下令将丁汝昌交刑部治罪，并命李鸿章详加遴选，奏保海军统帅以接替丁汝昌。

李鸿章认为目前没有可以替代丁汝昌指挥海军的合适人选，奏请丁汝昌继续留任。清廷不允，命刘步蟾暂代提督之职，待丁汝昌交接完毕，即押解进京。12 月 22 日，威海统将戴宗骞、张文宣、刘超佩和海军将领刘步蟾以及各舰管带等，致电恳请挽留丁汝昌。由于威海面临日军的进攻，形势越来越紧张，清廷只好让丁汝昌继续指挥北洋海军防守威海。

丁汝昌革职待罪，心情十分抑郁。但他仍以大局为重，积极与陆将协调，共同加强威海的防务。

1895 年 1 月 20 日，日军在荣成湾登陆，攻占荣成。25 日，日本陆军兵分两路进犯威海。同时，日本海军联合舰队从海上进攻北洋海军，形成水陆夹攻之势。

威海战前，丁汝昌与刘步蟾等制订了一个依辅炮台、海陆协防的作战计划。战役开始后，丁汝昌指挥北洋海军各舰一面以炮火支援陆路守军阻击日军，一面与刘公岛、日岛炮台配合，抵御日军从海上的进攻。

由于陆路防守薄弱，经过几天激战，威海卫沿岸全部被日军占领，南帮、北帮两个炮台群落入敌手。虽然有几座炮台被丁汝昌派遣的敢死队破坏，但日军仍可利用剩余的炮台轰击港内的北洋海

军。刘公岛处于日军的包围之中，与外界的电信联系断绝，成了一座孤岛。

在北洋海军的顽强抵抗下，日本舰队从海上的进攻连连受挫。2月5日凌晨，日本舰队派出鱼雷艇队，利用夜色的掩护，潜入港内袭击北洋海军舰只。是日，“定远”舰被击成重伤。次日，日军鱼雷艇又将“来远”、“威远”、“宝筏”3舰击沉。

2月7日，北洋海军10余只鱼雷艇逃跑，遭到日舰围追。最后，仅有左一鱼雷艇侥幸逃到烟台。接着，日岛炮台又遭到日军猛轰，丁汝昌被迫下令守军撤出该岛。

经过连续几天恶战，北洋海军官兵伤亡惨重，军心也开始动摇，部分将领和洋员们甚至秘密商议向日军投降。他们怂恿一些哗变水兵要挟丁汝昌，让他下令投降，被丁汝昌严辞拒绝。他说：“你们要投降，除非先杀死我，否则我不会坐视不管。”

丁汝昌早已报定了必死的决心，誓与舰队共存亡，绝不投降。日军在进攻威海前，曾起草了一份劝降书，由英国“塞班”号军舰舰长转致丁汝昌。丁汝昌接到劝降书后说：“我决不弃报国大义，而今惟有一死以尽职责。”并将劝降书上交李鸿章。他曾致电李鸿章表示，一旦战败，“惟有船尽人没而已”！他在给威海守将戴宗骞的信中说：“自顾衰朽，岂惜此躯？”他特地请来6个木匠，为自己做了一口棺材，并亲自进去躺了一下，试了试大小。他把儿子代禧留在身边，准备让他为自己料理后事，嘱咐儿媳带着孙子回老家，好好养育。战前，丁汝昌还派人将北洋海军的文卷转移到烟台，以免日后落入敌手。

2月9日，日本舰队再次向刘公岛发动猛烈进攻。丁汝昌指挥军舰和炮台反击，终于打退了日军的进攻。激战中，丁汝昌所乘“靖远”舰被日军炮火击毁。正在督战的丁汝昌准备与战舰同沉，但被舰上的水手救上小轮船。丁汝昌获救后，仰天长叹道：“这是老天不让我死在战场上啊！”

丁汝昌多次派人潜出威海送信，请求援助，救兵却迟迟不到。他曾要求官兵们坚守到 2 月 11 日，眼看最后期限已到，援兵仍杳无音信，丁汝昌知道形势已无法挽回。9 日，他下令将搁浅的“靖远”舰和“定远”舰炸毁，以免资敌。次日，刘步蟾在极度悲愤中服毒自杀。

11 日晚，丁汝昌接到从烟台送来的李鸿章的电报，命令他率舰突围。丁汝昌连夜召开军事会议，商讨对策。丁汝昌提出突围，遭到部分军官和洋员的反对，他们认为口外日军已布满水雷，北洋各舰都受重伤，而且弹药将尽，无法突围。丁汝昌又提出用水雷轰沉“镇远”舰，也遭到反对，担心这样做会激怒日军。

丁汝昌见大势已去，决心自杀殉国。他从军需官杨白毛那里要来鸦片烟膏，于 12 日凌晨在提督衙门服毒自尽，时年 59 岁。

临终前，丁汝昌命水师营务处提调牛昶昞将提督印截角作废。但是，牛昶昞并没有执行他的命令。

丁汝昌自杀后，牛昶昞和洋员及部分军官在自己的家中开会，秘密决定向日军投降。洋员瑞乃尔以丁汝昌的名义用英文草拟了一份投降书，再由一位管带译成中文，然后由牛昶昞加盖提督印，于当天送往日舰。17 日，日军正式占领刘公岛。

刘公岛陷落后，牛昶昞等谎称投降决定是丁汝昌作出的，致使丁汝昌死后蒙冤。清廷下令对北洋海军阵亡将领从优议恤，但将丁汝昌排除在外，不予考虑。

1906 年夏，在丁汝昌殉国 11 年后，威海、荣成、烟台、旅顺沿海士绅商民等 300 百余人 and 广东水师提督萨镇冰等 14 人，先后上书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为丁汝昌鸣冤。袁世凯据此上奏朝廷称：

丁汝昌束发从戎，转战各省，实为准部骁将。统领海军以来，衽席风涛，精勤罔懈。自部议停购船械，光绪十四年后未增一舰。丁汝昌尝以为言，卒以经费短绌，格于部

议而止。大东沟一役，以我笨滞之师船，御彼灵巧之舰队；且我仅十艘，敌船十二艘；敌用新式快炮，我系积年旧器。利钝既异，众寡复殊，丁汝昌裹创喋血，苦战多时，卒能伤亡相当。外人之作壁上观者，莫不啧啧称叹，论为得未曾有。及回防威海，收合余烬，竭力抵御。无如势力单薄，敌来愈众，坚持伊久，卒以械尽援绝，慷慨捐躯。败绩固不必讳，忠勇要自可嘉。其始终艰难委屈之情，亦为天下中外所共谅。请予销去革职处分，开复原官。

但清廷一直拖到 1901 年 4 月 25 日，才根据海军大臣载洵的奏请，以“力竭捐躯，情节可怜”，开复了丁汝昌原官原衔。沉冤最终得以昭雪，虽然来得迟了些，但足以告慰英灵于九泉。

吾将以死报国

——记杨用霖

1895年2月，日军从陆地和海上将刘公岛团团包围。困守在孤岛的北洋海军虽奋力拼战，仍无法摆脱全军覆没的厄运。北洋海军的几位主要将领见大势已去，无力回天，相继自杀身亡，以死殉国。其中最为惨烈的，当推护理左翼总兵、署“镇远”铁甲舰管带杨用霖。杨用霖誓死不降，举枪自击以明志节，实现了他“吾将以死报国”的誓言。

（一）

杨用霖，字雨臣，福建闽县（今福州）人，生于1854年。他年少时失去了父母，成了孤儿，由伯兄杨腾霄抚养长大。

1871年，杨用霖参加了福建海军。后在“艺新”号炮舰上当船生，跟随管带许寿山学习英语及驾驶、枪炮技术。杨用霖自知基础较差，所以发奋努力，不分白天黑夜，不管寒冬酷暑，刻苦学习，勤加操练。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杨用霖不仅掌握了许多理论知识，而且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对于航海、枪炮等各部门技术日益精通熟练。杨用霖也因此很快被提升为军官，担任了“振威”号炮舰的管炮官。不久，他又升任“艺新”号炮舰二副。

1879年以后，杨用霖调往北洋海军任职，先任“飞霆”号炮舰二副，后又随林泰曾调往刚从英国买进的“镇西”号炮舰，任该舰二副。

1881年3月，杨用霖随丁汝昌、林泰曾和邓世昌等前往英国，

接收订购的“超勇”、“扬威”号轻巡洋舰，任“超勇”舰二副。回国后不久，杨用霖晋升为“超勇”舰大副。

1885年11月，中国在德国订造的“定远”号、“镇远”号铁甲舰和“济远”号巡洋舰建成来华。林泰曾出任“镇远”舰管带，杨用霖任该舰大副。此后，杨用霖一直在“镇远”舰上任职，先后升任帮带大副、副管驾等职。1892年4月，实授北洋海军左翼中营游击。

杨用霖是个很讲义气、很重感情的人，言出必信，颇有侠士之风。他治军严明，对部属关心爱护，视同家人。杨用霖本人是从士兵成长起来的，对下级官兵的疾苦非常了解和同情。每当他们本人或家中遇到困难，他都能亲自给予慰问和帮助。官兵们把他看成是自己的父兄，非常尊敬和拥戴他。

长年艰苦的海上生活，使杨用霖养成了饮酒的习惯。他非常喜欢喝酒，也非常能喝酒。杨用霖平时话并不多，但喝酒喝到高兴处，他会侃侃而谈，滔滔不绝，纵论天下大事，慷慨激昂，旁若无人。

与许多行伍出身的军官不同，杨用霖不是那种目光短浅、胸无大志、随便放纵自己的人。他常常对人说，大丈夫应当为国家建立功勋，名垂不朽，不能碌碌无为，与草木同腐。

北洋海军的高级军官绝大多数是海军学堂的毕业生，还有不少是留过学的。像杨用霖这样完全靠自学而晋升到高位，可谓凤毛麟角。和那些学生出身的军官相比，杨用霖不仅拥有丰富的实际经验，而且更具有军人勇武、果断的气质和胆略。西方的来访者曾评价海军学堂的学生们时说：“他们是虚弱孱小的角色，一点精神或雄心也没有，在某种程度上有些巾帼气味。这自然是由抚育的方式所造成的。”这些评价虽然有些夸大，但也反映了一些事实。连李鸿章也感到，海军学堂出身的军官们大多数文秀有余，威武不足，少了些军人的气质。

但是，不可否认，海军学堂毕业的军官们受过系统的教育，具有良好的理论素养，对于管理近代军舰，他们更胜一筹。正像李鸿

章说的那样，他们“带船学问究较他处为优”。

杨用霖年少失学，没有读过多少书，也没有接受过正规系统的海军教育，与海军学堂毕业的军官相比，理论知识较为缺乏。而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要指挥近代化军舰，仅凭经验和勇气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具备丰富的理论知识和深厚的军事素养，才能适应近代战争的要求。杨用霖深知自己的弱点，所以加倍刻苦地学习。即使是闲暇时间，他也常常手不释卷。由于长期坚持不懈地学习，杨用霖的指挥才能不断提高，深得上司的信任和倚重。北洋海军总查、英国人琅威理对杨用霖出色的指挥才能和坚毅顽强的精神尤为赞赏，他认为杨用霖在海军中的前途不可限量，甚至预言杨用霖将成为亚洲的纳尔逊。

（二）

1894年9月17日，杨用霖作为升用参将右翼中营游击、“镇远”舰副管驾随舰参加了著名的大东沟海战。战斗中，他协助管带林泰曾指挥作战，表现十分出色。

杨用霖平时经常以“大丈夫当马革裹尸”来激励自己和部下。战斗即将打响时，杨用霖鼓励部下说：“我们报效国家的时刻到了，大海就是我的葬身之所，我将以死报国。各位愿意跟我杀敌的欢迎，不愿跟从的我绝不强求。”杨用霖的话深深打动了舰上官兵，他们流着眼泪向杨用霖表示说：“杨大人以死报国，我们岂能偷生！只要大人一声令下，就是赴汤蹈火，我们也绝不后退。”

战斗打响后，“镇远”舰紧随一马当先的旗舰“定远”，冲向敌阵，与日舰展开了激战。杨用霖协助林泰曾指挥军舰，连连给敌舰以重创。当时，战况异常惨烈，弹如雨下，血肉横飞。杨用霖沉着镇定，毫无惧色。海战中，他充分展示了自己出色的指挥才能，与林泰曾配合默契，指挥“镇远”舰巧妙避开敌舰炮火，与“定远”舰密切配合，且战且进。

激战中，“定远”舰被敌舰炮火击中，燃起熊熊大火，形势十分危急。杨用霖见“定远”舰受伤，担心一旦旗舰有不测会影响全军士气，遂征得林泰曾同意，急令“镇远”舰转舵，冲到“定远”舰前，挡住敌舰的进攻，掩护“定远”舰。“定远”舰因此赢得了宝贵的时间，迅速扑灭舰上的大火，抢修军舰，又重新投入战斗。当时在附近海域观战的西方海军人士都对“镇远”舰深表赞赏，认为如果没有“镇远”舰这种异乎寻常的勇敢举动，“定远”舰的处境将是十分危险的。

作为“镇远”舰的副管驾，杨用霖一方面协助林泰曾指挥战舰，一方面不断策励舰上官兵坚持战斗。在他的鼓舞下，全舰官兵始终保持高昂的士气，面对日舰凶猛的进攻，同仇敌忾，毫不畏惧。舰上 305 毫米主炮的一名炮手被敌舰炮火击中，头部炸裂，头骨片片飞扬，溅到其他炮手的身上。他们毫不惊恐，将这位炮手的尸体抬到一边，又继续射击。炮术长的弟弟战前来舰上看望哥哥，没有来得及离开军舰，便跟哥哥一起参加了战斗。战斗中，哥哥身负重伤被抬进舱中抢救。弟弟对哥哥略作安慰后，又返回炮位继续战斗。

“镇远”和“定远”2 艘铁甲舰是敌舰攻击的主要目标，数艘敌舰紧紧围住 2 舰，倾泻弹雨。但是 2 舰顶住了敌舰的围攻，并给敌舰以重创，最后迫使日本舰队先行撤离战场。

大东沟海战结束后，朝廷论功行赏，杨用霖因在战斗中表现英勇，着免补参将，以副将尽先补用，并赏给捷勇巴图鲁勇号。

是年 11 月 14 日，“镇远”舰随舰队从旅顺返回威海。进港时，因风浪过大，不慎触礁，舰体多处受伤。管带林泰曾引咎自责，忧愤自杀。这突然的变故，使危难中的北洋海军遭受了新的打击。

林泰曾自杀后，丁汝昌指派杨用霖暂行指挥“镇远”舰，并报李鸿章批准。李鸿章覆电表示赞同。但当时清廷已对丁汝昌极不信任，得知杨用霖系丁汝昌推荐，便对其能否胜任表示怀疑。11 月 20 日，清廷电令李鸿章对杨用霖进行仔细考察，并提出让“平远”号巡

洋舰管带李和担任“镇远”舰管带。

11月23日，丁汝昌电请李鸿章最后确定“镇远”舰管带一职。丁汝昌提出，按海军章程规定，林泰曾之职可由“靖远”号巡洋舰管带叶祖珪推升，但杨用霖、李和也可破格提拔，请李鸿章裁定。次日，李鸿章电告丁汝昌，决定仍由杨用霖暂带“镇远”舰。

12月8日，道员徐建寅奉命到威海查验北洋海军情况，对北洋海军各舰艇长进行了考核，并作了“可用”、“尚可用”、“不可用”等简短的评语。徐建寅对杨用霖的评价是“朴诚可用”。

12月18日，清廷电令李鸿章保举接替丁汝昌出任北洋海军提督的人选，并提出李和、杨用霖和徐建寅3个人供选择，要李鸿章仔细予以考虑。

两天后，李鸿章覆电称，李和才具稍短，杨用霖未便超升，徐建寅系一文官，都无法接任提督职务，仍坚持任用丁汝昌。

通过这次更换提督的动议可以看出，朝廷对杨用霖的看法已有了根本的改变，杨用霖的才能和他在北洋海军中的地位实际上已得到朝廷的肯定。杨用霖在北洋海军中最后的正式职务是护理左翼总兵兼署“镇远”舰管带，已成为北洋海军将领中地位仅次于提督丁汝昌和右翼总兵、“定远”舰管带刘步蟾的第三号人物。

(三)

杨用霖受命于危难，深感责任重大。他接职后，最紧迫的任务是尽快抢修好受伤的“镇远”舰。“镇远”舰触礁后，江南制造总局雇请了6名外国技师，来威海就滩抢修。杨用霖率领舰上官兵积极配合，日夜施工。由于旅顺失守，“镇远”舰无法进坞修理，加之天气渐渐寒冷，水下作业无法进行，雇请的外国技师也要求回上海。所以，到1895年1月，经过近两个月的抢修，“镇远”舰伤还留下3处，共长30余尺，宽2尺至6寸不等。最后只能采取临时性补救措施，在舰底伤处用夹层木撑。

1月6日，“镇远”舰出港试车试炮。因为机舱安有木撑，只有5个锅炉升火，“镇远”舰每小时仅能行驶7海里。而且，如果风浪过大，或开炮震动过大，都有可能使军舰发生危险。此时，“镇远”舰已无法出洋作战，只能留在港口内作活动炮台用。

1月25日，日本陆军兵分两路进犯威海，海军联合舰队则从海上发动进攻，予以配合，企图水陆夹击，消灭北洋海军。杨用霖协助丁汝昌、刘步蟾，指挥战舰反击敌舰的进攻，并以舰上炮火配合陆军阻击陆路进攻的日军。

经过几天的激战，北洋海军挡住了日军从海上的进攻，但陆军却没能阻止日军在陆上的进攻。日军占领了南帮炮台群和北帮炮台群，转而利用炮台轰击在刘公岛的北洋海军。

2月3日以后，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在陆上炮台的配合下，加强了从海上的进攻，并利用夜暗的掩护，派鱼雷艇潜入港内进行袭击。日本舰队的正面进攻一再受挫，但鱼雷艇袭击却屡屡得手，北洋海军舰艇损失严重。2月5日凌晨，“定远”舰被鱼雷击中，被迫驶至岸边搁浅。6日凌晨，“来远”舰、“威远”舰等又被鱼雷击沉。“定远”舰受伤后，丁汝昌将督旗移到“镇远”舰上，继续指挥抵抗。由于北洋海军伤亡惨重，援兵又迟迟不到，军心开始动摇，甚至出现了哗变。北洋海军威海营务处提调牛昶昞等人，与北洋海军的外国顾问们密谋向日军投降。

2月10日、12日，刘步蟾、丁汝昌相继自杀，杨用霖十分悲痛。他知道，形势已无法挽回，北洋海军到了最后关头，作为北洋海军职务最高的将领，自己再没有可以选择的余地，只有像丁汝昌、刘步蟾一样，以一死表明志节，为国尽忠。

丁汝昌自杀的当天，牛昶昞等人决定推举杨用霖主持向日军投降事宜。杨用霖已决心一死报国，严辞予以拒绝。他向刘公岛和心爱的战舰作了最后的告别，从容步入“镇远”舰舱内，口诵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著名诗句，正襟危坐，缓缓

举起手枪，扣动了板机。子弹从他的口中射入，击中后脑，“脑浆自鼻窍垂注如箸”，当即身亡，时年 41 岁。杨用霖自杀后，仍端坐不倒，闻声赶来的官兵们都惊叹不已。

杨用霖不辱志节，壮烈殉国，深为人们赞许。池仲祐在《海军实纪》中评价说，甲午战争中“我海军将士多死难者，而殉节之惨烈，则以护理北洋左翼总兵杨公为最”。“公生性沉毅忠勇，常以马革裹尸为壮，临难捐躯，盖亦卒酬其志云”。

杨用霖殉国后，朝廷为嘉奖其忠烈，下令按照军官阵亡例从优议恤，赠提督衔，给骑都尉兼一云骑尉世职。

刘公岛失陷后，杨用霖的灵柩与丁汝昌、刘步蟾等人的灵柩一同由“康济”舰运至烟台，后归葬家乡。

杨用霖英勇抗敌，壮烈殉国的事迹在他的家乡广为流传。杨用霖归葬之日，“道旁观者冲塞”，许多人流下了眼泪，表达对杨用霖的敬意。

不避危难 鞠躬尽瘁

——记叶祖珪

大东沟海战刚刚开始，北洋海军旗舰“定远”号上的信号装置便被日军炮火击毁，整个舰队失去了指挥。日本海军联合舰队乘机将北洋海军分割包围，企图利用其速度和炮火优势各个击破，一举全歼北洋海军。

失去统一指挥的北洋海军各舰与日本海军联合舰队进行了长达5个小时的激战，虽经奋力抵抗，仍无法摆脱被动的局面，损失惨重，处境险恶。危急关头，北洋海军的“靖远”号巡洋舰勇敢地升起指挥旗，代替旗舰集合被日军打散的北洋各舰，重新列阵。日本舰队见“靖远”舰升旗集队，北洋海军声势复振，遂不敢恋战，匆匆逃离战场。

北洋海军最终能击退日本海军联合舰队的进攻，“靖远”舰功不可没。当时，担任“靖远”舰管带的就是北洋海军的中军右营副将叶祖珪。

(一)

叶祖珪，字桐侯，1852年生于福建侯官（今福州）。叶氏先世从富沙迁来省城，叶祖珪的曾祖和祖父都做过县令，父亲叶汝钦是个国学生，先后6次参加科举考试都未能得中，没有做过官。后来，他在家中教授学生，当了私塾老师。叶汝钦共有9个子女，叶祖珪排行第三。

由于家中生活困难，叶祖珪放弃了参加科举考试的打算，转而

投考刚刚建立的福州船政学堂，这里的膳宿完全是免费的。叶祖珪很顺利地通过了入学考试，成为福州船政学堂驾驶班第一期学生。

1871年，叶祖珪结束堂课学习，与刘步蟾、林泰曾等同学一道，登上“建威”号练习舰，开始航海实习。叶祖珪随舰到达过南北洋各口及香港、新加坡、小吕宋、槟榔屿等口，丰富了阅历，增长了才干。

不久，船政大臣沈葆楨奏保叶祖珪为把总留闽尽先补用，派上“扬武”号练习舰。叶祖珪随舰又到过朝鲜、日本及南洋群岛各口岸。

1877年，叶祖珪以“才具优异”被选派为第一届留英学生，前往英国学习海军。10月，叶祖珪、严宗光、方伯谦、何心川、林永升、萨镇冰6人经过严格的考试，进入泰晤士河畔世界著名的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学习。

叶祖珪在校学习十分刻苦，成绩优异，深得英国教官的赞赏和好评。1878年夏天，叶祖珪完成了在皇家海军学院的学习，准备前往舰队实习。

7月26日，叶祖珪作为留学生代表，与中国驻英使馆官员黎庶昌、张德彝应邀前往泰晤士河口，参观了首次赴英国访问的日本军舰“清辉”号。

8月18日，叶祖珪、方伯谦、林永升、萨镇冰、何心川5人在朴次茅斯开始登舰实习。叶祖珪被派上英国地中海舰队的“忒来克柏林”号铁甲舰实习，1877年9月至1878年6月，林泰曾也曾在该舰实习。

叶祖珪在“忒来克柏林”号军舰上结识了也在该舰实习的英国王子，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临别时，英国王子将自己一枚珍贵的镶有蓝色宝石的戒指，赠送给叶祖珪，留作纪念。

1879年3月8日，叶祖珪转上英国地中海舰队的“音温思布拉”号军舰实习。这年秋天，他完成了全部舰上实习课程。接着，由

中方聘请的英国海军炮队教官苏萃和美国海军水雷教官马格斐，又分别为叶祖珪等留学生讲授了炮垒军火诸学和水雷电气诸学。

1880年5月，叶祖珪、方伯谦、林永升、萨镇冰4人完成了学业，最后一批离开英国回国。在经过了3年刻苦学习后，叶祖珪得到的评价是“勤敏颖悟，历练甚精，堪胜管驾官之任。”

叶祖珪回国后，船政大臣黎兆棠等奏保免补本班以守备留闽补用。1881年5月22日，李鸿章致函黎兆棠，准备派叶祖珪担任即将从英国买回的炮舰的管带官。

7月，李鸿章从英国订造的第四批3艘炮舰来华，北洋留用两艘，分别被命名为“镇中”和“镇边”，由林永升和叶祖珪担任管带官。叶祖珪管带的“镇边”号炮舰与“镇中”号炮舰为同型舰，舰长125英尺，宽29英尺，吃水9.6英尺，排水量440吨，马力400匹，时速10海里，装有11英寸口径35吨前膛炮1门，12磅后膛炮2门，格林炮2门。

叶祖珪这位29岁的年轻舰长有着丰富的知识和充沛的精力，他以极高的热情投入到管理和训练中，毫无保留地向自己的部下们传授他在福州和英国学到的海军知识，希望他们尽量快、尽量多地掌握这些知识，提高技术和战术水平。叶祖珪在悉心教授各种海军专业知识的同时，还十分注意对部属进行精神教育，向他们讲述做人的道理和历代忠烈的事迹。

在叶祖珪的严格管理和精心训练下，“镇边”舰军容整齐，纪律严明，训练有素。担任北洋海军总查的英国海军军官琅威理对叶祖珪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称赞“镇边”舰的管理和训练是一流的，“为全军之冠”。

1882年7月，朝鲜发生“壬午之变”，北洋海军奉命派舰平乱。政变平息后，为加强对朝鲜局势的控制，清廷派舰前往朝鲜驻守。叶祖珪奉命率“镇边”舰赴朝，执行守备任务。因表现出色，叶祖珪以都司留闽补用，并赏戴花翎。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法国舰队扬言要北上直隶，威胁京津，北洋的形势紧张起来。北洋海军的“超勇”、“扬威”2巡洋舰和“威远”、“康济”2练习舰奉命前往旅顺驻防。“镇中”、“镇边”、“镇东”、“镇西”、“镇南”、“镇北”6艘炮舰则奉派前往大沽、北塘驻防。叶祖珪率“镇边”舰驻扎北塘。

这年年底，朝鲜再次发生政变，史称“甲申之变”。北洋海军奉命前往朝鲜平乱，叶祖珪率“镇边”舰参加了这次行动。

（二）

1887年2月，叶祖珪与邓世昌、林永升、邱宝仁等率400多名官兵前往英国和德国接收“致远”、“靖远”、“经远”和“来远”4舰。叶祖珪和邓世昌负责接带在英国订造的“靖远”舰和“致远”舰；林永升和邱宝仁则由英国转赴德国，负责接带在那里订造的“经远”舰和“来远”舰。

“靖远”舰与“致远”舰是同型舰，舰长250英尺，宽38英尺，吃水16英尺，排水量2300吨，马力5500匹，航速18节，是北洋海军中航速最快的巡洋舰。“靖远”舰装有210毫米前后主炮3门，150毫米炮2门，6磅炮8门，速射炮6门，另有鱼雷发射管4具。

叶祖珪等接舰回国后，受到清廷的嘉奖，叶祖珪赏捷勇巴图鲁勇号。

是年8月，台湾吕家望番社围攻卑南清军大营，台湾巡抚刘铭传急电北洋海军请援。叶祖珪奉命率“靖远”舰与“致远”舰一道，火速赶往台湾，协助台湾守军攻剿，事定后返回北洋。

北洋海军成军后，叶祖珪于1889年2月被李鸿章奏保，以花翎副将衔补用参将升署北洋海军中军右营副将，管带“靖远”号巡洋舰。

是年6月，叶祖珪率“靖远”舰参加了南北洋海军联合操巡，到达朝鲜、俄国港口。

11月底，叶祖珪又率“靖远”舰随舰队南下操巡。12月，“靖远”舰抵上海。随后，又奉命开赴台湾，与“致远”舰一道，协助刘铭传“剿番”。

1890年9月，叶祖珪率“靖远”舰随舰队东巡。10日晨，“靖远”舰与南洋海军的“南瑞”舰从俄国海参崴开回朝鲜元山。上午时，天气晴朗，并无异常。午后，天气突然恶化，风雨交加，入夜后更加猛烈。“靖远”舰在风浪中剧烈摇摆，被涌向山侧。结果，舰首轻微擦伤。叶祖珪立即组织官兵对军舰进行了修补，最终安全抵达了元山。

次年4月，俄国皇太子来华游历抵达香港，叶祖珪奉命率“靖远”舰与“致远”舰一起前往随护，经福州、上海前往武汉。5月，李鸿章等大阅海军，叶祖珪率舰参加了校阅。随后，他又率舰随队出访日本。

10月11日，清廷根据李鸿章的奏请，嘉奖办理海军有功人员，叶祖珪赏换钦纳巴图鲁勇号。

1892年7月，丁汝昌率“定远”、“镇远”、“致远”、“靖远”、“来远”、“威远”6舰访问日本。

抵达长崎后，叶祖珪奉命率“靖远”舰与“来远”舰一起前往元山、穆湖崴、海参崴一带操巡。

1893年4月，朝鲜东学党人进入汉城，要求朝鲜国王下令驱逐日本人，再次引发政治风波。驻朝鲜的袁世凯电请李鸿章派舰前来，帮助恢复局势。李鸿章于6日命“靖远”、“来远”2舰前往朝鲜仁川驻守。

1894年3月，朝鲜开化党领袖金玉均在上海租界的旅馆中被朝鲜政府派遣的杀手洪钟宇刺杀。事件发生后，李鸿章应朝鲜政府的要求，派“靖远”舰和“威远”舰于4月2日将洪钟宇和金玉均的尸体送往朝鲜。

不久，朝鲜爆发了东学党人起义，清廷应朝鲜政府的邀请，派

出海陆军赴朝，帮助镇压起义。日本也乘机派兵赴朝，准备对中国开战。

日本自从在“壬午之变”和“甲申之变”中受挫后，一直在寻找机会，准备与中国再度较量。日本加紧扩军备战，却没有引起清廷的充分重视，北洋海军的建设也因经费不足而停滞不前。叶祖珪对局势深感忧虑，每次论及日本咄咄逼人的扩张威胁，他都慷慨激昂，忧愤之情溢于言表。日本海陆军借镇压东学党人之机大批开进朝鲜后，战争形势日益明朗。叶祖珪“知日本叵测，请先发制之，上书千余言，痛陈利害”。但是，他的建议没有得到认真的对待。李鸿章深信日本不敢轻易挑起战争，所以要求保持克制，以免为日本发动战争提供口实。

7月25日，日本舰队不宣而战，在丰岛海面袭击了中国的运兵船队，终于挑起了战争。8月1日，清廷不得不正式对日宣战。

战争爆发后，叶祖珪率“靖远”舰数次跟随舰队出海搜寻日舰，决心洗雪丰岛之耻。

9月17日，北洋海军护送援朝陆军在大东沟登陆，与日本海军联合舰队不期而遇，爆发了大东沟海战。叶祖珪率“靖远”舰参加了这场震惊中外的大海战。

（三）

海战开始后，“靖远”舰列于北洋海军“人”字形战阵的左翼，右前侧是旗舰“定远”号，左后侧是“致远”舰。12时50分，战斗打响，日本海军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的“吉野”、“高千穗”、“秋津洲”、“浪速”4舰掠过北洋海军“人”字阵的正前方，向其右翼阵后迂回，攻击力量最弱的“超勇”、“扬威”2舰。3分钟后，日本海军联合舰队本队的“松岛”、“千代田”、“严岛”、“桥立”、“比睿”、“扶桑”6舰驶至北洋海军战阵的正前方，双方随即展开了激烈的炮战。

日本海军联合舰队的本队6舰成“一”字纵阵且战且进，向北

洋海军“人”字阵右翼迂回。航速只有 13 节的“比睿”号巡洋舰被远远地甩在了后面。为了追赶本队的其他 5 舰，“比睿”舰不得已向右急转，冒险驶入北洋海军战阵，企图从“定远”舰和“靖远”舰之间冲过去。

叶祖珪见“比睿”舰疾驶而来，立即指挥“靖远”舰集中火力猛攻。“定远”等舰也向“比睿”舰发起攻击。“比睿”舰在“靖远”等舰的围攻下，连连中弹，损失惨重。叶祖珪为避免打伤己方战舰，下令停止炮击。他指挥“靖远”舰向“比睿”舰冲去，准备将其俘获，携带步枪的突击队员也站在了甲板上。“比睿”舰见形势不妙，集中炮火猛烈射击，在短短 5 分钟内连续发射了 1500 多发炮弹。“靖远”舰在“比睿”舰强大炮火的拦击下，无法靠近。正当“比睿”舰全力与“靖远”舰对峙的时候，“定远”舰从“比睿”舰的右后方发炮将其击中，305 毫米炮弹击毁了“比睿”舰下甲板后部，舰上 19 人被炸得粉碎，军舰燃起了熊熊大火。“比睿”舰无力再战，挂出“本舰火灾，退出战列”的信号，慌忙向南驶逃。

北洋海军由于在开战之初即已失去了指挥，虽然给日本舰队以重创，但被日本舰队分割包围，处境困难，损失惨重。开战不久，“超勇”舰被日舰击沉，“扬威”舰受重伤，撤出战阵自救，最后搁浅焚毁。不久，“定远”舰受伤，“致远”舰和“经远”舰先后战沉，“广甲”舰逃走，“济远”舰脱离战场，驶回旅顺。从大东沟赶来参战的“平远”号和“广丙”号巡洋舰也受伤，驶离战场自救。战至下午 3 点多钟时，北洋海军只剩下“定远”、“镇远”和“靖远”、“来远”4 舰仍在坚持战斗。

日本海军联合舰队的 12 艘战舰还余下 9 艘，“比睿”、“赤城”、“西京丸”3 艘弱舰受伤后退出战斗。本队的“松岛”、“千代田”、“严岛”、“桥立”、“扶桑”5 舰围攻“定远”、“镇远”2 舰；第一游击队的“吉野”、“高千穗”、“秋津洲”、“浪速”4 舰则围攻“靖远”、“来远”2 舰。

叶祖珪指挥“靖远”舰与“来远”舰密切协作，相互配合，顽强抵抗号称“帝国精锐”的“吉野”等4舰。“来远”舰与战沉的“经远”舰是同型舰，同为德国伏尔铿厂制造，是北洋海军中吨位仅次于“定远”、“镇远”2艘铁甲舰的巡洋舰，为2900吨。战斗开始时，“来远”舰列于“人”字阵的右翼，在“镇远”舰的右侧。“靖远”舰则列于“人”字阵的左翼，在“定远”舰的左侧。两舰因紧靠“定远”、“镇远”舰，受到掩护，所以面临的形势不如其他几艘远离主力铁甲舰的巡洋舰险恶，这也是两舰得以一直坚持的一个重要原因。

“靖远”、“来远”2舰虽然不是同型舰，但在混战中临时结为姊妹舰，互相支援。2舰在第一游击队“吉野”等4舰的疯狂围攻下，中弹累累。其中，“来远”舰中弹200多颗，舰上燃起大火，损失严重。“靖远”舰中弹100多颗，海水也涌入舰中。

叶祖珪见形势危急，如果继续与日舰硬拼，后果不堪设想。他果断地向“来远”舰发出了向西航行的信号，以摆脱日舰的围攻，争取时间救火堵漏。“来远”舰看到“靖远”舰发出的信号后，立即西驶，“靖远”舰也随后向西撤退。

“靖远”、“来远”2舰且战且走，退到大鹿岛附近，抢占有利地势，背靠浅滩，以舰首炮回击追击而来的“吉野”等4舰。“吉野”等舰害怕搁浅，不敢过分抵近攻击，只能远远地开炮。“靖远”舰和“来远”舰乘日舰攻击渐缓之机，抓紧扑灭舰上大火，修补军舰。

日本舰队旗舰“松岛”号巡洋舰等本队5舰围攻“定远”、“镇远”2舰，不仅没有占到多少便宜，反而被2舰重创，渐渐抵挡不住。于是，“松岛”舰发出了“各舰随意行动”的信号，日舰随即向南退去。“定远”、“镇远”2舰随后追击，日舰见一时无法摆脱，回头再战。

5时许，“靖远”、“来远”2舰经紧急抢修后，已脱离了险情。叶祖珪率“靖远”舰与“来远”舰一起，寻找“定远”、“镇远”2舰，与其会合。叶祖珪判断“定远”舰受伤已无法指挥，当时，在各舰舰长中

除林泰曾、刘步蟾和牺牲的邓世昌外，叶祖珪是职位最高的一位。于是，他在“定远”、“镇远”2 舰危急之时，毅然下令升旗集队，代替指挥。

在附近的“来远”、“平远”、“广丙”3 巡洋舰及“福龙”、左一鱼雷艇和在港内的“镇南”、“镇中”2 炮舰及右二、右三鱼雷艇等舰艇，见“靖远”舰升旗集队，都前来会合，重新列阵迎敌。

日本舰队见北洋海军声势复振，形势对己不利，加之天色渐黑，害怕遭到鱼雷艇的袭击，于是全速撤离。北洋海军尾追数里，因速力不敌日舰，无法追及，返航回旅顺。

（四）

大东沟海战结束后，“靖远”舰与“定远”、“镇远”、“济远”、“来远”、“平远”等舰在旅顺入坞修理。“靖远”舰因受伤相对较轻，不久便修竣。“定远”等舰未及修竣便因形势紧迫，不得不带伤与“靖远”舰一同返回威海。

1895 年 1 月，日军从海上和陆上向威海发动攻势，准备全歼北洋海军。叶祖珪率“靖远”舰参加了保卫威海的作战。

1 月 30 日凌晨，日本陆军右纵队分两路向威海南帮炮台群发起总攻，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则从海上予以炮火支援。

叶祖珪指挥“靖远”舰与其他战舰一道，配合各炮台，支援陆上守军。“靖远”舰率 2 艘炮舰和几只鱼雷艇驶近南帮迎击日军，毙敌数十人。

战前，叶祖珪就担心南北帮炮台一旦不守，大炮恐被日军用来攻击港内的北洋海军，那将十分危险。所以，他建议将各台大炮撤至黄岛。丁汝昌也有类似的担心，主张预先作好准备，一旦炮台不守，即将其炸毁。但他们的意见遭到陆上守将的反对，认为是临敌胆怯。不幸的是，经过一天的激战，南帮炮台群终于失守。虽然丁汝昌派出的敢死队炸毁了南帮最大的皂埠嘴炮台，但是龙庙嘴炮

台和鹿角嘴炮台失守后，被日军用来攻击北洋海军，威胁极大。

2月2日，日军左路纵队向北帮炮台群发动进攻。此前，守台清军大多溃散。丁汝昌见炮台不守，命“靖远”等舰将部分炮械运至黄岛，其余大炮、弹药等悉数炸毁，日军只得到了一座空台。

经过几天激战，威海陆路全部被日军占领。日军从陆地和海上将刘公岛团团包围，向北洋海军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猛烈进攻。

北洋海军虽然处境困难，仍奋力抵抗，顶住了日军的进攻。日本舰队在海上正面进攻屡屡受挫后，改变战术，派出鱼雷艇队潜入港内，利用夜暗的掩护，偷袭北洋各舰。

2月5日凌晨，日军鱼雷艇将“定远”舰击成重伤。次日，日军鱼雷艇又将“来远”、“威远”2舰和“宝筏”船击沉。当天下午，日本舰队发动了猛烈的进攻，想乘北洋海军实力严重受损之机，一举将其歼灭。陆上的日军也调集快炮，配合海上的进攻。

叶祖珪率“靖远”舰与“济远”、“平远”、“广丙”等巡洋舰一道，在丁汝昌的指挥下与黄岛炮台配合，反击北岸日军。其他炮舰与刘公岛、日岛等炮台配合，封锁了威海东、西两口。经过激烈战斗，日本舰队的进攻被击退。

2月7日，日本从海上和陆上向北洋海军发起了总攻。北洋海军鱼雷艇队惊慌失措，突围逃跑。结果，15艘艇船只有左一号鱼雷艇侥幸逃至烟台，其余有的被击沉，有的搁浅被俘。北洋海军虽然在这天的战斗中顽强地顶住了日军的进攻，但实力被严重削弱。

次日，日军继续进攻。叶祖珪指挥“靖远”舰奋勇反击。战斗进行得非常激烈，“靖远”舰官兵伤亡40余人。

“定远”舰损失后，丁汝昌把指挥部移至“镇远”舰。由于“镇远”舰受伤，加之舰大吃水深，行动不灵便，丁汝昌多数时间在“靖远”舰上指挥作战，“靖远”舰实际成为北洋海军的临时旗舰。

9日，日军从海上和陆上发动了更加猛烈的进攻。上午8时，日本海军联合舰队第三游击队的“天龙”、“大和”、“武藏”、“海门”、

“葛城”5 舰驶近刘公岛东泓炮台进行猛烈炮击。第一游击队的“吉野”、“高千穗”、“秋津洲”3 舰，加上本队的“千代田”舰，则在威海港东口海面担任警戒。战至 10 时，日军第二游击队的“扶桑”、“比睿”、“金刚”、“高雄”4 舰，也参加了进攻。在日本舰队从海上进攻的同时，日军也从陆上发动猛烈炮击，配合海上的进攻。

丁汝昌在“靖远”舰上，指挥“平远”舰及各炮舰驶至日岛附近，与日军展开激战，击伤 2 艘日舰，击毁鹿角嘴炮台大炮 1 门。战至中午时分，由日军内田海军大尉指挥的鹿角嘴炮台发射的 2 发炮弹，击中了“靖远”舰，舰上官兵伤亡多人，血肉横飞。炮弹击破左舷，穿过了铁甲板，又穿过了右舷舰首，海水涌入舰中。叶祖珪和丁汝昌见“靖远”舰受重伤，下令军舰逼近鹿角嘴炮台，“欲肉搏该台”，与敌同归于尽。但军舰驶至距敌 5000 米时，舰首开始缓慢地沉入水中。叶祖珪与在舰上指挥的丁汝昌决心与战舰共沉，不肯离舰，但被舰上水手救上前来救护的小轮船。

“靖远”舰损失后，北洋海军的抵抗力量进一步削弱。在日军越来越猛烈的攻击下，北洋海军渐渐难以支持。

“靖远”舰中弹的当天，丁汝昌命令“广丙”舰用鱼雷将已搁浅的“靖远”舰击毁，以免被日军打捞。与此同时，搁浅的“定远”舰也被下令炸毁。

“靖远”舰沉毁，叶祖珪心中十分悲痛。他亲手从英国阿姆斯特朗厂接收下这艘巡洋舰，并亲自驾驶来华，远涉重洋，历经艰险。此后，他与“靖远”舰朝夕相伴 7 年多，有着很深的感情。

战后，叶祖珪一直保存着一把他在“靖远”舰使用过的茶匙，匙柄上有用英文铸的“大清帝国海军靖远”(The Imperial Chinese Navy Ching Yuan)的字样。他常对家人说：“每当看到这把茶匙，就好象‘靖远’还在我身边。”后来，这把茶匙由他的后人捐献给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

丁汝昌下令炸毁“靖远”舰和“定远”舰两天后，在援军无望的

情况下，服毒自杀。威海水师营务处提调牛昶昞等假借丁汝昌的名义向日军投降。2月17日，日军占领刘公岛，北洋海军全军覆没。叶祖珪等北洋海军将领乘坐被日军解除武装的“康济”号练习舰前往烟台。不久，清廷将北洋海军将领一并革职，听候查办。随后，清廷正式下令撤销了北洋海军的编制。

（五）

甲午战争后不久，清廷为加强虚弱的海防，开始缓慢地恢复北洋海军。

战后，北洋只剩下“康济”号练习舰。1895年9月，北洋从福州船政局购置的“通济”号练习舰、从英国阿姆斯特朗厂订购的“飞霆”号驱逐舰和从德国伏尔铿厂订购的“飞鹰”号驱逐舰，相继驶来北洋。另外，福州船政局1869年制成的“湄云”号炮舰也划归北洋，改为运兵船。

次年，清廷向德国订购了3艘巡洋舰，分别命名为“海容”、“海筹”、“海琛”。这3艘军舰分别在1898年7月至9月间来到北洋。同年，在德国实硕厂订购的“海龙”、“海青”、“海华”、“海犀”4艘鱼雷艇也建成驶来北洋。

经过两年的努力，重整北洋海军的工作有了一定的基础。此时，清廷急需海军人才，开始陆续启用甲午战后被罢遣的部分海军将领。叶祖珪和萨镇冰成为最早被清廷重新启用的原北洋海军的高级将领。

叶祖珪被革职后，留在天津。经大学士荣禄举荐，西太后于1899年4月17日召见了叶祖珪和萨镇冰，详细听取了有关北洋海军重建的意见。当天，清廷发布上谕，开复叶祖珪革职处分，赏加提督衔，任命他为北洋海军统领，指挥北洋现有各舰。同时，任命总兵衔补用参将萨镇冰为帮统领。叶祖珪和萨镇冰负责挑选和配备各舰官兵，并督率训练。

叶祖珪上任时，正值意大利派舰来华恫吓，企图借德、法、英等国掀起的瓜分中国沿海港湾的狂潮，强租我三门湾。清廷拒绝答应意大利的无理要求，命沿海沿江加强戒备。叶祖珪向朝廷进言，表示北洋海军已有足够的实力与意舰一战。清廷得到海军的保证，态度更加坚决。随后，为加强南洋海防，叶祖珪奉命南下，与南洋海军协同防守。最后，色厉内荏的意大利不得不放弃了强租三门湾的要求。

1899年夏天，清廷在英国阿姆斯特朗厂订购的“海天”、“海圻”号巡洋舰驶抵大沽。这两艘4300吨的巡洋舰是北洋海军仅次于当年“定远”、“镇远”舰的大舰。它们的到来，大大增强了北洋海军的实力。

由于北洋良港多被列强瓜分，北洋海军只得泊于大沽口，设统领衙门于天津紫竹林。

1900年，义和团运动高涨，英、德、俄、法、美、日、意、奥8国组成联军进行武装干涉。6月17日，八国联军进攻大沽炮台。当时，叶祖珪乘“海容”舰前往天津公干，萨镇冰率北洋其他各舰在山东登州一带操巡，“海龙”、“海青”、“海犀”、“海华”4艘鱼雷艇则在大沽修配机件。战前，叶祖珪令“海龙”等4艇速驶山东归队。但4艇未及行动，即被联军俘获。“海容”舰也被困住。

1901年，清廷与11国签订了空前屈辱的《辛丑条约》。当时，有的议和大臣主张，为向列强表示中国永不再战的诚意，应将“海天”、“海圻”、“海容”、“海筹”、“海琛”5艘巡洋舰撤售，退还给英、德两国。叶祖珪得知后，据理力争，最终保住了5舰。是年11月，叶祖珪又奉命与俄国代表交涉，最终收回了被占用的大沽船坞。

由于政局动荡，清廷腐败无能，恢复海军举步维艰。但叶祖珪仍以极大的热情和精力，为北洋海军的重整而努力。他多次南下视察，并与各督抚商讨加强海防的对策，从整顿沿海沿江各处炮台入手，增强海防基础，统筹建设各处炮台，使其与海军能联络一气，彼

此呼应。

叶祖珪还十分注意对海军官兵的培训，并亲自撰写了《旗灯通语》2册，绘制了《要隘地理图说》1卷，印发给部属学习。

由于北洋海军编制没有恢复，开复原官的北洋将领只能在南洋和广东的旧式水师中实授官缺。1903年，叶祖珪晋升为广东水师提督，经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奏请，仍留北洋差遣。

1905年1月，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周馥会同袁世凯，奏请由叶祖珪统一指挥南洋和北洋海军。上奏称：

现统北洋海军广东水师提督叶祖珪，本船政学堂出身，心精力果，资劳最深，拟将南洋各兵舰归并该提督统领。凡选派驾驶、管轮各官，修复练船，操练学生、水勇，皆归其一手调度，……即南洋水师学堂，上海船坞，兵舰餉械支应一切事宜，有与海军相关者，并准该提督考核，会商各局总办道员，切实整顿。

清廷批准了这个统一南北洋海军的方案，叶祖珪的海军生涯也达到了顶峰，成为权力空前的海军将领。随后，叶祖珪移驻上海，在高昌庙设立了办公机构，总理南北洋海军。

1904年到1905年，爆发了日俄战争。软弱的清廷无力阻止这场在中国进行的厮杀，宣布中立。俄国军舰战败后避入上海黄浦港，日舰也欲进港追击。一时间，上海“讹言繁兴，市日数惊”。叶祖珪与萨镇冰援引中立法，坚决拒绝日舰入港，并采取果断措施，将俄舰扣留，解除其武装，有力维护了中国的权益和尊严。

叶祖珪在沪对上海船坞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和整顿。上海船坞是六十年代由曾国藩奏请设立的，隶属于南洋制造军械局。后因经营不善，每年亏银20余万元。叶祖珪将其“改为商办，凡南北洋军舰及招商开平各船下至差遣小轮均归修理。由是积弊一空，岁省二十余万外且有盈余”。

叶祖珪在整顿上海船坞后，“即议定水师学堂章程及餉械支应

一切事宜，条理井然，规模宏整”。后人称，“论南北两军联络之功，率以祖珪为最”。

1905年夏，叶祖珪从江宁沿江南下，巡视各炮台和水雷营。由于公务繁忙，天气炎热，叶祖珪劳累中暑，又染上伤寒，急回沪救治。7月29日，壮志未酬的叶祖珪病逝于上海军次，时年54岁。

经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和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周馥联名奏请，清廷以军营立功后积劳病故例对叶祖珪从优赐恤，并诰授“振威将军”。

叶祖珪为人朴实诚恳，谦逊礼让，治军谨严，关心部属，虽身居高位，但不尚奢华。他以“人必有远志”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时时自励。甲午战后，他受命于危难，为中国海军的重整殚精竭虑，作出了重要贡献。

叶祖珪病逝后，其灵柩移归故里，于1907年11月26日正式下葬于福州西门梅亭群鹿山之阳。光绪皇帝钦赐祭文，称赞叶祖珪“性行纯良，才能称职”，对他鞠躬尽瘁，为国尽忠深表哀悼。

从役何须问苦甘

——记萨镇冰

萨镇冰是清末民初中国海军的一位著名将领。他早年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后奉派赴英国留学，为中国第一届海军留学生。1895年，他作为北洋海军管带参加了保卫威海的战斗，表现异常英勇。甲午战争后，萨镇冰历任北洋海军帮统、统领、南北洋海军总理、筹办海军大臣、海军提督、舰队统制等职，是战后中国海军重建的核心人物。民国建立后，萨镇冰东山再起，三次出任海军总长，并担任过代理国务总理和福建省长等职。萨镇冰执掌海军多年，无论在清朝末年还是在民国初年，他都是一位颇具影响的人物。

（一）

萨镇冰，字鼎铭，1859年3月30日生于福建侯官（今福州）。其先世萨拉布哈为西域回回族，元时称色目人。萨拉布哈辅佐元世祖忽必烈创业，深受赏识，执掌兵权。萨拉布哈之子阿鲁赤定居雁门（今山西代县），所以，萨镇冰的原籍为雁门。阿鲁赤的长子萨都刺是元朝著名的诗人，赐姓萨，遂为萨氏家族受姓的开始。阿鲁赤的次子萨天与之子萨仲礼定居福建，成为萨氏家族定居福建的始祖。萨镇冰是萨天与的第十六世孙。

萨氏家族是福建的望族，但到了萨镇冰的祖父时，家境开始败落。萨镇冰的父亲萨怡臣是位秀才，在家中以教书为生。

萨镇冰7岁时，跟从名师王崧辰学习。一年后，萨镇冰家因生活困难，无力缴纳房租，被迫迁往萨家祠堂去住。年幼的萨镇冰投

靠行医为生的族叔萨觉民，科举致仕的道路也中断了。

萨觉民是福州一位有名的中医，与同籍的沈葆楨交谊甚厚。沈葆楨主持福州船政后，萨觉民便向他推荐萨镇冰到福州船政学堂学习。1869年，只有10岁的萨镇冰成为福州船政学堂驾驶班第二期的学生。

萨镇冰天资聪颖，在学堂学习非常用功。1872年，萨镇冰结束了堂课学习。在這一期的13名毕业生中，他的成绩名列第一。

1873年，萨镇冰被派到“扬武”号轻巡洋舰上实习。刚刚走出校门的萨镇冰对舰上生活感到十分新奇，求知欲望非常强烈。管带和教官因为他年纪小，人又长得瘦小，身体单薄，对他是否有能力和体力去完成一些重要的工作表示怀疑。但萨镇冰总是用行动来证明自己的能力。他勤于学习，肯于吃苦，工作总是抢着干。他还经常和舰上的士兵们一起结绳、解缆、刷油漆、擦拭枪炮、划舢板，刻意磨练自己。

萨镇冰在舰上实习了一年后，被委派担任“海东云”号炮舰的二副。“海东云”舰是由一艘从外国商人手里买来的旧轮船改造而成的，用于沿海缉盗。萨镇冰因随舰剿灭海盗表现出色，记大功一次。

1875年，“扬武”号巡洋舰改为练习舰。萨镇冰随舰实习，先后到过新加坡、小吕宋、槟榔屿及日本各口，大大丰富了阅历。

1877年，萨镇冰被选派为第一届海军留学生，赴英留学。10月，他与严宗光、林永升、叶祖珪等6人，考入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萨镇冰后来回忆这段时间的学习生活时说：

我对于所学各科知识格外重视。同时于课余时间细察当地人民的思想、风俗习惯、对华人之批判，以为将来回国服务时之借鉴。即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所学习的虽是驾驶，但是对于轮机和制造也稍有涉猎。学习始终是勤奋而紧张的。

1878年8月，萨镇冰被派上英国地中海舰队的“莫纳克”号军舰上实习。不久，又转上“恩延甫”号军舰。第二年秋，萨镇冰等结束了舰上课程。接着，英、美两国的教官又为他们讲授了炮垒军火及水雷电气诸学。

1880年5月，萨镇冰与方伯谦、林永升、叶祖珪结束留学生活，最后一批回国。

萨镇冰回国后，于1881年被分往南洋海军，担任“澄庆”号炮舰的大副。次年，他被调往北洋海军，担任天津水师学堂的教习。

天津水师学堂是继福州船政学堂之后建立的又一所海军学校，1880年由李鸿章创办。与船政学堂不同的是，天津水师学堂不设造船专业，只设驾驶和管轮专业。所以，天津水师学堂是第一所单一的海军军官学校。以后建立的海军学校，多仿天津水师学堂之制。

萨镇冰在天津水师学堂负责为管轮专业的学生讲授普通学科的课程。在他的学生中，有一位叫黎元洪的，后来担任了中华民国的大总统。

萨镇冰在学堂授课非常认真，他还常常拿自己的东西如时表之类，奖励那些学习好的学生。

学堂的工作和生活轻松、舒适，不像在舰上那样紧张、艰苦。但萨镇冰却从不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他常说：“军人不能贪图安逸，在岸上应和在海上一样。”萨镇冰睡觉的床是一张特制的又小又窄的木床，和他在舰上用的床一样。

1886年，萨镇冰被任命为“威远”舰管带。第二年，他又转任“康济”舰管带。

“康济”舰是福州船政局制造的第3号铁肋船，1879年7月建成下水，排水量与“威远”舰相同，都是1268吨，马力为750匹，航速12节。1889年，该舰改造为练习舰。

萨镇冰曾先后率舰前往台湾参加剿办卑南叛番和前往朝鲜执

行防护任务,并多次受到朝廷的嘉奖。但是,萨镇冰也有过一些失误,这影响了他的升迁。萨镇冰后来回忆说:

我在海军服务过程中,被上司记过两回过。第一次是在长江,我带那艘小炮艇在没人航行过的航线上试航。我自以为驾驶已较精通了,可以大胆尝试一下。谁知不到半个钟头,艇就搁了浅。第二次也是在长江,我想用学航海时学过的,不用机器,只用帆和蓬,用硬舵来驾驶,船又搁了浅。此后,我再也不敢冒险从事了。我非常羡慕碰快船和铁甲舰,渴望自己也有机会去带那些船。可是我这满腔的热望便被这两次过失所粉碎了。更遗憾的是因此使我没能参加甲午海战。

1889年,第一艘国产装甲巡洋舰“平远”号建成时,船政大臣曾有意让萨镇冰管带。但李鸿章有些不放心的,萨镇冰最终未能如愿。甲午战争爆发后,“康济”舰因航速较慢,一直被留在威海。萨镇冰因此没能参加1894年9月17日的大东沟海战。

1895年1月,日军大举进攻威海。为加强威海港的防守,萨镇冰奉丁汝昌之命,率“康济”舰上的30名水兵守卫日岛炮台。

日岛是一座礁石岛,面积约14亩,岛上炮台设有200毫米口径地阱炮2门,其他炮6门。威海保卫战开始后,萨镇冰指挥岛上守台官兵奋勇抗击日军从海上和陆上发起的猛烈进攻。香港《孖刺新闻》战地记者肯宁威记录下了当时的情形:

守着这岛的,有三位西洋人,四十名步兵,二十五名水兵。后来,因为那些步兵没有用,萨管带(镇冰)带领了三十名水兵来守这炮台。他在这岛被攻时非常的奋勇,虽然冒着不绝的炮火,他亲自把守着速射炮。从战争开始到停止,日岛当着南岸三炮台的炮火。地阱炮升起来后,更成了那三炮台的目标。这些炮并没有附着镜子,所以升炮的人一定要到炮台上面去,结果这人立刻受对方炮击,这

是很危险的职责。可是那些年轻的水兵仍旧坚守着这些炮，奋勇发放。

2月7日，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在陆路炮火的支援下，向刘公岛发起了总攻，想一举全歼北洋海军。

日本舰队以第二、第三和第四游击队的14艘军舰为左军，炮击日岛；以本队和第一游击队的8艘军舰为右军，攻击刘公岛。

这天的战斗异常激烈，整个日岛都被硝烟笼罩。萨镇冰指挥守台官兵与刘公岛炮台配合，反击日军的进攻。激战中，日岛炮台的弹药库被敌舰击中，引起剧烈爆炸。一门地阱炮也被击毁，仆卧在地，影响了另一门地阱炮的发射。萨镇冰见日岛无法再战，便向旗舰发出了请求撤离的信号。

丁汝昌见日岛已不能再守，便下达了撤退命令。8日，萨镇冰率守台官兵撤至刘公岛。

萨镇冰率军战斗到最后一刻，直至接到命令后才放弃阵地的作法，受到人们的称赞。他被视为服从命令、严守军纪的典范。洋员泰莱在他的《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中也称赞说：“其他海军炮台之守将不待命令，不须请训，而径遁矣。惟萨君行事，恒求不逾规矩。”

刘公岛陷落后，日军只允许北洋海军保留“康济”舰，并将其武器拆除，用于运送阵亡军官的灵柩和岛上官兵等。萨镇冰随舰离开刘公岛，抵达烟台。不久，他因病去职，改由程璧光接任“康济”舰管带。

（二）

战后，萨镇冰回到福建家中，当时，他只有36岁，正是大有作为的年龄，却终日无所事事。所以，精神颇感压抑，郁郁寡欢。

萨镇冰18岁时结婚，与夫人陈氏感情甚笃，育有一子一女。萨镇冰回乡后不久，陈氏不幸于9月11日病逝，他心中十分悲痛，情

绪低落到了极点。此后，萨镇冰终生未再娶。由于为官清廉，萨镇冰平素积蓄无多，回乡后家境窘困，生活十分清苦。后来，他应聘为福州缙绅子弟教授西学，以此聊补生计。

不久，萨镇冰的生活出现了转机。1895年11月，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创建“自强军”，并着手整顿海防，将江南炮台分为四路，即吴淞口、江阴、镇江和金陵。1896年，张之洞起用萨镇冰担任吴淞炮台总台官。萨镇冰因此由海军转入了陆军。不久，他又被张之洞推荐给继任的刘坤一，兼任“自强军”的帮统带。

甲午战后，为加强北洋海防，清廷开始重建北洋海军，先后购买和调派了一些军舰到北洋。1895年9月，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王文韶奏请将福州船政局刚刚建成的“建靖”号轮船由北洋购置，改造为练习舰，更名“通济”，得到了清廷的批准。与此同时，清廷又将福州船政局1869年生产的旧炮舰“湄云”号改为运输舰，划归北洋。不久，清廷在1894年分别向英、德两国订购的“飞霆”号和“飞鹰”号驱逐舰也于1895年相继来到北洋，北洋海军重建开始有了一点基础。

1898年，萨镇冰在当了几年陆军军官后，又重新回到了海军，担任“通济”号练习舰的管带，干起了他的老本行。“通济”舰于1895年4月建成下水，原是一艘运粮船，长252.7尺，宽34.1尺，吃水16尺，载重1900吨，马力1600匹。后由原“平远”舰管带李和监修，将其改造为练习舰。

萨镇冰担任“通济”舰管带不久，他的同乡、总理衙门章京郑孝胥便上书保举他。郑孝胥在上奏中说，萨镇冰“在英国日，已为英国海军提督所激赏，称其坚忍勤能，堪胜将帅之任”。担任吴淞炮台官后，萨镇冰“于所管之事，一毫不肯苟且，凡应办者，公费不足，辄以薪水继之”。萨镇冰“本习水师，及到自卫（自强）军后，复习陆战，其精进勤学，非寻常所及。”郑孝胥认为，萨镇冰不仅精通海军兼习陆战，而且“操守第一，勤能忠贞亦罕有其匹”。

郑孝胥的保奏,引起了清廷的重视。9月21日,清廷谕称: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候补道郑孝胥奏保现充北洋“通济”练船管带官参将萨镇冰,练习海军兼习陆战,历年管驾兵轮,痛除积习,操行尤属可信等语。该参将才具操守究竟如何,著荣禄详细察看,据实具奏。

由于从德国订购的“海容”、“海筹”、“海琛”3艘巡洋舰相继来华,从英国订购的“海天”、“海圻”2艘巡洋舰也将不久来华,北洋海军的重建急需一批经验丰富的海军人才。在执掌兵权的荣禄的考察和推荐下,西太后在1899年4月17日召见了叶祖珪和萨镇冰,询问了海军建设的有关问题。同日,清廷谕令开复叶祖珪革职处分,赏加提督衔,任北洋海军统领;萨镇冰赏加总兵衔,为帮统。

1899年,清廷向英国订造的“海天”和“海圻”2艘巡洋舰建成来华,萨镇冰兼任“海圻”舰管带。

“海圻”和“海天”2舰是清廷1896年向英国阿姆斯特朗厂订购的2艘同型舰,每舰造价为32.8242万英镑。“海圻”和“海天”2舰属二等巡洋舰,舰长424英尺,宽46英尺8英寸,吃水20英尺,排水量4300吨,马力1.7万匹,时速24节;装备有8英寸阿姆斯特朗炮2门,4.7英寸阿式炮10门,47毫米阿式炮12门,37毫米阿式炮4门,7毫米马克沁机枪6门,鱼雷发射管5具。“海圻”、“海天”2舰是清代海军中排水量仅次于“定远”、“镇远”(7335吨)的大舰。1904年,“海天”舰触礁损毁,“海圻”舰成为中国海军中最大的军舰,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后该舰自行沉毁为止。

萨镇冰出任“海圻”舰管带,实现了自己多年的夙愿。他对战舰十分爱护,常常自己拿钱维修和保养舰上的一些设施。他常说:“人家做船主(舰长)都打金镯子送给太太戴,我的金镯子是戴在我的船上。”有一次进行打靶训练时,舰上的一位枪炮副不慎把一门价值两万金的舷炮的炮膛划伤一道痕,萨镇冰得知后,主动拿出自己的月饷来赔偿这一损失。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知悉此事,对

萨镇冰非常赞许，立即寄款给他，代为赔偿。

1903年3月，袁世凯上奏朝廷，称赞萨镇冰“游历外洋，学问优长，驾驶娴熟，志趣刚正，操守洁清，胆略过人，能任艰巨。……取下虽严而素得军心，人咸畏服”。认为他“贤能卓著，实为海军中杰出之将才”，请朝廷予以破格擢升。

7月28日，清廷任命萨镇冰为广东南澳镇总兵。8月18日，袁世凯上奏称：

目前渤海门户洞开，兼以东陲未靖，尚赖舰队往来巡弋，藉壮声威。现在海军将才缺乏，该总兵谋略夙优，中外引以为重。交涉巡防均关紧要，未便遽易生手。合无仰恳天恩，俯念北洋防务至重，准将总兵萨镇冰暂缓赴任，仍留海军统带各船，俾资得力。

清廷同意了袁世凯的请求，萨镇冰得以提升后继续留在北洋海军任职。

由于天津水师学堂毁于1900年八国联军之役，北洋海军失去了培养人才的基地。萨镇冰于1903年冬选址烟台筹建新的海军学校，称为“烟台海军学堂”，由烟台海军练营管带谢葆璋任首任监督（校长）。谢葆璋是现代著名作家冰心的父亲，与萨镇冰是同乡且有师生之谊，曾任“海圻”舰帮带。在萨镇冰的关心、支持下，经谢葆璋苦心经营，烟台海军学堂很快发展成为一所著名的海军学校。

从1903年开始，萨镇冰就替叶祖珪代统北洋海军。叶祖珪前往上海总理南北洋海军后，萨镇冰被任命为北洋海军统领。1905年5月16日，清廷发布命令，以萨镇冰为广东水师提督，仍留北洋。叶祖珪在上海病逝后，萨镇冰又受命总理南北洋海军，成为海军中地位最高的将领。

（三）

八国联军之役后，中国海军的重建工作停顿下来。1906年，随

着清廷“预备立宪”的进行，海军复兴又被提上了日程。次年6月，清廷于陆军部内设海军处，下设机要、运筹、船政3个司，负责海军的重建工作。是年夏天，萨镇冰应召入京，专门商讨有关海军重建问题。

1908年11月14、15日，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3岁的溥仪继承皇位，年号宣统，溥仪的父亲、醇亲王载沣为摄政王。为维护风雨飘摇的专制统治，以载沣为首的年轻皇族贵胄们，加紧控制国家的军政大权，并着力加强陆军力量。

1909年2月，清廷谕令萨镇冰与肃亲王善耆、度支部尚书镇国公载泽、陆军部尚书铁良，妥慎筹划，先立海军基础。7月15日，清廷命郡王衔贝勒载洵和萨镇冰为筹办海军大臣。接着，正式成立了筹办海军事务处，统一负责海军建设。清廷决定由度支部筹措开办费700万两，各省每年分认海军经费500万两。

8月，南北洋海军统一整编为巡洋、长江两舰队。14日，清廷任命萨镇冰为海军提督。

8月25日，载洵、萨镇冰南下巡阅海防，视察了闽、粤等九省海防。9月3日，萨镇冰等还会同闽浙总督松涛、浙江巡抚增蕴举行了象山军港的辟港典礼。9月24日，萨镇冰一行返回北京。

10月，萨镇冰与载洵率队出访欧洲，考察各国海军。他们首先乘船抵达意大利，参观了各军港、船厂，订购了1艘1000吨级炮舰，名为“鲸波”号。接着，他们又前往奥匈帝国，在这里订购了1艘2000吨级特快驱逐舰，名为“龙湍”号。

随后，载洵、萨镇冰一行乘火车抵达德国首都柏林。他们受到德国政府的隆重欢迎，被安排在凯旋门前菩提树大街最高级的勃里斯特旅馆下榻。当身穿黄绫马褂、胸佩大绶勋章、拖着长长辫子的载洵等人到达旅馆走下马车时，他们的奇特模样引起围观者阵阵发笑。两位留德海军学生来旅馆看望萨镇冰时，他手执辫子，苦笑着对他们说：“你们看看，这时代我们还拖着这个尾巴，可笑不可

笑。”言下十分感慨。

载洵、萨镇冰等在德国参观了各船厂、炮厂，考察了德国海军各机构，并订购了3艘700吨级新式鱼雷舰，名为“同安”、“建康”、“豫章”。还订购了2艘400吨级钢甲平底炮艇，名为“江鲲”号和“江犀”号。

在德国考察十余天后，载洵、萨镇冰等前往英国。在英国，他们照例参观了各船厂、炮厂，并考察了皇家海军大学。最后，他们在英国订购了3000吨级巡洋舰2艘，名为“肇和”号、“应瑞”号。

次年1月，载洵、萨镇冰等结束了在欧洲的访问，乘火车经西伯利亚回国。

载洵、萨镇冰此次赴欧访问，还挑选了20多名海军学生前往英国留学，学习制造船舶。

载洵、萨镇冰等在意大利订购的“鲸波”舰和在奥匈帝国订购的“龙湫”舰后因故未能来华。在德国订购的“同安”、“建康”、“豫章”、“江鲲”、“江犀”5舰和在英国订购的“肇和”、“应瑞”2舰，建成后都陆续来华。

在英国访问期间，载洵、萨镇冰等考察了英国海军陆战部队。回国后，他们奏请朝廷批准，在烟台组建了中国海军的第一支陆战部队——海军警备队。

1910年8月，载洵、萨镇冰又率队前往美国和日本访问。在美国，他们参观了造船厂和机械厂，并订造了1艘3000吨级巡洋舰，名为“飞鸿”号，该舰后因故未交中国。在美国考察了一个月后，载洵、萨镇冰等乘船抵达日本东京，参观了日本的各造船厂和军械厂以及海军各机构。他们在日本订购了2艘780吨级炮舰，名为“永丰”号、“永翔”号。“永丰”舰即是后来著名的“中山”舰。11月，载洵、萨镇冰结束访问回国。

1910年12月4日，清廷将筹办海军事务处改为海军部，设海军大臣1员，品秩视尚书；设海军副大臣1员，品秩视侍郎。不久，

清廷任命载洵为海军大臣，原海军处参赞谭学衡为副大臣。24日，清廷任命萨镇冰为巡洋、长江两舰队统制，设统制处于上海高昌庙。萨镇冰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第一位海军总司令。

筹办海军事务处曾参照陆军军衔，制订了新的海军军衔制度，分为三等九级。即：正都统、副都统、协都统，正参领、副参领、协参领，正军校、副军校、协军校。都统相当于将官，参领相当于校官，军校相当于尉官。各级名称前皆冠以“海军”字样，以区别于陆军。1911年初，海军开始授衔。载洵一人被授予海军正都统，相当于海军上将；萨镇冰和谭学衡2人被授予海军副都统加正都统衔，相当于海军中将加上将衔。

海军大臣载洵是摄政王载沣的弟弟，小皇帝溥仪的六叔。这个纨绔子弟不及三十岁便被派来执掌海军，而他实际上对海军一窍不通。出巡闽、粤九省，访问欧、美、日，载洵只知吃喝玩乐，有关海军事务主要由萨镇冰具体负责。出访欧洲结束后，载洵遭革命党人刺杀，吓得赶紧向哥哥载沣提出辞职。虽然以后勉强当上了海军大臣，但海军他管不了，也不想管。所以，尽管清廷想让皇亲执掌海军，但实权却并不在他们手中。萨镇冰指挥着巡洋和长江两支舰队，大权在握，实际上控制着海军。好在萨镇冰为人正直谨慎，没有政治野心，又不是汉人。所以，清廷也还对他比较放心。

萨镇冰虽然身居高位，依然保持着朴素简单的生活习惯，不喜欢奢华，不讲究排场。当时，朝廷大员外出，都要身穿华丽的官服，乘坐8人抬的绿呢大轿，招摇过市，以显示地位和权势。而萨镇冰对此很看不惯，他经常在外出公干时把官服装在一个包袱里拎着，到了地方后换上，离开时再换下来。有一次，他参加筹办海军会议，筹办海军大臣载洵得知此事，散会后坚持要萨镇冰穿官服返回寓所，并命令用自己的轿子送他。萨镇冰无奈，只好同意。萨镇冰出门时，门口的差役等都吃了一惊，刚才还以为这个拎着包袱进门的人是哪位官员的仆从，原来竟是头品顶戴的海军大臣。

甲午战争以后，中国海军的重建，萨镇冰是功不可没的。无论是海军发展的规划，还是海军人才的培养、海军装备的购置等，萨镇冰都贡献多多。他凭借自己的经验、能力和几乎无可挑剔的品行，赢得了尊重和信赖，他的事业也如日中天。

（四）

正当萨镇冰致力于海军重建的时候，腐败的清王朝政治上已到了穷途末路，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席卷全国。1911年10月10日，革命党人发动了武昌起义，迅速占领了武汉三镇。

清廷得知武昌起义的消息后，立即派陆军大臣荫昌率北洋第一军赶往湖北镇压起义。同时，急电在上海的海军统制萨镇冰率海军主力战舰赴鄂，配合北洋军作战。

10月12日早晨6时许，在上海高昌庙统制部的萨镇冰接到了清廷发来的写有“亲译”字样的绝密电报。他亲自译出后，始知武汉发生了革命，清廷命他速带海军舰队前往攻剿。当时，海军的4艘主力巡洋舰都不在上海。其中，“海圻”舰由巡洋舰队统领程璧光率领，前往英国参加英王加冕典礼；“海容”、“海琛”2舰在山东附近海面作夏季演习；“海筹”舰则远在广东。留在上海的舰艇也多在船坞中修理，只有“楚有”号炮舰能够马上出发。于是，萨镇冰一面电令“海容”、“海琛”、“海筹”3舰迅速赶往武汉，一面亲率“楚有”舰驰赴前线。

15日，萨镇冰抵达汉口。随后，其他各舰陆续赶到。从18日开始，萨镇冰率舰配合北洋军，同革命军展开了激战。

海军的参战使革命军反击北洋军进攻的战斗连连受挫，北洋军在冯国璋的指挥下攻占了汉口。但是，由于革命风潮已席卷全国，清朝统治即将瓦解，海军将士也受到革命的影响，不愿再继续为清廷卖命。不久，驻沪和驻宁海军相继举行起义，加入了革命行列。在湖北前线的海军官兵也开始军心动摇。

革命党人认为萨镇冰率领的海军官兵不同于顽固的北洋军，是完全可以争取的力量。所以，他们一直在积极策动海军倒戈。早在萨镇冰率舰抵达汉口江面不久，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便派遣都督府海军顾问、原“建威”舰管带朱孝先带着他给萨镇冰的亲笔信前往拜谒。黎元洪是天津水师学堂管轮班的第一届毕业生，他想利用与萨镇冰的师生关系，劝说萨镇冰转向革命。萨镇冰看了黎元洪写给他的策反信后，没有表态，也拒绝给黎元洪回信。

10月20日，黎元洪又请瑞典人柯斯乘坐挂有红十字旗帜的小火轮来到“楚有”舰上，转交了他给萨镇冰的一封长信。黎元洪在这封信中详细介绍了自己从反对革命到加入革命的过程，谈了自己对革命的认识和民众对革命的支持。他在信中写道：“谁无肝胆，谁无热诚，谁非黄帝子孙，岂肯甘作满族奴隶，而残害同胞耶？！……洪之所以能明此大义者，一系吾师平日训海之功。……刻下局势，只要吾师肯出，拯救四万万同胞，则义旗所至，山色改观。……洪非为私事干求函丈，实为四万万同胞请命。满汉存亡，系于师台一身。”

萨镇冰接到黎元洪的第二封信虽然仍以沉默作答，但他心中已有所震动。

在黎元洪写信给萨镇冰的同时，湖北军政府民政部长汤化龙也致信其弟、萨镇冰的副官汤芑铭，要他帮助说服萨镇冰。

海军各舰管带也收到了黎元洪的策反信，他们见清廷大势已去，思想开始动摇。下级军官和部分士兵受革命宣传影响，大多同情、支持革命，并开始秘密串连，准备起义。他们拒绝进攻革命军，开炮时故意把炮弹打到天上或水里。

由于萨镇冰在海军中有着很高的威望，他的态度直接影响着起义的成败。所以，在下层官兵积极进行起义准备的同时，汤芑铭等军官重点作萨镇冰的工作。萨镇冰原驻“楚有”号炮舰，后移至“海容”号巡洋舰。“海容”舰管带是满人，汤芑铭等怕萨镇冰受其影

响，便劝说他移驻到“江贞”号炮舰上，该舰管带杜锡珪支持海军起义。

由于沿岸革命党人的封锁，海军处境十分困难。英国为保证汉口租界的安全也反对海军进攻武汉。11月1日，重新复出的袁世凯到前线视察。次日夜，他在肖家湾车站会见了萨镇冰。萨镇冰向他报告了海军作战情况，并谈了海军面临的困境。此时，袁世凯为压清廷授予他更多的权力，不急于进攻革命军。因此，他对海军作战并不积极支持。

萨镇冰渐渐失去了信心，态度有所变化。11月7日，他在汤芑铭等人的劝说下，终于给黎元洪写了一封回信。萨镇冰在信中表示，他并不反对革命党人发动的起义，但对他们提出的建立民国的政治主张表示怀疑，认为不符合中国的实际。黎元洪接到萨镇冰的信，立即复函，指出民主共和乃是大势所趋，并再次吁请萨镇冰顺应潮流，率军起义。

具有名教气节和报恩思想的萨镇冰并不想背叛清廷，但他也不想逆潮流而动，继续进攻革命党人。他对配合北洋军作战，态度逐渐冷淡，只是派几只小舢板，由小火轮拖到岸边，放几排枪应付一下。

最后，陷入进退两难境地的萨镇冰，选择了一条折中的道路：离开舰队，让各舰自由行动。他这样做实际是默许了海军官兵的起义行动。

11月12日，萨镇冰同意“海容”、“海筹”、“海琛”3艘巡洋舰因长江水位下降离开阳逻锚地而东下，并指定“海筹”舰管带黄钟瑛为队长。当夜，萨镇冰以前往上海治病为借口，离开“江贞”舰。

萨镇冰先到九江，在英国领事馆住了一夜。然后化装成商人到了上海，接着经香港返回福州家中。

萨镇冰离开舰队后，各舰便相继宣布起义，转向革命。而清廷并不知道萨镇冰的政治态度已经发生了转变，还在11月16日宣

布由他接替载洵出任海军大臣。

（五）

1912年1月，中华民国成立。一个月后，宣统帝下诏退位，清朝统治正式结束。不久，袁世凯继孙中山之后，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开始了北洋政府统治时期。

民国建立后不久，萨镇冰又重新复出，于1912年担任吴淞商船学校校长。12月2日，担任副总统的黎元洪致电袁世凯，称萨镇冰有“暗中保全武昌维持革命之功”，请授予实官。8日，萨镇冰被授予海军上将军衔。

1913年8月，萨镇冰被委派督办淞沪水陆警察事宜。次年5月，他奉调入京，任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办事员，8月又兼任上海兵工厂总办。

1916年6月，袁世凯称帝失败而死，黎元洪继任大总统。8月，龙济光的振武军与李烈钧所部滇军发生战争。黎元洪任命萨镇冰为粤闽巡阅使，率海军前往查办。

1917年6月24日，萨镇冰出任海军部总长。几天后，张勋拥溥仪复辟，赶走了黎元洪。溥仪登位后，于7月2日任命萨镇冰为海军部尚书。

复辟丑剧只持续了十几天便收场了，总理段祺瑞又重新组阁，刘冠雄出任海军总长。7月15日，萨镇冰改任海疆巡阅使。12月20日，萨镇冰被免去海疆巡阅使职务，回到福州。第二年9月17日，萨镇冰再度被起用，担任福建清乡督办，负责清剿土匪，维持地方治安。

1919年11月，北洋政府改组，靳云鹏出任国务总理。12月3日，萨镇冰接替刘冠雄第二次出任海军总长。

1920年5月14日，靳云鹏辞去总理职务。大总统徐世昌命萨镇冰以海军总长兼代国务总理。

当时，北京政权完全由北洋军阀控制，以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和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为争夺政权而剑拔弩张。萨镇冰居间调解，并请奉系军阀张作霖出面帮助解决双方的矛盾，但未能成功。7月14日，终于爆发了直皖战争。经过几天激战，皖系大败，直系控制了北京政府。

8月9日，萨镇冰辞去代总理职务，仍由靳云鹏任国务总理。11日，萨镇冰辞去海军总长职务。但同一天，北洋政府又任命萨镇冰为海军总长，这是萨镇冰第三次担任这一海军最高职务。

1921年5月，靳云鹏内阁总辞职，萨镇冰也随之去职。此后，他再也没有在海军中担任什么实际职务。

1922年5月25日，萨镇冰被授予将军府肃威上将军。9月13日，大总统黎元洪派萨镇冰会办福建军务。两天后，又任命他为福建省长。萨镇冰担任福建省长近5年，直到1926年冬北伐军入闽。

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年近七旬的萨镇冰没有再担任实际官职。虽然海军部聘请他担任高等顾问，但只是挂名而已。

萨镇冰在家乡过着十分简朴的生活，他把主要精力用在了从事各种社会福利和慈善工作上。当地百姓对他十分敬重和爱戴，称他为“菩萨”。

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等因不满南京政府对日妥协的政策，联合各派力量，发动了“福建事变”，宣布成立“福建人民政府”。

萨镇冰积极参加了这一抗日反蒋活动。11月20日，各界在福州举行有十万人参加的“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萨镇冰在会上发表演讲说：“我们不是作官，是为老百姓服务，当以群众利益为先，个人利益为末。”

萨镇冰最初被聘为人民政府高等顾问，人民政府将福建划分为闽海、延建、兴泉、龙汀4省后，他又被任命为延建省省长，管辖16个县。由于形势迅速恶化，萨镇冰未及上任。

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后，南京政府立即调兵遣将进行镇压。海军部长杨树庄通过萨镇冰的侄孙、“楚泰”舰长萨师俊劝说萨镇冰乘军舰前往上海，认为福建人民政府将遭失败，萨镇冰留在福建会有杀身之祸。但萨镇冰拒绝乘军舰去上海，他说：“正义的事应当去做，纵使失败，也可以激励后人，总不至永远徒劳无益。”此后，萨镇冰又利用他的影响，使驻马尾的海军部队和机关不与人民政府为敌。

不久，在南京政府的围剿下，福建人民政府失败，十九路军被迫从福州撤退。萨镇冰亲往马尾联系，防止海军部队对十九路军采取敌对行动。在他的帮助下，十九路军全部渡过乌龙江，安全撤离福州。

恪守军人服从信条的萨镇冰，在政治上一向谨慎保守，尽力与中央政府保持一致。但在“福建事变”中，他的立场发生了转变，站在了政府的对立面。在全国抗日情绪日益高涨的形势下，具有强烈爱国意识并曾殊死抗击过日本侵略的萨镇冰，无论如何是不会赞同和支持政府采取坚持内战、对日妥协政策的。他通过参加福建人民政府、支持十九路军，公开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态度。

抗日战争爆发后，萨镇冰不顾年迈体衰，应福建省政府的请求，于1937年10月前往南洋，向华侨宣传抗日救国并募捐支持抗战。萨镇冰等人的南洋之行历时半载，受到华侨的热烈欢迎，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1939年，日军迫近福州。蒋介石担心前政界、军界要人被日本人挟持、利用，便派人劝说萨镇冰离开福州前往陪都重庆。是年秋，萨镇冰抵达重庆，由海军总司令部负责照顾。

在重庆住了几周后，萨镇冰获准去西安游历。在西安，时刻关心抗战形势的萨镇冰，萌生了去延安看一看的想法。有一天，他在西安通往延安的公路上散步，遇到一个驴夫，便向他打听到延安的路程及沿途住宿等情况，并且与驴夫商量，能否用驴车送他去延安

走走。驴夫对这个南方老头的要求感到奇怪，便问他去延安干什么。萨镇冰告诉他，自己只是想到那边去看看。最后，他和驴夫约定，第二天清早在他住的旅馆门口见面。

次日晨，萨镇冰轻装上了驴车，前往延安。不料，此事被西安当局发觉，急忙派车将萨镇冰追回。萨镇冰只走了十几里地便被追上，只得返回西安。西北军政长官朱绍良在会见萨镇冰时告诉他，蒋介石请他回重庆。萨镇冰想去延安的愿望没能实现，只好返回重庆。

（六）

抗战胜利后，萨镇冰于1946年2月返回福州。他耳闻目睹南京政府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种种灾难，对国民党的统治十分不满。他曾感慨地说：“这样的政府定难久存。”

福建解放前夕，南京政府代总统李宗仁经过福州时，前往佛教医院看望因患皮肤病住院的萨镇冰，转达蒋介石的意见，请萨镇冰乘飞机或军舰前往台湾。萨镇冰以年老有病为由，拒绝赴台。不久，福建省政府主席朱绍良奉蒋介石之命，再次要萨镇冰乘飞机去台湾。萨镇冰佯称重病住院，并让人转告赋闲在家的原海军总司令陈绍宽不要去台湾。他还写信给自己的儿子福均，嘱其勿去台湾。

萨镇冰积极拥护解放，并利用自己的影响帮助稳定福州的社会秩序。1949年9月，萨镇冰作为特邀代表被邀请赴京参加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但他因病住院未能成行。新中国成立后，萨镇冰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1950年，他又当选为福建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

萨镇冰晚年酷爱作诗，诗作辑有《客中吟草》、《古稀吟集》、《仁寿堂吟草》等。1951年春，虚岁93的萨镇冰写下《辛卯春日感怀》一诗，总结自己的一生。诗云：

虚度韶光九十三，于今多病始停骖。
忧民不暇消寒暑，从役何须问苦甘。
此日栖山成野老，昔时当国比奇男。
回思履险如夷处，差率心中有指南。

1952年4月10日，萨镇冰病逝于福建省立医院，享年93岁。

萨镇冰病逝后，成立了以陈毅为首的治丧委员会，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国家和军队领导人发来唁电，深表哀悼。毛泽东的唁电为：“萨镇冰先生因病逝世，无任悼念，特电致唁”。周恩来的唁电为：“惊悉萨镇冰先生逝世，谨致深切的哀悼”。19日上午8时，福州各界举行了隆重的公祭仪式。10时，萨镇冰的灵柩被安葬于福州西门外梅亭山。

萨镇冰九十寿诞的时候，曾有来祝寿的客人向他请教长寿之道。萨镇冰笑着回答了客人两个字：“不贪”。“不贪”，是萨镇冰长寿的秘诀，也是他一生为人、为官的真实写照。

尽力民国最多

——记黄钟瑛

1911年11月，奉派前往武汉镇压革命军的清海军主力舰队在九江宣布起义。此举加速了清廷的瓦解，有力推动了辛亥革命的发展。九江起义的领军人物便是当时担任“海筹”号巡洋舰舰长的黄钟瑛。后来，他因光复有功，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首任海军部总长和首任海军总司令，为民国的创建和巩固作出了积极贡献。孙中山赞誉他“尽力民国最多”，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海军将才。

（一）

黄钟瑛，原名良鏗，又名鏐，字赞侯，1869年10月24日生于福建闽县（今福州）。黄钟瑛的祖父黄景鼎是一位牛骨制品商，祖居福州南台茶亭铺，经营一家销售骨簪、角梳等骨制工艺品的杂货店。黄钟瑛的父亲黄河澄在1862年被当时的闽浙总督左宗棠举荐办团练，并保奖五品同知衔。

黄钟瑛六、七岁时，被送进附近的私塾读书。1882年，13岁的黄钟瑛考入福州船政学堂第十一期驾驶班，成为一名海军学生，开始了他的海军生涯。

黄钟瑛自幼丧母，兄长黄钟泮和嫂嫂帮助父亲担负起养育他的责任。黄钟瑛对父亲和兄嫂的感情很深，以孝悌闻名乡里，为人称道。黄钟瑛十几岁时，父亲不幸去世，还欠下一大笔债务。家庭的不幸和生活的重负，使黄钟瑛较早地感受到人世的艰辛。而生活的磨砺，也使得黄钟瑛在他那些无忧无虑的年轻伙伴中更显成熟

和老练。他沉默寡言，胸怀大志，将全部精力和兴趣都集中在了学习上，不分寒暑，刻苦攻读。

经过5年的堂课学习，黄钟瑛于1887年毕业，被派往舰队实习。他首先进入驻防江浙一带的南洋海军，在“靖远”舰上实习。“靖远”舰是福州船政局1872年制造的一艘木质小军舰，排水量只有572吨，1879年1月由两江总督沈葆楨调来南洋，驻防金陵。黄钟瑛在“靖远”舰上实习了一段时间后，又被派到当时实力最强的北洋海军，先在“威远”舰上实习，不久又转往北洋舰队的另一艘较新的练习舰“康济”号上当练习生。当时，萨镇冰任该舰管带。黄钟瑛在北洋舰队实习期间，除在“威远”、“康济”2舰练习外，还被派往刘公岛学习枪炮等专门知识。

实习结束后，黄钟瑛留在北洋海军服役，被派到著名的“济远”舰上任职。“济远”舰是北洋海军1883年从德国伏尔铿厂订造的一艘穹面钢甲舰，排水量为2300吨，马力2800匹，航速15节，是北洋海军的主力巡洋舰。黄钟瑛在“济远”舰上当航海员，一直到甲午海战结束。

“济远”舰参加了甲午战争中全部3次海战，是北洋海军中作战次数最多的一艘战舰。黄钟瑛随舰参加战斗，经受了残酷的战争考验。

1894年7月，“济远”舰率“广乙”、“威远”2舰组成护航舰队，护送陆军增援朝鲜。25日，在返航途中，“济远”、“广乙”2舰在丰岛海面遭到日本舰队的突然袭击，爆发了丰岛海战。

偷袭“济远”、“广乙”2舰的是日本海军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的3艘巡洋舰“吉野”号、“浪速”号和“秋津洲”号。“济远”、“广乙”2舰面对强敌，奋力还击。双方激战1个多小时，“济远”、“广乙”2舰多次击中敌舰，但因寡不敌众，伤亡严重。“济远”舰大副沈寿昌、枪炮二副柯建章、练习生黄承勋等13人阵亡，另有27人受伤。前炮台因积尸太多，以至不能转动。“广乙”舰受伤后退出战场，不慎

触礁搁浅，舰上官兵焚舰登岸。

“济远”舰被迫向西撤退，日舰“吉野”紧追不舍，“济远”舰发尾炮轰击敌舰。“吉野”舰措手不及，连连中弹，被击成重伤，遂不敢再追，“济远”舰因而得以逃生。“济远”舰因在撤退时先挂白旗，后挂日本海军旗，向追敌示弱，所以颇受非议。然而“济远”舰的战斗力还是给日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日军各舰被告知，以后与“济远”舰交手要格外注意，不可轻敌。虽然黄钟瑛在丰岛海战中的作战表现无从查考，但毫无疑问，这位 25 岁的青年同“济远”舰一样，经受了首次考验。

1894 年 9 月 17 日，黄钟瑛又随“济远”舰参加了著名的黄海海战。这场中日舰队主力大决战，持续了 5 个多小时，双方均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这场海战中，“济远”舰官兵虽然也进行了英勇的战斗，但因“济远”舰在战斗结束前退出战场，提前数小时驶回旅顺基地，受到人们的指责。海战结束后，“济远”舰管带方伯谦被清廷以临阵退缩罪处斩。

次年 2 月，黄钟瑛随“济远”舰参加了威海保卫战。此役，北洋海军在日军水陆夹击之下全军覆没，“济远”舰与“镇远”、“平远”等 10 艘军舰被日军俘获。战后，黄钟瑛与其他北洋舰队的官兵一道，被清廷遣返回乡。

（二）

甲午战后不久，清廷开始着手恢复北洋舰队。被革职遣返的原海军官兵又陆续被起用，重返海军，黄钟瑛也于 1899 年回到重建的北洋舰队。

海军重建，人才缺乏，黄钟瑛这样科班出身又有作战经验的军官，倍受清廷重视。黄钟瑛回到海军，先在“飞鹰”、“福靖”等舰任枪炮官，后转往“海琛”、“海筹”、“海天”等巡洋舰，历任船械、驾驶、副管驾等职。1904 年，35 岁的黄钟瑛被任命为“飞鹰”舰管带。“飞

鹰”舰是中国第一代驱逐舰，1895年在德国伏尔铿厂建成来华。该舰排水量850吨，马力5500匹，航速达24节，是北洋舰队中较新式的军舰。

黄钟瑛为官清廉，生活十分俭朴，他的收入多数用来偿还父亲欠下的债款，以至年近不惑仍未娶妻。亲朋好友都劝他早日成家，他总是婉拒说：“债务没有还清，父母九泉之下不得安宁，我怎敢有家室之乐呢？”直到后来黄钟瑛事业有成，收入渐丰，才娶薛氏为妻，生有一子名忠琨。

黄钟瑛后官居高位，仍自奉俭约，一日三餐，粗茶淡饭，不以为苦。但对有困难的亲友他却从不吝啬，总是慷慨解囊。

1907年，黄钟瑛调任南洋海军“镜清”号巡洋舰管带。该舰为南洋海军的主力战舰，是福州船政局1884年制造的一艘旧式巡洋舰，为铁肋木壳，排水量2200吨。1909年7月，清廷将南北洋海军舰队统编为巡洋舰队和长江舰队。“镜清”舰被编入长江舰队，为舰队旗舰。

次年12月，清廷成立海军部，黄钟瑛兼任海军部驻沪参谋官。不久，黄钟瑛升任“海筹”舰管带，授海军副参领，相当于海军中校。

“海筹”舰是清廷在甲午战后为重建海军向德国伏尔铿厂订购的一艘新式巡洋舰，同时订购的还有“海容”、“海琛”2舰。3舰排水量均为2950吨，航速为19.5节。它们与从英国订购的“海圻”号巡洋舰同为清海军主力战舰。

当时，黄钟瑛在海军界资历较浅，之所以能很快晋升为主力巡洋舰的舰长，与其过人的才干是分不开的。黄钟瑛身材瘦小，办事果断干练，机敏沉着，为人忠厚诚恳，廉正谦让，功名利禄不介于怀。他对部下要求严格但又不失仁爱，总是和颜悦色，甚至有人说他“终其身未尝有疾言遽色”。黄钟瑛十分关心部下的疾苦，并注意发挥属下官兵的才能。因此，他深得部属拥戴和上司的赏识。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辛亥革命的巨浪将黄钟

瑛推上了历史舞台，扮演一位更加重要的角色。

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党人很快占领了武汉三镇，并组成了以黎元洪为都督的湖北军政府。清廷急派萨镇冰率海军主力前往武汉江面协助北洋军镇压起义。海军中许多中下层官兵受到革命宣传的影响，又耳闻目睹北洋军的种种暴行，思想上逐渐倾向革命。各舰的部分下级军官开始秘密联络，策动起义，准备调转枪口，反对清廷。黄钟瑛对革命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默许、支持属下的秘密联络活动。当时，“海筹”舰在向革命军阵地开炮时，故意将炮弹射向天空或江里，“只有碰巧，革命军才会被打着。”

11月2日，驻防吴淞的“策电”舰率先起义，配合了上海的光复。接着，停泊在黄浦江上的“建安”等8艘舰艇也宣布起义。11月11日夜，停泊在南京江面的“镜清”等13艘舰艇宣告起义，驶往镇江。与此同时，在武汉阳逻江面的海军主力也在积极酝酿起义。萨镇冰默许起义，离开舰队去上海“治病”，临行前指定黄钟瑛为舰队队长。黄钟瑛在“海筹”舰上竖起队长旗，负责指挥舰队行动。

11月12日，黄钟瑛率舰队驶往九江。黄钟瑛对海军官兵们说：“我们都是汉族人，反对满清、建立民国是我们的职责。革命要取得成功，必须铲除旧习，严明纪律。我希望大家保持刚健中正的品格，坚定信念，无损军人的名誉，为国家和民族争光。”各舰官兵无不感奋，表示愿服从黄钟瑛的指挥，为建立民国效力。

“海筹”等3舰驶离阳逻锚地不久，“海琛”舰上的见习士官阳明首先将舰上的龙旗扯下，扔进江中，挂起了白旗。“海筹”、“海容”等舰也随即降下了龙旗，升起白旗。至此，海军正式宣布起义，加入革命行列。海军主力在九江起义，有力支援了革命，给清廷以致命的一击。

(三)

黄钟瑛率舰队起义抵达九江后，受到九江军政分府提督马毓

宝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款待。黄钟瑛表明了海军参加革命之意，请其代为电告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指示海军下一步的任务，并颁发国徽，以便各舰悬挂。

当时，有一些革命党人对海军是否真心参加革命抱有怀疑。一天凌晨，九江炮台发现“海容”舰迹象可疑，恐有异动，即开炮警告。接着，都督马毓宝派参谋长李烈钧前往“海筹”舰与黄钟瑛晤商，要求各舰将炮门暂时卸下，以免相互误会。黄钟瑛对他说：“海军舰队的来意是参加革命，如果各舰都卸去炮门，还有什么用呢？”黄钟瑛再次向李烈钧表示了海军参加革命的诚意和决心，使其打消了疑虑。

根据湖北军政府的指示，为支援各地革命军，反击清军的进攻，在九江的海军主力分为两队，黄钟瑛被黎元洪任命为海军司令部部长并兼第一舰队司令官。黄钟瑛率“海筹”等3舰组成的第一舰队，随九江军政分府参谋长李烈钧前往安徽，支援革命军。第二舰队前往武汉助战。

黄钟瑛率舰抵达安庆后，镇守江面，昼夜严防，安抚民心，很快稳定了那里的局势。不久，汉阳告急，湖北军政府急电黄钟瑛率第一舰队驰援。黄钟瑛率舰队抵达武汉青山江面，指挥各舰封锁清军进军通道。“海筹”、“海容”、“海琛”3舰每天轮流以大炮轰击敌军，历时一个星期，有力配合了革命军作战。

海军全部起义后，各地派出代表在上海召开会议，讨论组建海军统一机关。最后决定，在上海高昌庙设立海军总司令部，公推程璧光为海军总司令，黄钟瑛为副总司令，黄裳治为参谋长。因程璧光在国外，黄钟瑛在武汉前线，均不能到任，暂由参谋长代理一切。

1911年12月，独立各省代表选举从海外回国的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并确定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宣誓就职，中华民国宣告成立。南京临时政府下设陆军、海军、司法、财政、外交、内务、教育、实业、交通9部。孙中山任命黄

钟瑛为海军部首任总长。

黄钟瑛得到孙中山的信任，身膺要职，深感责任重大。当时民国初建，政局动荡，人心不稳，百端待举。黄钟瑛为加强海军建设夜以继日地工作，以不辱使命，不负孙中山和海军将士的厚望。黄钟瑛任总长后，发布《通告海军全体书》，指出民国初创，形势异常严峻。海军官兵要以革命大局为重，严格遵守军纪和政府的法令，不争名逐利，不内启纷争，齐心协力推翻满清政府，努力推进共和政治。黄钟瑛号召海军官兵“矢敌忾同仇之义，无有携心；处惊涛骇浪之中，勿萌退志。必使澄清寰海”，“使中华海军之徽，雄视亚洲，耀我民族”。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袁世凯向南方发出战争威胁。孙中山决心进行北伐，彻底推翻满清政府。1月11日，孙中山亲自担任北伐总指挥，计划分4路进军。黄钟瑛坚决拥护孙中山的北伐主张，积极调拨军舰，组建北伐舰队，由海军次长汤芑铭担任北伐舰队司令，率“海容”、“海琛”、“南琛”、“通济”4艘巡洋舰北上。

1月16日，北伐舰队抵达烟台，帮助当地革命军巩固和扩大革命成果。不久，由于革命党的妥协，南北和议告成，孙中山被迫让位于袁世凯。

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后，黄钟瑛不愿入北京政府，请求辞职。于是，袁世凯任命刘冠雄为海军总长，黄钟瑛任海军总司令。

刘冠雄是福州船政学堂第四期驾驶班的毕业生，在海军中资历较深。刘冠雄任“海天”舰长时，该舰触礁损毁，刘冠雄按律当斩，但幸得直隶总督袁世凯力保不死。此后，刘冠雄便投靠了袁世凯，成为袁的亲信。1912年，南京政府派员北上，迎接袁世凯到宁就职，黄钟瑛不愿北上，身居海军部要职的刘冠雄主动前往，更得袁世凯的信任。所以，袁世凯任命刘冠雄为海军总长，为其控制海军。

(四)

1912年4月6日,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正式任命黄钟瑛为海军总司令,蓝建枢为海军左司令,吴应科为海军右司令。

黄钟瑛任海军总司令,授海军中将军衔,驻上海高昌庙海军总司令处,负责统辖各舰队及学堂、练营、水雷营、医院、造船所等。总司令处下设左、右两个舰队,后改称第一和第二舰队,共有舰艇30余艘。

黄钟瑛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致力于海军的发展。他生性谨慎认真,办事从不草率,特别是关系海军建设的重大举措,他更是一丝不苟,反复思考,仔细权衡,不敢掉以轻心,唯恐决策失误,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每有小的失误,黄钟瑛都自责甚严,常常紧锁双眉,长时间绕室踱步,郁闷不乐。他经常对部下说:“我既任此职,就应进取不止,有所建树。现在民国初建,列强环伺,要收建威销萌之效,将有赖于海军。如果我们积习相因,不思进取,满足于做表面文章,致使军国大事毁于因循玩忽之中,岂不辜负了国家和人民的厚望。”

由于黄钟瑛忠于职守,夙夜在公,废寝忘食,致使健康受到极大的影响,身体日见消瘦羸弱。黄钟瑛的兄长黄钟泮得知他的情况后,写信劝他于功成名就之时,急流勇退,告老还乡,在家乡买几亩地,过无忧无虑的田园生活。黄钟瑛回信感谢兄长的一片好意,但表示自己既深得孙中山先生信赖,被委以国家重任,自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日在公,便不可一日懈怠。他认为,“若欲整顿海军,非再加十倍精神不可”。

由于过度操劳,黄钟瑛于10月28日突然吐血满盆,被送往上海红十字医院治疗。他在病榻上仍关心公务,致使身体难以康复。12月4日,黄钟瑛终因诸症并发,医治无效,不幸在上海寓所去世,时年仅43岁。临终前,黄钟瑛还喃喃向病床前的下属交待公

事，在场的人都感动地流下了眼泪。

黄钟瑛病逝后，海军部报请临时大总统予以优恤。呈文称：

查黄中将钟瑛系福州船政海军学堂出身，在各舰服务垂三十年，历任“飞鹰”、“镜清”、“海筹”各舰长，亦复操防并顾，动合机宜。去年民国光复有功，奉孙前大总统简任海军总长，适际破坏时代，万端待理，公牒之烦甲于往日，该中将事无巨细，必躬必亲，辄至夜分不得休息，其致病之由实根于此。自改充总司令后，又属建设时代，掣划周详，操劳日甚。比因边氛日恶，忧愤交腾，尚力病与各舰长密筹御侮之策，遂致呕血盈盆，愤志以歿。海军失一良佐，即民国少一将材，凡属国袍共深痛惜。窃以予夺之典，首重激功。褒亡恤逝，即以风示来兹。如该中将之办事实心，有功民国，想久在垂念之中。兹者大星竟陨，共济何人，追念前劳，曷胜凄怆。其应如何优予议恤之处，出自逾格鸿施。所有海军总司令黄中将钟瑛在任积劳病故缘由，理合据实呈明，仰候大总统裁夺施行。

旋即奉“临时大总统令”：

海军总司令中将黄钟瑛，在各舰服务多年，正资倚任，兹以积劳病故，本大总统殊深惋惜，应从优照海军上将例优恤，以彰勋绩。此令。

黄钟瑛病逝后，海军部下令全军降半旗3天以志哀悼，并于12月28日在北京阅学堂设位公祭。同一天，由萨镇冰、魏瀚、程璧光、蓝建枢等海军界要人及陈其美、伍廷芳等发起，在上海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孙中山接到黄钟瑛去世的噩耗，放下手中的工作，从杭州赶往上海，参加黄钟瑛的追悼会。孙中山对黄钟瑛的去世深表哀悼，在会上发表了介绍黄钟瑛生平及其勋绩的演说。孙中山的演说悲惋激昂，与会数百人深为感动，无不落泪。追悼会后，海军派军舰将黄

钟瑛的灵柩运回福建家乡，接受各界吊唁。1913年1月，葬黄钟瑛于福州西门外梅亭。

黄钟瑛的去世，使艰难斗争中的孙中山失去了一位忠实而坚定的支持者，他在挽黄钟瑛联中，充分表达了自己的悲痛和惋惜之情：

尽力民国最多，缔造艰难，回首思南都俦侶。

屈指将才有几？老成凋谢，伤心问东亚海权！

另一位革命伟人、曾在临时政府任陆军总长的著名军事家黄兴，也对黄钟瑛投身革命、创建民国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并对他在革命最需要的时候英年早逝，深感痛惜。他在挽黄钟瑛联中写道：

一举夺得扬水江，汉势不孤，黯收幕南王气；

六洲齐传纳尔逊，将星忽陨，独存海上雄风。

护法救亡 功在天下

——记程璧光

1917年7月，作为海军主力的第一舰队，从上海启航，南下广州，参加了孙中山发动的护法运动。这是海军自1911年起义以后最重要的一次革命举动，它有力推动和支持了护法运动，极大震撼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在中国海军历史上留下了光荣的一页。领导这次重大行动的，便是海军著名将领程璧光。

（一）

程璧光，字恒启，号玉堂，1861年生于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县）。程家原本是殷实之家，靠祖上务农积攒下万贯家财。但程璧光出生时，程家已开始衰败。程璧光的父亲程培芳不善理财，祖业渐被耗尽。后来，程培芳凑了一笔钱，只身前往美国经商。

程培芳与夫人谭氏育有六子一女，程璧光是他们的第四个孩子，程璧光上有二兄一姊，下有三个弟弟。程璧光8岁这一年，从遥远的美国传来坏消息：父亲因生意赔本，又气又累，一病不起。不久，程璧光便随一位族叔漂洋过海，来到美国檀香山，照顾病重的父亲。两年后，父亲病逝，程璧光送灵柩回乡安葬。

父亲去世后，家中生活更加困难。程璧光便前往福建，投靠他的姐夫陆云山。

陆云山是福建海军的一位舰长，他收留了程璧光，安排在自己指挥的“靖远”号炮舰上，跟随他学习航海。程璧光作为“靖远”舰上的一名小水手，开始了他将近半个世纪的海军生涯。

1876年,15岁的程璧光考入福州船政学堂,为驾驶班第五期学生,开始接受正规的海军教育。

程璧光毕业后,先被派上福建海军的“扬武”号巡洋舰当见习生。此后,历任“超武”号炮舰帮带、“元凯”号炮舰管带和福州船政学堂教习等职。1887年12月,福州船政局为广东海军建造的“广甲”号巡洋舰建成下水,程璧光又出任该舰帮带。1892年,程璧光升任新下水的“广丙”号巡洋舰的管带,成为主力战舰的舰长,时年仅31岁,其职务晋升之快,在当时的海军将领中是少有的。

1894年5月,北洋大臣李鸿章奉旨校阅海军。广东海军奉命派出“广甲”、“广乙”和“广丙”3艘主力巡洋舰,前往北洋参加会操。当时,中日关系日趋紧张,随时有爆发战争的危险。校阅结束后,程璧光上书李鸿章,深为时局担忧,请求率“广丙”舰留驻北洋备战。当时,中国的4支海军舰队由各地封疆大吏控制,畛域分明。程璧光作为广东海军的将领上书请求留驻北洋海军,无疑是一个大胆的举动。因此,程璧光的上书深得李鸿章的赞赏,这位请缨抗敌的年轻舰长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久,“广丙”舰与“广甲”、“广乙”舰一起被临时编入北洋海军,进一步增强了北洋海军的实力。

随后,程璧光率“广丙”舰参加了北洋海军的备战活动,还奉命率“广丙”舰前往朝鲜,先后出巡仁川、大同江等处。

7月25日,日本海军在丰岛海域突袭中国的运兵船队,挑起了战争。

9月16日,北洋舰队主力护送增援朝鲜的中国陆军前往大东沟登陆,程璧光率“广丙”舰参加了此次行动。护航舰队抵达大东沟后,“广丙”舰与“平远”号巡洋舰等舰艇在口外停泊,负责掩护陆军上岸。其余10艘护航战舰则由丁汝昌亲自指挥,在口外12海里处下碇,担任警戒。

9月17日12时50分,丁汝昌率领的10艘战舰与日本海军

联合舰队遭遇，爆发了大东沟海战。

战斗打响时，“广丙”与“平远”等舰已完成了掩护陆军登陆的任务，正在大东沟口外警戒。接到归队参战的命令后，“广丙”舰和“平远”舰及3艘鱼雷艇迅即赶往加入战阵。

激战中，“广丙”舰与日本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乘坐的“西京丸”号巡洋舰相遇。程璧光沉着指挥，“广丙”舰猛烈的炮火连连击中敌舰，“西京丸”舰顿时燃起熊熊大火。趁敌舰慌乱之际，紧随“广丙”舰之后的“福龙”号鱼雷艇冲向“西京丸”舰，实施鱼雷攻击。正与僚属观战的日本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见鱼雷飞驰而来，惊骇失色，以为必死无疑。可惜，由于射距太近，鱼雷从“西京丸”舰下穿过，未能触发。“西京丸”虽然侥幸逃生，但已丧失作战能力，狼狈逃离了战场。

“广丙”舰在战斗中受伤起火，程璧光指挥“广丙”舰官兵一面灭火抢修，一面坚持战斗。最后，“广丙”舰与“定远”等5艘军舰，一直坚持到战斗结束。

大东沟海战后不久，日本陆海军又分兵进犯威海。退守威海的北洋海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程璧光在“广丙”舰上指挥战斗，腹部中弹受伤，血染内衣。后来，程璧光曾多次将伤口给人看，深以为荣。

1895年2月，北洋海军陷入孤立无援、腹背受敌的绝境，丁汝昌等北洋海军将领相继自杀。身为广东海军将领的程璧光奉命作为军使，向日军递交了投降书，北洋海军最终全军覆没。

尽管向日军请降是奉命行事，但程璧光一直将其视为自己的奇耻大辱，内心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痛苦，终其一生不愿向人提及。出自程璧光家人和好友之手的有关他的记述，也大多讳言此事。

(二)

刘公岛陷落后，日军将俘获的“康济”号炮舰解除武装，归还中国，用于运送丁汝昌、刘步蟾等阵亡将领灵柩和其他海陆军军官撤离。“康济”舰成为北洋海军仅存的一艘军舰，由于舰长萨镇冰病重，经李鸿章推荐，程璧光出任该舰管带。

战后，北洋海军的军官都被革职遣返。程璧光担任了一段时间的管带后，也因战败受牵连而被解职。离开海军后，他先在上海居住了一段时间，因无事可作，心情郁闷，便携家眷返回广东老家。

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次年至香港、广州发展组织，开展革命活动。程璧光与弟弟程奎光很早便与孙中山结识，因为是同乡，又志趣相投，所以关系非常密切。1893年，孙中山创办广州沙基东西药房，以行医为掩护，宣传革命。他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在城南广雅书局内的抗风轩议论时政，抨击当局，程璧光和程奎光是这里的常客。

后来，担任广东海军“镇涛”舰舰长的程奎光秘密加入了兴中会，积极在海军官兵中发展革命力量。孙中山听说程璧光赋闲在家，便力邀他加入兴中会。程璧光犹豫不决，迟迟没有答复。一天，孙中山请程奎光约程璧光到西关兴中会机关秘密会面，对他说：“清廷丧师失地，都是由政治腐败所致，你亲自参加了甲午之战，肯定会有更深刻的体会。现在，我们要顺天时，应民意，共举大义，推翻满清。你去年也积极赞成我们的主张，如今何不宣誓入会，一起去成就标名千古的大业呢？”

程璧光并不完全赞同孙中山的见解，虽然清廷政治腐败他深有体会，但他并没有想过要推翻朝廷。所以，他对宣誓加入以推翻清廷为宗旨的兴中会仍有几分犹豫。孙中山见此，便借故离开房间。程奎光趁机劝程璧光说：“这里是举义的大本营，其中秘密你都已知晓，他们是不会轻易让你离开的。小弟我早已入会，决心以身

许国，将来兄长也很难置身事外。请兄长毅然决断，勿再迟疑。”

程璧光见事已至此，便提笔签名，宣誓加入了兴中会。孙中山对能争取程璧光加入兴中会，非常高兴，据说，曾许诺将来革命成功，由程璧光来担任海军总督。

1895年10月，孙中山准备在广州发动第一次武装起义。程璧光认为，目前革命党人力量薄弱，一旦起义失败，将大伤元气，动摇信念，应当谨慎行事。孙中山则坚持要马上采取行动，轰轰烈烈地大干一场，以震动天下，警醒国人。

起义前夕，清廷得到密报，采取了严厉的镇压行动。孙中山脱险，逃亡日本。程奎光、陆皓东等4人被逮捕杀害，成为第一批牺牲的革命党人。程奎光的妻子也在家中自缢身亡。程璧光为躲避清廷的追捕，逃往南洋槟榔屿。弟弟的被害使程璧光十分悲痛，精神受到很大的打击。他对孙中山的作法非常不满，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不再与其联系。

程璧光虽然在战败后被革职，离开了海军，但他却始终不能忘情于海军，希望有一天能重返海军任职。1896年秋，李鸿章出使欧美等国，途经槟榔屿，程璧光前往谒见。李鸿章问他何以来到南洋。程璧光解释说：“海军甲午兵败，我深感责任重大，怕朝廷降罪，所以来此间躲避。”李鸿章安慰道：“海军战败乃是国家大事，哪里是你一个人的过错，不必太过自责，还是尽快回国吧，我会致电朝廷为你解释，请朝廷不再追究。”

不久，程璧光回国，参加海军重建工作。当时，正赶上清廷在英国阿姆斯特朗厂订购“海天”、“海圻”号巡洋舰，李鸿章推荐程璧光为监造专员，与林国祥、谭学衡等人前往英国监造军舰。

“海天”、“海圻”2舰是清廷在甲午海战后向外国订购的最大的2艘巡洋舰，排水量均为4300吨。1899年，2舰由程璧光率领回国，编入重建的北洋海军。

程璧光回国后，先后担任北洋海军“海容”、“海圻”号巡洋舰管

带和北洋营务处会办等职，成为海军中一位重要人物。

1907年6月，清廷在陆军部中设海军处，负责海军建设。海军处下设机要、船政、运筹3个司，程璧光出任船政司司长。1909年，清廷统一南北洋海军，组成巡洋、长江两舰队，程璧光任巡洋舰队统领。巡洋舰队担负海上作战任务，是海军的主力舰队。此时，程璧光已是海军舰队中仅次于萨镇冰的二号人物。

1911年，英国国王乔治五世举行加冕典礼，准备大阅海军。英国驻华公使邀请清廷派舰参加。清廷决定派贝子载振为特使，程璧光为副使，率海军中最大的巡洋舰“海圻”号前往祝贺。

4月24日，“海圻”舰从上海出发，出太平洋，经印度洋而入大西洋，艰苦航行近两个月，于6月19日抵达英国的朴次茅斯港。23日，“海圻”舰代表中国海军参加了盛大的加冕典礼。英王和王后在座船接见了程璧光等，对中国军舰远航而来表示高兴和感谢，并赠送一面加冕银牌作为纪念。

加冕典礼结束后，“海圻”舰驶往比利时装煤，接着进入阿姆斯特朗厂检修机器，工期为一个月。当时，因墨西哥发生革命，局势混乱，中国驻墨西哥公使请求清廷派军舰保护华侨。清廷命程璧光俟军舰修好后，前往美国和墨西哥。

8月，程璧光率“海圻”舰由英国启航，穿越大西洋，驶抵美国纽约，受到当地华侨和美国各界的欢迎和重视，美国总统塔夫托亲自接见了程璧光及随行的官员，表示问候。程璧光在美期间还会见了美国海军部官员和将领。

由于墨西哥局势很快平静，清廷取消了“海圻”舰赴墨之行，命其前往古巴慰问华侨。

8月中旬，程璧光率“海圻”舰到达古巴。古巴华侨得知祖国军舰到来，十分激动和兴奋，纷纷扶老携幼前来迎接从远方而来的亲人。他们召开了隆重的欢迎大会，并停业3天庆祝这一盛事。程璧光等在古巴停留十余日，受到热情款待。

访古结束后，程璧光奉命率“海圻”舰返回英国，准备接带在英国建造完成的“肇和”、“应瑞”2 巡洋舰一同回国。不久，“海圻”舰因遇风受损，不得不入厂修理。

10 月 10 日，武昌起义爆发，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席卷全国，清朝统治土崩瓦解。程璧光得不到国内的指令，遂滞留英国，等候国内局势明朗。1912 年，中华民国建立。程璧光于是年夏天率舰回国。因英国煤矿工人大罢工，一时无法买到足够的煤，只好将“肇和”、“应瑞”2 舰留在了英国。

程璧光率舰远航，行程万里，时逾一年，开中国军舰航行欧美之先河，堪称中国海军史上的壮举。“海圻”舰也因此成为中国海军史上航程最远的战舰。回国后，程璧光及全舰官兵受到民国政府的嘉奖。程璧光因“经年远使，督率有方”，被授予二等文虎勋章。

（三）

武昌起义后不久，海军在各地也纷纷起义，加入革命行列。为统一指挥，各地海军代表在上海召开会议，商讨组建海军领导机构并推举海军领导人。当时，程璧光虽远在英国，但因他在海军中的威望和他与革命党人的密切关系，会议一致推举他为海军总司令。

1912 年 1 月 1 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最初打算让程璧光出掌海军，外交总长伍廷芳等也电请程璧光速回。后因程璧光一时无法回国，孙中山遂任命率舰队起义的黄钟瑛担任临时政府的第一任海军总长。

程璧光回国时，国内形势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孙中山被迫下野，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刘冠雄被任命为新内阁的海军总长。程璧光遂辞去一切职务，闲居上海。

程璧光在上海居住期间，常去南京拜会一些在野名人，其中许多是革命党人。袁世凯对南方革命党人的活动十分警惕，程璧光与革命党来往密切，使他很不放心。他几次想请程璧光到北京任职，

以便笼络、控制，但每次都被程璧光婉拒。

1913年春天，袁世凯专门派人到上海请程璧光进京任职。袁世凯让来人捎话给程璧光说：“当年我袁项城在李中堂身边任职时，凡是先生的事无不予以帮助。现在我肩负国家重任，急需先生的帮助。先生岂能坐视不管？”程璧光见事已至此，知道无法拒绝。加上此时他正患咳喘，南方气候潮湿，不利调养。所以，程璧光答应进京担任海军高等顾问。1914年5月，袁世凯在总统府内特设了一个总揽军权的“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程璧光被任命为八参议之一。

1915年春，袁世凯积极准备改行帝制。程璧光反对帝制，不愿助纣为虐，整天以养鸟种花打发时间。他表面上闲情逸志，内心却十分苦闷，深为国家前途担忧。他在1915年秋给广东一位友人的信中写道：“时势不佳，实足令人厌世，恨不得早死为快也。国事不堪闻问，衮衮诸公，日云整顿，时言筹备，无非徒托空谈，官吏不习于因循，即习于敷衍。哀我中国，生机已尽，惟有仰天长叹而已。”

不久，袁世凯派程璧光考察全国兵工厂。10月，程璧光到上海，考察了高昌庙兵工厂；11月，他又抵达广州，考察了石井兵工厂。

1916年6月，袁世凯因帝制失败而死，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黎元洪曾在程璧光任帮带的“广甲”舰上当过三管轮，与程璧光共事多年，关系密切。所以，他极力推荐程璧光出任段祺瑞内阁的海军部总长。9月，经参众两院投票通过，程璧光出任海军总长，时年55岁。

程璧光任海军总长后，立即着手整顿部务，决心革除积弊，重振海军。他常以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名言自勉，不辞辛劳，力行改革。他上任的当月，便本着“海军之根本，尤在人才”的思想，改革海军教育体制，颁布了《海军学生考选章程》十三条，打破各海军学校招考学生的地域界限，改由海军部负责统一在全国招

生。此举对破除闽人把持海军的局面,真正实现全国海军的统一,具有积极意义。

程璧光整顿海军的工作刚刚起步,即被日益加剧的政治动荡所打断。

1917年春,围绕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问题,黎元洪与段祺瑞之间早已存在的“府院之争”公开化。段祺瑞主张加入协约国,向德国为首的同盟国宣战,企图借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扩大皖系势力,达到“武力统一”的政治目的。黎元洪担心皖系势力借机膨胀,因此极力反对向德国宣战。

4月25日,段祺瑞召集来京的督军和督军代表二十余人讨论外交问题。程璧光和陆军训练总监张绍曾也被邀请参加。段祺瑞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写有“赞成总理外交政策”八个字的签名单,请大家签名。各省督军和督军代表都秉承段意,签名赞成。唯有程璧光在签名单上写下“如国会一致,当服从多数民意”。段祺瑞看了很不高兴。

5月10日,参战议案提交国会讨论。段祺瑞仿效袁世凯,指使军警、流氓等组织所谓“公民团”等围攻国会,打伤二十多名议员,企图通过威胁手段强行通过参战议案。结果,舆论大哗,一时群情激愤。

程璧光认为内阁应对目前局面负责,遂与外交总长伍廷芳、司法总长张耀曾、农商总长谷钟秀向段祺瑞提出内阁引咎总辞职,以谢国人,被段祺瑞拒绝。当天晚上,程璧光等4人分别向总统提出辞职。最后,内阁中只剩下段祺瑞一人。

5月23日,黎元洪下令罢免段祺瑞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职务。段祺瑞则唆使皖系各省督军宣布独立,并在天津集聚力量,准备以武力推翻黎元洪。

程璧光见形势危急,一面电令海军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懌率舰驻扎大沽,镇慑叛军;一面密见黎元洪,劝其离京南下,免被要挟。

黎元洪此时寄希望于张勋居间调停，不肯南下，只是命程璧光先行出京，集合舰队，相机行事。程璧光见无法说服黎元洪，只好离开北京，于6月9日乘军舰抵达上海高昌庙。

（四）

程璧光一到上海，即召集林葆懌和第一舰队的几位舰长，商讨对策，决定通电宣布拥护共和，要求各省叛督取消独立。

程璧光离开北京前，曾深夜密访伍廷芳问计。伍廷芳认为需联合反段的各方力量一致行动，建议程璧光与在上海的孙中山、岑春煊、唐绍仪联络，共谋大事。程璧光抵沪后，即与孙中山等商讨国事。此时，孙中山等正与西南实力派商洽联合反对北洋群逆，拥护约法。程璧光率海军拥护共和，受到孙中山等人的热烈欢迎。

岑春煊与孙中山本是同床异梦，想借护法之机扩充实力，因此，也极力拉拢海军。他通过旧识与“海容”舰长杜锡珪联系，准备利用该舰前往汕头送饷之机，搭乘前往广东。出发前一天，岑春煊的随行人员和行李、食物等都已先行上船。孙中山接到消息后十分焦急，担心岑春煊先抵广东，会使自己的护法行动受到影响。于是密囑海军命“海容”舰暂缓启行，从而阻止了这次行动。

但是，这件事使程璧光对孙中山和岑春煊等人的分歧感到疑虑。为了推动程璧光南下护法，孙中山暂时放下了与岑春煊的分歧，达成了谅解。6月23日，孙中山、岑春煊、唐绍仪联名致书，邀请程璧光在上海静安寺路哈同公园共进晚餐。书云：

玉堂总长执事：敬启者，此次海军拥护共和，义声久著于全国。微闻将士有以弟等办事未能统一，转觉迟回；实则弟等同以救国之志，断无自相睽牾之理。如执事果以弟等不统一为疑者，请释虚怀。并于二十三日下午六时在静安寺路哈同公园，略备晚餐，惟愿驾临，俾得面商一切，弟等当同拱候也。专此敬达，即请台安。惟照不宣。孙文、

岑春煊、唐绍仪同启。

程璧光接书后，欣然前往，与3人共商护法救国大计。6月27日，孙中山派人将麦加利银行30万元支票送交程璧光，作为海军参加护法讨逆的军饷，以示诚意。

6月24日，李经羲内阁以萨镇冰为海军总长，任命程璧光为海军总司令。程璧光认为这是张勋等人操纵的结果，不予承认。7月1日，张勋拥溥仪复辟，黎元洪逃入日本领事馆避难。次日，程璧光以海军总长名义通电声讨复辟。3日，程璧光又与淞沪护军使卢永祥联合发布讨贼檄文。4日，孙中山在上海环龙路住宅邀集程璧光、唐绍仪和其他沪上海陆军将领及国民党要人会议，商讨时局，决定迎黎元洪南下主持大计，并发布讨逆宣言。

程璧光命“海容”、“海筹”2艘巡洋舰北上迎接黎元洪南下。不料，2舰北上后，被段祺瑞策动倒戈，投向了北洋政府。程璧光得知后，懊恼不已，气得在舰上连连用手杖猛击甲板，痛骂两舰长的背叛行为。

7月10日，孙中山、陈炯明、章太炎、朱执信、胡汉民等人在程璧光的安排下，秘密登上停泊在吴淞口的“应瑞”号巡洋舰，南发动护法运动。12日，到达汕头后，孙中山等又转乘由程璧光侄子程耀垣任舰长的“海琛”号巡洋舰，于17日抵达广州。当天，孙中山在黄埔的欢迎会上发表演讲说：“欲争回真共和以求福利者，必须有二大伟力，其一为陆军，其二为海军。……故迭次与程总长磋商，幸得海军全体将士效忠共和。惟是海军必须有根据地，现今上海已为一般称兵谋叛者所割据，浙江、福建亦然；只有以广东为海军根据地，然后一切大计划可以发展。”他希望程璧光能早日率舰队南下广东。

段祺瑞将张勋逐出北京后，继续担任国务总理，由冯国璋代理总统。刘冠雄被任命为海军总长，萨镇冰任海疆巡阅使。北洋政府得知程璧光有率驻沪海军南下之意，派人多方拦阻。萨镇冰也在上

海三马路海军租船处召开的海军将领会上，劝说大家要服从中央命令，不要使海军分裂，以致被人利用。程璧光闻言十分不悦，与萨镇冰争论起来。最后，会议不欢而散。

程璧光决意率海军南下，家人深为他的安全担心。程夫人邓氏极力拦阻，甚至到孙中山的住宅哭诉说：“当年我叔婢（指程奎光夫妇）因跟随孙先生而死，难道今天还要我丈夫跟随孙先生而死吗？”程璧光闻知，不为所动。他在给妻兄邓聪保的信中写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自当牺牲救国，死所不计也。”他还在日记中写下“宁维护公理死，不违背公理生”十二个字，以表明他的心志。

程璧光接到孙中山关于广东方面欢迎海军南下的电报后，于7月22日黎明，与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懌率“海圻”号巡洋舰等5艘军舰以赴象山港演习为名，从龙华出发，前往广东。伍廷芳、唐绍仪等随舰同行。行至象山，又有“福安”、“豫章”2舰加入同行。

同日，汪精卫代程璧光等在上海发布了《海军讨贼檄文》，正式宣布海军南下护法。檄文称，“我海军将士既以铁血构造共和，即以铁血保卫之”，并提出了拥护约法、恢复国会、惩办祸首三项主张。

北洋政府得知程璧光率舰队南下，十分惊恐，采取了各种办法劝诱威迫，但都未能奏效。7月24日，北京政府下令免去程璧光海军总司令职务；26日，又下令免去林葆懌第一舰队司令职务。

（五）

8月5日，程璧光率舰抵达广州，孙中山与广东各界代表及群众出黄埔外5里多，热烈欢迎海军舰队进港。沿途旌旗招展，“十里天日为红”，欢呼声、鞭炮声不绝于耳。

6日下午，广东各界在长堤东园召开有数万人参加的欢迎海军南下护法大会。程璧光在会上发表演讲说：“今北京政府藉共和之名，行专制之实。我海军万难坐视，决计争回真共和，非至约法、国会恢复，我海军将士不肯罢休。现在联合西南各省一致进行，各

界人民务望推诚相助，我海军坚持到底，俾人民得享真共和之幸福。”会上，孙中山及广东军政首脑等也发表了演说，欢迎海军南来护法。当时，天上下起了大雨。但数万与会者依然精神振奋，情绪激昂。孙中山也在演讲时即兴发挥说：“海军是离不开水的。今天我们在这里欢迎海军南下，而天降大雨，也表示了欢迎之意。”

程璧光率领的7艘军舰与已在粤的另外3艘军舰会合后，使护法海军的军舰达到了10艘，总吨位达到13,390吨，接近当时中国海军军舰总吨位的一半，而其战斗力则要超过北洋政府所控制的军舰。这10艘军舰中有巡洋舰2艘、驱逐舰3艘、炮舰4艘、运输舰1艘，包括当时中国海军中最大的巡洋舰“海圻”号（4300吨）和最大的运输舰“福安”号（1700吨）。

程璧光率海军南下，对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是一个极大的支持。孙中山对海军参加护法的重要意义给予高度评价。他指出：“向来革命之成败，视海军之向背”，“吾人得海军之助力，若出兵北上，十日可到武昌，握中原要点，北方伪共和派非降即逃而已”。“以一万陆军，助以海军，即足使北京、南京、汉口长虑而却顾”。

为统一领导护法运动，孙中山等在广州成立了军政府。9月10日，孙中山宣誓就任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程璧光被任命为军政府海军总长。

10月，护法战争爆发。程璧光出任征闽海陆联合军总司令，负责在福建开辟第二战场，与湖南战场相呼应。12月至次年1月，海军护法舰队参加了讨伐潮梅镇守使莫擎宇和两广巡阅使龙济光的战役，有力配合了陆军的进攻。

正当护法战争紧张进行之际，围绕着护法领导权的斗争也激烈起来。程璧光因其特殊的地位，成为这场政治厮杀中的一个重要角色。

孙中山为首的激进派与陆荣廷为首的桂系军阀势力在护法领导权问题上严重对立，以伍廷芳、唐绍仪和程璧光等为代表的国民

党稳健派则居中调和，力图使国民党与桂系为首的西南军阀之间的联合不致破裂，以推动护法的进行。

程璧光率领的护法舰队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无论是孙中山还是陆荣廷都希望能牢牢地把这支力量控制在自己的手中。而广东地方实力派则力推程璧光出面主政，以期实现“粤人治粤”的目的。这样，程璧光便成为各方争取的焦点人物。程璧光任海军总长时，面对“府院之争”的混乱局面曾发出“政海潮流瞬息万变”的慨叹。此时，不谙政治斗争的程璧光面对的则是更加复杂的局面。

作为国民党元老，程璧光率舰南下，是为了支持孙中山的护法事业。但海军南下后的军费军政府却无力负担，而由桂系出面给予解决。所以，程璧光也深知，海军要想在广东立足，就离不开桂系的支持。因此，在孙中山同桂系的斗争中，程璧光竭力从中调停，不使双方彻底破裂。

11月15日，孙中山下令海军炮击广东督军府，驱逐督军陈炯明。程璧光担心事态扩大，拒绝执行命令。后经程璧光向陆荣廷施加压力，改派莫荣新接代广东督军。

不久，桂军拘捕并枪杀大元帅府亲军军官，再次激怒孙中山。1918年元旦，孙中山命海军与粤军、滇军配合，驱逐莫荣新。程璧光不主张公开与桂系对抗，而且认为粤军、滇军不会与海军配合，海军单独行动不可能成功。孙中山决意采取行动，亲自率随员于3日午夜登上“同安”、“豫章”2舰，下令炮击督军府。2舰舰长没有接到程璧光的命令，有些犹豫。孙中山便亲自发射数炮，又命水兵们连发数十炮，一直打到第二天拂晓。

海军打响后，粤军、滇军并没有如约发动进攻。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和滇军将领方声涛等都反对与桂军决裂，命令部队严守中立。莫荣新则不准桂军还击，急电程璧光调停。程璧光得知情况后，下达了停火命令。为了安抚桂系，程璧光不顾孙中山的反对，将“同安”、“豫章”2舰舰长撤职。事后，莫荣新亲到大元帅府向孙中山请

罪，事件得以和平解决。

军政府成立后，并没有得到西南护法各省的支持，各省自行其是，缺乏统一行动。国民党稳健派希望能尽快组建起真正有效的指挥机关，统一各省的步调。1月，经各方多次协商，成立了“西南护法各省联合会议”，采取合议制，推举岑春煊为议和总代表，伍廷芳为外交总代表，唐绍仪为财政总代表，唐继尧、程璧光、陆荣廷为军事总代表。

“西南护法各省联合会议”的成立有与军政府对抗之嫌，于法理不合，因而遭到许多人的反对。于是，有人建议将“西南护法各省联合会议”与军政府合二为一，并对军政府加以改造，引入联合会议的合议制，改变军政府的大元帅制。这一方案得到国民党内大多数人的支持。程璧光遂与伍廷芳、唐绍仪在陆荣廷和孙中山之间斡旋，促使双方达成一致。

程璧光的调停工作引起了控制军政府的激进派的强烈不满，他们怀疑程璧光与桂系秘密勾结，威胁孙中山的领导地位。

正当程璧光奔走调停之际，广东将领李福林、魏邦平等于2月8日电请陆荣廷，要求以程璧光取代桂系的莫荣新出任广东督军，想借此达到“粤人治粤”的目的。虽然此前程璧光曾几次拒绝广东军政界让他出任粤督的请求，但此举仍引起桂系的猜疑，担心程璧光有借机排挤桂势力图的企图。

所以，尽管程璧光在努力调解激进的中华革命党人与桂系军阀的矛盾，结果却事与愿违，不仅未能得到双方的理解和支持，自己反而陷入左右为难、险象环生的境地。

（六）

程璧光为人忠厚谨慎，为官清廉正直。他率舰南下后，为表示“始终为国，纯尽义务”，拒绝领取一切薪俸，生活所需完全由家中承担，不从公家取分毫。程璧光生性淡泊，喜欢简单随意，很厌恶官

场追求奢华、讲究排场等陋习。他平时外出，从不前呼后拥、仪卫森严，随身只带一个仆人。程璧光率舰护法，成为全国瞩目的人物，也深为北洋军阀所仇视。当时，广东局势不稳，广州社会治安状况很差，亲友们都为程璧光的安全担心，程璧光却总是不以为然。他对家人说：“我平生与人无怨无仇，即使是段祺瑞，虽然政治上是对手，我们之间的私人友谊也不错。我起兵护法完全是出于公义，不为私仇，我有什么可害怕的呢？”后来，伍廷芳也劝他多注意安全，程璧光认为老人过虑了。但碍于情面，他勉强答应没有紧要公务，不离开海珠岛。

后来，随着前线连连奏捷，后方更加稳固，广州的治安状况也大有好转。程璧光便经常从海珠岛渡河登岸，与朋友聚会。尽管当时内部政争激烈，程璧光心中坦然，一如既往，未曾有丝毫戒备。

2月26日晚8时许，程璧光带仆人吴某乘渡河小艇前往长堤赴宴。小艇靠上码头，程璧光沿台阶上岸。突然，黑暗中冲出两名枪手，向程璧光连发两枪。程璧光胸部和肩部中弹，用粤语喊了一声“捉住渠”，便倒在码头的栅栏旁。枪声响后，行人惊叫四散，刺客也乘乱逃走。仆人吴某急忙将程璧光抬上小艇，驶回海珠抢救。待法国军医加沙布博士匆匆赶到时，程璧光已气绝身亡。时为9时30分。程璧光终年57岁。

得知程璧光被刺消息后，孙中山等军政要员纷纷赶往海珠。大家推举胡汉民起草讣电，胡汉民悲痛难抑，几次搁笔挥泪，数易其稿。电文写成后，没有缉拿凶手的字样。朱执信提笔写上了“现在严缉凶手”6个字。随后，由孙中山领衔发出。电文如下：

海军总长程公玉堂，于今日午后八时半，在海珠码头遇贼被击，枪中胸部，即时殒命。去年政变，程公以海军南来，首倡大义，护法救亡，功在天下。岂意所志未成，遽遭贼害，痛何可言。现在公推林司令葆懌，主持海军，以继程公生平未竟之志。现在严缉凶手，各界安谧，谨此电闻。

孙文、莫荣新、伍廷芳、吴景濂宥。

程璧光遇刺后，军政府和国会决定举行国葬。程夫人邓氏予以拒绝，并坚持根据程璧光生前意愿葬于上海。邓氏还将各方送给的治丧费全部退还，以贯彻程璧光“始终为国，纯尽义务”的初衷。5月21日，程璧光的灵柩运往上海，1920年1月，葬于江苏宝山。军政府在广州为程璧光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并决定在海珠公园建造程璧光铜像，以纪念他的护法功勋。

程璧光死后，孙中山和莫荣新都发布命令严缉凶手。莫荣新还出赏银1万元，后来又增加到5万元，但刺客始终没有抓到。程璧光被刺遂成疑案。长期以来，人们大多怀疑此案系桂系所为，也有人怀疑是北洋政府所为。后来，据学者考证，刺杀程璧光是激进的中华革命党人所为，策划者是朱执信、张民达，执行者是肖觉民和李汉斌。他们刺杀程璧光的主要原因是他们认为程璧光已完全倒向了桂系，将破坏孙中山领导的护法大业。

率舰支持孙中山护法的程璧光最终被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人杀害，不能不说是程璧光的一个悲剧，同时也是护法运动的一个悲剧。

程璧光被刺，使孙中山失去了一位重要盟友，也使他完全失去了对作为护法重要力量的海军的影响。程璧光死后，海军逐渐倒向桂系，孙中山的力量因此被大大削弱，政治上陷入更加孤立的境地。最后，在桂系的排挤打击下，孙中山被迫于5月21日离开广州，他发动的第一次护法运动也宣告失败。

1922年夏，黎元洪复任大总统，追赠程璧光勋一位海军上将。

清廉刚正 矢志报国

——记陈绍宽

陈绍宽是南京政府时期中国海军最为重要的将领。从1929年到1945年，陈绍宽先后任海军部政务次长、部长、海军总司令等职，实际执掌海军达16年之久。他在任期间，励精图治，惨淡经营，为中国海军在逆境中求发展贡献颇多。抗日战争爆发后，陈绍宽率海军官兵英勇抗战，可歌可泣，在中国抗战史上留下了光荣的一页。抗战胜利后，陈绍宽因不满蒋介石的内战政策，辞职回故乡隐居。解放前夕，他严辞拒绝蒋介石让其前往台湾的要求，坚持留在大陆，迎接解放。建国后，陈绍宽先后任福建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副省长等职多年，为新中国的建设作出了许多积极贡献。陈绍宽一生清廉刚正，矢志报国，堪称近代中国海军将领中的典范。

（一）

陈绍宽，谱名必谨，字厚甫，1889年10月7日生于福建闽县胪雷乡胪雷村（今属福州市郊区城门乡）的一个贫寒之家。父亲陈兆雄（伊黎）原是个箍桶匠，后参加海军，从水手升至管轮中士。

陈绍宽童年在家乡干过放牛等农活，9岁时入私塾读书，14岁考入福州教会办的格致书院学习。1905年，16岁的陈绍宽考入江南水师学堂。

江南水师学堂是两江总督曾国荃于1890年创建的一所南洋海军学校，校址在江宁（今南京）仪凤门（今兴中门）内花家桥。学堂设驾驶、管轮专业，陈绍宽为第六期驾驶班学生。

陈绍宽在校学习期间，以刻苦勤学见称，他性格内向，沉默寡言，一心埋头苦读，很少与人交往。当时，学堂规定每天晚自习到9点30分。陈绍宽认为时间太短，他请求学堂允准他延长自习时间，自己愿为此每月加缴灯火费大洋6角。校方为他的刻苦精神所感动，破例准许他每晚自习时间可延长到11时30分。

1908年冬，陈绍宽经过3年苦读，以优异成绩通过了陆军部海军处主持的大考，结束了堂课学习。随后，陈绍宽被授予把总，给五品顶戴，派上“通济”号练习舰实习。1911年，他被派到海军大臣的座舰“联鲸”号炮舰上担任二副兼教官，授海军副军校军衔，相当于海军中尉。

民国建立后，陈绍宽于1912年被调到“镜清”号练习舰上担任大副。他到任后不久，军舰由上海驶往福州，舰长因故不能随行，便让他负责此次航行。按照海军当时的惯例，如果军舰3年没有进出某港口，可以聘请引水员领航。“镜清”舰已有多年未到福州港，而且闽江口至马尾港航道地势错综复杂，更须请人领航。但陈绍宽凭借自己娴熟的航海技术，不请引水员，亲自驾驶，最后安全抵达马尾。一个尉官初次率舰进港，不需请人领航而能安全抵达目的地，确属不易。所以，此事在当时的海军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1913年，陈绍宽又先后担任了“江亨”号炮舰副长、“肇和”号练习舰航海大副、“应瑞”号练习舰航海正、“湖鹏”号鱼雷艇艇长等职。是年2月，陈绍宽被授予海军上尉军衔。1914年，陈绍宽调任海军总司令处副官，晋升为海军少校。

1915年，爆发了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战争。12月5日，在陈其美、蒋介石等人的策划下，革命党人里应外合，夺取了停泊在高昌庙的“肇和”号练习舰。随后，“肇和”舰炮击江南制造局，岸上的革命党人也按计划发动了起义，水陆配合，准备一举占领上海。

但岸上的行动很快失败，原来打算响应起义的另外两艘练习舰“应瑞”号和“通济”号也调转炮口轰击“肇和”舰。革命党人最终

不得不弃舰而去，“肇和”舰起义失败。

“肇和”舰起义事件发生后，海军总司令李鼎新、练习舰队司令徐振鹏因疏于防范而被免职，海军总司令处被撤销，由海军总长直辖各舰队，许多官兵遭处分和清洗。

在这次事件中，陈绍宽扮演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角色。12月5日是个星期天，而陈绍宽通常节假日都在司令处工作。“肇和”舰起义发生后，海军总司令李鼎新以下官员都在休假，唯有陈绍宽一个人在司令处。他得知起义消息后，立即上报，并及时向各舰传达命令，从而控制了局势。所以，“肇和”舰起义事件不仅没有累及陈绍宽，相反，他得到了海军部的格外赏识和器重。

1914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中，飞机和潜艇发挥了重要作用，引起各国的普遍关注。1915年，中国派遣李世甲等人前往美国留学，专门学习飞机和潜艇使用、制造等方面的技术。

1916年2月，陈绍宽奉派前往美国考察海军，重点了解有关飞机、潜艇发展情况。12月，陈绍宽又前往战火纷飞的欧洲，进行实地考察。

1917年5月，陈绍宽奉命随英国海军参加了对德国海军的作战行动。因表现出色，作战有功，英国政府于是年10月授予他特别劳绩勋章。

陈绍宽在英国详细考察了飞机、潜艇的作战情况后，又先后于次年2月和4月赴法国和意大利考察两国海军。随后，他把在美、英、法、意4国考察的情况编成《飞机潜艇报告书》发送回国。海军部将陈绍宽的《报告书》刊印颁发，并据此制订中国海军发展飞机和潜艇的规划。不久，海军在福建成立了海军飞潜学校，着手培养海军所需的飞机和潜艇方面的专业人才。

1918年5月，陈绍宽在英国参加了海军潜艇部队作战。8月，他又随英国作战舰队参战。同月，他被任命为中国驻英使馆海军正武官。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陈绍宽于1919年2月任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海军委员。4月，他兼任国际海道会议中国海军代表；不久，又兼任中国留欧海军学生监督，并晋升为海军中校。

在国外的几年，陈绍宽有机会直接了解各发达国家海军的发展情况，因而对中国海军发展的现状深表忧虑。他在1919年5月给海军部的《驻英海军武官报告书》中写道：“欧战虽已告终，而我海防仍不容稍息，盖和议行将签约，列强并无缩小军备之计划。……我国港湾纷错，海岸绵长，设险备防，更为急务。……我海军舰艇年龄大率愈限，旧而且小，战斗力固不足言。查各国海军关于建舰计划有加无已，独我国于建舰之预算付诸阙如，致年来海军力量有退无进，是海防自撤于无形，使前此数十年谋国之基暗中消灭，岂不大可虑哉。再以此次巴黎议和，逐一比照，益知论国势之强弱，定国位之崇卑，当视其海军力量大小。我堂堂神圣之民国，岂能任载胥以溺乎。”他呼吁，“谋国壮猷定从海防着手”。

(二)

1919年10月，陈绍宽奉调回国，担任“通济”号练习舰中校舰长。他知识渊博，技术精湛，经验丰富，教授认真，深受学生们的欢迎和敬佩。

1922年，陈绍宽调任海军总司令公署参谋长。次年1月，他被授予海军上校军衔。2月，陈绍宽出任“应瑞”号练习舰舰长。由于作战勇敢，表现出色，陈绍宽于1926年9月被任命为海军第二舰队少将司令。

此时，北伐战争已经开始。陈绍宽率舰队驻南京下关，负责长江防务。控制着江苏等省的军阀孙传芳自以为有陈绍宽率领的海军舰队帮助，可保无虞，因而十分得意。他在一次宴会上向手下的将领们介绍陈绍宽时说：“今天，我结识这位品行高尚、勇敢善战的陈将军，就比我扩充10个师的兵力作用还大。”

但孙传芳没有料到，此时海军正在密谋倒戈。海军总长杜锡珪和海军总司令杨树庄见北洋政府大势已去，便决定率海军易帜。他们征求陈绍宽和第一舰队司令陈季良等将领的意见，大家一致表示赞同。陈绍宽主张海军应统一行动，不要因一地海军率先行动，而使其他地方的海军部队陷于被动和危险的境地。

1927年2月，陈绍宽率驻南京江面的“楚有”等全部舰艇灭灯兼程下驶，赶赴吴淞口外的鸭窝沙海面，与杨树庄率领的舰队会合。3月14日，海军发表通电，宣布脱离北洋政府，加入国民革命军。

海军易帜后，参加了北伐作战。北伐军进军上海，在沪海军积极配合。3月22日，陈绍宽率“海容”等舰攻克了北洋军占领的吴淞口炮台。随后，他率舰前赴浏河，配合北伐军沿江扫荡北洋军，俘获敌舰船多艘。

北伐军攻占南京后，海军分4个区在长江设防。陈绍宽率“楚有”等舰艇负责第二区江阴至镇江的防务。4月10日，陈绍宽督率各舰艇驶往江阴、泰兴、三江一带，截击渡江进犯的孙传芳部2个团，将其全歼。此后，陈绍宽又率队多次击退敌军的进攻。

南京政府成立后，陈绍宽奉命负责镇江至南京段长江的防务，将第二舰队司令部设在南京，指挥舰队拱卫首都，责任尤为重大。7月6日，陈绍宽被南京国民政府委任为军事委员会委员。接着，陈绍宽亲率“楚有”旗舰及“楚同”、“永健”、“永绩”、“联鲸”等舰，封锁长江上游的马当、华阳、东流、安庆及东、西梁山等处，昼夜梭巡，以防武汉汪精卫、唐生智南下讨蒋。

8月，由于内部斗争激烈，蒋介石宣布下野。孙传芳决定利用这一机会渡江南进，恢复在江浙的势力。

17日，陈绍宽奉命率“楚有”等舰封锁长江。孙传芳发动多次佯攻，以分散海军和蒋、桂部队的防守力量。陈绍宽率舰往来江上，多次与江北及小股渡江敌军展开激战。

不久，孙传芳主力部队在龙潭一带渡过长江，并迅速攻占了栖霞山、乌龙山和龙潭，南京形势岌岌可危。主持军务的军委会常委何应钦、李宗仁急命第一军、第七军主力由东、西两路会攻龙潭，歼灭渡江之敌。同时，他们致电陈绍宽，请其率海军舰队予以配合。电文称：

连日敌人到处偷渡，沿江防守部队大有顾此失彼之虞，幸赖执事调度得宜，常遣军舰梭巡江面要害之处，轰沉敌船无算，而偷渡之敌，势乃稍戢；此后倘能不时派舰巡弋于八卦洲、划子口、大河口、乌江镇等处，则敌计当不敢复逞也。镇定京都，厥功实伟，荦筹硕划，无任佩嘉。

陈绍宽率“楚有”等舰连日与敌军激战，切断了敌军的退路。31日，陈绍宽率舰从早上7时开始，与敌军鏖战3个多小时。在海陆军的压迫之下，敌军全线崩溃，渡江进犯的孙传芳部主力5万余人大部分被歼，只有少部分逃回江北。

战后，南京政府以海军保卫首都有功，明令嘉奖，并拨款五万元犒赏海军将士。陈绍宽所部因战功卓著，被授予“中流砥柱”大勋旗一面。南京政府特派国府委员蒋伟宾前往慰问，陈绍宽代表海军致答辞。龙潭战役使南京转危为安，陈绍宽也因此声望大增。

10月，陈绍宽率舰队参加了讨伐武汉唐生智的“第一次西征”。他率“楚有”等舰沿江西进，连克安庆、九江等重镇，突破多道防线，率先进占武汉，并出示安民，维持治安。接着，陈绍宽又率舰于次年1月相继进占岳州、长沙，并沿江堵截追击溃逃的敌军。在海陆军的联合进攻下，唐生智兵败逃走，武汉势力瓦解。

1928年12月，陈绍宽被任命为新设立的海军署署长，晋升为海军中将。

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服从国民政府。不久，蒋介石在北平与张学良会晤，电召陈绍宽前往研究海军统一的问题。当时，除了陈绍宽所在的闽系中央海军外，中国还有两支海军力量，

即东北奉系海军和广东粤系海军，闽系海军一直想将其收归统一。蒋介石也曾许诺，一旦东北易帜，全国统一，海军也将统一。陈绍宽抵达北平后，首先同张学良讨论了接收东北海军的问题。张学良虚与周旋，没有明确表态。

实际上，张学良要保住东北的实力，绝不肯将东北海军拱手让人。蒋介石为了得到张学良的支持，不得不作出让步。他与张学良会谈后，召见陈绍宽说：“海军统一问题，要等一个时候，现在汉卿不同意将东北海军交给海军署接管。”陈绍宽统一海军的愿望未能实现，回到下榻的北京饭店后，神情沮丧，连声叹道：“上当了。”

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陈绍宽被任命为“讨逆军”海军舰队司令，率领第二舰队的14艘舰艇参加了与桂军的作战。

4月12日，国民政府下令组建海军部，隶属行政院。6月1日，海军部在南京正式成立。杨树庄任部长，陈绍宽任政务次长，仍兼第二舰队司令。杨树庄在任海军部长的同时，还兼任福建省政府主席。他与蒋介石关系不睦，遂长住福建，海军部的工作实际由陈绍宽负责。1931年12月，杨树庄辞去海军部长职务，专任福建省主席。1932年元旦，陈绍宽就任海军部长，不久，晋升为海军上将。

陈绍宽任部长不到一个月便爆发了上海“一·二八”事变。2月1日，日本军舰炮击南京，陈绍宽请示还击。军政部长何应钦指示说：“蒋委员长正在考虑，你们听候命令吧。”十多分钟后，日舰停止炮击，蒋介石未下令还击。

次日，陈绍宽根据何应钦的电令，命海军各部扼守要隘，严阵以待，维持海防，保护治安。

由于海军严守政府命令，没有积极支持十九路军在上海的抗日行动，引起各界人士的强烈不满，有人甚至提出取消海军部。事变后，一些监察委员还联名呈文弹劾陈绍宽。陈绍宽在接见记者时表示，国人对海军指责，纯出爱国热情，至深感惭。但海军并非畏惧暴日，实因未奉政府命令，不敢擅自行动。

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在建建发动抗日反蒋事变，陈绍宽奉命指挥海军舰艇前往帮助镇压。十九路军被迫南撤时，经萨镇冰出面做工作，海军朝天鸣炮佯装进攻，并派船帮助，使十九路军安全渡过乌龙江，撤离福州。

1935年9月，陈绍宽叙一级上将。不久，当选为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次年12月，他当选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

(三)

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一直是陈绍宽的梦想。他主持海军工作后，致力于海军的各项建设，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推动海军缓慢地向前发展。

1928年8月，蒋介石参加了“咸宁”号炮舰的下水典礼，在演讲中提出了15年内建设60万吨海军的目标。5个月后，他参加“永绥”号炮舰下水典礼时又重申了这一目标。

陈绍宽见蒋介石如此重视海军，深受鼓舞，雄心勃勃地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但无情的现实很快击碎了他的梦想。由于战乱不断，内忧外患，经费十分困难，海军建设举步维艰。陈绍宽不得不花费大量精力，四处筹措资金。1929年9月，“民权”号炮舰建成下水。该舰共需120万元左右，其中舰身36万元完全是海军自筹，包括陈绍宽署长任内经常费节余款17万元、第二舰队公积费4万元、变卖废舰得款17万元、前海军总司令部拨款2万元，甚至包括陈绍宽所捐海军署长6个月公费计2400元。剩下的80多万元经费还没有着落。陈绍宽在军舰下水典礼上发表演讲时，当着在场的何应钦等军政要人的面，公开抱怨说：“至今天下水后，对于（民权）舰内的设备以及军备的添置，还不晓得款在哪里。所以，在这国内财政极端困难的时候，绍宽对于海军建设的前途实在没有多大的把握。”

尽管困难重重，陈绍宽仍不气馁，想方设法增强海军的实力。他一度亲自兼任江南造船所所长，打破洋人垄断的局面，依靠回国留学生，自行制造海军所需的舰艇。继“咸宁”、“永绥”、“民权”3艘炮舰建成后，又先后造出“逸仙”号轻巡洋舰、“民生”号炮舰和10艘“宁”字号炮艇，并对“建威”、“建安”号驱逐舰进行了大规模改造，建成轻巡洋舰，改名“大同”、“自强”。

由于经费紧缺，无力购买欧、美、日等国先进的大舰，陈绍宽于1930年同要价较低的一家日本小厂播磨造船厂签订合同，定造一艘新型的2600吨级的轻巡洋舰，名为“宁海”，制造费以东北大豆折价，分期付款。与此同时，按照日本图纸，在中国生产一艘同型舰，名为“平海”。“宁海”舰于1932年完工回国。“平海”舰1931年动工，1936年前往日本安装武器装备，次年4月完成。这两艘先进的巡洋舰成为中国海军的主力战舰。

1928年，中央海军所属第一、第二舰队和练习舰队总吨位为3万多吨。在此后的10年间，海军共建造和购买了17艘舰艇，改造了11艘，总吨位达到4万多吨，舰艇质量也有所提高。尽管距离60万吨海军的建设目标还相去甚远，但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取得这样的成就已属不易。

陈绍宽在积极添造军舰的同时，还十分注重人才的培养，努力发展海军教育。海军在1916年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派遣留学生，陈绍宽主持海军部工作后，重新恢复向海外派遣留学生的作法。从1929年以后，陈绍宽先后向英、美、德、意、日等国派出留学生90多人次。

陈绍宽在任期间还收回了由外国人把持、控制的水道测量权和引水权，并派员接管了东沙群岛灯塔，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尊严。

陈绍宽是个外表严肃，不苟言笑的人。他一向执纪认真，一丝不苟。有一年除夕，海军部某科的一名少校军官在科里值班，他的

一位朋友邀请他到家里吃年夜饭，他觉得朋友家离得很近，很快便能返回，且部里有总值班员值班，但去无妨。不料，陈绍宽除夕夜还坚持巡查，发现这名军官擅离职守，立即下令按规定将其革职。可怜这位心存侥幸的军官，不得不在大年初一卷铺盖走人。

陈绍宽办事认真，敢于坚持原则，严格按章办事。他在任内主持制订、颁发了海军铨叙法规，并严格执行，绝不徇私。一次，曾是陈绍宽直接上级的军政部政务次长鹿钟麟向他推荐一名军官，要求给予少校级员缺。陈绍宽按规定只同意以上尉级补用。蒋介石也曾要求陈绍宽给电雷学校校长欧阳格定少将军衔。陈绍宽坚持按章办事，只同意授予他上校军衔，使蒋介石和欧阳格都很恼火。

陈绍宽在军中素以廉洁著称，自律甚严，被视为军人中的楷模。早在他担任舰长时，他与众不同的品格便为人们所了解和称道。当时，舰上士兵出缺半月或一月，所余薪饷被舰长吃“空额”是司空见惯的事，而负责执行的是舰上的文书。所以，一般新舰长上任，别的人不带，只带文书。而陈绍宽无论到“通济”舰还是到“应瑞”舰接任，都是一个人独行，从不带文书。他在担任舰长时，从不吃空额中饱私囊，而是把所余薪饷拿来作士兵福利之用。陈绍宽接掌海军部后的十余年间，始终持身谨严，公私分明，两袖清风，从不沾公家便宜。他甚至连自己写信用的信纸、信封、邮票等都要专门放在一个抽屉里，绝不和公家的混用。他在离职返乡时，本可乘坐部里的汽车前往码头上船，但他认为自己已不在任，不应再使用公车，坚持自己租人力车前往码头候船。

陈绍宽 20 岁时妻子便去世了，也没有留下子女。以后他未再续弦，一直过着独身生活。他没有家室牵挂，全身心投入到了工作中，即使是节假日也很少休息，真正是以海军为家，把工作当成最大的乐趣，为海军的发展倾注了全部心血。

(四)

1937年4月，国民政府派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为特使、海军部长陈绍宽为副使，前往英国参加英王乔治六世的加冕典礼。临行前，蒋介石召见陈绍宽，就购买海军装备作指示，要求利用这次前往英国的机会在欧洲几个国家考察一下，尽量多购买一些海军需要的新式装备。但他同时也表示，国家财政困难，购买装备最好是赊帐，或者用东北大豆等土产来抵偿。

陈绍宽一直希望中国海军能拥有潜艇。虽然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都曾经做过努力和尝试，但都没有成功。此次赴欧，陈绍宽决心实现购买潜艇的目标，并尽快组建中国海军潜艇部队。临行前，他密嘱马尾要港司令李世甲，接到他的电报后，在四十八小时内速飞伦敦转柏林接收他订购的潜艇，成立海军潜艇舰队，并在国外进行短期训练。

陈绍宽等乘坐意大利的“维多利亚”号轮船首先到达了意大利。墨索里尼会见了他们，并陪同他们观看了意大利海军的海上演习和阅兵式。访问结束后，陈绍宽从意大利订购了6艘鱼雷快艇和1艘鱼雷快艇母舰。随后，陈绍宽等前往德国。希特勒、戈林接见了孔祥熙、陈绍宽等，并同意中国方面提出的用大豆与德国进行交易的方案。接着，陈绍宽等与德国方面签订了制造6艘潜艇和1艘潜艇母舰的合同。

参加完英王加冕典礼后，陈绍宽又重返欧洲大陆，先后前往比利时、荷兰、德国、意大利等国，继续就购买海军装备及培训人员等问题进行商谈。

“七·七”事变爆发后，陈绍宽立即中断在欧洲的访问，乘飞机回国，指挥海军抗战。

根据预定的作战计划，海军49艘舰艇陆续驶入长江，以集中兵力，拱卫京畿。8月6日，最高国防会议决定封锁长江，将长江中

上游的数十艘日本舰船和 300 多名日本海军陆战队员予以围歼。不料，出席会议的行政院院长汪精卫的秘书黄浚向日方提供了这一绝密情报，致使封锁计划失败。日本舰船迅速撤至长江口和黄浦江，严重威胁上海。

8 月 11 日，为阻止日军从江阴水路直抵南京，蒋介石下令阻塞江阴水道。陈绍宽亲赴江阴指挥封江，共在江阴水道沉下大小舰船 43 艘，约 6.4 万吨。另沉民船、盐船 185 艘和大量石料，形成了一条坚固的江阴阻塞线。

接着，陈绍宽命第一舰队司令陈季良率“平海”、“宁海”、“应瑞”、“逸仙”4 艘主力舰列阵前沿，守卫阻塞线，第二舰队随后支援。与此同时，陈绍宽还派舰破坏了通州下游的航路标志。

8 月 13 日，淞沪战役开始。日军为打通长江航道，进占南京，决定突破江阴封锁线。从 16 日开始，日军不断派飞机进行轰炸，守卫封锁线的海军各舰奋起反击。

9 月 22 日和 23 日，日军先后派出近百架飞机，向守卫江阴封锁线的海军各舰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舰上官兵英勇反击，击落敌机多架。但“平海”、“宁海”2 舰被日军击沉。

陈绍宽得知江阴战况，立即乘“中山”舰赶赴前线视察，并采取紧急措施，加固江阴阻塞线。25 日，“逸仙”号巡洋舰被日军飞机炸沉，陈绍宽命令海军第二舰队赶赴江阴接防，继续阻击日军。

主力战舰相继损失后，陈绍宽又命用拆卸下来的舰炮组成海军炮队，布置在长江两岸要塞，腰击企图沿江西进的日军舰船。

上海、南京失守后，日军沿长江西进，攻取武汉。为适应战时需要，海军部于 1938 年 1 月 1 日改组为海军总司令部，陈绍宽出任总司令。随后，海军集结了 40 多艘舰艇参加武汉会战，陈绍宽亲临前线部署指挥，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乘舰往来于马当、汉口、岳阳、长沙等地。海军部队在陈绍宽的指挥下，修筑炮台，布设水雷，封锁了航道，大大限制和阻滞了日军从水路的进攻。由于陆上防线

屡被日军突破，海军经常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被迫放弃阵地，沿江西撤。

武汉失守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海军总司令部几经辗转也迁往重庆。在陈绍宽的领导下，海军官兵克服种种艰险，坚持抗战。他们一方面加强对重庆的水上防卫，阻止日军从水路进逼重庆，一方面派出布雷游击队，深入敌后水域布设水雷，封锁航道。海军的作战行动有效地打击了日军，抗战期间，日军有 321 艘舰艇和船只被击沉击伤，其中绝大多数是被海军布设的水雷攻击所致。

（五）

陈绍宽生性耿直，为官清正，对官场腐败十分厌恶，不屑为伍。因此，他在上层屡受排挤、打击。但他总是坚持原则，毫不示弱。在海军建设问题上，陈绍宽经常与军委会和何应钦领导的军政部发生冲突。陈绍宽不善言辩，每次参加军事会议，讨论及海军问题时，他倘有不满意，总是不多申辩，挟起皮包拂袖而去，以示抗议。抗战初期，海军部改为海军总司令部，隶属于军政部，但陈绍宽根本不买何应钦的帐，军政部对海军也多方刁难，双方关系弄得很紧张。当时，海军制造水雷需要炸药，军政部在汉口的仓库里存有很多炸药，但海军多次申领，军政部始终不予批准，也拒绝拨给海军制造水雷的经费。

陈绍宽和蒋介石的关系最初比较融洽。蒋介石对陈绍宽非常赏识和信任，认为他是一个可以利用的人。所以，他排挤走了杨树庄，提拔陈绍宽执掌海军。陈绍宽对蒋介石也曾寄予很大希望，认为在他的支持下，海军会有较大的发展。但是，很快双方都彼此感到失望。蒋介石感到陈绍宽是个很难驯服的人，不会唯命是从。陈绍宽则对蒋介石分而治之的海军政策深为不满，海军中闽系、奉系、粤系三支力量不但始终没有统一起来，蒋介石还另外扶植了自己的嫡系海军——电雷系，使原本就已薄弱的海军力量更加分散。

抗战爆发前，陈绍宽与蒋介石的关系便开始疏远。1937年陈绍宽出访欧洲时，就有传言称他将被贬为驻外大使。当时英方为了表示对陈绍宽的支持，特意在招待宴会上将陈绍宽的位置排在各国海军首脑之前。

抗战期间，陈绍宽对蒋介石的指挥表示不满。他曾用嘲笑的口吻对部下说：“如果有人向委员长建议，只要坐在板凳上，两手执蒲扇，扇一扇就可当飞机去打敌人，他也会信以为真。”

1938年，马当失守一个月后，军事委员会下令追查海军失守的责任，给陈绍宽难堪。陈绍宽十分气愤，亲自草拟了一份措词强硬的报告予以反驳。他在报告中说，海军守江，未有一艘敌船闯过封锁线。而陆军闻风披靡，未战先逃，致使封锁线失守。不严查陆军责任，反追究海军，是何道理？陈绍宽的部下担心报告会激怒军委会，劝他把口气改得和缓一些。陈绍宽厉声说：“不准更动一字，即报上去。”

到了抗战中期，蒋介石的亲信陈诚取代何应钦出任军政部长。由于有蒋介石的信任和支持，加之海军地位下降，陈诚对陈绍宽更不客气，根本不把海军放在眼里。他上台后，紧缩海军经费，最后连海军仅剩的几艘舰艇的煤炭费也核减了。他还采取各种办法不断分化瓦解闽系海军的力量，使陈绍宽地位不稳，处境更加困难。

1945年5月，以宋子文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前往美国旧金山参加联合国宪章会议，陈绍宽作为海军顾问参加了会议。会议结束后，陈绍宽又前往英国。不久，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陈绍宽立即从伦敦乘飞机赶回重庆。随后，他前往南京参加了受降仪式。

为了排挤陈绍宽，蒋介石命令海军参谋长曾以鼎统一负责海军接收工作。陈绍宽不肯示弱，命第二舰队司令李世甲和海军总司令部少将署长曾国晟分别前往厦门、台湾、澎湖和长江沿岸接收日伪舰船。由于曾以鼎体谅陈绍宽的苦衷，未予干涉，海军接收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为了进一步削弱陈绍宽的实力，陈诚于1945年春趁陈绍宽在美国参加会议之机，将海军陆战队第一独立旅改编为陆军，原有官兵大部分被遣散回籍。9月，陈诚又在军政部设立海军处，自兼处长，从闽系中分化出来的实力派人物周宪章任副处长。海军处设1个办公室和人事、训练、军务、供应4个组，专门负责海军行政、教育、训练和建造等事宜，审批海军总司令部的公文，这实际上架空了陈绍宽的海军总司令部。

1945年10月，军事委员会命陈绍宽率“长治”号等军舰从南京开往渤海湾，堵截从山东半岛渡海前往辽东的八路军。陈绍宽此时与蒋介石、陈诚的矛盾已十分严重，他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极为不满。于是，他借口“长治”舰需要修理，拒绝率舰北上，并请拨给油费。随后，陈绍宽率“长治”舰前往台湾视察左营军港。

蒋介石对陈绍宽公然违抗命令极为恼怒，电令陈绍宽立即返回重庆。陈绍宽抵达左营的第二天便被迫乘飞机回到重庆，结果，他受到了蒋介石的严厉斥责。

是年12月，对蒋介石彻底失望的陈绍宽提出辞职。蒋介石准其所请并下令撤销海军总司令部，将海军处扩大为海军署，陈诚兼任署长，周宪章任副署长，负责接收海军总司令部及其业务。陈诚派周宪章率陆军警卫连将海军总司令部包围，实行武力接收，先把海军警卫连缴械，然后召集军官们点名训话，并按将、校、尉级分别隔离软禁。

一个月后，蒋介石抵达南京，提出要召见陈绍宽。住在南京下关饭店的陈绍宽得知消息后，当天便乘船离开南京，返回福建老家。

（六）

陈绍宽回到庐雷老家后，杜门谢客，不进城参加任何活动，只是偶尔进城去看望他敬佩的老前辈萨镇冰。其他时间，陈绍宽或在

家中阅览史书、报刊，练习书法；或在园中种植蔬菜花果，过着清静悠闲的生活。

1947年4月，国民党政府委任陈绍宽为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他不予理睬。蒋介石派人给他送钱，他也拒不接受。1949年福州解放前夕，福建省政府主席朱绍良奉蒋介石之命两度前往牯雷，要陈绍宽去台湾，都被陈绍宽拒绝。朱绍良第二次前往牯雷劝驾时，带着蒋介石邀请陈绍宽赴台“共襄国是”的函件。陈绍宽态度非常坚决，对朱绍良说：“蒋委员长如一定要我飞往台湾，我决在飞机上跳下。”朱绍良无奈，只得作罢。

福州解放后，福建省人民政府主席张鼎丞亲自前往牯雷村邀请陈绍宽出来工作。新中国建立后，陈绍宽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福建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副省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福建省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等职。他还曾先后赴苏联、印尼、缅甸等国参观访问。陈绍宽在担任副省长的20年中，还多次到国内各地参观考察，足迹遍及大江南北。

1969年7月30日，陈绍宽因患胃癌医治无效，在福州去世，终年80岁。由于十年动乱的影响，直至1979年3月才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陈绍宽的骨灰安放在福州西门外文林山革命陵园。

舰长必与舰共存亡

——记萨师俊

1938年10月，中国海军历史上最富传奇色彩的战舰“中山”号炮舰在湖北金口被日军飞机炸沉。舰长萨师俊率全舰官兵英勇抗敌，最后壮烈殉国，写下了抗战史上悲壮的一页。

（一）

萨师俊是海军名宿萨镇冰的侄孙，字翼仲，生于1895年，福建闽侯（今福州）人。萨师俊的父亲萨君谦，是位乡绅，和妻子罗氏有3个儿子，萨师俊排行第二。

萨师俊的祖先是蒙古人，家中有尚武的传统。所以，萨师俊自幼便开始学习骑射。初学时，萨师俊经常从马上摔下来，弄得浑身是伤。一次，他摔成重伤，人们劝他不要再练了，他却说：“既然要学，就一定要把它学好，不能半途而废。”伤愈后，他比过去练得更加勤奋刻苦。

萨师俊从小仰慕那些仗义疏财、解危济困的侠士，经常帮助别人。有一年冬天，萨师俊在路上遇到一个衣不蔽体、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乞丐，对他非常同情，便把自己带的钱都给了他。有人见萨师俊对一个素不相识的乞丐如此慷慨，感到不可理解，认为这样做太过份了。萨师俊说：“我这样做不是为了沽名钓誉，要博得一个乐善好施的美名，而是真心想救他一命。既然要救人，就要救活，怎么能吝惜这点儿钱呢？”

萨师俊出生的那一年，清朝的北洋海军在威海兵败，全军覆

没。在以后的十余年间，中国海防十分空虚。少年时代的萨师俊经常听老人们讲述中国海军甲午战败的往事，也经常看到列强的军舰在中国沿江沿海耀武扬威，感到非常气愤。他很动情地对自己的哥哥和弟弟说：“强国莫急于海防，忠勇莫大于卫国。我们兄弟应当去学习海军，这也是发扬我们家族尚武的传统。”

或许是命运的有意安排，后来萨氏三兄弟都考入了海军学校。萨师俊考入烟台海军学堂，哥哥萨师同考入江南水师学堂，弟弟萨本炘考入福州船政学堂。以后，兄弟三人都留在海军服役。

1913年7月，萨师俊从烟台海军学校毕业，为该校第八期学生。萨师俊毕业后，被分配到练习舰队任职。

最初的几年，他担任“通济”号练习舰三副等职，后调往海军机关任职。1924年4月，他升任海军闽厦警备司令部副官处处长。此时，他的兄长萨师同任司令部轮机处处长。

以后，萨师俊又担任过“江贞”、“建威”（一说“建安”）舰副长、“公胜”炮艇艇长、“青天”测量舰舰长和“顺胜”、“威胜”、“楚泰”各舰舰长，后又任第一舰队司令部参谋。萨师俊担任“顺胜”舰长时，率舰从上海航行到福建，开创了我国历史上内河炮舰海上远航的先例。

萨师俊是一位服从命令，尽职尽责的优秀军官。他为人正直，性格倔强，时人评价他“倜傥有奇气”，“卓犖有大志”，是海军军人的模范。他常说：“服役海军，必勤奋忠勇，力争上游。”萨师俊非常善于团结部属，治军恩威并重。士兵有疾痛，他勤加慰勉；部属有困难，他解囊相助。同事们钦佩他的坚毅勇敢，认为他将来在海军界的发展不可限量，甚至有人说他以后会成为中国的纳尔逊。萨师俊听到这些赞誉却说：“我不过是勉尽责任而已，任之所在，生死以之。我怎么敢指望能有英国海军统帅纳尔逊那样的殊勋伟业，但愿我能像纳尔逊那样效命疆场，为国尽忠。”

萨师俊非常仰慕古往今来的忠义之士，每当谈到他们的功业

和气节，他都慷慨激昂，赞佩不已，忠勇气概，溢于言表。萨师俊以他们为榜样，勉励自己，教育部属，人们都说他有古名将之风。

(二)

抗战前夕，萨师俊出任海军第一舰队所属“中山”舰舰长，军衔为二等中校。

“中山”舰是一艘具有革命历史意义的战舰。该舰原名“永丰”，是清末筹办海军大臣载洵、萨镇冰 1910 年赴日、美考察海军时，在日本三菱造船厂订造的一艘炮舰。该舰排水量为 780 吨，舰长 62 米，马力 1350 匹，航速每小时 13.5 海里，舰上配有阿式 105 毫米炮 1 门，阿式 75 毫米炮 1 门，阿式 3 磅炮 4 门，马式 1 磅炮 2 门，配员兵 108 人。与“永丰”舰同时订造的还有由日本川崎造船厂承建的“永翔”炮舰，两舰造价均为 68 万日元。

1913 年，“永丰”舰建成来华，编入海军第一舰队。1915 年底至 1916 年初，“永丰”舰响应孙中山护国讨袁的号召，由当时的海军总司令李鼎新和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懌率领，参加了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运动。1917 年，“永丰”舰又在海军总长程璧光的率领下，南下广州，参加了孙中山发起的反对段祺瑞独裁统治的护法运动。

1922 年 6 月 16 日，广东省长、粤军总司令兼陆军部长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叛乱，非常大总统孙中山脱险后登上“永丰”舰避难。此后，孙中山坐镇“永丰”舰，指挥仍忠于他的海军护法舰队各舰，反击陈炯明叛军，坚持了 56 天。

1924 年 11 月 13 日，孙中山应冯玉祥之邀前往北京“共商国是”，“永丰”舰又承担了护送任务。次年 3 月 12 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4 月 16 日，为纪念孙中山，广东省长胡汉民下令将“永丰”舰改名“中山”舰。

1926 年 3 月，蒋介石制造了著名的“中山舰事件”，借此打击

共产党。后来，“中山”舰留在广东，成为广东海军的主力战舰。1932年8月，“中山”舰脱离广东，加入中央海军，编进第一舰队。

萨师俊接任“中山”舰舰长后不久，抗战爆发。1937年9月22日，江阴海空战开始。海军第一舰队司令陈季良指挥第一舰队主力战舰，与日军飞机展开激烈战斗。经过两天血战，“平海”、“宁海”两艘最新式的轻巡洋舰被日军炸沉，海军官兵伤亡很大。萨师俊指挥“中山”舰护送海军部长陈绍宽紧急赶往最前沿，视察军情，重新调整作战部署。

经过2个月的苦战，中国海军损失惨重，大部分战舰被击毁，其余舰只沿江西撤，继续抵抗日军。

1938年1月，海军总司令部将残存军舰编成两个舰队，“中山”舰仍编归第一舰队。当时，海军总司令部撤至汉口、岳阳办公，有数以千计从前线撤下来的海军官兵来到岳阳，急需收容管理。2月1日海军成立了特务队来负责这项工作，任命萨师俊兼任队长，暂驻岳州中学，不久又移驻湘潭。萨师俊将特务队收容的残废伤病官兵，分批转移到马尾海军抗战受伤士兵休养所治疗、休养，把余下的官兵分队加以训练，然后陆续补充到各舰艇和武汉、洞庭湖等海军炮队。

1938年6月，日军向武汉发动总攻。中国海军舰队主力集中在岳阳地区，防卫洞庭湖和长江水面。各舰采用袭击敌舰船和布雷封锁水道等战术阻挡日军的水路进攻。萨师俊率“中山”舰担负布放水雷及运输任务，参加了多次战斗，与友舰一起，先后在葛店、新洲、田家镇、赵家矶一带炸沉、击毁日军舰船19艘，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恼羞成怒的日军派出大批飞机搜索中国海军舰艇。7月20日，27架日军轰炸机空袭了驻守岳阳的中国舰队。当时弹下如雨，各舰高射炮集火迎击，爱国官兵抱定有我无敌的决心，奋勇抗击。经过激战，敌机逃走。中国海军的“江贞”、“民生”2舰被炸搁浅，官

兵伤亡 34 人。当晚，激战之后的萨师俊对战友说：“军人以身殉国，遗嘱已立，生死祸福置之度外。今后，惟有一腔热血与敌周旋。”足见其抱定了誓死抗敌的决心。

当战事正紧的时候，海军总司令部任命萨师俊为鄱阳湖警备司令，调他到岸上工作。萨师俊不愿离开他心爱的“中山”舰，所以力辞不就。他说：“以前打内战，在岸上，在舰上，都算不了一回事。而这次是神圣的抗日战争，我怎么能到岸上去躲避呢？就是再大些的官我也决定不就。”萨师俊认为，“现在我们除了以血肉之躯硬拼之外，最重要的工作是要国人知道，中国极需要海军，只有建设强大的海军才能维护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

由于日军迫近武汉，国民政府迁往重庆。10 月初，“中山”舰奉命从岳阳开赴武汉外围，在武汉上游金口至新堤一带江面巡弋，担负掩护部队转移和警戒任务。尽管当时形势十分险恶，日军飞机不断前来轰炸，已有多艘中国军舰受创，但“中山”舰仍继续坚持战斗。

（三）

10 月 24 日上午 9 时，“中山”舰巡逻后停泊在金口赤矶山附近江面。这时，突然从武汉方向飞来一架日军侦察机，萨师俊下令准备迎击。日机从舰尾正方向袭来，“中山”舰舰尾高射炮先发制敌，向日机猛烈开火。日机迅速转向，在“中山”舰右舷绕转一周，然后向武汉方向飞去。

萨师俊见敌机意在侦察，料想将有大队敌机来袭，令全舰作好充分准备，严阵以待。当时，“中山”舰上的主炮和副炮已被拆下，安装到沿江要塞，剩下的主要武器有：德国制造的 20 毫米高射炮 1 门，瑞士制造的 20 毫米机关炮 1 门，英国制造的 37 毫米机关炮 2 门和捷克式机关枪 2 挺。安装在前驾驶台的 2 门英式机关炮只能打 60 度以下的仰角，安装在舰尾的 2 挺捷式机关枪也不能对空

射击。全舰只有安装在舰尾的1门德制高射炮是有效的防空武器。因此，“中山”舰的火力相当薄弱。

上午10时许，“中山”舰奉命启航执行新的任务，准备起锚后向武汉方向行驶。约11时，6架日军轰炸机从武汉方向袭来。敌机在“中山”舰上方作高空盘旋一周后，朝北向大军山方向飞去，然后来了一个大迂回，掉头向“中山”舰猛扑过来。萨师俊指挥全舰官兵早有准备，枪炮齐发，向敌机猛烈射击。敌机遭到顽强抵抗，无法选准轰炸目标，只好盲目扫射、投弹。一时间弹如雨下，爆炸声震耳欲聋。“中山”舰四周掀起一个个巨大的水柱。萨师俊不顾危险，站在驾驶台上，从容不迫地指挥着战舰。他身着肩章、袖口都绣有金线的崭新呢制军服，显得格外英武、威严。他冷静地观察着敌情，高声下达各种命令。激烈的战斗不但没使他有半点畏惧，相反，壮观的战斗场面使他周身热血沸腾，勇气倍增。“中山”舰在他的沉着指挥下，进退得宜，回击有力，使敌机无隙可乘。

“中山”舰与6架敌机厮杀了一个多小时，敌机始终没有占到便宜。不料，由于长时间发射，舰首瑞士造机关炮突然出现故障停止了火。对空炮火只剩下舰尾的德国造高射炮，火力顿减。敌机见“中山”舰舰首机关炮不再射击，便选择舰首方向俯冲投弹。由于舰尾高射炮被桅杆挡住，无法拦击从舰首方向俯冲而来的敌机，使敌机袭击得逞。敌机投下的第一颗炸弹落在“中山”舰左尾侧高射炮附近水中，掀起巨大的水柱倾泻到舰上，猛烈的冲击力震倒了舰上防护用的沙包和防弹片设备，沙水渗到炮上，炮门略受影响，舵也被炸坏，舵机失灵，所幸无人受伤。

接着，敌机投下的第二、第三颗炸弹都落在“中山”舰右舷附近，将锅炉舱舱舷的钢板炸坏，江水涌入舱中。虽经奋力堵塞，但不到3分钟已积水4尺多，致使炉火被淹，锅炉无汽，军舰失去动力，随波起伏，颠簸不定。由于船舱进水，整个战舰向右倾斜约25度。

萨师俊在驾驶台上指挥全舰官兵一面发炮拦击敌机，一面奋力救火塞漏，抢救战舰。萨师俊军服肩章和袖口上的金线，在阳光的映照下闪闪发光。官兵们怕舰长成为敌机的目标，都劝他摘下来。萨师俊泰然地说：“军服是国家名器的象征，决不可更换。常人死犹正衣冠，何况我们革命军人，为国殉职岂能服装不整。”说罢，他整理好军服，紧握手枪，继续指挥。

激战中，突然一颗炸弹击中舰首，巨大的爆炸使全舰剧烈震动，并引爆了驾驶台上的机关炮炮弹。舰首高射炮被炸毁，驾驶台顿时血肉横飞，烈焰升腾，大火迅速燃烧到了前甲板。负责操纵舰首高射炮的1名上士和驾驶台上的1名下士舵工及信号兵和8名炮手在爆炸中当场牺牲。正在指挥战斗的萨师俊双腿被炸断，左臂也受重伤，血肉模糊。但他忍着剧痛，紧紧抱住驾驶台护梯，不使自己倒下，继续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官兵们见舰长负伤，急上前扶他离开驾驶台。萨师俊推开他们说：“我还能指挥。我是舰长，你们不能这样，坚守岗位是我的职责。”

由于战舰受损严重，情况危急。一些官兵面对险恶的形势有些惊惶失措。萨师俊高声鼓励他们坚持战斗，为有革命传统的“中山”舰争光。官兵们见舰长虽身负重伤仍毫不退缩，都镇定下来，回到各自岗位，继续战斗。

这时，敌机见“中山”舰燃起熊熊大火，更加猛烈地进行轮番轰炸。“中山”舰上仅有的后高射炮也因发炮太多，炮闩和炮膛受水沙及火药瓦斯卡塞不灵，无法再发射。敌机因此更加肆虐。敌机投下的炸弹在“中山”舰左舷锅炉舱和机舱附近爆炸，舰舷钢板洞穿，江水汹涌而入。由于左舷洞大，进水很猛，致使原来向右倾斜的“中山”舰，转向左舷严重倾斜，达45度，已不堪作战，整个战舰顺水在江中旋转飘流，失去了控制。

副舰长等请示萨师俊下达弃舰命令。萨师俊见战舰即将沉没，忍痛下令官兵们离舰，但他本人坚持留在舰上。他说：“中山舰是国

父的座舰，我不能放弃这艘象征革命精神的战舰。我是舰长，舰长必与舰共存亡！”

官兵们见舰长不肯离舰，也都群情激昂，表示要与战舰同归于尽。萨师俊命令大家迅速离舰，他说：“没有牺牲者，不能体现我中华民族之忠义；没有生还者，不能杀敌卫国。你们要为国家报仇，为我和中山舰报仇，这是大义。现在大家一起去死又有什么意义呢？”

官兵们深深地被萨师俊的英雄气概所感动，有的竟失声痛哭。他们不忍心丢弃舰长而逃生，坚持留在舰上。副舰长见不能说服萨师俊，其他官兵也不肯离舰，便下令从左舷放下2只舢板，命勤务兵强行将萨师俊背起，在众人的帮助下抬上了舢板。

装满约20名官兵的2只小舢板刚刚离舰不远，敌机便轮番俯冲而来，用机枪疯狂扫射。小舢板上的官兵大多牺牲，几个士兵扑到萨师俊身上，舍身掩护自己的舰长，但终未能挡住敌机的枪弹。萨师俊壮烈殉国，与舢板一同沉入江中，时年43岁。

当“中山”舰缓缓下沉之际，适有一艘帆船驶来，舰上幸存人员因而获救。官兵们刚刚离舰，“中山”舰舰尾即先沉入水中，接着舰首昂然而起，随后一声巨响，这艘英勇的战舰沉入了江底。因为萨师俊牺牲时身着高级军官制服，“中山”舰又曾是陈绍宽的座舰，所以，“中山”舰战沉后，敌人曾大肆吹嘘，称中国海军总司令阵亡。

“中山”舰与敌机激战约2个小时，牺牲25位官兵，重伤、轻伤22人。全舰实有99人，伤亡共47人，是抗战期间单舰伤亡人数最多的一次。而萨师俊则是在战场上牺牲的职务和军衔最高的海军指挥官。

萨师俊率“中山”舰英勇抗日，血战金口，直至为国捐躯，其忠勇之气概，成为抗战军人的楷模。国民政府根据萨师俊烈士的抗日战功，特追赠他为海军上校。

要有鱼腹葬身的壮志

——记陈季良

俄国十月革命两年后，在寒冷的西伯利亚，中国海军一位年轻的舰长，以极大的勇气，向一支装备简陋的苏俄红军提供舰炮和弹药，打败了驻防庙街的日本干涉军，从而引发了著名的“庙街事件”。这位年轻的舰长 18 年后又指挥中国海军在江阴要塞英勇抵抗日本侵略军。他就是海军抗日名将、第一舰队中将司令陈季良。

（一）

1883 年 10 月 13 日，陈季良出生于福建闽侯（今福州）一个官宦人家，父亲陈镜河是位知县。陈季良原名世英，字季良。1920 年以后，因为“庙街事件”的缘故，陈世英这个名字不能再用了，遂以字行。

陈季良的母亲吴氏是福建宁德人，明朝时著名将领戚继光曾在那里抗击过倭寇。所以，陈季良从小就常听母亲给他讲戚继光抗倭的故事。一次，陈季良随母亲回外婆家，登上望楼远眺大海，看到不少渔民在海滨泥埕乘橇捕蛏，橇在泥上疾走如飞，十分自如。母亲告诉他，当年倭寇来犯的时候，戚继光就曾用这种橇为武器，当潮水退下去的时候，命士兵们乘橇冲过泥淖，斩杀倭寇，夺其战船，获得大胜。母亲的故事给陈季良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影响着他幼小的心灵。从少年时代起，陈季良就十分崇拜戚继光、林则徐等民族英雄，希望自己能有一天象他们一样，杀敌报国。

陈季良家是一个读书世家，曾祖和祖父都是举人，父亲也是读

书人。受此影响，陈季良的哥哥和弟弟们都习文，唯有他后来投笔从戎。1897年，14岁的陈季良考入江南水师学堂，成为该校第四期驾驶班学生。

陈季良的成长与不断加深的民族危机相伴随。他出生的第二年，爆发了中法战争，福建海军在马尾遭到重创，几乎全军覆没。次年，中国以屈辱退让结束了这场战争。整整十年后，北洋海军在威海重演全军覆没的悲剧，中国又输掉了甲午战争。当陈季良满怀强国梦想走进江南水师学堂的时候，各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万里海疆，门户洞开。国家的衰败深深地刺痛了陈季良的心。在校学习期间，他时刻不忘中国海军甲申、甲午战败的屈辱，学习非常勤奋刻苦，并自觉磨练自己。除了认真学习专业课程外，陈季良还十分留意总结以往海战的经验和教训。他认为，甲申、甲午海战的失败主要是因为政府决策者和战场指挥者缺乏必胜的信心和决心。如果象戚继光、林则徐那样坚决抵抗，入侵之敌是完全可以被打败的。

1905年3月，陈季良以优异的成绩从江南水师学堂毕业，派往“海圻”号巡洋舰见习。这年的阴历11月，陈季良被正式授职，担任“建安”号驱逐舰的粮饷副。1909年夏天，他被任命为“海容”号巡洋舰鱼雷大副；1911年阴历9月，陈季良又转任该舰枪炮大副。

当时，清朝统治日益反动腐朽，孙中山等发起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席卷全国。强烈的爱国情感使陈季良开始逐渐接受革命党人的思想，他深深感到，中国衰败不堪、备受欺凌的局面是清廷腐朽统治的结果，清廷已成为中国振兴的障碍。陈季良还接受了民族革命的观念，认为清廷的统治是对汉族人的征服和压迫。陈季良虽然官职不高，但却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志向。他常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华好儿女岂能‘白了少年头，空悲切’，甘当亡国奴？”

1911年10月10日，革命党人发动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爆发。

清廷立即派陆海军前往武汉镇压革命军。陈季良所在的“海容”舰也奉命赶往武汉江面集结。

清廷对革命党人的残酷镇压和对平民百姓的野蛮屠杀，激起越来越多的海军官兵的不满和愤慨，一些受革命思想影响的下级军官和士兵骨干开始秘密联络，策动倒戈。“海容”舰是海军统领萨镇冰的座舰，舰长是满族人。因此，在该舰策动起义，困难性和危险性更大。但陈季良等人仍冒着生命危险积极活动，组织本舰官兵起义，并与“海筹”、“海琛”等舰官兵加紧联系，以便采取联合行动。陈季良还说服正副炮手在炮击武汉革命军时，不是把炮弹射向空中，便是射入江中，始终未向武昌城内发射一炮。

由于下级军官和士兵的积极策动，受到革命思想影响的黄钟瑛等管带转而同情和支持海军倒戈。不久，在武汉江面的清朝海军主力宣布起义，加入了革命军。

“海容”等舰起义后，参加了支援革命军的战斗。11月19日下午，“海容”舰猛烈炮击了清军阵地。日本驻汉口总领事馆的情报描述说，“海容”舰“在驶出租界区域水线之一刹那，倏见火光一闪，开启全部炮火，猛射江岸官军炮兵阵地，迫近江岸至五百米以内，连续猛射。其炮弹开始爆炸于车站左近，继即显出其瞄准很准确，江岸炮兵阵地内沙尘飞扬，村落起火，官军炮火最后不得不归于沉默，车站后方复次第起火。海容乃以堂堂英姿，悠然驶去。”

此次轰击，“大挫清军威势，清军汉口东方阵地几全为之动摇。”而“海容”舰只受了些轻微的损失。

此战胜利，作为枪炮大副的陈季良是功不可没的。此后，“海容”舰又多次参加战斗，有力地支援了革命军。

1912年1月，陈季良随“海容”舰参加了孙中山发起的北伐，当时“海容”舰为海军次长、北伐海军司令汤芎铭的座舰。后来因为南北和谈，北伐很快结束了。

(二)

民国建立后,陈季良调任“湖鹗”号鱼雷艇艇长,1913年1月授海军少校。1914年10月,陈季良又升任第二舰队“江亨”号炮舰舰长。

1919年7月,北洋政府为收回久为沙俄强占的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三江航权,重建三江江防,决定派军舰北上,组建吉黑江防舰队。北上舰队由陈季良指挥的“江亨”舰和“利绥”、“利捷”号炮舰及“利川”号武装拖轮组成,另派“靖安”号运输舰拖带、护送。21日,北上舰队从吴淞口出发,经过10多天的航行,经东海、黄海、朝鲜海峡和日本海,历经艰险,抵达海参崴。停留数日后,北上舰队继续前进,穿过鞑靼海峡,于9月中旬抵达三江交汇入海的俄国重镇庙街(尼古拉耶夫斯克)。北上舰队官兵在庙街受到当地数千华侨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款待。“靖安”舰完成了拖带、护送任务后,返回上海。已升任中校舰长的陈季良接任舰队指挥官,负责指挥各舰经黑龙江进抵松花江。

中国政府收回三江航权,重建东北江防的努力,遭到盘踞远东的高尔察克白俄政权及其支持者日本的阻挠。日本乘协约国武装干涉俄国十月革命之机,派重兵侵入西伯利亚。仅在庙街,日本就驻有陆军千余人,还有包括4艘驱逐舰在内的一些海军舰艇。中国北上舰队进驻庙街途中,不断遭到日本海军军舰的拦截和追踪。

北上舰队在庙街稍事休整后,准备在结冻封江前经伯力前往哈尔滨。不料,舰队行至距伯利不远的西伯利亚大铁桥附近,遭到白俄军炮火袭击和日本海军的阻截,被迫退回庙街,等待政府通过外交渠道解决。

由于不久后黑龙江封冻,北上舰队已无法再前进。经中国政府交涉,白俄当局被迫同意北上舰队4舰在庙街过冬。

中国海军官兵被困庙街,远离祖国,受到白俄当局的种种刁

难，幸得当地华侨大力帮助，才安顿下来。因此，海军官兵对白俄当局和日军十分痛恨。

10月下旬，日本海陆军主力因封江而撤离庙街。苏俄红军乘敌人兵力空虚之际，发动了对庙街的进攻。

白俄军负隅顽抗，并派军官来见我北上舰队指挥官，请求中国海军官兵协助其抵抗红军。

陈季良对白俄在日本人的支持下阻挠我行使三江航权十分愤慨，拒绝了白俄军官提出的借兵要求。他推托说：“我军暂驻此地，乃是客军，不应插手贵国的内部事务。而且，舰上多是水手，不谙陆战，即使参战也于事无补。”白俄军官再三请求，陈季良坚决不允，他们只好悻悻而去。

不久，苏俄红军攻入庙街，白俄军和部分协防的日本军向东败退。红军浩浩荡荡开进庙街，有骑兵团、步兵队和滑雪队等，约二千多人，军容甚壮，其中有很多是华人。

中国海军官兵目睹红军军纪严明，深受百姓拥护，普遍对其抱有好感。陈季良等军官打算前往拜会红军指挥官，不想，红军司令官和副司令先行前来求见。这支红军部队的司令官是一位约四、五十岁的独臂军官，副司令是一位年仅二十多岁的女军官，他们对中国海军官兵拒绝帮助白俄军进攻红军表示感谢。此后，红军官兵经常到我海军官兵的宿舍闲谈，彼此感情十分融洽。每次红军官兵来，都受到我海军官兵的盛情款待。

11月的一天深夜，日本宪兵从日本领事馆向红军驻地发动了突然袭击。由于对日军缺乏防范，红军损失严重，司令官牺牲，住所也被攻占。但是，红军不久便调整力量反击日军。经过几天激战，将日军围困于领事馆内。由于领事馆防守坚固，红军缺乏炮火支援，所以久攻不下。于是，红军派代表特来向陈季良求助，请求借我海军舰炮给红军使用。陈季良感到事关重大，请红军代表暂回，容与其他军官商议后再予答复。

陈季良连夜召集 4 舰军官开会，讨论红军的要求。4 舰军官对日军素无好感，此次庙街受阻，更增对日军的仇恨。相反，他们对红军感情颇深。因此，军官们一致决定借炮给红军，打击一下日军的嚣张气焰。

次日，红军派 3 名军官前来听候答复。陈季良遂将“江亨”舰 3 英寸边炮 1 门、“利川”舰 5 响格林炮 1 门借给红军。同时，给红军钢弹、开花弹各 3 发，格林炮弹 3 排共 15 发。

红军用从中国军舰上借来的 2 门炮，向日军发动猛攻，很快攻克日本领事馆，占领了日军盘踞的洋楼，击毙日军数十人，俘虏 130 多人。

1920 年 3 月，江水渐渐化冻，日本海军 20 多艘舰艇驶至口外。红军将所借之炮归还，并建议我海军 4 舰驶往马街暂避，以免日军报复。

于是，陈季良决定率舰队驶往马街，各国侨民和部分华侨也要随同。红军遂派出数十艘帆船，帮助我舰队运送侨民抵达马街。

不久，日本舰队和白俄军舰开到马街，向我 4 舰开炮示威。接着，日本军官来到舰上调查 4 舰帮助红军情形，并到处搜集证据。陈季良早已预作准备，枪炮部门连夜改编了舰上武器、弹药库存表册，日军在舰上的调查一无所获。恼羞成怒的日军扬言要击沉我 4 舰，杀死舰上所有的中国官兵。

陈季良一面与日军周旋，一面命各舰作好准备，一旦敌舰炮击，即予回击，然后打开水塞放水，自沉军舰，不使资敌。陈季良和舰上官兵都表示要团结一心，绝不向日军妥协，抱定必死的决心。

各协约国应中国政府要求，出面调停，认为中国海军帮助苏俄红军一事多系传闻，无法确证，中日双方应派员进一步审查。于是，从 1920 年夏天开始，中日双方组成调查委员会，对庙街事件进行调查。陈季良与其他几位舰长和副舰长逐一接受委员会的审问，历时 2 个星期。结果，日本方面没能找到中国海军帮助苏俄红军的确

凿证据。

后来,日本方面找到了几个红军发射的炮弹弹壳,认出是日本的产品。因为“江亨”舰是清廷在日本川崎船厂订造的,舰炮和炮弹也都是从日本购买的。因此,尽管陈季良等中国官兵一口咬定与此事无关,使日本方面无法获得更进一步的证据,但日本方面仍认定中国海军帮助了红军对日本领事馆的进攻,所以不肯善罢甘休,坚持要求中国政府就此事向日本政府道歉,并严厉处分北上舰队的指挥官。

中国北洋政府迫于日本的压力,在沈阳组织军事法庭对陈季良进行审判。最后判决将陈季良革职,永不叙用。

(三)

“庙街事件”后,北洋政府海军部并没有执行军事法庭的判决,而是调陈季良南下到上海,担任海军长江上游舰队的队长。但陈季良原名“世英”不能再用了,遂以字行。

1922年1月,陈季良出任“楚观”炮舰舰长。8月,他又升任“海容”巡洋舰舰长。该舰是中国海军当时仅次于“海圻”巡洋舰的第二大主力战舰之一,排水量为2950吨,由德国伏尔铿厂建造,1898年建成来华。1917年程璧光率“海圻”、“海琛”等舰南下参加护法后,“海容”和“海筹”2舰便成为北洋政府海军最大的战舰。陈季良出任“海容”舰舰长,说明他已成为海军中的一位重要将领。1923年1月,陈季良晋升为海军上校。

由于军阀混战,海军经费没有保障。于是海军当局决定夺取富庶的厦门,通过收取税款解决海军经费问题。从1923年7月起,陈季良率“海容”舰参加了海军3次攻打厦门的战斗。1924年5月,海军攻占厦门,赶走了当地的军阀,设立了闽厦海军警备司令部。是月,陈季良晋升为海军少将。次年2月,陈季良升任海军第一舰队司令,兼闽厦海军警备司令。

1926年7月，广东革命政府开始北伐。这时，国民党积极策动海军倒戈，支持北伐军。这年10月，北伐军东路军入闽作战，军阀张毅的第一师从漳州向福州退却，企图与福州城防司令李春生会合，作垂死挣扎。

北伐军派员与陈季良联络，请海军提供帮助，陈季良表示愿与北伐军合作。他派出海军陆战队拦截张毅部，并派军舰封锁重要水域，阻止敌船运送部队和给养。经过激战，海军配合北伐军全歼张部，总计一万余人。

接着，陈季良又向福州城防司令李春生发出警告，并派舰前往震慑。随后，陈季良指挥各舰运送、掩护北伐军开进了福州城。

陈季良率海军主力在福建率先倒戈，沉重打击了北洋军阀的统治，有力支持了北伐军的进军。在海军的帮助和支援下，北伐军很快占领了福建。

1927年4月，中央海军正式易帜，加入国民革命军。陈季良仍任海军第一舰队司令，率海军主力巡防吴淞一带，主要防范属于北洋政府的东北海军的袭扰。

1929年6月，南京政府海军部成立，陈季良任常务次长兼第一舰队司令，是海军中地位仅次于部长杨树庄和政务次长陈绍宽的第三号人物。1930年4月，海军设立陆战队总指挥部，陈季良兼任总指挥。1932年元旦，陈季良接替升任部长的陈绍宽担任政务次长，仍兼第一舰队司令。

是年，上海爆发“一·二八”事变，十九路军奋起抵抗日本侵略军。驻防高昌庙的陈季良与海军部常务次长李世甲紧急研究时局，并就海军如何行动向上峰请示。当时，国民党南京政府采取退让政策，力图避免使局部冲突演成全面战争。陈季良和李世甲研究认为，国家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如果爆发全面战争，政府明令抵抗，海军绝不退缩，一切牺牲在所不惜；如果是局部冲突，则应慎重，海军参战，势必扩大战事。这样，不仅不符合政府方针，而且会危及海

军在上海的众多机构和财产，江南造船所、海军军械库、海军飞机制造厂、海军医院、海军测量局、海岸巡防处、引水传习所、海军电台等单位倘遭破坏，则多年难以恢复。因此，陈季良一方面命在沪海军作好战斗准备，一方面要求等待上峰命令，绝不轻举妄动。

日本驻沪海军司令和日本海军武官均致信表示，不会扩大战事，中日海军应和平相处。中国海军部命各舰队进入备战状态，“本‘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原则，严加戒备”。陈季良宣布驻沪海军防区实行戒严，并拒绝与日本海军将领书信往还。

2月初的一天，一艘日本商船闯入我高昌庙江防警戒线，哨兵开枪击毙其船长。日本海军向我驻沪海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惩凶、道歉、赔偿，并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限24小时内予以答复。当时，海军在上海只有几艘在修的舰艇和2个连的警卫部队，无法与敌作战，只得忍辱退让，但对日本提出的条件也据理力争。最后，经过双方谈判，中方书面对事件表示遗憾，付给日方抚恤金国币2万元，但同时也要日方尊重中国海军的戒严令，日船通过我防区须事先告知。

此事件结束后，驻沪海军更加谨慎，竭力避免给日本海军以口实。不久，十九路军和上海各社团要求取用上海海军仓库内贮存的大炮、弹药和钢板。陈季良请他们找海军部批准，最后自然没有下文。由于国民党政府采取了妥协的方针，陈季良和李世甲等驻沪将领扮演了十分尴尬的角色，客观上成了不抵抗政策的执行者。

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国民党调集陆海军前往镇压。12月，陈季良前往三都，统一指挥海军作战。一个月后，改由陈绍宽亲自指挥。

1934年11月，因部分舰长联合反对陈绍宽，陈绍宽提出辞职，并亲往上海请陈季良进京主持部务。陈季良在代理部务期间，将反对陈绍宽的事件迅速予以平息，惩办了为首的几个舰长。后经调解，陈绍宽复职。1935年9月，陈季良晋升海军中将。

(四)

1937年7月，抗战爆发。陈季良所率第一舰队奉命在江阴构筑封锁线，以防止敌舰直抵南京。8月11日午夜，在陈绍宽亲自主持率下，8艘老旧舰艇和20艘商船在江阴水道放水自沉，封锁了航道。以后，海军又陆续自沉了“海圻”、“海容”、“海筹”、“海琛”等4艘超龄的巡洋舰和日本商人的3艘商船、8艘趸船，构筑了一条坚固的江阴阻塞线。

陈季良率“平海”、“宁海”、“应瑞”、“逸仙”4艘主力舰列阵前沿，日夜守卫着阻塞线。“平海”舰和“宁海”舰是中国海军最先进的2艘巡洋舰。两舰都由日本设计，排水量为2600吨。“宁海”舰在日本播磨造船厂建造，1932年建成来华。“平海”舰在中国江南造船所制造，日方派人指导，并提供武器装备，1937年4月最终完成。该舰是陈季良的旗舰。“应瑞”舰是清末从英国订购的一艘2460吨的巡洋舰，1913年建成来华。“逸仙”舰是江南造船所1931年建造的一艘轻巡洋舰，排水量为1500吨。

中国海军力量与日本侵华海军的实力相差悬殊，但中国海军的士气十分高涨。日军飞机和舰艇多次来阻塞线侦察、骚扰，都遭到我海军的猛烈回击，先后有数架敌机被击落。战斗中，陈季良总是不避危险，沉着指挥。尽管周围弹火纷飞、水柱掀腾，他都不为所动，神色自若。官兵们受他的感染和鼓舞，都奋勇杀敌。

战斗间隙，陈季良总是喜欢与官兵们在一起。每天晚餐后，他都身着便装走上甲板，和蔼可亲地同官兵们交谈，给他们讲解抗战的形势和御敌方略，讲述历代民族英雄抗御外侮的事迹，激励他们坚守军人气节，坚决抗战到底。他说：“中华民族目前面临严重危机，我们绝不能坐等灭亡。只要我们大家同心协力，守住防线，便可牵制敌军很多兵力，拖延他很多的时间，以充实我们的抵抗力量，取得最后胜利。”他鼓励官兵们说：“当一个军人，首先必须忠于职

守，勇于从战。在陆上，人人要有马革裹尸的雄心；在海上，人人要有鱼腹葬身的壮志。”

陈季良非常善于听取部下的意见，虚心采纳他们好的建议。部下们能够得到他的信任，十分乐意接受他的指挥，因而士气很高。

9月22日，日军为消灭中国海军主力，打通江阴航道，派出数十架飞机，对守卫江阴的中国海军舰艇及岸防阵地进行了猛烈进攻。

日机攻击的主要目标是陈季良的旗舰“平海”号。“平海”舰上司令官旗高悬，陈季良虽已年近花甲，仍精神抖擞，雄风不减当年，他站在驾驶台与舰长一道指挥战斗。“平海”舰与敌机激战了6个多小时，发射高射炮弹265发，高射机枪子弹4000余发，击落敌机1架，重创数架，与其他军舰一起，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激战中，与陈季良站在一起的舰长高宪申腰部中弹，身负重伤，另一名司号兵头部中弹牺牲。战斗结束后，陈季良派舰护送高宪申和战斗中受伤的“宁海”舰长陈宏泰及其他伤亡人员前往芜湖治疗或安葬。

当晚，陈季良召集各舰负责人到旗舰开会，研究作战方案。会上，有人建议降下“平海”舰上的司令官旗，以免敌机集中轰炸。还有人建议各主力战舰疏散到上海，以便机动。陈季良表示反对，他说：“当年马江之战，我军扬武号旗舰即将沉没之际，舰上一名信号兵仍奋力将军旗在主桅顶升起，并紧握旗绳直到最后英勇牺牲。扬武舰沉之后，军旗仍在露出水面的桅杆上迎风飘扬，给全军以莫大鼓舞。今天我们平海舰绝不能降下司令旗，向敌人示弱。各舰可在一定范围内机动作战，但不能放弃坚守阻塞线的任务，放弃消灭和牵制敌人的机会。”陈季良的话更坚定了官兵们的抵抗决心。

9月23日晨，38架日本飞机从四面来袭，对我海军舰艇继续进行狂轰滥炸。“平海”、“宁海”两姊妹舰并肩作战，先后击落敌人飞机4架，击伤多架。但“宁海”舰伤势过重，沉入江中，舰上官兵阵亡15人，伤49人。“平海”舰炮弹全部打光，身受重伤，军舰倾斜

20多度，舰上官兵阵亡11人，伤20余人。陈季良命其上驶搁浅，尽力抢修。最后，“平海”舰在十二圩搁浅，官兵们将舰上炮械和主要部件卸下，撤离了军舰。此后，日军又连续数日轰炸，“平海”舰最终被炸沉。

“平海”、“宁海”沉没后，陈季良移驻“逸仙”舰，在该舰升起司令旗，继续指挥作战。25日，10多架日机又飞临“逸仙”舰上空，进行轮番轰炸。由于连日激战，舰上弹药已不多，但爱国官兵们仍顽强抵抗，击落敌机2架，打退了进攻。这场战斗，全舰阵亡14人，伤8人，陈季良也被炸伤。不久，日机又来报复，终于将该舰炸沉。“逸仙”舰沉没后，陈季良又在“定安”号运输舰上竖起司令旗，以该舰为旗舰，指挥第一舰队的其他战舰，继续战斗。

陈季良连续在前线指挥50多天，频繁激烈的战斗和伤痛折磨使他心力交瘁。陈绍宽派第二舰队司令曾以鼎率第二线军舰前往接防，命陈季良撤往后方医院休息治疗。

陈季良从前线撤下来后，有人向蒋介石报告说，陈季良临阵脱逃。蒋介石十分震怒，当即在报告上批示：“就地枪决”，交陈绍宽办。陈绍宽接到批示非常气愤，立即将陈季良在江阴海空战中指挥作战的情况向蒋介石汇报。蒋介石仍不相信，怒气未消，对陈绍宽说：“嘿！你去查明处理吧。”

“平海”、“宁海”等舰与日军飞机激战时，蒋介石的德国总顾问法肯豪森正带领一批随员在江阴炮台观战。他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说：“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我所看到的海空军最激烈的战斗。”蒋介石接电后愕然，立即打电话给陈绍宽说：“误会，误会，请代我安慰陈季良。”

江阴海空战是中国海军最大的一次对日作战，保卫了江阴阻塞线，大大迟滞了日军的进攻，为粉碎日军3个月内灭亡中国的迷梦，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海军在作战中也付出了沉重代价，主力战舰损失殆尽。

1938年1月，海军重新进行了整编。海军部被撤销，另组战时海军总司令部，下辖第一和第二舰队，陈季良仍任第一舰队司令，负责指挥包括“中山”舰在内的20余艘舰船。

武汉保卫战中，陈季良将司令部设在“民权”号炮舰上，负责武汉下游防务。第一舰队各舰在陈季良的统一指挥下与西进日军展开了血战，多艘舰艇英勇战沉，“中山”舰中校舰长萨师俊和“义宁”艇少校艇长严传经壮烈殉国。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陈季良设司令部于四川万县，指挥第一舰队的“楚观”等9艘舰艇负责长江上游江防任务，严防敌舰驶进川江，威胁重庆。抗战后期，第一舰队多次参加战斗。到1945年8月抗战结束时，第一舰队只剩下了“楚观”、“楚同”、“楚谦”号炮舰和“克安”号运输舰这4艘军舰。

1944年5月，陈季良出任海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仍兼海军第一舰队司令。1945年4月14日，陈季良积劳成疾，在万县病逝，终年62岁。5月，国民政府明令追晋陈季良为海军上将。

临终前，陈季良对身边的僚属说：“我深恨未能亲将日寇赶出中国，但我相信，日本侵略者的彻底失败已经在望了。”此后仅几个月，日本便宣布无条件投降。一代抗日名将倘地下有知，可以无憾了。

长江抗敌建功

——记曾以鼎

1957年11月，担任人民海军司令部研究委员会主任的原民国海军中将参谋长曾以鼎在北京逝世。这位戎马一生的海军抗日名将被迫赠为革命烈士，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一）

曾以鼎，字省三，福州人，生于1887年。曾家是福州的名门望族，曾以鼎的长兄曾毓雋后官至交通总长，是北洋政府炙手可热的人物，与国务总理段祺瑞关系极为密切。

1905年，曾以鼎考入烟台海军学堂学习航海驾驶，为该校第二期学生。烟台海军学堂创办于1903年冬，开始附设于烟台金沟寨以北海军练营内，由练营管带谢葆璋兼任监督（校长）。1907年，烟台海军学堂正式迁入烟台金沟寨以南新校址。烟台海军学堂初创时只设驾驶（航海）一科，没有管轮（轮机）专业，学制也缩短为3年，以适应海军重建对人才的急需。

1908年春，曾以鼎从烟台海军学堂毕业，被分派到舰上任职。1909年9月，筹办海军大臣载洵和萨镇冰赴欧洲考察海军，从舰队和海军学校中挑选曾以鼎等23名优秀青年军官和学生，随行前往英国，学习制造舰船和炮械。

在英国的留学生活使曾以鼎开阔了视野，增长了学识，也更激发了他的爱国情感。1911年5月，英王乔治五世举行加冕典礼，邀请各国海军派舰艇参加。清廷派巡洋舰队统领程璧光率“海圻”号

巡洋舰前往英国。“海圻”舰是中国海军当时最大的一艘军舰，但与其他海军大国的军舰相比却小得可怜。曾以鼎目睹此景，很受刺激，深为中国海军的落后而感到耻辱，立誓发奋学习，振兴海军。

曾以鼎学成回国后，被派往“应瑞”号练习舰当教练官，负责教授舰课。1918年3月，曾以鼎出任“永键”舰舰长，这艘排水量为860吨的炮舰是江南造船所1914年建成下水的一艘新舰。1921年6月，曾以鼎又被任命为“江利”号炮舰舰长，该舰是宣统元年从日本订购的，排水量为550吨。

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大战爆发。海军派出“海筹”、“海容”2艘巡洋舰急驶秦皇岛，“江利”与“江元”、“楚同”、“楚谦”4艘炮舰赶赴大沽口，威胁奉军后路。曾以鼎指挥“江利”舰勇猛善战，他本人也被流弹击伤了手指。直军获胜后，曾以鼎受到海军总司令杜锡珪和吴佩孚的嘉奖。

由于连年军阀混战，中央政府财政空虚，无力支付海军的饷款，屡屡拖欠，有的舰上官兵竟长达十几个月领不到军饷。各舰只好各显神通，自己设法筹款。曾以鼎的长兄曾毓隽是当时国内有名的财神，曾以鼎每次都去找这位财大气粗的长兄帮忙解决经费困难，曾毓隽也总是慷慨解囊，尽力相助。所以，曾以鼎指挥的军舰很少有欠饷之虞，舰上官兵的生活境况要好得多。

当时，海军总司令杜锡珪的靠山是掌握北京中央政府的直系军阀，而曾毓隽则是皖系的骨干人物。杜锡珪得知曾以鼎是曾毓隽的胞弟，遂生戒心，对曾以鼎加意提防、限制。曾以鼎受到排挤，情绪十分低落。他率舰驻防大沽口，常将舰务交给副长料理，自己则移住天津。

（二）

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通过1920年的直皖战争和1922年的第一次直奉战争，打败了段祺瑞的皖系和张作霖的奉系，控制了北

京政府。为了同直系抗衡，段祺瑞与张作霖、孙中山结成了反直同盟。段祺瑞提出“联省自治”的政治主张来反对直系“武力统一”的政策。

当时，皖系首领导段祺瑞寓居天津租界，天津遂成为反直的联络中心。受杜锡珪排挤的曾以鼎也通过曾毓隽的介绍，参加了反直活动。当时，直系控制下的海军对沿海、沿江各省反直力量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因此，争取海军参加反直意义重大。

1923年3月，根据华盛顿《九国公约》的有关条款，日本将山东主权交还中国。海军遂派出“海筹”号巡洋舰和“永绩”号炮舰前往青岛驻防。“永绩”舰舰长蒋斌是曾以鼎在烟台海军学堂读书时的同班同学，此次单独率舰执行任务，远离杜锡珪的控制，曾以鼎认为这是策动其反直的大好时机。于是，在曾毓隽的具体安排下，曾以鼎秘密前往青岛，劝说蒋斌和“海筹”舰舰长许建廷率舰反直。曾以鼎此行携带了6万元巨款，分给两舰。这对苦于无饷的两舰来说，不啻是久旱甘霖。两舰得此资助，遂离开青岛直驶上海。

4月8日，“海筹”、“永绩”2舰与原驻上海的“建康”舰和“列”字艇以及江南造船所、海军总司令公署各课课长等官佐和士兵发表通电，反对直系军阀，宣布脱离北京政府独立，拥戴被杜锡珪排挤下台的原海军第一舰队代理司令林建章为海军领袖。次日，得到反直各派支持的林建章发出通电，表示接受拥戴，在上海高昌庙原海军总司令公署旧址成立海军领袖处，自任领袖，任命曾以鼎为参谋长，原海军第一舰队司令周兆瑞为舰队司令。在上海宣布独立的这部分海军时人称之为“沪队海军”，它的灵魂人物是曾以鼎。

驻沪海军舰队宣布独立，受到反直各方的欢迎和支持。5月6日，林建章致电孙中山。次日，孙中山回电对沪队独立表示支持，其电云：

朗诵回环，欣慰无量。以为此时全国兵士皆如在沪海军袍泽，其将领皆如执事者，则和平统一盛世，不难指挥

立定。年来国事螭蟾固由于一二军阀之凭借武力，恣行攘夺，实亦由于多数军人昧厥卫国保民之天职，甘为强权所利用，而供无主义之牺牲。尊论一语破的，读之令人快慰。方今和平统一，已为全国人心所倾向，少数冥顽之徒，乃必背道而驰，于川、闽、粤诸省，均已屡试其技。野心未达，而吾民颠沛流离之苦已增至不忍见闻矣。文迭次宣言，标明主旨，凡赞成和平统一者皆吾友，反抗和平统一者皆吾仇。如执事之明达与在沪海军之彻悟，文当竭其绵薄，相与戮力同心，共纾国难。南来海军诸将士亦极表赞同。幸勛前途，以竟全功。临电钦迟，至深企禱。

上海出版的《大陆报》4月12日社论称：“这次（海军）宣言不啻为直系方面之一声霹雳，此项宣言，断然与政治大局有甚大之影响，其意味乃为奉系、浙江当局及孙中山之一种政治胜利。”

1917年，程璧光率舰队南下广州参加护法是北京政府海军的第一次分裂，此次沪队独立是第二次分裂。

沪队独立后引起连锁反应，又有几艘舰艇前来投奔。杜锡珪只得采用严厉镇压的办法，枪毙了一些想投奔沪队的官兵，才稳住了局面。

1924年9月，直系江苏军阀齐燮元向皖系浙江军阀卢永祥发动进攻，爆发了“齐卢战争”。支持齐军的北京政府海军派舰前往助战，与支持卢军的沪队海军相持于吴淞，长达一个多月。不久，杜锡珪收买了沪队海军司令周兆瑞，趁“海筹”、“永绩”2舰舰长不在舰上之机，率2舰脱离了沪队。

“齐卢战争”最终以卢军失败而告结束，齐军占领浙江和上海，沪队剩下的军舰最后也都被杜锡珪接管了。

（三）

当“齐卢战争”正酣之时，张作霖于1924年9月率奉军入关，

声援卢永祥。吴佩孚率直军迎战，双方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经过几个月的激战，直军战败，失去了对北京政府的控制。段祺瑞以临时总执政名义组成新政府，直军支持的海军总长杜锡珪被迫下台，由林建章接任。1925年2月，曾以鼎升任“海容”号主力巡洋舰的舰长。

林建章上台后，着手剪除杜锡珪在海军中的势力，他首先掌握重兵的杨砥中开刀。曾以鼎奉林建章和海军总司令杨树庄之命，负责捉拿杨砥中。

杨砥中是烟台海军学校第六期毕业生，深得杜锡珪的赏识，奉命负责扩充海军陆战队。几年后，陆战队已发展为一个混成旅，由杨砥中任少将旅长。陆战队是杜锡珪在海军中的一支骨干力量，杨砥中凭借自己在海军中的势力，骄横跋扈，为害地方。杜锡珪下台后，杨砥中也被迫辞职。不久，他通过杜锡珪秘密与占据浙江的直系军阀孙传芳联系，并打算返回福建，重新掌握陆战队，与孙传芳合作。

1925年4月，杨砥中到上海向杜锡珪报告他在杭州与孙传芳联系的进展情况。曾以鼎得到确切情报后，派副长刘焕乾等前往码头，逮捕准备乘船离沪赴闽的杨砥中。在逮捕过程中，杨砥中拔枪企图进行反抗，结果被士兵开枪击伤左肋，后在医院中死去。

1927年3月，海军倒戈，加入国民革命军。不久，曾以鼎出任新设立的鱼雷游击队司令处司令官，率所辖“建康”、“豫章”2艘驱逐舰和8艘鱼雷艇参加了北伐。

1929年6月，南京政府组建海军部，下辖第一、第二和练习舰队及鱼雷游击队，曾以鼎仍任鱼雷游击队司令。

11月，张发奎和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等联合反蒋，在南宁成立了护党救国军，分兵进攻广东。蒋介石调集大军援粤，海军派曾以鼎率“联鲸”、“永健”、“永绩”、“楚谦”、“楚同”等舰赶赴广东。曾以鼎抵达广东后，部署各舰分防黄埔、白鹅潭及汕头等处，并亲率“联

鲸”舰赶往三水前线，配合陆军攻击张桂联军。12月8日以后，广州防务吃紧，曾以鼎又率“联鲸”舰驰返白鹅潭附近梭巡，并指挥扼守三水的军舰作战。不久，曾以鼎又改乘“楚同”舰赴西江指挥，逼进梧州。两广战事结束后，曾以鼎率各舰先后返回原防。1931年元旦叙勋，曾以鼎晋授三等宝鼎勋章。

1932年1月，陈绍宽出任海军部长，所兼第二舰队司令由曾以鼎接任。是年，发生了日军进攻上海的“一·二八”事变，海军奉命不准帮助英勇抗敌的十九路军。曾以鼎对海军连年参加内战却不能在对外反侵略作战中发挥保卫国家的作用而感到痛心。他对十九路军的抗日壮举深表同情和钦佩，对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十分不满。1933年，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曾以鼎的外甥、担任第二舰队司令部书记官长的潘其武策动“应瑞”舰长林元铨参加福建人民政府。结果事情暴露，潘其武被革职。有人猜测，潘其武的活动背后有曾以鼎支持。

“一·二八”事变后，鉴于日本不断加紧侵华步伐，国民政府开始制订针对日本侵略的国防计划。海军部队也积极整训，加强战备。1932年10月，海军部调集新制巡洋舰“宁海”号等6舰在南京八卦洲江面会操，由曾以鼎担任指挥官。11月，曾以鼎又督率新改造的“大同”、“自强”及“中山”、“通济”等10余艘舰艇，会操八卦洲。次年8月，曾以鼎率“逸仙”号巡洋舰，从上海基地出发，巡察华北沿海各港口，经威海、烟台、长山岛、大沽和青岛等处，事毕南航回防。

1934年2月，海军裁撤鱼雷游击队，除将“建康”舰划归第一舰队，其余各舰并入曾以鼎指挥的第二舰队。7月，曾以鼎率“应瑞”、“海筹”等舰赴湖口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操演。次年7月，他再率“楚有”等舰在湖口演习。9月，曾以鼎晋升为海军少将。11月，他率“海容”等舰在闽浙洋面会操。1936年1月，曾以鼎又率“宁海”、“中山”等10余艘战舰在南京八卦洲会操。7月，以曾以鼎翊

赞国民革命有功，奉令颁给国民革命誓师 10 周年纪念勋章。1937 年 3 月，曾以鼎率“楚有”等 8 艘舰艇出海会操，先后航经嵊山、定海、象山、台州、马尾、三都、温州、宁波，月末返回上海。此次会操是抗战前海军最后的一次演习。

（四）

1937 年 7 月，抗日战争爆发。海军在江阴设立阻塞线，第一舰队司令陈季良率“平海”等 4 艘主力巡洋舰列阵前沿，曾以鼎率第二舰队随后支援。9 月，江阴海空战开始。海军各舰英勇抗击日军的进攻，在短短几天时间里，“宁海”、“平海”、“逸仙”等主力战舰先后被日本飞机炸沉，一线兵力所剩无几。9 月 25 日，曾以鼎乘旗舰“楚有”赶赴江阴，接替受伤的陈季良，指挥第二舰队接防江阴封锁区。“楚有”舰抵达江阴后，遭到日军飞机连续数天的猛烈轰炸，舰上官兵进行了英勇抵抗。10 月 2 日，该舰最终在六圩港被日机炸沉。当时，曾以鼎还兼任江阴江防副总司令。“楚有”舰沉没后，曾以鼎便把他的第二舰队司令部移往江防司令部，继续指挥所部官兵抗战。

在主力舰只相继战沉的情况下，海军改变了保卫江阴江防的策略，决定成立海军炮队，拆卸舰炮安装到长江两岸的险要地带，用以腰击敌舰。江阴方面，由曾以鼎负责组建总台部，并抢修巫山等处炮台。曾以鼎经常亲临炮台视察，督导训练并训话，鼓励炮台官兵不怕牺牲，杀敌报国。11 月 30 日晨，5 艘日舰上驶六助港附近抛锚，我炮台立即发炮轰击，与敌舰激战近 3 个小时，重伤 2 舰，敌人狼狈遁逃。战后，曾以鼎以炮台台长陈秉清指挥有方，英勇善战，传令嘉奖。

由于日军迫近江阴，江防总司令刘兴请示南京后，下令所属部队撤离。但海军方面没有及时得到撤退命令，曾以鼎仍坚守江阴城中。当时，局势已相当混乱，乱兵败将纷纷逃往江北。曾以鼎知大

势已去，江阴不守，但在没有接到命令的情况下，他绝不撤退。曾以鼎平时喜欢吸烟和饮酒，此时仍镇定如常，打开罐头，取酒邀副官同饮。他从抽屉中取出手枪放在桌子上，对副官说：“我身为守将，耻作日俘，如日军进城，只有自裁报国。”

刘兴撤往江北后，亲自清点将校，发现缺了曾以鼎，知他尚在城中，立即命亲随将撤退命令送往江阴，交给曾以鼎。曾以鼎接到命令后，才与副官登上汽艇，连夜撤离江阴。次日晨，江阴即告失守。

曾以鼎乘艇抵达南京下关时，陈绍宽已电令“江元”号炮舰在码头专候。曾以鼎从江阴脱险，颇有死里逃生之感。他平时即好书法和吟诗，有儒将之称，此时更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诗兴顿起。他登上“江元”舰后，在大官厅要来文房四宝，挥笔写就两副对联，一副是“疾风知劲草，世乱识良朋”，送给了巫山炮台台长陈秉清；另一副是“疾风知劲草，世乱识忠诚”，送给了自己的副官。

12月12日，南京失守，中国军队沿长江向西撤退。曾以鼎率舰赶赴马当要塞及彭泽一带，部署江上防务。海军奉命毁涂荻港至九江段长江的航行标志，并封闭马当港道，以迟滞日军。

1938年1月，海军部被裁撤，另组海军战时总司令部，下辖第一、第二两个舰队，曾以鼎仍任第二舰队司令。该舰队由“永绥”号炮舰等17艘军舰组成。不久，江阴电雷学校的12艘鱼雷快艇也交由曾以鼎指挥。

国民政府退往武汉后，部署保卫武汉。曾以鼎仍以第二舰队司令兼任江防司令部副总司令，奉命前往九江前线，负责指挥马当、湖口的海军部队。6月，日军向武汉发起总攻，曾以鼎所部首当其冲。曾以鼎激励将士誓死抵抗，他说：“我们绝不能再让敌人拿下武汉，又来一次像南京那样的兽行，残杀我们数十万的无辜兄弟姐妹。我们一定要坚守阵地，寸土不让，坚持循着抗战到底，直到最后胜利这一条路走下去。”

曾以鼎不顾危险，亲往第一线视察、布置，指挥所属部队作好准备，坚决予进攻之敌以痛击。6月30日，武汉的第一道防线、号称长江天险的马当要塞失陷，日军向湖口进犯。曾以鼎亲自坐镇前线，指挥海军官兵利用炮台和水雷阻挡日军的水路进攻，配合陆军防守。不久，因陆军奉命撤退，湖口失守，曾以鼎率部移驻蕲春。10月25日，武汉失守。

武汉失守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重庆三面环水，所以水上防御十分关键。川江前卫在荆河，咽喉在宜昌。武汉失守前夕，曾以鼎奉命负责荆河防务。11月，曾以鼎被派往沙市指挥作战。不久即移师宜昌，构筑炮台，布设水雷，加强封锁线。

1940年3月，日军从水路进攻，遭到顽强抵抗，无法实现越荆河水道进取宜昌，从而威逼重庆的战略企图。无奈，日军改由陆路迂回进攻，迟至6月始攻占宜昌。

日军攻占宜昌后，无力再进，抗日战争开始转入相持阶段。海军各舰奉命担任长江防御，曾以鼎率第二舰队余下的5艘舰艇驻防巴东。

1944年12月，陈诚出任军事委员会军政部长，与陈绍宽的矛盾日益加深。当时，陈绍宽对曾以鼎有些成见。陈诚想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拉曾以鼎反对陈绍宽，拟调曾以鼎到陆军大学将官班受训，许诺给曾以鼎与同期受训的集团军总司令相同的待遇，并暗示曾以鼎以后可取代陈绍宽，出任海军总司令。曾以鼎为顾全海军稳定的大局，没有同意。

抗战后期，军统头子戴笠也想染指海军，他通过曾以鼎的外甥、被称为戴笠四大台柱之一的潘其武与曾以鼎联系，表示愿与曾以鼎合作，由曾出任海军总司令，他本人任副职。戴笠控制海军的计划得到美国人的支持。出于礼貌，曾以鼎在潘其武的陪同下，应邀拜访了戴笠。戴笠十分高兴，殷勤接待，大加恭维，还特意送给曾以鼎一个密码本，要曾与他保持秘密联系。曾以鼎返回后，将密码

本交书记官收起,不予重视。不久,戴笠便坠机身亡。

1945年4月,曾以鼎接替病逝的陈季良出任海军参谋长,晋升海军中将。9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曾以鼎受命全权负责海军受降事宜,坐镇上海,指挥各地海军接收。

蒋介石派曾以鼎全权负责海军受降事宜,意在排挤陈绍宽。陈绍宽对此十分不满,下令第二舰队少将司令李世甲和总司令部少将署长曾国晟分别前往闽台及长江沿岸进行接收。曾以鼎体谅陈绍宽此时的处境和心情,并未对此加以阻拦。12月,陈绍宽与蒋介石矛盾激化,蒋介石下令撤销海军总司令部,由陈诚接管海军。陈绍宽辞职回乡,曾以鼎也随之去职,寓居上海。

(五)

上海解放前夕,蒋介石多次派人劝说曾以鼎前往台湾,曾以鼎不为所动,坚持留在上海。

解放后,曾以鼎积极参加了人民海军的建设工作。1949年6月,刚组建的华东军区海军以司令员张爱萍的名义在上海《大公报》上发表通告,号召原国民党海军人员为人民海军服务,同时在上海重庆南路182号设立办事处,接待前来登记报到的原海军人员,然后根据具体情况量才使用。曾以鼎等许多海军爱国官兵响应号召,投身到新海军的建设中。曾以鼎等海军元老受到格外重视和礼待。1949年秋,曾以鼎被安排担任华东军区海军司令部研究委员会主任。该委员会负责研究海军各级机构的组织编制草案、沿海基地设防和反封锁措施、搜集美蒋海军情况等。此外,也参加审查海军教育训练计划纲要,检查造船厂修装舰船的进度等。研究委员会全体人员都是人民海军成员,穿着海军服装,享受高级供给制待遇,生活上受到特别关照,政治上也给予极大信任。

1950年5月,曾以鼎又来到北京,担任海军司令部研究委员会主任。该委员会是海军首长的高级参谋和研究、咨询机构,在曾

以鼎的主持下,委员会积极献计献策,为人民海军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7年11月1日,曾以鼎因病在北京去世,终年70岁。

坦骨东海 死得其所

——记林遵

抗战胜利后，中国为恢复行使在南海诸岛的主权，于1946年底组成“前进舰队”，进驻西沙、南沙群岛。从此，美丽的南海诸岛又重新回到了中国人民的怀抱。具体负责这次进驻行动的，就是“前进舰队”的指挥官、海军上校林遵。

（一）

清朝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八月，盛夏的榕城福州，溽热异常，就在这八月间，清福建海军鱼雷艇艇长林朝曦喜得贵子。林朝曦为孩子取名林遵，又拆名“遵”为其号，曰“尊之”。取这个名字，林朝曦是颇费一番琢磨，有着良苦用心的，这还要从林家的家世说起。

翻开林氏宗谱，赫然可见林则徐的名字——按辈份论，林遵是鸦片战争中领导虎门销烟、抗击英军入侵的民族英雄林则徐的侄孙。他出生的这一年，正逢林则徐120周年诞辰。当年，林则徐面对英军远涉重洋而来的利炮坚船，虽有“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宏愿，无奈清廷腐败无能，国力羸弱，他梦想中的坚固海防、强大水师也随他被贬新疆而付诸东流。身居大漠，林则徐心中那份蓝色情结并未断绝，他期望着后代们能继起报国，扬威海上。林家的后人始终没有忘记先人的训诫，林朝曦便是承袭了这种家风，考入江南水师学堂附设的鱼雷班第二期，开始了他的海军生涯。如今他给儿子取名林遵，意在望其遵承林家爱国遗风和忠贞报国的气节，成为安邦

兴国的有用之才。

林遵幼年入私塾学习,12岁时进福州西城小学,后升入福州格致中学。1922年,林朝曦奉调出任南京海军雷电学校学监,林遵也随父迁往南京,就读于有名的金陵中学。

课余时间,林遵常到南京下关仪凤门内的雷电学校操场上,忘情地看着海校学生出操训练,幻想着有一天自己能融入那蓝色的行列。因为他记得,从闽江口的马尾到扬子江边的下关,到处可见耀武扬威的洋人舰船。他也记得,父亲曾不止一次讲述过叔祖林则徐临海御敌、壮志难酬的往事和中国海军甲申、甲午战败的耻辱。渐渐地,血脉中的爱国基因在他心里萌生成驾舰平波靖海疆的信念,并随着年龄的增长一天天明晰、坚定起来。1924年中学一毕业,林遵便毅然投考了烟台海军学校。

1928年初,霸驻山东的奉系军阀张宗昌怀疑烟台海校师生暗通北伐军,遂令部队包围、查封了烟台海校,并在未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将8名师生作为嫌疑人拘捕,押往济南受审。学校遭张宗昌蹂躏迫害,已难以为继,5月正式宣告停办,师生被迫离烟南下。林遵等尚未毕业的第十八期学生,悉数并入福州马尾海军学校续完学业,称为烟台海军学校寄闽班,也成为烟台海校历史上最后一期毕业生。林遵这班学生当年毕业,被分配到南京鱼雷枪炮训练班见习。

1929年7月,新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海军部决定派遣员生赴英留学。林遵经海军部政务次长陈绍宽亲自考核,以优异成绩入选。

11月5日,林遵等12名留学员生从上海启程,辗转赴英。1930年初抵英后,他们先编成一班,到朴次茅斯军港内驻泊的英国皇家海军“安乐伯斯”号练习舰上当见习生。见习期满后,他们按计划先后进入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和朴次茅斯海军学院学习枪炮、水中兵器、通信和航海等各专科。

远离祖国,学习和生活都十分紧张、艰苦,而更令林遵他们感到压抑的,是英国人的歧视。当时的海上霸主根本没有把那个曾被他们用坚船利炮征服了的东方大国的海军放在眼里,送给中国海军留学员生的,常常是白眼和讥讽。尽管如此,为了能够学到建设海军所需的更多专业知识和技能,实现先辈那个“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百年梦想,林遵他们忍辱负重,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发愤苦读。

1934年8月,异国苦读4载的林遵学成归国。他被派到舰上,先后任“宁海”、“海容”舰枪炮员,不久又升任福州海军学校学生队长。在队长任上,他不仅严于律己,倾其所学传授学生,而且注意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鼓励进步思想。1936年12月,林遵调任第一舰队“自强”号炮舰副长。

(二)

1937年3月,海军部长陈绍宽作为中国政府副使,与孔祥熙率团赴英,参加英王乔治六世加冕典礼,并考察欧洲各国海军状况。已晋升海军上尉的林遵,作为陈绍宽的随员陪同前往。

5月下旬,林遵在伦敦又接到新命令:去德国接收中国订购的6艘潜艇和1艘潜艇母舰,并负责管理在那里学习潜艇技术的10名留德学生。当时,中德关系尚属正常,中国政府与德方的军事技术交流合作也比较密切。但林遵抵德不久,“七·七事变”爆发。与日本结成法西斯轴心的德国,先是拖延中方所订潜艇的交货时间,最后竟背信毁约,拒绝交货。眼见接艇无望,国内又烽火连天,林遵等忧心如焚,再三请求回国参战。当局见事态已无可挽回,国内抗战又急需专门人才,便准其所请。1939年5月下旬,林遵等人终于登上了回国的轮船。

林遵这次回到国内,战局已令他触目惊心。原本羸弱不堪的中国海军经过江阴、厦门、广东等几番血战,实力已损失殆尽,尤其是

主力战舰全部战沉。林遵原在的“自强”舰也未能幸免，作为堵塞船沉在了江阴封锁线上。

由于实力减损，国民政府军委会决定将原海军部裁撤，成立海军总司令部，仍以陈绍宽为总司令，除保留第一、第二两个舰队建制外，练习舰队等 17 个单位被撤编。此时，舰队元气已伤，又缺乏空中掩护，更是处处被动；而岸炮要塞位置固定，无法机动，易暴露而遭致敌军袭击。于是，水雷战便以其作战行动隐蔽、杀伤威力巨大的特点，成为海军抗敌的主要作战手段。

1939 年 1 月，海军第一支敌后布雷队——长江中游布雷游击队奉命成立，担负封锁长江，切断敌西进湘、鄂、川水上运输线的任务。由于该游击队所负责任重大，1940 年 1 月，全队编制扩充，林遵出任扩编后的长江中游布雷游击队第五队少校队长，率部活跃在皖南贵池一带长江沿岸，在敌占区中布雷，开展对敌水上航线的破袭。

1 月 20 日，两河口一声雷鸣，林遵率领的第五队首战告捷，揭开了长江中游布雷战的序幕。这天夜里，林遵率部在夜幕的掩护下，抄到日军防线背后，在贵池两河口江面一次布下 100 公斤触发漂雷 15 具，当即炸沉日军汽艇 1 艘，毙敌 13 人，伤 5 人。次日，又有 1 艘日军大型运输舰在贵池、大通间航道上触雷沉没。此后，水雷仇恨的轰鸣便在江面上此起彼伏，一艘艘满载军火、兵员的日军舰船，拖着浓烟烈火，没入了冬日冰冷的江流中。

由于水雷战的威胁，长江航线被迫数次断航，这对仰仗长江运输线，蓄谋发动枣(阳)宜(昌)和湘北攻略作战的日军来说，不啻是在其咽喉插上了一把尖刀。为此，日本侵华海军长江舰队司令曾于 1940 年 5 月专门对航行长江的日本舰船示以要旨四项：禁止集结航行；凡行驶芜湖以上商船须由兵舰引导；舰船不得夜间行驶芜湖九江间；凡舰船行经芜湖上游时须加速通过。并制订了对违犯以上四项规定的惩戒办法。

与此同时，恼羞成怒的日军在贵池、安庆段沿江大举增兵，发动对布雷队游击根据地的扫荡，烧杀虏掠之外，还以重赏缉捕布雷队员，以期割断布雷队同当地群众的联系，铲除布雷队的根基，进而把他们赶离江岸。

这时，林遵从同属第三战区、经常并肩作战的新四军部队那里学到了寓兵于民、依靠群众、忽整忽零、机动灵活的一套游击战法。为了避开日军的锋芒，林遵带领队员或者白天侦察敌情，夜间乘风雨等恶劣天气出击；或者化装成老百姓，分头出动，偷越封锁线布雷。他们还想出一个以假乱真、隐真示假的妙招，命人特制了一种浮筒，这种浮筒浮在水上，外观与漂雷露出水面的部分极为相似，浮筒上面还写有对日军进行反战宣传的内容，布雷时将这种假漂雷与真雷搭配，一起布放在江中，日军对水雷本是扫不胜扫，焦头烂额，这回更是真假莫辨，雪上加霜，可又徒唤奈何。

由于水雷战战绩显著，国民政府军委会和海军总司令部屡次嘉奖布雷有功人员。当时任军委会委员长的蒋介石除手令海军总司令部并转饬各战区长官，嘉勉布雷战绩外，还要求对战区内的布雷队员予以特别保护。当年3月，林遵荣膺战时最高奖章——陆海空军甲种一等奖章。

1941年9月，日军发动第二次湘北会战，围绕长江航运的保破交，战火复炽。9月28日，一场惊心动魄的布雷战在长江边展开。当晚，林遵率第五队与程法侃的第一队联合行动。当他们运动至长江支流秋浦河南岸的蛇形窑时，被敌军发现，弹雨随即倾泻过来。两位队长危急时刻带领队员果断冲破火网，抢渡过河，抬着仅余的7具漂雷向江边急进。途中传来消息：由于敌舰监视封锁，江中船只已被扣一空。面对这严峻的形势，官兵们同仇敌忾，岂肯功亏一篑，于是林遵带领大家仍奋不顾身进至江边。江边果然空无一船，原来联系好的布雷船也避往他处去了，江中还时有敌舰巡弋，探照灯的光束不时扫过江面。这时，林遵坚定地对大家说：“虽然无

船,但我们可以洒水推雷入江布放,运用我们的技能,一显海军身手。”说完便率先跳入江中,队员们也纷纷相随,一直推雷游至江心才从容地向下游敌舰船布放。

由于布雷队行踪暴露,日军增派重兵沿秋浦河一线布防,切断了布雷队的退路以及和陆军掩护部队之间的联系。在日军严密搜捕下,布雷队被发现,交战中伤亡3人,余者急泅返秋浦河南岸,但随即又被包围上来的敌军冲散。林遵和几名队员情急之中藏入了茂密的玉米地,躲过了搜捕。但日军包围很紧,他们一直不得而出。幸亏一位老农妇发现了他们,并送来干粮,他们才得以坚持下来。10月5日,林遵等人在被困7天后,终于在营救部队接应和当地群众掩护下乘隙脱险归队。第五、第一布雷队的行动吸引了日军的注意力,布雷游击队的其余各队乘机出动,于9月30日在贵池黄湓布雷,当天就炸沉日军一艘汽艇,次日又炸沉敌运输舰和汽艇各1艘。日军做梦都想疏通的水上动脉再告梗阻。

(三)

1941年10月,长江中游布雷游击队改编为海军第二布雷队,林遵任第五大队中校大队长。不久,经在烟台海校和留英时的同学、时任军事委员会侍从室参谋的林祥光推荐,林遵于1942年12月到重庆国防研究院研习新的海军学术,任海军研究员。1944年3月毕业后,林遵被分配到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办公室任海军参谋。当年10月,他与胡志贞女士结婚。

由于林遵在布雷袭击作战中功勋显著,又曾在国内外数次深造,学识渊博,故深受器重。1945年,他被派往华盛顿,担任中国驻美大使馆海军副武官。

抗战后期,根据中美两国协议,美国开始帮助中国重建在抗日战争中遭到严重破坏的海军,向中国赠送和租借舰艇并负责培训人员。1944年底,国民政府征召了一批知识青年,先集中于重庆唐

家沱接受海军基础知识训练，然后送往美国迈阿密海军训练营受训，准备接收美国海军舰艇。

抗战胜利后不久，美国总统杜鲁门批准赠送 8 艘军舰给中国，这是美国给中国的第一批赠舰。这 8 艘军舰包括 2 艘 1400 吨级护航驱逐舰“太平”号、“太康”号，2 艘 900 吨级驱逐舰“永泰”号、“永兴”号，4 艘 900 吨级扫雷舰“永胜”号、“永顺”号、“永定”号和“永宁”号。

这批军舰虽然吨位不大，但都较新且装备较好。8 舰舰龄都不超过 4 年，装备有最新型的小口径快炮及深水炸弹，并装有防空雷达和反潜雷达，具有较强的作战能力。

中国在美国接收这批军舰后，组成“中华民国驻美舰队”，林遵被任命为指挥官。1946 年 2 月上旬，林遵率舰队开赴设在古巴关塔那摩的美国海军基地，与美海军进行混合作战演练。

4 月 8 日，林遵率 8 舰启航回国。美国派出 15000 吨的运输兼修理母舰“吗咪”号护送，负责供给、修理、医疗和通讯联络。

林遵率 8 舰从关塔那摩基地出发后，访问了哈瓦那、墨西哥等地，穿过巴拿马运河后，又访问巴拿马、洛杉矶和旧金山等城。然后，他们经夏威夷、中途岛和关岛，横渡太平洋，抵达日本。所到之处，他们都受到侨胞的热烈欢迎。

7 月 19 日夜，林遵率舰队驶入吴淞口。24 日，在南京下关举行了归国典礼。

护送 8 舰回国的“吗咪”号在完成任务后，也由美国赠送给中国。该舰原是美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最大的一艘运输舰，著名的美国海军五星上将尼米兹曾任该舰轮机长。1942 年，该舰被重新改装，全部采用先进设备，一次可以装运 300 多万加仑的油，另外，舰上还设有机械厂和医院等。该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加了地中海、北非、特别是诺曼底等地的作战行动，颇著功勋。“吗咪”号移交中国后，改名为“峨嵋”号，成为中国海军最大的一艘军舰。

日本投降后,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确定的原则,中国正式恢复对一度沦陷的台湾、澎湖及其附属岛屿以及南海诸岛行使主权。1946年10月,中国海军在上海成立由美国赠舰组成的“前进舰队”,进驻西沙、南沙群岛。已晋升上校的林遵被任命为舰队指挥官。

在30年代曾占据我西沙、南沙岛屿的法国,此时也派舰在南海海域频繁活动,意欲在日本投降后重新恢复在越南的殖民地,并进而占据西沙、南沙。时不我待,林遵受命之后,迅速组织所部对收复西沙、南沙做了充分准备。

1946年10月29日晚,林遵率领由护航驱逐舰“太平”号、猎潜舰“永兴”号、坦克登陆舰“中建”号、“中业”号4舰组成的“前进舰队”,从吴淞口出发,开始了意义非同寻常的远航。

11月4日,舰队南下驶抵珠江口外海,锚泊于内伶仃岛附近。林遵随即与广东省政府联系,一起研究了登岛进驻的各项具体事项。广东省派省府委员肖次尹和顾问麦蕴瑜为接收专员,各带一组随员,随舰分别前往西沙、南沙。11月9日,舰队到达海南岛南端的榆林港。为了抢在法国人前边,舰队分为两队,“永兴”、“中建”2舰由舰队副指挥官姚汝钰率领,接收专员肖次尹等随行,前往西沙;林遵亲率“太平”、“中业”2舰,并搭载麦蕴瑜等接收人员前往南沙,两队分别完成收复西沙、南沙的使命。

11月27日,西沙分队先期离开榆林港,28日下午驶抵西沙群岛主岛武德岛,开始对西沙实施接管。29日,接管官兵在武德岛上鸣枪升旗,并立下花岗岩质的纪念碑一座,碑的正面刻有肖次尹题写的“固我南疆”四个大字。为纪念“永兴”、“中建”2舰到达,武德和中途崎二岛被更名为“永兴岛”和“中建岛”。

林遵亲率的收复南沙分队,因受盛行的东北季风影响,两次出航都被风浪压回。林遵当机立断,决定取先向西驶越南岬港再转向南沙的航线,终于在12月9日出航成功。12月12日晨,“太平”舰

的了望兵通过薄明的海雾，在舰首方向发现了覆盖着浓密植被的低矮陆地和不时滚过雪一样浪花的礁盘，南沙到了！7时许，“太平”舰在距这个岛西南端一海里多处抛锚。林遵随后命“中业”舰派兵登陆搜索，确认没有敌情后，他兴奋地带着“太平”舰舰长麦士尧等10多名官兵，乘艇上了岛。

经实地勘验并对照海图，这个岛便是南沙群岛主岛长岛。林遵和官兵们在码头旁平毁了刻有日本国徽和“大日本帝国”字样的石碑，然后在原碑座上树起随舰带来的新的主权碑，碑上题刻“太平岛”，用的是“太平”号舰名。接着，官兵们在碑前举行了简单而又隆重的升旗和主权接管仪式。

随后，“中业”舰舰长李敦谦又将“中业岛”主权碑立在南沙群岛的第二大岛铁崎岛上。“前进舰队”还将太平岛以东约7.8海里外的一圆形珊瑚礁以李敦谦的名字命名为敦谦沙洲，用该舰副舰长李鸿庥的名字将太平岛以南13海里的一海岛命名为鸿庥岛。这些名称后经中国政府厘定，一直沿用至今。

作为指挥官的林遵在做完这一切后，又仔细收集了我国历代先人在这一海域活动留下的文物遗迹，考察了岛、礁及附近海域的水文、气象、地质等情况，最后拨留海军陆战队一个排驻守太平岛。舰队于12月15日返航。

12月26日，林遵率“太平”、“永兴”2舰抵达广州，受到各界热烈欢迎。林遵在“太平”舰上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宣布西沙、南沙群岛已胜利收复。1947年元旦，海军总司令部电令嘉奖参加收复南海诸岛的海军官兵，并命令进驻西沙、南沙群岛舰队继续留驻广州，就近处理有关事宜。

1947年底，中国政府内政部向国内外正式公布了经过核定的中国南海东沙、西沙、中沙和南沙群岛各岛、礁、沙、滩名称，并宣布对其恢复行使主权。从此，美丽的南海诸岛复归中国人民的怀抱。

(四)

1947年7月，林遵被任命为海军点验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48年2月，林遵被提升为海防第二舰队司令。

该舰队主要担负长江江防，负责东至江苏江阴，西至江西湖口500多公里江段的江面防务，统归京（南京）沪（上海）杭（杭州）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指挥。海防第二舰队此时仅有3艘护卫舰和3艘炮舰以及两个艇队，分为5个防区：第一防区驻江阴，第二防区驻镇江，第三防区驻南京，第四防区驻芜湖，第五防区驻安庆，每个防区指定一名舰长兼任防区指挥官。

海防第二舰队虽然舰艇或老旧，或吨位小，但一旦爆发战事，要他们阻挡解放军过江，面对尚没有水上力量的解放军和长江两岸手无寸铁的百姓，这些舰艇无疑还是有很大杀伤力的。林遵对形势有较为清醒的认识，深知国民党的腐朽统治已维持不了多久，阻挡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军就是与人民为敌，逆潮流而动。在历史的转折关头，他开始认真思考调整自己的人生航向了。

1949年初，为把解放军阻挡在长江以北，蒋介石令海军总司令桂永清迅速扩充被视为江防骨干的海防第二舰队的实力。到1949年3月，海防第二舰队所属及受其指挥的已有20多艘军舰和近60艘炮艇。但此时，人民解放军兵锋已抵江北，海防第二舰队舰艇在长江江面上直接处于解放军炮火的威胁和控制之下。国民党统治大势已去，海军官兵均感前途无望，“黄安”舰、“201”号扫雷艇特别是国民党最大的战舰“重庆”号巡洋舰的先后起义更是全面动摇了士气。尽管海军当局急忙“整肃军纪”，甚至不敢再派单艘舰艇执行任务，但官兵的离心趋向已是无可挽回了。

这时，在多数官兵具备起义思想基础和起义的客观条件日趋成熟的情况下，已由代将临时军衔晋升少将的林遵开始利用自己的身份，向一些思想可靠的进步军官摸底，做工作。

与此同时，地下党组织也开始着手争取海防第二舰队起义，其主要目标就是争取林遵。

经过周密安排，中共于1948年底派地下党员林亨元与在上海《中国海军》月刊社任社长的郭寿生取得联系。郭寿生早在1924年在烟台海校读书时就加入了党组织，并在该校组建了旧海军中第一个共产党小组和共青团组织。北伐战争时期，郭寿生在上海策动海军起义，支援周恩来领导的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后因故与组织失去了联系。这次，林亨元向他传达了周恩来同志要他“归队”的指示，并请他出面策动林遵率第二舰队起义。

郭寿生比林遵高两届，两人在烟台海校读书时即相识。他领受任务后，三次在镇江北固山约林遵晤谈，一方面坦言自己是奉周恩来副主席之命前来为海防第二舰队、也为林遵争取一条光明出路，另一方面根据自己了解的信息，再次为林遵分析了时局，指出起义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老校友开诚布公的引导和透彻的分析，更使林遵增添了信心，他表示同意率部起义。

与此同时，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中共华东局和上海地下党组织也分别派人与第二舰队“永绥”舰舰长邵仑、参谋欧阳晋、轮机长阙晓钟等人多次接触。我党还通过国民党进步的高级海军军官周应骢、曾国晟等做海防第二舰队官兵的工作。

千头万绪一下子都集中到林遵和海防第二舰队。为了避免渠道太多，互相干扰，甚至泄密，林遵决定只认郭寿生、林亨元这条线，并通过其他渠道向外放风：“林遵思想顽固，不便争取。”同时，林遵还选定了确实可靠的助手，形成了起义的核心。

1949年3月间，林亨元与林遵在镇江秘密会晤，商定了起义的具体事项。根据商定的意见，林遵利用“重庆”舰起义后桂永清急于控制住部队的想法，在4月中旬将舰只分别集中在几个港口内，并停止了巡江，还向我军通报了合适的渡江地点，从而使千里江防洞开了许多门户。

4月21日,我军发起渡江战役。桂永清急忙召集在南京的各舰舰长,要他们冲出长江,却因邵仑等人的搪塞而迟迟不得落实。22日午夜,连接桂永清三道急电的林遵从芜湖赶到南京海军总司令部。急于保舰出逃的桂永清再次要求林遵率舰撤往上海,并许以海军中将副总司令的高位和青天白日勋章的奖赏。林遵以难当大任为由,假意恳请桂永清亲临监督舰队或由海军参谋长等人上舰协助指挥。桂永清等人岂肯冒险前往前线?布置完任务便匆忙溜之大吉了。

4月23日晨,林遵一返回笆斗山舰队锚地,立即召集各舰舰长和两个炮艇队队长在临时旗舰“永嘉”号上开会。林遵首先介绍了桂永清等“海总”官员已逃到上海的情况,并有倾向性地分析了战局,启发大家明智地考虑切身安危和全体官兵的前途,发表对舰队去留的意见。林遵经过耐心诱导,基本控制着会场的局面,但赞成起义的多数军官和反对起义的少数军官争论了数小时,还是没有结果。最后,参谋戴熙愉建议以不记名投票方式做最后决定,为大家所接受。表决结果,参加投票的16人中,8票赞成“留下来”起义,2票反对,6票弃权。林遵十分高兴,最终决定起义,并布置“惠安”舰舰长吴建安和“江犀”舰舰长张家宝起草给解放军驻浦口部队的联络信;各舰暂不中断与“海总”的无线电联系,以迷惑桂永清;各舰近岸锚泊以便舰员上岸防空。此时是1949年4月23日15时30分。

当天傍晚,几名反对起义的舰长经过密谋,在“永嘉”舰利用尚未降下的司令旗,指令各舰升火起锚,并带头开足马力向下游逃跑。会后已移驻“惠安”舰的林遵立即用报话机喊话,把愿意起义的“永绥”、“楚同”、“安东”和“美盛”4舰叫了回来,“永嘉”、“永修”、“永定”、“永绩”、“武陵”、“兴安”和“美亨”7舰相继下逃。其中,“兴安”号逃到江阴附近被我军炮火击中搁浅,“永绩”号也在附近因惊慌失措搁浅,两舰后均被我军俘获。

林遵率领“惠安”、“永绥”、“安东”、“江犀”、“楚同”、“联光”、“太原”、“吉安”、“美盛”等9艘军舰和第一机动艇队、第五炮艇队的21艘炮艇共计30艘舰艇、1271名官兵起义，加入人民解放军。

(五)

4月30日，林遵和全体起义官兵给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去了致敬电，电文充分表达了起义官兵对领袖的敬意和脱离反动阵营、参加建设人民海军的决心。

5月18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给起义官兵复电，称赞他们的起义是“南京江面上的壮举”，“是值得全国人民热烈欢迎的行动”。

1949年8月28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分别接见了林遵等起义的原国民党海军高级军官。毛泽东对林遵等说：“你们有科学知识，有技术，我们新海军要向你们学习；人民解放军有优良的政治工作和战斗作风，你们也要向新海军学习。”接见后，毛主席还亲自为海军题词：“我们一定要建立一支海军，这支海军要能够保卫我们的海防，有效地防御帝国主义的可能的侵略。”后来，林遵当选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国防委员和全国人大代表。

1949年5月，林遵出任刚成立的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海军第一副司令员，1951年任解放军军事学院训练部海军教授会主任、海军系副主任，1957年任刚组建的海军军事学院副院长。这期间，林遵一直主管教育训练，为人民海军的发展，尤其是海军专门人才的培养和海军院校建设，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桃李遍布海疆。1955年，林遵被授予海军少将军衔和一级解放勋章。

1974年，林遵被任命为海军东海舰队副司令员。在任内，他不顾病体虚弱，经常下部队视察、调研，足迹遍及舰队防区内的60多个单位，直到1976年鼻咽癌复发，他才不得不离开伴他戎马一生的舰艇。1977年8月，林遵加入中国共产党。1979年7月16日，

林遵病逝于上海，终年 74 岁。

林遵生前曾对身边的同志说：“我一生爱海军，爱海洋，又是东海舰队的副司令，坦骨东海，正是死得其所。”林遵病逝后，遵其遗愿，他的骨灰被撒入东海的万顷碧波中。

七十二载海军情

——记邓兆祥

著名的爱国主义者邓兆祥，是中国海军史上一位传奇式的将领。他11岁考入北洋政府时期的黄埔海军学校，先后就读、留学、工作和参与领导建设的国内外海校恰好有11所之多；他曾干过水鱼雷、枪炮、航海等多个专业，不惟巡弋航迹留在中国的江河、近海，也曾留在太平洋、印度洋和大西洋等苍茫三大洋上；他曾是国民党海军王牌战舰——“重庆”号轻巡洋舰受人瞩目的舰长，却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毅然参加起义，驾舰驶向光明的新岸。当他以83岁高龄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退役而转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之时，他创下了在海军中服务72年的纪录。

（一）

邓兆祥，1903年4月出生于广东省高要县双木棉村（今属肇庆市）。其父在当地黄江税务局做查货员，家境虽称不上富足，但也衣食有余。秉持着小康之家，邓兆祥的父亲不仅要有正房，还纳有一位偏室，共育有12个孩子。邓兆祥在兄弟姊妹中排行第六。

邓兆祥的幼年是无忧无虑的。但他7岁那年，父亲突然病亡，家道就此中落，并渐为贫困所扰。加上家中人口多，生活负担日显沉重。为生计所迫，邓兆祥的几个兄长很小就外出学手艺谋生。上学上到11岁时，邓兆祥也准备辍学到广州去学做生意。

邓兆祥有个挺要好的朋友，叫邓佩光，是黄埔海军学校的毕业生。邓佩光年长邓兆祥10岁，十分喜爱邓兆祥的聪灵颖慧，从海校

放假回家时，常给他讲海校的种种见闻，还帮着他学习英语。邓佩光听说邓兆祥已停学准备外出谋生，便向他建议说：“黄埔海军学校正在招生，且膳食服装均是公费，何不前往一试？”

黄埔海军学校始建于1887年，清末时称黄埔水师学堂，民国成立后改称黄埔海军学校。困窘之中的邓兆祥听到海校招生的消息，先是高兴，继而又有些担心。一则因为海校招考及生员管理制度严格，需要具备相当身份的人保荐才能报考；二则担心自己年龄不够。还是邓佩光帮忙帮到底，他带着邓兆祥来到广州，找到任广州警察厅厅长的哥哥邓瑶光，求他相助。

邓瑶光原与邓兆祥的父亲是熟人，又念同姓同宗，遂写信给海校校长，为邓兆祥引荐担保。邓兆祥拿着邓厅长的亲笔信，又虚报了两岁年龄，才报上了名。

入学先考数学、英语两科，通过后再进行语文考试。身高1.5米出头的邓兆祥以《国防以海军为重》的精彩短文博得考官青睐，顺利过关，1914年秋被录取为黄埔海军学校第十六期学生。

按学制，邓兆祥在黄埔海军学校学完5年课程后，应再转入吴淞海军学校学习3年海军专科方可结束学业。但1920年2月，吴淞海校因办校经费无着而被迫停学，刚入校学习1年的邓兆祥不得已和其他7名学生一起转入烟台海军学校。在烟台海校学习航海驾驶专业1年后，邓兆祥等人又转入南京鱼雷枪炮学校学习。

在南京鱼雷枪炮学校的学程原应为1年3个月，但学程届满时又生变故：由于军阀混战，海军也是四分五裂，军令不通，根本没有军舰供毕业的海校学生实习。无奈，邓兆祥等一班学生只好舰上操作陆上练。

不久，从在校学习的北洋政府海军总司令杜锡珪的副官口中透露出这样一个情况：南方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风起云涌，海军的主要战舰都聚到广东去了。邓兆祥进而了解到，在广东担任护

法海军舰队司令的温树德是自己在烟台海校学习时的校长余振兴的同学，两人都是烟台海校第一期毕业生，并一起留学日本、英国。为了能通过舰上实习学到真才实学，邓兆祥找到余振兴说明了自己的愿望，并求其相助。余振兴遂为邓兆祥等人给温树德写了封介绍信。

邓兆祥等来到广东后，温树德起初对他们心存疑忌，怕他们是北方派来的奸细，后来看出他们还都是刚出校门的学生，才放心将他们派舰实习。邓兆祥上了“肇和”号练习舰实习航海，后又到“海琛”号巡洋舰实习。

1922年9月，护法运动因军阀陈炯明的叛乱而失败，广东海军内部分化，粮饷无着。延及次年，情况更加严重，在直系军阀分化收买下，温树德于12月率“海圻”、“海琛”等主要舰只北驶青岛，投靠了直系，组成渤海舰队。邓兆祥随舰来到青岛，并结束实习，被派往“华甲”号运输舰任枪炮副。至此，他完成了在4所海校航海、枪炮、水鱼雷等3个专业的学习。

应该说，这样长的学习生活为邓兆祥日后服役海军打下了较为扎实的知识和技能基础。特别是在烟台海校期间，一位曾留学日本的教官常向他们讲述亲眼所见日本将甲午战争中俘获的北洋海军“镇远”、“靖远”舰的铁锚、锚链当众陈列的耻辱，在邓兆祥心中引起极大震撼，益发明确当海军固海防的信念。后来在做海校教官、校长时，他总忘不了给学生们讲述这个故事。

（二）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11月，战事结束，奉系获胜，张作霖收编了渤海舰队，并对舰上原有官兵逐步调换。邓兆祥也被调到岸上，担任东北海军第二舰队舰队长袁方乔的副官。

在广东海军“飞鹰”舰任舰长的舒宗鑑是邓兆祥黄埔高一届的校友，他在书信来往间问邓兆祥是否愿意到舰上工作，邓兆祥正求

之不得，便爽快答应。1928年，邓兆祥回到广东，先后在“飞鹰”号上任枪炮长、航海长和副舰长。

1929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正式颁令组建直隶行政院的海军部。海军部成立后，把培养人才当作复兴海军的要务，经与英国联系，决定向英国派出20名海军留学生，其名额分配是：中央海军所属的第一、第二舰队14人，东北海军所属的第三舰队4人，广东海军所属的第四舰队2人。广东第四舰队选考出的中榜者是邓兆祥和烟台海校第十五期毕业生陈香圃。

邓兆祥到南京海军部报到时发现，20个留学名额并不一样，其中8个是军官生，12个是见习生。当时他已是少校副舰长，理应划为军官生，但却阴差阳错地被划到见习生中去了。身份不同，待遇自然也不一样。但为了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他还是未加计较地接受了现实。1929年11月，他与林遵和后来任海军参谋长的周宪章等人，作为海军复兴时期的第一批留学生赴英国学习海军。

抵英后，邓兆祥先被分到英国皇家海军地中海舰队所属的“决心”号战列舰上实习，后进入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学习指挥专业的基本课程。经全面考核，他作为最优秀的学员进入皇家海军各专科学校深造。

1934年4月，邓兆祥学成回国，先后担任“宁海”号巡洋舰枪炮长、“通济”号练习舰副舰长，并被临时派往空军学校和空军教导总队讲授海军技术。第二年，32岁的邓兆祥与17年前就由母亲作主订了婚的未婚妻黄景兰结婚，这时黄景兰也已28岁了。

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邓兆祥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民族自卫战争中。

1938年11月，原设于南京的海军水鱼雷营迫于敌情恶化，由吴城迁至湘阴，最后撤到湖南辰溪。水鱼雷营主要担负培训海军水鱼雷专业技术兵员及海军学校学生见习水鱼雷专业的任务，而水鱼雷均为当时处于劣势的中国海军与日寇周旋的利器，故海军当

局对水鱼雷营很重视。因为邓兆祥留英时专修过水鱼雷专业，于是便派他出任该营营长。

1939年1月，西江形势吃紧。邓兆祥奉海军总司令部命令，率布雷、测量两队兵员赶赴梧州，协同军委会桂林行营江防处筹划防务。6月，海军布雷队编制确定，其第二分队归水鱼雷营营长邓兆祥指挥，参与了长沙会战中的湘河布雷战。

1940年，邓兆祥升任第二舰队司令部中校参谋。1942年，他又奉命来到贵州桐梓，担任迁移至此的马尾海校训育主任。

当时，海军总司令陈绍宽与军政部长陈诚之间矛盾极深。1941年，马尾海校因战火迫近搬迁时，陈绍宽请军政部下拨经费，陈诚就是不予批准。当时学校已在迁移途中，陈诚却命令学校回迁，陈绍宽也顶着不理睬。就这样，学校虽然迁了，但迁移费用却无处申报。

海校是培养海军抗战人才的场所，必须办好。面对拮据的学校开支和人心浮动的学生，邓兆祥深感自己责任重大。身为中校训育主任的他带头过节俭的生活，并向全体学生宣布：“抗战不胜利，我不穿皮鞋！”从此，他坚持穿布鞋粗衣，把节衣缩食省下来的钱都用来接济家有困难的学生。他还题写了“雪甲午耻”几个大字，制成匾额，悬挂于学校图书馆的大门上，意在激励学员毋忘国耻，誓死驱逐倭寇。

1945年9月，中国海军接收了战败投降的日本作为赔偿物赔付的1350吨驱逐舰“宇治”号，改名“长治”号。邓兆祥在海军总司令陈绍宽的亲自指挥下，具体负责该舰的接收工作，并被任命为该舰的第一任舰长。此时，“长治”舰在整个中国海军中实力最强。

不久，军委会命令陈绍宽派“长治”号前往渤海湾，堵截由胶东向辽东半岛渡海的八路军北进东北部队。但陈绍宽此时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深为不满，不愿加入内战，因此乃以军舰需要修理为借口，抗命不遵。不久，他亲率“长治”舰南下，视察台湾左营军港去

了。

(三)

战后海军重建,除接收日本赔偿和参与分配日本残余军舰外,还大量接受英国和美国的援助。根据中英两国政府在二战期间达成的协议,英国计划赠给中国 13 艘舰艇,其中包括轻巡洋舰 1 艘、护航驱逐舰 2 艘、巡逻艇 8 艘、潜艇 2 艘。在赠送了几条军舰后,英方因经济上的困难,对无偿赠舰渐露悔意,提出将余下未赠各舰改为租借,租用期满再由中国价购。后经交涉,英方同意将轻巡洋舰与日军入侵香港时英方撤退带走的 6 艘缉私船相抵,另一护航驱逐舰仍作租借,租期 5 年。

早在 1945 年,中国海军即派出 90 名官兵前往英国学习,准备接收英国赠舰。同年夏,国民党军委会组建“赴英接舰参战学兵总队”,下设两个大队,邓兆祥出任第一大队大队长。但学兵总队未及赴英,日本已经宣告投降,总队中数百人被抽去接收日舰。到 11 月总队赴英时,首批人员只剩了 240 余人,因此邓兆祥等又在南京、上海补召学兵 584 名,于翌年 11 月前往英国接舰。这也是邓兆祥第二次赴英。

1946 年 11 月 29 日,邓兆祥率官兵 600 余人登上了英国万吨轮“玛格丽特皇后”号,于 12 月上旬抵达英国。尔后,学兵们被分配到英国皇家海军鱼雷、枪炮、轮机、通信等各专业学校学习,学毕再上舰实习操作。

1948 年 5 月 19 日,中英两国政府在英国朴次茅斯军港举行军舰交接仪式。皇家海军朴次茅斯基地司令弗雷泽上将和中国驻英大使郑天锡,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交接文件上签字。为纪念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赠给中方的“奥勒路”(译为“曙光女神”)号轻巡洋舰更名为“重庆”号,由已晋升上校军衔的邓兆祥出任舰长。另一艘由英国租借给中国的护航驱逐舰,则以孟良崮战役中阵亡的整

编 74 师师长张灵甫的名字命名为“灵甫”号。

5 月 26 日晨,随着长鸣的汽笛,“重庆”号和“灵甫”号在邓兆祥的统领下驶离朴次茅斯,启航归国。他们途经直布罗陀、马耳他岛、塞得港、亚丁、科伦坡、新加坡、香港,履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之波涛,沐地中海、红海之风雨,航程 1 万海里,于 8 月 23 日驶抵上海。

“重庆”号轻巡洋舰 1936 年 9 月 20 日下水,标准排水量 5274 吨,满载排水量 7500 吨,配有 152 毫米双联装主炮 3 座,102 毫米四联装副炮 2 座,高射炮、机枪、鱼雷发射管及雷达、声纳等装备齐全先进,在当时属战力较强的一型舰艇。该舰在二战中战绩辉煌,曾参加过围歼德国超级战列舰“俾斯麦”号和北非登陆战、西西里岛登陆战等重大战役,共击沉德、意法西斯巡洋舰 1 艘、驱逐舰和扫雷舰各 3 艘、登陆舰 7 艘、商船 21 艘,在同型舰中,战果名列榜首,被称为“银色魔鬼”。

对这样一艘功勋战舰肯忍痛割爱,英国人确实是下了狠心。不过,他们虽对中方接舰的官兵上至邓兆祥下到普通水兵都严加考核培训,似乎仍对中国海军军人的技术和能力不放心,在“重庆”号离港时,英方给舰上派来了联络官和几名轮机士。这些傲慢的英国海军官兵,在航行途中屡屡违反舰规,随意抽烟,乱丢东西,打牌、酗酒。邓兆祥几次要求节约用水,英国轮机士故意开着水龙头任水流淌。英方联络官明知在舰上拍发电报须经舰长签发,却擅自向外拍发电报。恰在这时,一名英国轮机士故意与中国舰员发生冲突,中国水兵群情激愤,邓兆祥决定待舰中途一靠岸,就将这名轮机士遣送回英国。英国联络官表示,如果这样做,英方人员将全部离舰,“重庆”舰以后的航行、补给概不负责。面对恫吓,邓兆祥针锋相对地表示:如果贵方要求上岸,我们将不再挽留!

“重庆”舰上的这场风波引起了英国皇家海军总部的重视。“重庆”舰到达科伦坡后,英国武官出面调停。最后,所有英国轮机士在

科伦坡上岸，只留联络官随“重庆”舰到了香港。

（四）

“重庆”号回国，成为国民党海军最大的一艘战舰。这时，解放战争已进入决战前的关键时期，国民党进行的反共反人民内战失尽人心，国共胜负大局渐趋明朗。但蒋介石不甘心，又把“重庆”号作为王牌驱使到了内战前线，希望它给战局带来哪怕一线转机。与蒋介石的愿望相反，这时舰上下级军官和士兵“异动”倾向已在萌生并迅速增长，这些人原都是在抗战胜利前后怀着寻找出路的心情和报效国家、振兴海防的志愿投身海军的，而眼下，本应用以抵御外侮的战舰却要用来残杀自己的同胞，残酷的现实动摇了他们的理想，失望、彷徨和疑惑与日俱增。另一方面，国民党政府官员以爱国为号召，欺骗舰上官兵把积攒的外币兑成金元券，而金元券随即飞速贬值，加上士兵几个月未发薪饷，一些官兵的家庭生活无着，更是雪上加霜。

1948年10月，“重庆”舰被派往辽沈战役塔山前线，无功而返。回到上海不久，从英国回来的士兵便逃亡了三分之一，另外一些下级军官和士兵则在寻找新的出路。这段时间，邓兆祥也陷入苦闷之中，他思索着战舰和自己的前途，也思索着自己应该作出的选择。

1949年2月25日凌晨，停泊在吴淞口外的“重庆”舰上，宁静突然被紧张的脚步声和低沉的喝令声所打破。受解放战争胜利形势鼓舞和中共政策影响的爱国士兵发动了起义！

起义发动后，控制了军舰的起义士兵派代表来到邓兆祥敞开着舰长休息室，向他说明了情况。

对于士兵们的行动，邓兆祥并不觉得突然，8天前的2月17日，“重庆”舰奉令待命吴淞口，准备开赴江阻截解放军渡江。那时，烟台海校毕业的国民党海军上海指挥部主任周应骢少将曾受地下

党委托，向邓兆祥暗示：“向北开。”此刻，邓兆祥的态度至关重要，因为几十名普通官兵要把这艘大舰毫无阻碍地由国统区开往解放区，单从技术角度而言也近乎天方夜谭。起义士兵们希望邓兆祥舰长能够加入起义行列，这不仅可以保证军舰航行安全，而且能够稳定全舰官兵的情绪。

正如士兵希望的那样，深明大义的邓兆祥作出了他一生中最具历史意义的选择——参加起义。他登上舰桥，指挥军舰驶出黎明前的黑暗，航向北方。

2月26日上午，“重庆”舰经过35个小时的航行，安抵解放区烟台港，不久，又奉命转往辽西葫芦岛，受到中共中央和地方党政军领导及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4个月前在同一个地点，“重庆”舰还被视为国民党的内战利器，4个月后，邓兆祥驾舰重来故地，留下的却是“重庆”号舰史上最为辉煌的航迹。

“重庆”舰起义，非同寻常，举世瞩目。起义3天后，国民党政府方得知这一消息。痛失王牌战舰，带给他们的不仅是战斗力上的极大削弱，更是军心士气的瓦解和政治上的强烈震撼。已“隐退”奉化的蒋介石闻讯气急败坏，下令将海军总司令桂永清“撤职留任，以示惩戒而察后效”，所有海军舰只则暂泊停航，未有命令不得移动。同时，命令空军不惜代价找到并炸沉“重庆”号，并大造舆论，宣扬其空军“战果”和“重庆”舰的“下场”，以图籍此弹压日益浮动的军心民意，挽回影响。

国民党空军连续数日在解放区各港口上空侦察。当时，为隐蔽自己，“重庆”舰驶到葫芦岛港防波堤一端，并用树枝遮掩。没想到，这样反而露出了破绽，国民党空军飞机发现葫芦岛港防波堤突然“加长了一截”，便低飞侦察，“重庆”舰终于暴露了，随后便是大机群的狂轰滥炸。邓兆祥率领全舰官兵协同解放军奋力进行抗击，但由于敌机慑于舰上炮火，采取的是高空水平轰炸，舰上及陆上防空火力鞭长莫及，加上战舰弹药也无从补给，战至3月20日，“重

庆”舰已多处中弹受损，舰员也有伤亡。为了保存这艘当时中国最大的巡洋舰，辽西军区领导报请中央军委同意，于当日将“重庆”舰海底门打开，让战舰自沉。

得悉“重庆”舰起义的消息及护舰战斗的经过，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于3月24日给邓兆祥及“重庆”舰全体官兵发来了一份意味深长的嘉勉电，电文说：“你们的起义，表示国民党反动派及其主人美帝国主义已经日暮途穷。他们可以炸毁一艘‘重庆’舰，但是他们不能阻止更多的军舰将随你们而来，更多的军舰、飞机和陆军部队将要起义站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方面。”并勉励“重庆”舰官兵做“新中国人民海军建设的先锋”。

嘉勉电对邓兆祥及全舰官兵无疑是巨大的鼓舞，也是对形势的正确预见。“重庆”舰起义不久，林遵率国民党海军海防第二舰队在南京芭斗山起义，叶裕和率江防舰队在重庆起义，国民党长江防线重要支援点江阴总炮台官兵起义，撤退台湾后又到长江口骚扰的“长治”舰起义，……。到1949年底，国民党海军共起义16起，起义舰艇72艘，官兵3377人。

“重庆”舰的起义还带来了一个小插曲，就是英国在移交“重庆”舰时，其“赠舰计划”中尚余2艘潜艇未交付。得知“重庆”舰起义，英方考虑如此大舰都能转舵易帜，小小潜艇更不保险，便以此为借口，停止了潜艇的赠交，并将在英国受训准备接收潜艇的国民党海军技术人员悉数遣回，国民党海军的潜艇梦也就此破灭。

（五）

“重庆”舰自沉后，中央军委决定在安东（今辽宁丹东）成立一所临时性的海军学校，主要是对国民党海军起义人员进行思想教育，邓兆祥被安排担任安东海军学校的校长。

建国前夕，邓兆祥由毛泽东主席点名，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并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还有幸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

大典。当年轻的人民海军方队迈着矫健的步伐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人民群众的检阅时，邓兆祥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因为这支方队是由“重庆”舰起义官兵组成的。两天后，朱德总司令把开国大典阅兵评比第一名的锦旗颁发给了海军方队。

开国大典后，朱德派聂荣臻特邀邓兆祥、林遵等人到中南海做客。在专门为他们准备的宴会上，朱总司令频频举杯向他们敬酒，感谢他们为新中国的解放做出的贡献，并希望他们继续努力，为人民海军的建设做出新贡献。

此前，毛泽东主席还专门委托周恩来接见了出席第一届政协会议的邓兆祥、林遵、周应骥、郭寿生等4名海军起义将领。周恩来亲切询问了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并征求他们对人民海军建设的意见。周恩来坦诚相见，诸将领畅所欲言。邓兆祥提出，初创的人民海军需要人才，旧海军中有许多人有爱国思想，懂专业技术，应该请他们出山，用其所长。周恩来当即表示，一定把他们的建议向毛主席汇报。后来，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关心、过问下，许多旧海军的高级官员被分配到重要的工作岗位，人民海军还吸收录用了4000多名原国民党海军官兵。

邓兆祥在完成了安东海校的使命后来到青岛，领导创建了海军快艇学校，并于1950年8月出任第一任校长。此后不久，中央军委决定打捞修复“重庆”舰，并为此组建了专门的“黄河部队”。作为“重庆”舰的老舰长，邓兆祥被抽调到“黄河部队”，为打捞“重庆”舰做了大量的组织领导和具体的技术性工作。1951年6月初，“重庆”舰打捞出水。后因该舰损毁较为严重，修复或利用舰体改装代价均太高，1954年，军委决定中止修复“重庆”舰的方案，对该舰作如下处理：舰体继续保养好；部分机器供修理其他舰艇使用；部分装备部件交予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和大连海校作为教学器材。“黄河部队”随之撤销，邓兆祥调任大连海军学校副校长。

此后，邓兆祥又相继担任海军青岛基地副参谋长、副司令员、

北海舰队副司令员、海军副司令员等职，1955 年被授予海军少将军衔，196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邓兆祥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83 年后，他先后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七、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1998 年 8 月 6 日，邓兆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 95 岁。

主要参考书目：

- 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1961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法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1957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1957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 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1957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 戚其章主编：《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1989—1991 年中华书局
- 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1958 年中华书局排印本
- 赵尔巽：《清史稿》，1977 年中华书局排印本
- 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1982 年海洋出版社
- 杨志本主编：《中华民国海军史料》，1987 年海洋出版社
- 齐国华、季平子编：《甲午中日战争》（盛宣怀档案资料之三），1980、1982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 陈霞飞主编：《中国海关密档》，1990—1997 年中华书局
- 谢忠岳编：《北洋海军资料汇编》，1994 年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 朱有瓚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1983 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1991 年江苏古籍出版社
- 李鸿章：《李鸿章全集》，1997 年海南出版社
- 方伯谦：《益堂年谱》，载《方伯谦问题研讨集》，1993 年知识出版社
- 程慎修堂编：《程璧光殉国记》，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本

高晓星编:《陈绍宽文集》,1994年海潮出版社
戚其章:《甲午战争史》,1990年人民出版社
姜 鸣:《龙旗飘扬的舰队》,1991年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孙克复、关捷主编《甲午中日战争人物传》,1984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包遵朋:《中国海军史》,1974年台湾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
王家俭:《中国近代海军史论集》,1984年台湾文史哲出版社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1987年中华书局影印本
姜 鸣:《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日志》,1994年北京三联书店
唐宏等编著:《烟台海军学校》,1994年海洋出版社
陈书麟、陈贞寿编著:《中华民国海军通史》,1993年海潮出版社
萨杰仁:《萨镇冰传》,1994年海潮出版社
《中国近代海军》编辑部编:《中国近代海军》,1994年海潮出版社
陈书麟:《陈绍宽与中国近代海军》,1989年海洋出版社
《闽侯县志》
《番禺县续志》
《闽贤事略初稿》
《海军杂志》
《海军期刊》
《海军整建月刊》
《海军抗战事迹汇编》
《福建文史资料》
《传记文学》(台湾)
《革命人物志》(台湾)

责任编辑:崔树森

封面设计:唐 宏



9 787801 510556

ISBN 7 - 80151 - 055 - 0 /K · 3

定价:19.80 元